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

杨奎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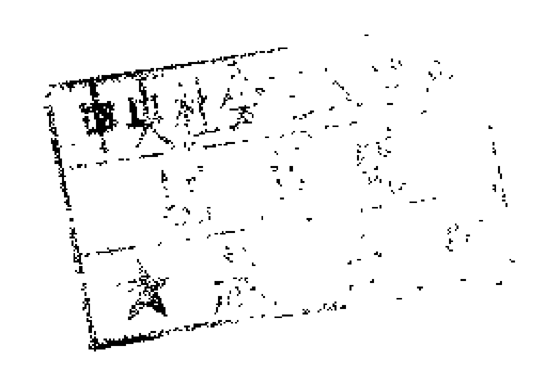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

杨 奎 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
杨奎松

责任编辑：王春华　　封面设计：来玉红
责任校对：吴白桦　　版式设计：任志珍

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编：100091　　电话：258.2931　258.186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1992年10月第1版
字数：365千字　　印次：1992年10月第1次
印张：14.25　　印数：1—3000　册

书号：ISBN 7-5035-0575-3/D·296　定价：7.70元

序

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又是如何向前伸延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最初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故乡，如果我们还记得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在二十八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几乎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压迫之下，我们就应当想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毕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同时，也正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才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对世界的特殊影响。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它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多少年来，我们深入地探讨了它的内部原因，分析说明了国内社会、阶级、党派集团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中国革命的任何一种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很快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政策？为什么中国革命者

会主动要求接受来自外国的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指导？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出自一个外国人的主张，而整个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外国的顾问和代表人物来规划和设计？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对中国革命者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苏维埃”革命口号？为什么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的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在抗战期间既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存在矛盾，而又明确地把它们看成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为什么共产党要把政治民主化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并且一度把资本主义的“总司令”美国看成是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助力，而它最终又为什么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此相关连，我们似乎更应当试问：这样一种状况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条件下，究竟对于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呼应的？而40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中心苏联关系若即若离之际，中共的理论观念又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和政策？换句话说，中国革命的策略，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我们全都知道，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内因往往也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外部原因确实在发生作用。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地，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从20年代而不是从1905年开始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显然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密切关系的。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高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国革命及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外因决定论者。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这种办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并没有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去发展自己，从主张世界革命，主张保卫苏联，主张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问题；以致提出“中间地带革命”的思想，他们曲折地却又是勇敢地走出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如此，失败还是成功之母，成功中也依旧包含着失败，外因也仍旧通过内因在起作用，历史总还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依

旧充满了荆棘。

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的这种研究能够使人增加对于中国革命曲折程度以及艰难程度的了解，并注意到中国革命产生和发展的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它们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因果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本书中因为我自身的水平和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而存在的各种不足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和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以俄为师”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14—1918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德国被打败了，但这场战争却使这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多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大国，成为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的主要债务国①。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战争，使欧洲国家备受损害，整个欧洲经济在以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远在太平洋的两大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和日本，却明显地受到这场大规模战争的刺激，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②。

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不仅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利益，而且对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特别是对英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都明显地形成了威胁，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形式和利益关系迅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这一情况，战后各国政府都有清醒的意识，他们不能不千方百计力图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战争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这不可避免地牵制了英、法等国政府的极大精力，也自然而然地把他

---

① 到1922年11月，欧洲各国所欠美国的债务，包括未付利息在内，总数达116亿美元，其中英国为47亿，法国为38亿。

② 在战后的1920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都低于战前1913年的水平，只有美国和日本是呈发展的趋势。不仅如此，如果以1913年为100的话，美国1920年制造业生产的年度指数达122.2，日本更高达176。

们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拖累了进去。一连几年，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在家门口总是争吵不休，对远东事端却力求调和。不仅如此，战争的结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促使各大国的政治家们从各自利益的角度来寻求建立一种相互牵制和妥协的基础。这导致了1919—1922年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联盟和国际法庭这一类前所未有的国际协调和国际制裁性质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野心，自然具有极为严重的意义。

中国是远东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尚未被瓜分和独霸的落后国家。帝国主义之所以未能吞并中国，显然是同它的过于庞大有关。1840—1900年间，列强们兵力最多的不过100万（俄国），最少的仅几万人（美国），世界头号殖民帝国英国的兵力也不过是50余万人，后起的日本则只有20余万人。要把这样少的兵力单独投入到有数百平方公里，4亿人口的中国来，同时又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殖民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而当各国列强时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到中国来之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这都要支配中国就不仅仅有数亿中国人可能成为敌人，而且将使自己成为其它列强的敌人。于是，1899—1900年，事情有了合乎逻辑的发展，美国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解决了这个难题。尽管各国政府仍旧抱有自私和卑鄙的目的，争吵和战争依旧不断发生，但是，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资格至少在形式上被保全了下来。可是，大战的爆发，使这一切发生了某种变化。野心勃勃的日本公开试图乘机改变这种状况了。

1914年8月，欧洲战争开始，协约各国为防止远东祸起，力劝日本加入协约国，日本遂乘机要挟，迫使英、法、俄等同意日本可在与协约国权利无关之中国各地“自由行动，不加干涉”，

并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①]。随后，日即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诡称胶州租借地应交付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紧接着，日本公开对德宣战，并借口军事需要强行霸占了胶济线。11月7日，日军攻取青岛，对德作战结束，但它却突然强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且发出最后通牒，强迫中国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所附中日两国的换文十三件。迫使中国公开承认日本可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同时可以在南满和东蒙地区为所欲为。

日本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不能不引起欧美各列强的不满。但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要让他们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中国来同日本一争高下，不仅战争中不可想象，即使在战后也绝无可能。

在这时的大国中间，唯一对日本的扩张有条件进行干预的，只有美国。美国毕竟不能忽视与其有着直接地理联系的远东地区所发生的问题，更无法回避日本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国。日本的行动无疑严重破坏了美国所强调的"门户开放"的原则。但是，要让陆军兵力总数还不及日本2／5，海军军舰总吨位只多出日本2/10的美国阻止日本的行动，自然也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在孤立主义仍旧盛行的大战时期，即使是有关部分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深受国会和政党分权化牵制的美国政府，也绝难反映强烈。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之后，其对日本的妥协更是不可避免了。11月2日，双方终于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和蒙古等地区的"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主义和机会均等的原则的承诺[②]。

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观念，毕竟在形式上与大多数列

① 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1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0、197页。

② 全文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04—105页。

强有所区别。其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倾向不仅较其它殖民大国为强，而且对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往往有所影响。这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其复杂的特点。其光绪年间主动退还庚子赔款近2900万美元，用于中国教育事业①，这在形式上终究是对中国表示友好的一种姿态，从而得到了当时中国舆论界的赞扬。同样，美国也是最早提出和始终主张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帝国主义大国，尽管其实质上不过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并且它时时在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强权政治时代，美国的这种主张毕竟是受到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欢迎的。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更明确主张公开外交，废除秘密外交，取消关税壁垒，削减和全面限制军备，绝对公平地调整一切殖民地，并建立国际联合组织，以保证国家不论大小均享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他甚至宣称："和平会议之际，必自始至终，公开于世界，秘密授受之政策，使不再见于今日。""故凡悖逆正义之行为，吾人必尽其所能以反对之"，必"使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与生命之安全"②。毫无疑问，美国总统的这一主张，再度为美国在各弱小国家和民族中，特别是在中国，赢得了声誉。

大战结束后，中国获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权利，第一次得以与各列强共同参加重大国际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际事务。这种变化进一步使中国各界人士感到振奋，他们不仅为此再次向美国欢呼，而且开始相信，和会将会名符其实地实现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切实遵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正当权益，特别是恢复大战中日本强占的中国对山东的主权③。人们甚至指望，通

① 见王树槐：《庚子赔款》，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1），精华印书馆1974年版，第287页。

② 转见《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189页。

③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等。

过和会，中国将一体解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撤退外国驻军、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以及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等各项问题[①]。于是，不仅当时的北京政府立即组团前往巴黎正式出席会议，中国各界著名人士，甚至与北京政府对立的南方军政府方面，也纷纷组团前往巴黎，准备迎接这大快人心的时刻。

中国人显然太单纯了。他们没有注意到美国对于那些过去并不属于它的太平洋岛屿的强硬立场，也没有注意到美国国会对威尔逊总统在殖民地以及宗主权等问题上的开明立场所表示出的某种不信任态度。他们更忘记了历史，甚至忘记了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纲领”时那个墨迹未干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既然能够默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得逞，既然能够为了某种利益而与横暴的日本苟合妥协，它为什么不能再三、再四地重复这一过程呢？何况美国总统并没有支配世界的权力，而和会的其它参加者仍旧抱定了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呢！

似乎弱小民族都有这种过于单纯的特点。并未得到参加和会邀请的朝鲜人同样对威尔逊和即将成立的国联抱有热切的期望，因此他们竟秘密派遣代表前来巴黎向和会控诉日本的强暴统治和奴役。然而这位有幸出现在巴黎的朝鲜人却被拒之于门外。同样的命运很快也落在了中国人头上。幻想取得国际平等地位的中国人，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被邀出席和会，却被列为第三类国家，只分得两个席位。紧接着发现和会并无平等和公开原则，参加会议的20多个国家，实际上一切决定却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列强组成的专门会议秘密讨论作出，自己并无任何影响会议的能力。随后，人们进一步发现威尔逊总统在国内和国际都陷于孤立无

①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170—171页；《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

援的可怜地位，其率先提倡的国际联盟得不到自己国会的认可，在和会上又不能不自食其言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列强之间的团结。于是，中国人再次强烈地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了，甚至连争取山东主权的恢复也成了泡影。日本强硬地坚持占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威尔逊想出的唯一解救办法就是暂时实行五国共管以后交还中国，然而即便这种妥协的办法也难以行得通。

1919年4月30日，列强终于还是依照日本的愿望达成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规定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统统交予日本①。

1914年日本攻占青岛时，中国是中立国，此后中国又成为参战国，无论作为中立国还是作为参战国，中国都不是战败国，战败的是德国，何以中国要向日本割土让地呢？威尔逊高唱“自由平等”、“民族自决”，人们指望和平会议和国际联盟从此会主持公道，其结果竟如此悲惨，如此荒唐，这不能不令人愤慨。而更让人愤慨不已的是，人们一夜之间发觉腐败的北京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几年时间里竟与日本主动签订了如此之多的丧权辱国协定②。人们对此不能不无比愤怒。

1919年，是远东地区政治动荡、危机四伏的一年，同时也是各弱小民族开始觉醒和开始掀起斗争浪潮的一年。1919年3月在日本奴役下的几十万朝鲜人在全朝鲜发动了广泛的起义斗争。这场斗争极大地触动了亿万中国人。列强的欺凌和朝鲜人民的起义，终于从两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不再仅仅是学生们感到愤慨了。中国人对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愿望，从来没有

① 全文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18—319页。

② 梁启超等亦称于和会期间始知1918年中日换文密约等事，颇感不满。见《申报》1919年3月24日。

如此强烈；对外人的欺凌和领土的丧失，从来没有如此痛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和狂妄野心，也从来没有如此敏感和仇恨。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关于“公理战胜强权”和“民族自决”的宣传，在广大知识界、进步舆论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改变国家屈辱地位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对各国政府能够受威尔逊影响在和会上主持正义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结束大战以后日本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情形，更成为广大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强烈的要求。因此，而对和会中美、英、法各大国在中国问题上重演对日妥协丑剧，致使日本霸占中国山东主权即将成为惨痛事实之际，人们的失望和愤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4月下旬，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陆续传来。至5月初，中国代表交涉失败已成定局。终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之激愤达到极点，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其斗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在对日交涉中曾直接充当卖国贼角色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商人纷纷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甚至许多大城市的工人群众也自发地投入到爱国运动之中，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这一空前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严重冲击了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迫使它罢免了曹、陆、章，并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的企图①。然而，罢免也好，拒签也好，以至游行集会、罢课罢市罢工，都不能使山东及青岛主权回归中国，也不能促使各国政府采取真正同情中国的行动，甚至并不能防止类似的事件今后继续发生。现实的沉重压力迫使人们开始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此时的中国政治，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不仅军阀之间你争我夺，战争不断，而且南北对立，各持一端，互不相让，你死我活。甚至各派内部和南北政府自身，也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209页。

时时有倒戈和内讧发生。对此，广大进步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倍生厌恶，以致长期以来视政治为畏途，唯恐避之不及。

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夺，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人们迅速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①国与国的关系，既然依然是强力和利益的关系，央求和哀号自然无用，救国的办法，只能改造和强大自己的国家。为此，人们明显地开始试图干预国家的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进步舆论界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民主主义的深入人心。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协约国的胜利，看成是世界人类新精神的胜利，看成是民主主义（或民治主义、平权主义、庶民主义、平民主义……）对专制独裁制度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胜利，并确信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惰眠"的中国，也概莫能外。人们憎恨恃武力以专制的军阀政权，同样也确信它有违历史潮流。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认为南北政府中"无一可恃之人，无一非巧取豪夺日与吾人为仇为敌，其思想、其行事，无一能与平民政治相容"②。由他们来主持国家，"国事如何能不腐败？外交如何能不失败？国家如何能不灭亡呢？"③显然，人们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谈论民主，人们第一次把政治的黑暗、外交的失败与人民、甚至是"平民"、"庶民"的政治无权联系起来。他们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上黑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专政，而人民却无权。一旦人民象欧美国家人民那样，有了"创制权"、"复决

---

① 《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

② 学训投稿：《对于国人之大警告》，《时事新报》1919年5月11日，并见高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

③ 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月17日。

权”、“罢官权”，“还怕有拥兵的军人吗？还怕有卖国的阴谋的盗贼吗？还怕有政治不澄清那一天吗？”①五四运动，“平民”奋起救国，迫使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拒签巴黎和约，甚至不能不释放有严重“越轨”行动的爱国学生，自然使人们更深感民众运动和民众力量的重要。人们甚至公开主张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宣称：“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②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人民深深陷入到民族危机感之中，而且使他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迫使他们开始尝试着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以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解民族于倒悬，并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

应当指出，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政治观，尽管深受欧美日本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它同欧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观念仍是有相当距离的。其所谓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庶民政治等等，世俗的形式的理解，要比伦理的内容的理解多得多。人们注重的往往还不是这种政治制度的特定内涵及其本质，而是它的表面意义和实用价值。进而言之，人们往往是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文化积淀出发，把民主政治同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念混合在一起。人们实际上仍旧鄙薄现实的政治生活，其所谓民主政治云云，多半只是陈独秀所谓：“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的一致行动，是李大钊所谓：“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只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会议。只要多少熟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史，就可以看出，这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主政治观念，还只是一个大杂烩，而更确切地说，他们

① 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

② 《干涉政治》，《南开日刊》第36号。

的民主观念，其实已经被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所侵蚀了。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股强劲的政治潮流，一股是民主主义的潮流，一股则是社会主义的潮流。前者以德、奥、俄三大专制帝国的垮台和远东中、日等专制国内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为标志，后者则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苏俄劳农政府的出现和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乃至社会革命运动的勃发，形成了大战后一时间澎湃于整个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产生于国内新学校和由欧美日本学校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时已先后登上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舆论的各个舞台，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众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大批在校学生构成的，对欧美日本新学说、新思想极为敏感的社会群体，因而使得中国思想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对象。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两大思潮正是中国对抗专制统治和列强欺凌的强大武器。不仅如此，面对战后各国社会革命和工人运动强大浪潮，人们还迅速把民主主义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中，确信二者或者相辅相成，或者亦步亦趋，而社会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对立物，从来就是同“集体”和“平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出现了强调阶级斗争并以共产主义为发展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广义上的社会主义仍旧是一切反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人们的包罗万象的思想武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显然也早就在从西方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自从1900年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首次引入“社会主义”这一名词①以来，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就开始介绍和宣传社会主

① 见《清议报》，第52期，1900年7月26日。

义了。

当然，就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其在五四运动之前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多半还不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内容，以社会革命为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恰恰相反，长期苦于专制和武力之害，渴望和平与平等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暴力、专政等等，往往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这就决定了多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有着一种特定的倾向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毗邻的俄国诞生之后，中国进步舆论界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难于接受和理解。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社会主义，最难于接受的，无疑也是其最重要的东西，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受欧美资产阶级宣传舆论的影响，人们这时普遍相信，这种社会主义不仅过于残酷，而且过于专制。而这恰恰是素主平等调和和厌恶专制压迫的广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

但是，在探索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五四运动时期，面对来自俄国和欧洲社会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浪潮，要想拒绝社会主义主张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此相反，俄国革命和德、匈、意、美等国社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浪潮，更深深地刺激了进步的中国人，使他们深感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于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迅速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力图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主张中，找到一条足以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而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人们的救国主张也日趋分化。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是最先把矛头指向试图利用军阀、政客，甚或未来资本家来实现其改造中国梦想的孙中山、梁启超们的。但是，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同以孙中山以及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主张渐进改良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至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

李大钊等仍旧明显地“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①；强调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有必要提携无产无识的体力劳动者，“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②，及至苦口婆心地劝说资本家实行什么“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承认工人有得红利的权利，并以此“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使“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③。他们这时虽然已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够在社会所有、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发展实业，但他们显然“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④，因此，他们无疑还尚未认定可以无限崇拜的“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⑤。其改造社会的方案，也不外由下至上，由小至大，即所谓“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⑥；同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组织，逐步造成民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使人民直接成为国家主人⑦，从而达到“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共同劳工”和“公有主义”的目的⑧。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对各种实验道德新生活的工读互助团等等，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幻想着这种种平和改良的实验，会有助于他们理想的实现。

---

①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②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③ 陈独秀：同①。

④⑦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⑤ 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

⑥ 陈独秀：《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新青年》；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号，1919年9月15日。

⑧ 《陈独秀在鄂之演说》，《晨报》1920年2月11日。

但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毕竟太少了，像他们那样勇于去实践新生活的人毕竟更少了，而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环境本身也注定了他们的这种种实验是不能持久的。即便能成功，要影响亿万中国人又有多少可能呢？前后不过一年左右时间，那些立志要摸索出一套渐进改良方法，进而影响并改造全社会，推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志士仁人们，便纷纷败下阵来。在痛感社会黑暗，环境恶劣之余，一些人终止了自己的探索，一些人怀疑中国恐怕最终还得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循序渐进，演成一个大乱，现在只不过可以做些社会主义的预备工夫，一些人还不死心，决心研究别的改良平和的办法，但也有一些人对种种改良平和的主张感到了绝望，渐渐开始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典型地代表着这种倾向的毛泽东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英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① 不难看出，即使在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眼里，俄国革命也仍旧不免有些恐怖和残酷，但人们已多少觉察到，这或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且此非其目的，乃其手段，加上"他们初此仓忙去办"，"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他们不得。

吸引中国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倾向于俄国式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四：一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已经被人们看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二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的，这使得在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

① 《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册。

主张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成了唯一一个提供了成功榜样的社会主义；三是随着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挫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干涉，各国政府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新闻封锁逐渐取消，其各种崭新的以劳动平民当家作主为目的各种制度、法令、政策等等，引起了同情劳动群众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四是1920年苏俄政府公开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确是人们理想中的"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它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

难怪这时的青年学生在接到苏俄政府的通告后，激动地大声疾呼："俄国人民呵！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①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纷纷涌现出来，是不足为怪的；而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可以肯定，在1920年，尽管仍有一些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②，人们多数一般地也不同意在中国照搬俄国的作法，但整个舆论界已迅速在对苏俄的问题上，"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这自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集团在中国的形成，以至很快有人公开欢呼起俄国革命来了。他们明确要求那些"怀疑革命的，何不看看俄国？"③公然主张在中国也应该实行那"有人类以来第一次轰

---

① 参见《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钱江评论》第9期，1920年5月2日；浦泉：《我国确立对俄方针之必要》，《晨报》1920年3月26日；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等。

② A.D.：《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期，1920年2月24日。

③ 两极：《红年大蒸》，《闽星》第2卷第6号，1920年1月19日。

轰烈烈的大革命”，去“革政府的命”，“革阶级的命”，革种种落后风俗、制度和不道德的心理和行为的命①。

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对于有着相当数量的急切地希望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毗邻的俄国发生推倒封建阶级及资本阶级压迫统治的十月革命和打败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劳农政府之后，中国出现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团体，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

1920年初，一个号称“中国社会党”的团体宣告成立，并立即向欧美及苏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给予同情和援助，乘“社会主义在中国播种之时机已熟”，助其“在一短时期内”使社会主义“遍于中国”②。到了3月12日，一个更为激进的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则在四川重庆诞生。他们声称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与苏俄联合，推翻中国军阀和资本家的政治统治，使生产资料归工人和农民所有，直接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③。

很难判断这两个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所具有的实际价值，至少，它们并不是后来典型意义上的那种共产党，其理论素养和实际的革命程度也颇让人怀疑。尤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着200万产业工人和近4亿农民的国度里，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仅仅靠这样一些默默无闻、人数可怜的小组织，要在一个短时期见诸成效，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尽人皆知，欧洲社会主义者为了引导组织工人群众，至少已经艰苦工作了将近100年，就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为此也已经进行了20年的奋斗才取得了重大成绩。在落后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迅速地集合起大批同

① 真风：《流血》，《闽星》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1日。

② 见《民国日报》1920年2月5日。

③ 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市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情十月革命、倾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把他们组织成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战斗集体，迅速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以满足人们急切的救国救民愿望呢？依靠上述两个缺少活力且与外界缺少联系的小组织，自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在1912年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党、中华工党骤生骤灭的历史，注意到诸如国民党、研究系之类的政党组织在中国政坛大起大落10多年而一无成效的事实，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生、发展和壮大，需要某些特殊的条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帮助。而在五四时期，这种历史的机遇出现了。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由此渐渐明朗了。尽管那个不久之后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陈独秀，这时还缺乏革命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以激烈手段改造中国的思想准备①。但是，重要的在于，立志于改造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大多已经认定了社会主义，而毗邻的苏俄已经开始发挥其重要影响，随着后者的不断巩固和强大，这种影响将不可避免地由间接而直接，由精神而物质，这对于力图在中国实现人类美好憧憬的中国先进分子们，不能不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西方不亮东方亮

运用暴力手段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的革命主张。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他是早就把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的征兆，这显而易见激励着以后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迅速扑灭资本主义充满了高昂的战斗热忱。列宁主义的诞生说明了这种情况。他正是在马克思预言的基础上明确断言：二十世纪初

① 陈独秀在1920年2月尚公开表示不同意“卤莽正裂随意妄动”，主张社会改造应當先树立“平等”和“劳动”的信仰，经过“工读互助以身作则为改造的预备”。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开始走向衰败，进而根据俄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强国统治力量相对稳固的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首先胜利的有别于马克思的看法。与此同时，鉴于俄国的专制特点，他进一步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并相应地提出了建立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政党，实行集中制原则和秘密工作等一系列组织和加速革命进程的方法。勿庸置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得益于列宁及其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上述认识和努力，这不能不更进一步促使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等坚定其以暴力方式改造整个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落后的专制国家的革命者，列宁固然很难体会发达的民主国家中阶级关系相互作用的意义；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无疑并没有设想过以政治强制力的形式来伴随新社会成长。列宁清楚地知道，暴力和专政，只是由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一种方式，即使在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的条件下，世界范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因此，他确信不疑，当帝国主义的链条从俄国这一薄弱环节破裂之后，正处于垂死和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将迅速开始崩溃，革命的无产阶级将首先在欧洲先进国，进而在全世界接连点燃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资本主义世界将很快变成灰烬。

然而，列宁与马克思仍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更多地是从理论的逻辑性特别是从发达国家阶级力量对比的客观现实出发，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矛盾的积累和阶级斗争必然的总爆发上；而前者却从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更多地寄希望于欧洲革命党数量增加及其革命意识和主观努力上。在这种情况下，当俄国革命后欧洲未能出现预想中的连锁反应，少数革命党人举义也往往因势单力孤而归于失败之后，列宁等人很自然地把问题归结为主观力量的弱小，以为“国际革命越来越逼

近，甚至可以视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①，而“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②，不能利用这种形势。因此，列宁不得不下决心发起建立共产国际，帮助各国革命派建立共产党。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在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等文件中，鲜明地反映了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色彩，人们显然一致认为：“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现在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③。这种形式就是不顾一切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创建“世界苏维埃”。为此，必须全力组建和扩大各国共产党，并使他们按照集中制的原则，附属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以便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战斗组织根据俄国的经验来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

共产国际的成立，对于帮助各国革命派建立共产党和采取统一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德、匈革命和随后风起云涌的各国工人运动，也深深鼓舞了共产党人，并使许多国家出现了革命的气氛。但是，事实上，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产业工人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并不大，即使在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广泛的民主传统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空气，因此也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广泛群众基础。激进的革命派和共产党人只是在一小部分工人和青年学生中间，才有一些影响。而热衷于和平改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工人群众和中间阶级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大战的结束，尽管各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许多西方工人也同情苏俄劳农政府，但那些旨在模仿十月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努力，却无一例外地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1—362页。

② 同上书，第28卷，第9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5页。

遭到失败。这意味着，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正在向俄国的革命方式提出挑战。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似乎并不特别悲观，他一再强调："欧洲的运动的比较迟缓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那里必须克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大的压力。"① "国际资本无疑地还比我们强"②。

然而，承认国际资本的力量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承认"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③，以至承认世界革命不是料想的"欧洲马上爆发起义"④，而要"继续很多年"⑤，这都意味着俄国革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已陷入一种颇为矛盾的境地。事情十分明显，本以为已敲响了国际资本主义丧钟的俄国共产党人，将不得不把"敲钟人"重新置于国际资本主义强大体系的缝隙中，与之和平共处，并在其可能的压迫威胁下讨生活。这样一来，不仅自己一向强调的"一国的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⑥的原则难以继续，而且其政治举措将不可避免地要重新服从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需要，从而使那些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明显发生扭曲。由于在理论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敌人，于是，苏俄的外交原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策略谋术，旨在"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23页。

③ 同上书，第178页

④ 同上书，第148页。

⑤ 同上书，第138页。

⑥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01页。

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于是，列宁领导的苏俄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很快就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支持和鼓励一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又往往根据其国家利益的需要，通过外交方式对这些国家的政府予以承认并谋求建立稳固的双边关系；它一方面迫于列强的压力在领土主权方面作出牺牲，一方面却又根据自身利益支持弱国中的民族自决和革命，不惜冒侵害弱国领土主权之罪名；它一方面出于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原则，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所掠取的在他国的特权，一方面却又对某些有利于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权益恋恋不舍。苏俄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政策，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协约国的武装干涉。由于协约国借口援救在西伯利亚受到武装的德奥战俘威胁的“捷克军团”，因此，外国干涉军大批侵入了其远东地区。一时间，在西伯利亚竟接连出现了19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但是，由于各国干涉目的不一，矛盾重重，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过于脱离下层劳动群众，以至民心倒向布尔什维克一边，终于使这种干涉徒劳无功。1919年底，红军迅速挺进到东西伯利亚，迫使美国首先宣布撤出自己的军队，其他各国也被迫先后宣布撤军，唯独日本借口俄国远东局势威胁朝鲜和满洲的普遍和平，而拒不撤军[②]。

日本独霸远东和中国的野心，早就由于俄国的混乱而受到鼓舞。当英美各国商定各国所派干涉军最多不得超出7000人之际，日本派往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军队竟达72400人之多[③]。它不仅丝毫不理会美国的抗议，甚至在各国宣布撤军之后，仍旧试图得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0年》第3卷，第695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8年》第2卷，第433—434页。

到俄国远东的领土和资源。不仅如此，它还通过对中国政府的控制，促使中国军队参加到对苏武装干涉的行列中，鼓励中国政府对苏俄的敌视态度，千方百计地使苏俄在远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试图迫使其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作出种种让步。鉴于这种情况，苏俄不得不遗余力地对美国、特别是对中国开展外交活动。

苏俄早自1918年1月起，即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苏俄多次表示过愿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租界以及其他特权，并允许中国在付清建造中东铁路资本的情况下，收回中东铁路①。至1919年7月，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劳农政府又公开发出对华宣言，呼吁"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代表与苏军会晤；同时再度公开声明愿意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和交还中东铁路②。

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反映了列宁及其共产党领导人在民族及国家关系上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但是，这种立场一开始就受到了其国家利益的限制。宣言关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和其他租让财产的表示，在苏俄报刊正式发表时被删去了；宣言承认满洲及蒙古等地区是沙皇"从中国攫取的"，但却主张"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于哪一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从而为苏俄控制蒙古和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③。

当然，习惯于从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俄共领导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为苏俄民族利益着想的。保卫苏俄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维护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这方面，人

---

① 参见《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第1册，第267—271页；《消息报》1918年7月5日。

② 转见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1964年版，第52—55页。苏联《消息报》1919年8月26日亦刊载了此一宣言，但却删去了有关无偿交还中东路等内容。

③ 苏维埃政府1919年8月发表对蒙古人民和政府的声明，宣称"蒙古此后已是一自由的国家"。

们的道德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列宁明确认为：承认民族平等，同时又保留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绝不是国际主义，而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①毫无疑问，列宁相信苏俄可以作出这种牺牲，同时他也相信，一切有助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治上扩展和经济上获益的策略，都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利的。因为，1920年的列宁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关于世界革命将“简单、迅速、直接地实现”的预言已经失败了，对于苏俄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延迟爆发的情况下”，使“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②

要确保苏俄能够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生存下去，是否有必要继续沙俄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作法，仍然是个问题。按照列宁的看法，中国北方及其政府事实上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谋求日本所关注的满蒙地区的权利，势必会加剧日本与苏俄之间的矛盾，而且未必能够真正从那里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保持自己在外蒙以及满洲的发言权，在战略上不仅是一种扩大缓冲区域的手段，而且客观上也有助于加强自己今后同日本在远东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苏俄还无力同侵占其远东领土的日本相抗衡的情况下，苏俄势必要把苏中关系看作牵制日本的手段之一。这种情况决定了苏俄对华政策的复杂性。

苏俄在远东的政策是极其现实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保存自己和削弱列强的目的。为此，它一方面极力挑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使其不能结成反苏同盟；一方面积极在中国开展活动，

---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372页。

并接近中国亲英美的军阀势力，鼓励他们同亲日势力的斗争，以牵制日本的注意力；同时，苏俄开始全面开展对中国、日本、朝鲜各界的革命宣传和政治鼓动，力图在远东各国民众中造成激进的反帝倾向，推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此来加剧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危机。

俄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众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是通过在俄华工组织，特别是通过俄共中央远东局进行的。

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处受命派遣熟悉地下工作并通晓英语的维经斯基，以设立华俄通讯社的名义带领一行人进入中国，准备同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并考察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他很快使陈独秀等了解了俄国革命的真象，并使他们迅速相信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长期以来苦于找不到一种救国救民的根本办法，对社会主义只有向往却无系统知识的陈独秀，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列宁的理论折服了。1920年7月，俄共在中国的党员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讨论了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并得出了肯定的意见①。随后，在维经斯基等俄共党员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8月以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以及长沙、日本等地建立了起来。并在俄共的援助和支持下，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声》、《劳动者》、《工人周刊》、《劳动与妇女》以及《共产党》月刊等重要宣传刊物，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开始大批翻译出版关于列宁等人革命理论的书籍；同时成立外国语学社，开始组织进步青年前往苏俄进行学习。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立，无疑是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造成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发生直接影响的结果。

---

① 见《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5－7期，第14页。

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发展的情况看。1920—1922年中国至少出现过7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组织或政党。如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1921年左右姚作宾在北京成立的一个“中国共产党”① 和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在这一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②和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共产党”，以及1920年8月以后由俄共帮助在中国上海等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共产主义组织都不可避免地要取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最终可以得到承认的当然只能是由俄国共产党直接帮助在中国本土成立的那个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一开始就向陈独秀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活动经费，帮助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毫无疑问，要没有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让月收入平均不足100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参加者依靠自己的收入来大量发行刊物、印制革命书籍和宣传品、组织各种活动，如集会、结社、外国语学社及工人夜校等，将是很难想象的，它势必要影响组织的发展以至生存③。正是由于得不到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援助，除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其它共产主义组织，包括

---

① 姚作宾在1921年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中称他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王觉源在《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一书中称姚之组织为“大同党”。

② 目前可知其正式名称叫“中国YC团”，具体代表何意尚不详。

③ 在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中共党员绝大多数尚兼任社会工作，赚取薪金，但多数参加者资历较浅，年纪尚轻，月收入仅数十元至百元左右”，唯陈独秀可达200元左右。但建党后包括陈在内，许多成员开始从事组织宣传工作，渐无固定薪金收入，以后更全部为职业革命家。从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工作报告看，1921年下半年以后，一年需费近2万元左右，自行筹集数仅1000余元。

在俄国境内的“中华共产党”，都很快烟消云散了①。

再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论的内容和其特性看。在1920年下半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已明确倾向于以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开始具有某些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们先后表示应树立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以便“有所指望”，“知所趋赴”②，但他们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十分肤浅，大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改造中国的“准备”和“方法”，也尚在讨论和探索之中。但人们多半认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必与英、德、俄……有异”③。因此，他们大多并不主张“以一个主义支配世界”④，对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方法，也众说不一，更未曾设想过要以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来指导中国进行革命。维经斯基到上海并帮助组建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之后，陈独秀最先发表了崇尚布尔什维主义的《谈政治》一文，公开表明了自己试图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推行以“阶级战争”和“劳动专政”为核心的俄国式社会革命的决心。紧接着，由维经斯基协助上海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更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来自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个宣言首次试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者和信仰者中树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概念，并明确主张：必须把全世界“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式的”，因此，宣言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确信：“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

① 1922年以后，“中华共产党”成员或转入俄共，或转入中共；“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大部加入中共；“中国共产主义协会”部分成员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余均无下落。

② 《毛泽东给罗璈阶》1920年11月25日。

③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76页。

④ 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9月28日。

的特征”，俄国革命所经历过的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①。

来自苏俄的影响是如此明显，以至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之初，就不能不立即向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死敌——“马格斯修正派”和“社会党”宣战，尽管“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②。同样，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文字上也全盘接受了俄国共产党人传授的革命方法，即首先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进而“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由共产党指导，“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时机一到，即由共产党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如此即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把政权“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③。然而，参加起草宣言的上海共产主义者，显然相信中国的工人运动还远远达不到那样的程度。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到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④，“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⑤。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在理论上是依靠产业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斗争来实现的；而共产党，在理论上也应该是植根于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并且应该是由其先进分子所组成。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们这时却多半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他们中很多人显然不很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①③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②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④ 陈独秀：《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劳动界》第11期，1920年10月23日。

⑤ 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期，1920年9月5日。

他们更多地只是以为，社会革命不过是因为生活所迫以致造成阶级对抗而引发的，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的，而中国的生活问题恐怕比俄国革命前夕也不相上下，所以革命是必然的现象。至于阶级，如《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他们大多相信中国的劳动群众就等于欧洲那无产阶级，是摧毁资本制度的力量，并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不激烈的情况，归结为国际资本的压迫，进而相信“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的阶级对立，主要“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立”[1]。故中国的劳动群众，包括“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如工人、店员、车夫，乃至佃户，统统已“变为世界的无产阶级”[2]。这样，中国共产主义者们很自然地把自己攻击的矛头除指向中国所固有的“武人”、“官僚”、“财主”或“资本家”以外，更明确指向国际资本主义，确信只有推倒国际资本制度，才有可能真正使中国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毫无疑问，人们渴望尽早实现社会革命，但他们并不相信中国“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无产阶级“能够很快担负起这种使命。因此，他们一方面根据书面的认识，相信“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3]，因而大力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不认为领导革命和组织群众的，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并确信俄国革命的要素和原动力，就是知识阶级，因而主张中国也只能以少数人的牺牲和革命来谋取多数人的幸福[4]。他们一方面受俄国革命宣传的影响，相信社会革命决不是搞“去抛炸弹放手枪”的军事冒险行动[5]，而

① 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

② 陈独秀：《〈劳动界〉发刊词》，《劳动界》创刊号，1920年10月10日；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③ 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④ 李大钊：《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同上。

⑤ 古生：《告劳兵农》，《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4月7日。

应当是一种群众性的“直接行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靠“总同盟罢工”、“决不能成就社会革命”①。于是，他们迅速得出结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也就是说，“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②。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和理论条件，但是，时代和环境客观上促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未来国家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共产党在远东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和中国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尽快根本改造社会的愿望，就不可避免地结合起来了。来自俄国的理论、经验和援助，显然大大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使他们能够运用主观的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和组织了。

然而，“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迫使中国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卷入到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同所谓“马格斯修正派”的斗争之中，以至不能不严格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一度失去了广泛研究、比较、批判、鉴别，最终形成自己完整的社会主义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自身条件以及理论、经验和物质基础的缺乏，也自然而然地加强了人们“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以俄为师”的心理，并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而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独立性，其方向、道路、革命方法以及革命动力，势必要由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助选择和提供。

---

① 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

② 见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资料》第132页。

然而，要指望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助只有少数几个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这时显然还不了解中国的情况[①]，他们也并没有给来华的维经斯基或其它俄国共产党人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列宁在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并不认为这些落后的东方国家存在任何共产党。尽管他后来承认在个别落后国家中可能已经有共产党，但他更多地也只是把它看作一种"名义上"的共产党[②]。可以肯定，不论列宁怎样强调共产党的主观作用，他始终未曾改变党必须以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为基础，并由其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观念。当然，列宁并不反对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坚决主张支持这种运动。但列宁认为，落后国家中第一位的任务，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民主自由。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帮助并促进这一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革命化，引导它们"同苏维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实行彻底反帝的政策，并设法实现"劳动者苏维埃"，使它们能够同西方无产阶级一起，推翻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最终在西方无产阶级领导和帮助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③]。列宁确信："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无论为了巩固自身，还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苏俄都"必然要一方

---

① 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过程中，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是混乱的。在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及列宁的发言中，他显然把中国看作是"封建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而大会通过的罗易的"补充提纲"里则明确宣称中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130页。

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①不难看出，列宁在缺少有关东方落后国家的具体知识的情况下，不能不主要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尽管由于落后国家代表罗易等人的激进态度使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甚至使共产国际对落后国家的策略变得有些模糊和混乱，但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仍旧坚持认为，东方国家的任何一种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都应该也必须在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服从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必然要在东方落后国家寻找真正有力量的、能够切实推动反帝革命运动的政治势力，以便能够尽快在东方掀起广泛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运动，动摇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此来促进过于迟缓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或至少根本遏止帝国主义对苏俄的进攻和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共产党人具体帮助下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然也要跟着改变自己的策略。

（三）最佳的利益选择与结合

用实力的观点来看待2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注定要失望的。在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50多个党员，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且处于秘密状态下，在社会上乃至在工人中间，还形不成任何势力和影响。当1920年12月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之后，这个组织更是一度失去了经费来源②，直到共产国际派遣的正式代表马林于1920年6月3日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210—214页。

② 关于这种情况的记叙，分别见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3期；《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来到上海后，共产党才又开始恢复了活力①。

马林在远东地区国家有过实际工作经验，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他又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共产国际选中他来中国工作，表明了它对中国问题的重视。但马林来华后显然没有能够马上去干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主张，以至在一个月之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和党纲，仍旧继续"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②，并且宣称要在政治斗争中，"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③。这无疑与马林所了解的共产国际的策略不相符合。

十分明显，设法把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一种高度统一又纯之又纯的基础上的努力，一开始就是俄共远东组织发起的，中共一大也是在俄共远东组织和1921年初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预先确定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有不同看法。实际上，负责处理苏俄远东事务的俄共中央远东局的领导人，对于在中国寻求同盟者的工作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帮助中国组织共产党。从远东共和国④优林使团开始，几乎所有苏俄来华人员都负有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政治倾向和政治作用进行实地调查的任务。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初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认识和分析是各不相同的，其政策也不时地受到其外交工作和中国政局变动的

① 马林来华后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不足一年时间，共产国际就为中共提供了16655元活动经费，保证了中共开展自身活动以及组织和宣传工人的需要，参见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

② 《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页。

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1921年，同上，第9页。

④ 远东共和国是这时苏俄为缓和与日本及美国等国家的关系，便于在远东开展外交而建立的一个"缓冲国"。

影响。这时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唯一观点一致的就是：苏俄的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其远东地区的和平和主权，在这方面，那个纯粹由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值得重视的。

在1920年7月直皖大战爆发以前，苏俄内部对华策略没有太多的选择。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由亲日的皖系把持，苏俄在倾向上自然是同情当时中国南方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代表的革命势力①。至直皖大战，亲英美的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之后，鉴于直系军阀吴佩孚赞同与苏俄改善关系，苏俄即迅速开始对吴佩孚表示好感，试图推动吴采取亲俄反日的政策②。同时，苏俄对孙中山在陈炯明帮助下回到广州，准备北伐，颇示不悦，而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十分重视③。可是，1921年6月，苏俄公开照会北京政府出兵蒙古，并无视中国方面抗议于7月攻占库伦后，苏俄与北京政府关系一度转恶，苏报又开始抨击吴佩孚的摇摆政策而对孙中山表示好感④。然而，当直系与亲日的奉系矛盾加剧，孙中山试图联奉倒直的企图明显之后，苏俄又不能不再度开始同情吴佩孚。

苏俄对华政策的不断改变，明显地是其对日政策在起作用。苏俄急于解除日本在远东的压迫和威胁，以至于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试图利用中国反日的实力派领袖，并与之结盟，而并不特别在意其政治色彩。苏俄亲吴疏孙，很大程度仅仅取决于他们对日态度和实力大小。由于孙中山总是奉行违拗其心愿的政策，且实力不足，故苏俄虽仍旧与孙保持联络，并肯定其政治倾向，但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却不能不对吴佩孚寄予希望。

当然，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的俄国共产党人，不会过份迷信其外

---

① 参见（苏）《真理报》1918年11月4日；《共产国际》第2卷第16期。

② 参见《民国日报》1920年8月11日；（苏）《消息报》1920年10月9日。

③ （苏）《外交委员会公报》1921年第1—2期，第12页脚注。

④ （苏）《消息报》1921年11月16日。

交策略的功用。特别是面对多变的中国政局和吴佩孚对苏并无太多好感的情况，他们不能不双管齐下，力图在远东各国进步党派和劳动群众中开展工作，推动群众性的反帝运动，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为此，当共产国际“二大”结束之后，他们立刻开始着手召集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试图以此来推动远东各国的反帝特别是反日运动的兴起。

正在共产国际积极筹备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之际，1921年夏传来美国准备就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在华盛顿召集一次国际会议的消息。美、日、英、法重新坐在一起讨论远东问题，这使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深感其在远东离间和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策略受到挫折，因而极度担心帝国主义各国会重新勾结起来反对和干涉苏俄。为此，1922年1月，为了同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原定于苏俄远东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大会，被移到苏俄的首都莫斯科来召开了。在开会之前，几乎各个与会代表团都发表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公开声明。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一开始就试图把会议引向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俄和掀起苏维埃革命的方向。他宣称：战后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亚洲和远东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点”，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它们在远东的竞争，“当今最强大的政府，四个最暴虐、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政府，即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在华盛顿缔结了一个条约”，“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季诺维也夫显然开始相信远东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将成为世界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法码”，因而极力宣传远东人民革命的必要性。但他同时并没有忘记告诫各国代表：“真正解决远东问题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败日本资产阶级。”①

显而易见，鼓动远东各国人民掀起反帝特别是反日的群众斗

① 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季诺维也夫在第1、2、4次会议上的发言。

争浪潮，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尽管某些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或多或少仍旧抱着世界革命的幻想，一心指望这次会议能够使远东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加速世界革命的程度。但会议毕竟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他们所面临的首先任务。这就是："把中国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推翻督军统治"，为此应该首先支持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斗争①。

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共产国际向各国散发的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各种宣传品也没有能激起人们的兴趣。马林在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不无遗憾地表示："这个会议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激起像当年凡尔赛会议所激起的那种政治愤慨，……没有直接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普遍性的运动。"②

华盛顿会议中心是解决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问题。它固然同巴黎和会一样，包含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无疑是要使三大强国在这一地区承担明确的和平义务，消除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以确立国际新秩序。在这方面，三大强国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英日同盟、海军军备竞争以及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范围上。会议成功地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以限制海军军备的《海军条约》规定了各国海军战列舰的吨位比例和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并以《九国公约》的形式，肯定了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保证在现有条件下不再扩张势力范围或谋取特权③。

一般说来，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并无助于真正缓和帝国主义国

① 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中，萨发罗夫在第8、10次会议上的发言。

② 见《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③ 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页。

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但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毕竟为挽回在巴黎和会上失去的信誉和抑制日本在华扩张的野心，迫使日本不仅在《九国公约》上签字承认反对独占中国和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而且同意交还其强行霸占的山东胶州德国租借地及其财产，撤退沿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全部驻军。尽管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方面提出的各项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收回主权的要求大多不了了之，但恢复中国在山东的主权，以及肯定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否定独霸中国及扩张势力范围的任何企图，毕竟对面临日本威胁，和对巴黎和会怀有痛苦记忆的中国各界爱国人士，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不论共产国际多么激烈地主张中国人民一举实现争取独立和平等的愿望，绝大多数中国人这时显然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中国若仍旧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现状之中，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就不能不对某些列强的理智和友好寄以期望。

要使中国免除分裂、落后和任人宰割的局面，当然必须首先争取实现统一与和平，进而全力发展实业，使国家臻于强盛。在1922年，中国各派进步势力已先后认识到这一点，但主张却各不相同。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是意见分歧。直到1922年5月下旬，由于得到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统一认识。6月，中共接连发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宣言》、《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以及其它署名文章，肯定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①]。7月，中共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公开宣称："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只有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养成真正实力，从而为"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

---

①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1922年6月。

力和战斗力强固”，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像俄国一样“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①。

共产国际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共产党人中所存在的那种脱离实际的倾向。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的运动”②。但是，对于这个尚不足200人的组织，无论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还是中共领导人自身，无疑都不能寄予过多期望。就在中共二大鲜明地提出了联合国民党等民主派的问题的同时，陈独秀就不能不明白承认：要指望国民党按照共产党的愿望“觉悟改造”并“和我们携手”，“希望很少”③。

不难断言，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是早有预见的。在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里，就明确肯定了“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联盟”，“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并明显地把它看成是共产国际在东方国家的首要策略任务。尽管决议强调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支持的方式“应当同该国共产党……协商确定”，并注意保持“处于萌芽状态”的该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④，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提纲草案的提出人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袖的列宁，无疑对东方落后国家中共产党在目前革命中的作用，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激进的印度人罗易，在共产国际“二大”就此问题提出并得到会议通过的《补充提纲》，显然把不了解东方国家情况的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认识搞乱了。《补充提纲》明确主张在中国、印度等国，“革命的第一

---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3—74、76—77页。

②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2年8月18日。

③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2年6月30日，《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④ 见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186—187页。

步，应当是推翻外国压迫”，但“并不是去赞成当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共产国际在这些国家“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领导他们进行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在最初时期这些国家的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殖民地的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领导”，相反，共产国际应当通过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与那里的革命运动发生联系，并使革命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以便“一有可能就建立工人和农民苏维埃”①。这样一来，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事实上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法。按照前一种作法，共产国际要联合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时设法保护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启发其觉悟，但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可能性；而按照后一种作法，共产国际没有必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至少是应当通过共产党来保持同革命运动的联系，排斥资产阶级的作用，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根据文件所说，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策略，似乎应该是后一种。然而依据事实，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策略，似乎又应该是前一种。

根据1921年至1922年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报告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报告人都明确认为，在中国当前政治斗争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只能是国民党，而不会是共产党。不仅国民党10多万党员与共产党不足200党员的强烈对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国民党与“只占中国人口总数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的产业工人之间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也使他们十分兴奋。他们显然相信：在中国，“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像国民党那样，“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都深受

①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189—190页。

爱戴”①。毫无疑问，在这个“几乎谈不上工人运动，也谈不到什么工业”②，无产阶级运动明显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共产国际只能依照列宁的提纲，去支持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时注意保护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不过，所谓保护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当然，在这个时期，俄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显然还考虑不到这些。他们首先关心的只是如何才能与国民党真正结盟，以切实促使国民党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发展和革命。在这方面，他们一开始就遇上了麻烦。因为孙中山虽然对苏俄抱以好感，但其对列强的态度却与苏俄大相径庭，因此孙颇受其政治衰荣的环境影响，下台时往往急于与苏俄建立联系，而上台后则惧于列强干涉，有意与苏俄保持适当距离③。加上孙中山政治地位不稳固，国民党又组织涣散，难以在政治上形成大气候，俄共和共产国际仅靠外力不仅不能左右其政治倾向，而且难以使其组织成为一种统一而强固的政治力量。为此，在1922年1月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等人率先考虑到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其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更进一步提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具体主张。这个办法尽管一开始就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④，但对于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妙的攻心之策。

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国际代表是在正式建议国民党与共产党平

---

① 参见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② 见《真理报》1922年7月30日。

③ 孙中山1920年寓居上海时，对来访的波波夫及维经斯基均表示急于想与苏俄建立密切的联系，但在1921年底1922年初准备北伐过程中见到马林时，却拒绝了马林提出来的联俄办法，称由于英国等关系，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参见《真理报》1925年3月15日，《革命文献》（台北）第9辑，第1410—1411页。

④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2年4月6日。

等合作不成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这种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工作的"党内合作"的方式①。或许，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出于国共两党各方面条件过于悬殊的考虑，本来就不相信孙中山会同意两党平等合作的形式。但归根结蒂，"党内合作"的形式要比党外平等合作的形式更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和左右国民党的政治方向，这种考虑恐怕是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选择国共合作方式时最根本的出发点。勿庸置疑，根据1922年8月和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具体指示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最初看上去是更倾向于利用国民党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②。但即使在这时，共产国际也已经在设想如何使共产党能够影响国民党的各种政策，以至"在国民党内组成核心"的问题了③。因为，它这时最关心的实际上主要还是尽快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因此，它虽然指示共产党"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并希望共产党能够在其中得到顺利发展，但它仍旧十分强硬地要求共产党必须去"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使国民党能够切实联合苏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④。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其实指的就是张作霖，因为孙中山从1921年底开始，就与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公开合作反对吴佩孚。而苏俄最痛恨的就是日本，最担心的也就是中国亲日势力上台并勾结日本反对苏俄。尽管不论列宁的外交策略还是苏俄实际政策本身，都承认适

① 目前所见孙中山拒绝党外合作的说法，仅见于陈独秀1929年所写的《告全党同志书》，陈称1922年5月达林拜访孙中山时，曾有此遭遇。但不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陈本人在1922年4月初即开始反对党内合作了，可知党内合作之议早在达林拜访孙中山之前，即已由国际代表马林提出。

②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驻华南代表的指示》，1922年8月。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7页。

当妥协的必要性，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质的不信任，他们却极端反对孙中山的任何一种妥协，因此不能不设法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生重要作用，从而促使国民党真正走上彻底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革命道路。

要让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去推动和引导历来主张对列强适当进行妥协的国民党走上彻底反帝的革命道路，恐怕只能采取这种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办法，事情非常明显，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只能指望由国民党来掀起中国反帝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是难以通过站在国民党之外摇旗呐喊来影响其政策的。客观上，除了进入其内部之外，共产党没有任何办法来有效地和迅速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然而，把党内合作的形式当成是促使对方向有利于己方转化的一种方式，这无疑使合作的概念本身发生了某些变化。事实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或多或少地把它看作是一个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因此它不仅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而且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组成从属自己的团体”、进而“组成核心”，甚至于脆提出了领导权问题①，从而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迅速带有了使前者左右乃至取代后者的进攻性质。当然，在1923年上半年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多半还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真正构成了这种可能性的条件的，还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国民党关系的发展。

孙中山下决心与苏俄结盟，再度发生在新的政治挫折之后。这次新的挫折发生在1922年7月间，当孙中山正集结军队准备北伐之际，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叛乱，致使孙一年多的北伐准备再度付诸东流，并且被迫又一次离开广东回到上海。同以往一样，孙中山在失败的时候再次想到了同苏俄建立直接联系的必要性。在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

1922年8月25日他收到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面交的苏俄新任驻华代表越飞的来信后，他立即回信向越飞表示了愿意与之建立密切联系的愿望。

这时，因日本已表示出将从苏俄远东地区的滨海省全部撤兵的意愿，故苏俄对迅速解决它和中国及日本的关系十分重视。苏俄选派曾负责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的颇享盛名的外交家越飞来华，说明了这种情况。但苏俄对日本仍疑心重重，对日本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极为担心，因而对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颇不满意。越飞于8月12日到北京后，即致函孙中山，对孙联络张作霖提出了疑问，并主张孙无论如何应同北京政府的外交部保持接触，以促进中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用说，孙中山对此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明确认为，“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而张作霖靠近日本则是由于英美对吴的支持和苏俄对张的敌视态度，很难说他在一定的条件下不会反对日本。孙中山直率地表示：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头等大事，他过去和今后一样，“准备同任何一位接受我条件的领袖进行合作”。而中苏两个国家的完全谅解，只有在他建立起一个“将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之上的中国政府”之后，才能达成。与此同时，孙中山向越飞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决不赞成苏俄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为此，他将同意苏俄暂时保有它目前在中东铁路的权益和在蒙古的军队①。

孙中山的反映对于越飞和马林具有值得庆幸和满意的一面，尽管越飞等怀疑孙中山利用张作霖具有危险性，马林甚至干脆反对孙继续采取同军阀打交道和军事统一的策略，亲自撰文并鼓动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发表文章予以批评，但孙中山对中苏谈判中的两大症结——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情绪和决心统一中国的强烈意志，明显地赢得了越飞

① 《孙中山致越飞函》1922年8月27日。

的好感。当越飞回信表示希望孙中山对张作霖保持警惕，并解释同得到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谈判，是一种被迫之举之后，孙中山的答复再度使越飞感到震动。孙宣称：苏俄这个创立了伟大制度的国家同得到帝国主义的“国际承认”的反动的北京政府谈判，无疑只能表示自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站在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从而助长那种反对在中国“采用可以称之为苏联革命或激变这种方法”的“资本家的论点”。他劝告越飞采取他所提出的“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即以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向他提供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等等帮助。而他将指挥四川的军队经甘肃接通蒙古，以得到这些援助①。

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多半是其这一阶段日渐感到“处境艰危”，“经济久困”，以至“音问梗塞，无从一为纾解”的心理的反应②，纯属被迫之举。但它明显地触动了越飞和马林。他们迅速起草了《我们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提纲）》，决定由马林带回，向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陈述他们对当前中国问题的看法。提纲明确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要开展纯粹是共产国际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阶级分化尚未充分进行，不适合开展纯粹的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党的活动必须无条件地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共产国际的工作也必须与苏俄外交政策相协调。提纲指出：在中国，北京政府只是帝国主义的傀儡，苏俄和共产国际只能通过帮助国民党统一中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③。与此同时，越飞接连两次向苏俄政府寄回书面报告，认为与北京政府谈判实欠妥当，今日中国唯有孙中山与国民党对革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孙中山

---

① 《孙中山致越飞函》1922年12月20日。

② 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55—663页。

③ 《我们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提纲）》1922年12月。

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而且可以对张作霖施加影响。因此，他要求苏联政府批准他南下与孙中山进行谈判。

越飞和马林的报告的基点，显然是建立在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的基础之上的。它明显地区别于这一年来共产国际指示的显著特点，就是公开主张不应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化的前景抱任何幻想，而应该切实地把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限定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内，使它能够作为反帝及反日运动的重要部分，为苏联外交和安全提供保障。

1923年1月中旬，越飞得到苏联政府①指示，前往上海，于1月22日开始与孙中山开始谈判。1月26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公开承认中东路暂时只能由中苏两国共管，蒙古的苏联红军亦不必立时撤退，从而使越飞在同北京政府谈判中所难以解决的两大难题，得到了孙中山国民党的谅解。而越飞则相应地坦率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并明确表示：孙中山“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②。

孙越宣言的发表，充分表明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决心。尽管越飞关于共产主义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声明明显偏离了共产国际乃至列宁的历来主张，但这种失误比较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的同盟者来说，或许不太重要，总之，苏联报纸在转载这一宣言时，仅仅把这句话抹掉了事，并没有作出任何反映。而三个月之后，经过对孙中山求援呼吁的反复讨论，苏联政府正式通知孙中山，他将在一年之内分4次得到

① 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宣布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② 见《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2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200万卢布的援助，同时还将向国民党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并提供军事物资，以此来帮助国民党逐步加强其统一中国的实力①。事情很明显，苏联自信它已经找到了真正能够在中国造成反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从而适合苏联远东利益需要和世界革命潮流的同盟者了。

孙越宣言的发表，同样符合孙中山的愿望。自陈炯明叛变后，孙已深感扩张党的组织和获得稳定外援之重要。故他一面接受共产国际代表之建议，吸收中共党员入党，并修订党章党纲，力图扩大其组织，一面则积极与苏俄代表进行联络并寻求援助。但孙中山毕竟是一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者，他不仅对于他20余年来开创和领导的革命政党和革命运动，有着强烈的私人感情，而且深知为达到自己的基本目的应采取哪些策略手腕。就象其1915年为阻止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1918年为得到日本财阀的军事援助，而不惜牺牲某些民族利益一样，他下决心与苏俄结盟并接受其军事援助，也是在山穷水尽之后被迫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唯一与前有所区别的只是在于，向来反对与列强为敌的孙中山采取了一个他曾认为是过于冒险的自我孤立的策略。但对于一贯相信“中国统一必借外力”②的孙中山来说，这也确是逼上梁山之举。因为在经历了外交和军事上、政治上一系列挫折之后，孙中山对列强的“不予支持”、“反对”和“压制”已深有体会，他深知：“我们已丧失了从美、英、法等列强国家获得援助的希望，……唯一对我们南方政府表示援助的，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③

---

① 卡图诺娃称此200万卢布为200万墨西哥银元。见A.I.卡图诺娃：《孙逸仙和俄国顾问》，载《孙逸仙，1866—1966》，第171页；等。

② 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31页。

③ 参见《孙逸仙致越飞函》1922年12月20日；《孙中山与布鲁克曼的谈话》，《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55页。

应当注意的是，孙中山对俄国革命始终是抱以好感的，对其政治制度本身也不乏赞美之词，这些无疑是孙决心公开与苏联结盟的一些重要原因。但孙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革命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和激进的经济政策不感兴趣，也是十分显然的。因此，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利害关系，其最初相互利用的成份明显地要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故孙中山从1922年8月返回上海至12月之间，虽积极与苏俄人员接触，却始终不曾下决心与苏结盟。他明确认为：双方关系"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否则，只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到头来反倒要加入国民党方能有所作为①。因此，孙此后虽一度被迫决心与苏结盟，但在1923年1月16日广州收复之后，其态度已渐次恢复常态。其在中东路与蒙古问题上的让步很有分寸感②，而其要求苏联方面承认中国不应推行共产组织与苏维埃制度，则颇为坚定。甚至，他又开始频频同英国以及港英当局接触，谋求支持③。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看来，其与苏联结盟，所失明显要少于所得。

不过，不论孙中山与苏联结盟得失利弊如何，就中国历史本身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结合，才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壮大，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进而为顺序演出20年代至40年代一幕又一幕重大历史剧，提供和

---

① 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页。

② 关于中东路，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了"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故仅同意"现在只能维持现况"；关于外蒙古，孙中山亦迫使越飞承认："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故亦仅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③ 孙中山寻求英国及港英当局帮助的努力从1923年1月一直持续到5月，直至广州财政陷于极度困境，港英方面仍旧置之不理，才被迫放弃了这种努力。参见陈福霖：《国共合作以外：孙中山与香港》，《现代亚洲研究》第13卷第1期。

规定了主要角色，甚至决定了其中心内容和基本线索。这意味着，完整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只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了。而就国际政治的演进而言，俄国人影响和介入中国革命的过程，恰恰是列宁主义逐渐从西方移向东方，在最适宜其生长的条件下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尽管在不同的民族土壤的条件下，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异，但无论如何，俄国人强烈的介入意识和得天独厚的介入条件及其实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势必要在中国和远东刻下深深的烙印。

第二章　向左还是向右

（一）排斥外力的外力作用

华盛顿会议以后的远东政治局势，明显开始趋于缓和。英日同盟和美日蓝辛—石井协定废除了，美日之间围绕太平洋地区岛屿的争端解决了，各国海军军备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在中国问题上“门户开放”主义得到了重申，进一步攫取特权、扩张势力范围和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作为远东主要祸源的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之后迅速减少海军预算1亿日元以上，并准备裁减4—6个陆军师团。同时，于1922年10月全部撤退了其在西伯利亚的干涉军，于12月将胶州(青岛)交还中国。而欧洲各主要国家，包括日本，也先后开始承认苏联，与之谈判建交和发展贸易。这种趋势表明，战后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远东国家关系正在发生着某些重要的变化，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

华盛顿会议未能通过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各大国将不会轻易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改变的机会与可能。对于公约中所写明的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及行政权完整，和不再谋求特权与新的势力范围等内容，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成是一种维护门户开放主义的冠冕堂皇的漂亮措辞，而意识不到它对此后中国革命所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无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强调这一立场并主张在中国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的愿望，与战前日本及一些国家力图利用中国政治分

裂和混乱来扩张其权利，以及左右中国政府的作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不仅说明，主张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稳定的倾向开始在列强中占了上风；而且预示着，当一个统一、稳定和有力巩固之政府出现之后，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将可能会逐步发生某些实质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暹罗（泰国）为许多进步的中国人树立了表率。①

暹罗在十九世纪末作为半殖民国家开始通过内政改革谋求独立，这种努力于大战之后因德、奥、匈战败和美国主动放弃领事裁判权及关税限制而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在此之后，它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谈判，亦终于使英、法、荷、意、日等列强效法美国，承认了它的独立自主。经此种方式而成功，使不少中国人颇生感触，孙中山即以暹罗为例，确信“外交纯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②

在大战之后，为更多的激进的中国革命者树立了榜样的，还有半殖民地的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从1919年到1923年，它们也先后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的独立。

大战后东方落后国家出现的这一系列走向独立自主，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和奴役的现象，突出地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向。它说明，战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开始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不是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继续保持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和榨取，而是争夺和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所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害，越来越超出了它们所获得的利益。至少只有少数殖民地的美国同殖民大国英、法在经济消长方面的巨大差异已表现出，殖民地多少并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利润的重要因素。相反，过多地占有殖民地反而会背上许多沉重的包袱。事实上，资本主义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固然会造成垄断的趋

① 孙中山对此倍加推崇，曾多次谈到暹罗的情况，以鼓励同志。

②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16页。

势，会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去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但这毕竟只能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当世界开始被瓜分之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就会产生抑制这种发展势头的种种机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毕竟是以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为原则的，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资本主义，而没有等价交换，也不存在自由竞争的可能。以政治强力来建立和维系的殖民体系，造成区域性的经济封锁和垄断，不仅破坏了世界性的市场开放和统一，而且使竞争的条件、环境严重地不平等，这自然违反了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当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还热衷于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之际，美国就率先提出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要求，尽管这一要求最初还仅适用于中国，实际上它已经鲜明地反映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抑制其恶性膨胀的某些因素，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要求则恰恰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原则的一种反映。大战后半殖民地国家陆续出现取得独立自主者，一方面同这些国家中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关，另一方面也正是帝国主义各国被迫开始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需要而改变策略的反映。它既不是某一落后国家民族力量同压迫它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相比已占优势的结果，也不是帝国主义政府开始变得格外仁慈的表现，它纯粹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造成的一种不依帝国主义者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历史趋势。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要清楚地看清这种趋势及其背景，还存在许多困难。但暹罗和土耳其等国的独立，毕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落后国家革命者发出了重要的讯号，使许多人确信自己的国家也有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和压迫，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的机遇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的推动、外交上的联合和物质上的援助，无疑是加速其壮大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外界动力。而它们对邻近国家的政治介入，也无疑使这些国家的革命鼓动和革命运动，或多或少地染

上了俄国的色彩。

1923年9月底10月初，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行到达广州，他们几乎是轻而易举地便使孙中山下决心向俄国革命学习。鲍罗廷10月6日到达广州，3天后孙中山即公开承认国民党“缺乏组织”，精神涣散，无真正之党军，“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①。再过5天，则一反其过去只注重军事和谋略的态度，开始强调“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用主义感化人心比军事奋斗更加重要②。随后，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明确承认国民党“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故应“以苏俄为模范”，鲍罗廷为指导，改组国民党③。

孙中山这时的“以苏俄为模范”，当然与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他已深知：“自欧战而后，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发生一种新世界势力也”，亚洲民族已“感此世界潮流”，抵抗欧洲强权，“今之突厥（即土耳其一引者注），其先导也；波斯、柯富汗（即阿富汗一引者注），其继步也”。“强盛如英，加以战胜之余威，尚不得不退让而许爱尔兰之自由，允埃及之独立，容印度之解放”，此大势所趋也，一旦得“济弱扶倾、仗义持言”之强国帮助，亚洲各族及中国人民亦必可乘此潮流和时机而遂其所愿。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等很容易地使孙中山相信：同样靠革命取得成功的苏联，不仅是“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并且是使亚洲伊朗、阿富汗获得独立之重要助力。因此，孙中山不仅愿借助苏援以成就事业，而且对苏之信任大增，颇愿借鉴其革命经验以步后尘④。

苏联的经验对于落后的东方国家革命者所具有的吸引力，远比对欧洲民主制度较发达的国家的革命者要强烈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程度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在军队日益

①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7—268，283—284，390，429，501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2—403页。

与政治相分离，国家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渐渐突出，政治决策过程相对公开和人民自由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要运用俄国式的革命方法和统治方式，明显地要困难得多。但在东方，在各种专制制度之下，集中制的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专政，这些具有鲜明俄国色彩的东西，却如鱼得水，具有极大的市场。一向主张人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及不知不觉，强调知行不必统一，认为革命终为少数人之事，不必与民意求同① 的孙中山，在了解到俄国革命的方式后，迅速开始对鲍罗廷传授的俄国经验发生兴趣。

孙中山理解的俄国革命的经验，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六个字，即党民、党军、党国。所谓党民，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要改过去“以兵力战斗而成功”的办法，为“以党员奋斗而成功”，改过去少数人革命的作法，为“以主义征服”，努力“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②，如此即可象俄国革命，“拿主义来感化全国”，“没有打什么仗，便把政府根本改造”③。所谓党军，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国民党要想革命成功，“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使“军队全属党人”，且人人明白革命主义。苏联士兵之所以“不徒打走沙皇，并且打败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诸联军”，全系于此。“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④。所谓党国，在孙中山看来就是，国民党自今即应象苏联一样，完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使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国家为国民党国家，因为苏联“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⑤

鲍罗廷所讲述的俄国革命的情况，对孙最有吸引力的大概就

---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3页；第8卷，第114页。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1—432，436，477页。

④ 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8，477—478页，第9卷，第182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3—104页。

是共党在各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它同民众、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则更是足以给孙中山以重要启发的，也是孙中山求之不得的。必须肯定，在鲍罗廷等来后，孙中山对苏联的印象在日益亲近。他甚至经常不断地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相提并论，视苏联为中国革命的唯一支持者，断言苏联社会正是自己“要造成的新世界”①，公开宣称必须向苏联学习。然而，孙并不因此而更加激进以至变成共产党。他日渐相信，中国革命虽早于俄国，但因方法不当、宣传不够，使俄国革命反而先行成就。两国革命理想主义并无差别，不同者只是方法而已。中国革命只要得其方法并有其援助，必定可以成功。

国民党此时“注名党籍之党员，为数二十余万”，“然按之实际，则除在册籍上载有姓名外，实不知党员在于何所”②。且其有组织之部分，多为海外华侨，国内除广东、上海及四川有少数在上层活动的骨干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形之组织。不仅如此，国民党从未开过代表会议，也从未形成过什么决议，就连党纲也不过就是简单几条。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实现“党民”、“党军”、“党国”有多么困难，就是迅速扩大其组织，使其“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也决非易事。既然下决心以俄为师，孙中山不能不全权委托鲍罗廷，照猫画虎地搬来俄国党的组织方式和议事程序，并授权鲍罗廷为国民党重新起草宣言、党章等指导性文件。

不难想象在这种形势之下鲍罗廷将发生怎样重要的作用。国民党的党章，在一定程度受到苏共党章的影响，从党员资格、上下级间金字塔式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及纪律处分的方式、党团组织的规定，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中央机构的设置和议事程序，统统是苏共党章的翻版。甚至为改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06页。

② 孙中山，《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台）《国父全集》第2册，第7页。

组国民党而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几乎全面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国民党第一次开会设立了主席团，形成了各方面的工作报告和议案，选举了自己日常的执行及监察机构。

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帮助国民党进行组织建设，强化其实体，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其革命化。因此，鲍罗廷从一开始就注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影响和左右孙中山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上。在这方面，根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发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鲍罗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就是使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方式重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作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正确宗旨。

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原仅限于推翻清朝满族贵族的封建统治和实现民族平等。至1923年初虽受世界风潮影响，增加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之意，但向无反帝倾向和内容，其民权主义，原仅限于反对阶级政治，谋求直接民权的实现形式，其虽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之说，但一向坚持人人平等自由，人民均为国家主人，并无据政治分野及作为加以部分排斥的主张。其民生主义，原仅限于通过定地价照价抽税来平均地权，和将交通、水利、矿山、森林等归国家所有，以防止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垄断，其虽渐有改善工农生活之议，但并无以工农为依靠，把外国企业和民族工业国有化，及消灭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计划①。由鲍罗廷草拟，经过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讨论和孙中山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及政纲，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明显与此不同。它几乎全面套用了共产国际1923年11月28日决议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某些方面发挥了其思想。

宣言所谈之民族主义，中心即"反帝国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

① 分别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5—196页，第7卷，第1—4，60—61页。

已。”非反对帝国主义，不能推倒“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其民权主义，虽重申了孙中山之直接民权说，但却明确表示了否定“天赋人权”的人人平等自由说，强调“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及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其民生主义，虽仍重申了平均地权之方法，但同时亦提出了将一切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为贫苦农民分配土地，制定劳工及劳工团体保护法，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等较为激进的主张①。

很难认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都能够真正了解和接受这种来自苏联的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在这里，旧的三民主义只保留了它的基本特征和某些具体形式，其基本精神和中心内容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苏联人无疑正在把反帝、反军阀，乃至反对压迫工农之特殊阶级的激进革命思想，注人国民党的血液中。不过，在事实上，鲍罗廷力图使国民党接受的革命思想要比共产国际决议所要求的多。在鲍罗廷于国民党“一大”之后向苏联党及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讨论情况的报告可以看出，鲍罗廷曾力图使国民党在反帝问题及依靠工农问题上更加激进些。比如，他坚持国民党应当宣布它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拒绝偿还北京政府之外债，同时将一切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又比如，他坚持国民党不仅应当宣布反对一切资本家，而且应当肯定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阶级，“他们应当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表示它将支持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并希望工人和农民组织支持国民党。在这方面，鲍罗廷似乎没有花费太多的力气便达到了目的。在宣言的“政纲”部分，国民党人第一次强硬地表明了自己对维护民族权利的不妥协立场，而在宣言的“主义”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22页。

部分，则明确地表示了将为工农而奋斗并将以工农为依靠的思想。但是，如果认为这些都完全符合国民党人的潜在革命意识，那就错了。国民党的宣言最终并没有能够写上以工农为革命主导的字样，关于民生主义的条文中甚至未能表现出共产国际决议所要求的全面国有化和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内容①。至于在反帝问题上，宣言虽强烈地表示出反帝的倾向和主张，然而，宣言中却没有丝毫与苏联结成统一战线的字样，几乎所有国民党领导人都反对类似的表示，以致当鲍罗廷颇费周折地说服了宣言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同意写上：国民党"认为必须同其它被压迫国家的国民革命运动，同那种与我们有共同目标、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而斗争的世界革命运动，组成共同的阵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主张之后，也被孙中山毫不客气地将它取消了。鲍罗廷向莫斯科报告说："孙认为这一条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在目前形势下提出这一条，等于直接向英国和法国宣战。""照他的意见，这一条的含义是：国民党应当帮助朝鲜、印度和安南等等"。而"英国，即使是英国的所谓真正的民主派，即工人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容忍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中有这种会直接打击印度的条文。法国，包括法国所有的激进分子，也会因为这种针对安南的条文而起来反对国民党。"②

孙中山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一个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者，孙已饱尝了列强政府的冷遇和歧视，更深悉外交之艰难，他一向不主张自己在自己谋求独立解放的道路设置障碍。即使他明知他得不到列强的同情，但至少他还渴望通过外交的运用，使各国列强不把他看作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危险敌人。事实上，强烈

① 鲍罗廷在1923年底与孙中山交谈过之后，就已经明白他可能使孙中山接受什么和不可能使他接受什么。据鲍罗廷说，孙中山在农民问题上，只答应推行二五减租和设立农会，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

② 参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4页。

主张孙中山进行反帝革命的俄国人，也并非总是表现出一副与帝国主义国家势不两立的姿态。1918年布尔什维克为了自身政权的巩固，不仅以牺牲民族利益来寻求与德国的妥协和平，而且也曾不顾一切地寻求过美、英、法等列强的支援①。这意味着，对于任何一种革命来说，外交及其适当的妥协，都不失为一种谋取胜利的必要手段。不过，对于已经接受了反帝国主义宣传和日渐深切体会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孙中山来说，要继续施展这种手段，显然不那么容易了。他虽然仍一再强调"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当"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方法则当"因应环境以求适宜"②。但客观上，由于他在自己高擎的旗帜上已经写上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激烈口号，并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他事实上已经公开地站到了苏联的一边。不论他是否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已经成为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怀疑和仇视的对象。这种情况，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孙中山一步步更接近苏联。

1923年秋，孙中山因维持政府特别是各种军队所需，被迫向北京各国公使团交涉截留关税之关余问题。至年底，双方发生严重分歧，美英等国竟派大批军舰压境广州进行武力威吓，使孙中山极感愤慨。以致他首次公开发表反帝宣言，号召国民"以剧烈态度""为中国正义而奋斗"，制止帝国主义之武装挑衅。紧接着，他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③。随后，孙中山更公开表示："本党与苏俄精神合一处，乃在同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联合各弱小民族，共同去打破帝国主义④。据此，孙中山一改不愿承认与苏联联合的作法，明白宣告："俄国与中国，今为对等之国家。彼对于不平等条约，

---

① 苏俄政府因布列斯特和约牺牲太大，曾在批准生效前试图取得美国等国的援助，与德对抗，但未成功。见威廉·格雷夫斯：《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冒险，1918—1920》，纽约1931年版，第22—2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页。

③④ 同上书，第9卷，第23，126，502页。

（与我）有共同之目的，诚为中国之友邦，其援助中国也，乃当然之事。中国之与提携也，亦不能不谓当然。”①

孙中山在反帝及联苏问题上态度之转变，既有欧洲大国已陆续承认苏联的背景，也有其日益对帝国主义失去幻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事实所使然。在1924年以后广州大街上到处可见苏联顾问身影的情况下，与其否认与苏结盟，倒不如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威吓帝国主义的好。孙中山1924年2月与日本人的一段谈话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他声称："俄国以赤化英国为目的，其计划在先对于印度及其殖民地为赤化运动。其援助广东也，在强行赤化运动于广东之敌之香港，然后再赤化印度及缅甸方面也"。故"以广东为根据地之俄国赤化运动，非以中国国内为目的，系以香港及印度为目标。我辈之不阻止俄国之赤化运动者，在已知此种实情故也。"②当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说明，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仅将来政治制度不会相同，而且其三民主义也非"列宁之糟粕"，中国人也不是"俄国的走狗"，中国将不会有被赤化的可能。

一方面宣称俄国援助国民党，目的在赤化英国及其殖民地，一方面却又劝告外人相信中国并无被赤化之可能，孙中山力图转移矛盾的复杂心态可见一斑。但是，采用这样一种解释方法，其实丝毫不能缓和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事情非常清楚，即使苏联的矛头针对英国，它也只能通过援助国民党来实现这种目的。或者它援助国民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借以向外扩展影响和势力，或者它和国民党什么也干不成，二者必居其一。事实上，1924年之后，国民党开始每月从苏联得到相当数额的经费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1页。

援助①，苏联军事顾问亦大批抵达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苏联方面提供的270万元的资助下创办起来，国民党甚至得到苏联1000万元的援助创建了相当规模的中央银行②。特别是由海参崴至广州的海上定期运输线由苏联建立之后，不仅运来了飞机、大炮、机枪、步枪及各种弹药和石油等大批军用物资，帮助国民党建立起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而且由于苏联轮船公开在广州大批进出口各种货物，使广州日益摆脱了对香港的依赖，使港英方面每天几乎损失25万英镑的收入，其进出口贸易亦减少了约60%③，加上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逐渐采取公开的强硬态度，致使双方矛盾迅速加剧起来。

1924年7月，因法国安南总督在广州沙面租界里被炸，以英国为首的沙面租界工部局决定颁布新警律，严格在沙面生活和工作的华人的出入手续④。由于制造爆炸案的本为安南革命者，而新警律又只对华人而发，致使在沙面的中国人深感受到歧视，遂于7月15日宣告罢工。此一罢工迅速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当英国驻广州领事请其出面劝说停止罢工之际，孙中山即明白表示："贵

---

① 关于苏联援助国民党经费的具体数目，目前未见精确统计。冯自由1924年8月8日答《顺天时报》记者问，称月助民党二万五千，军官学校二万五千，已交二十五万云云。据赫鲁尼琪所著《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一书计算，鲍罗廷每月津贴国民党中央党部为3万墨西哥银元，黄埔军校为10万粤币。另据中共1924年有关报告可知，国民党地方党部月费各数千元，也是鲍罗廷提供的。另象设在广州、上海及香港的国民党报纸杂志，和上海大学等，鲍罗廷每月亦分别要提供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故据陈独秀在一次会议上说，仅1924年苏联即向国民党提供了200万元的经费援助，其中央财政计划、国民运动预算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各部职员的工资，亦是由鲍罗廷支付的。

② 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哥伦比亚大学1976年版，第148—209页；《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39页等。

③ 阿吉莫娃：《在起义中国的两年》，第168—169页。

④ 1924年6月，越南青年爱国组织心心社成员范鸿泰受命到沙面刺杀法国驻印度支那（即安南）总督麦尔林，未能成功，范为此牺牲。由于心心社的活动基地设在广州，成员多以华人身份活动，范即以华人身份潜入沙面，故沙面工部局颁布此针对华人之警律。

领此次毅然颁布此苛例，其中侮辱国体、人民之处实多。沙面为中国领土之一，外人以居留资格，实无取缔华人权”。故除非英国觉悟，而罢工决不能取消[1]。由于政府和各界的支持，800余名在沙面工作的中国人坚持罢工几近一月，终于获得成功，迫使工部局取消了歧视华人的有关条文[2]。这一事件显然使港英当局及在广州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深感愤懑。

紧接着发生的商团事件立即使港英当局找到了一个报复的借口。

广州商团是广州和佛山地区商人借口保护商界利益和安全，而组成的一个武装团体，成员约1000余人，其总头子是英国香港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陈廉伯，背后有港英当局和陈炯明等部分地方军阀撑腰。自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以来，因维持政府及各种军费开支，特别是孙中山为北伐筹集军费，被迫向商界大量摊派各类捐税，极大地加重了商界的负担，引起了商人的不满。加上广东政府与港英当局矛盾日深，对工人运动比较宽容，商人们恰恰与香港英人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对工人运动颇为反感，以致在一些英国殖民主义者和陈廉伯等人的挑唆下，渐生武力反抗的企图。陈廉伯遂以集资扩充商团武力为由，筹措了大批款项，从丹麦偷运出境枪支将近万杆。因事泄被路透社披露，引起国民党人警惕。陈廉伯亦被迫向政府申请批准购枪入境，但却声称将在3个月左右启运。可广东政府原有规定，凡购枪入境者均须事先报明购用理由，批准后方能订购，输运到口又须申请护照，陈显已违反规定。故军政部虽于8月4日核发护照，4天后丹麦货船抵港，沙面亲广东政府之内线密告后，孙中山仍决心予以扣留。由此引发了所谓商团事件[3]。

---

①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23页。

② 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8月15日。

③ 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5日，等。

商团1000余人，购枪近万，而商团公所自购者仅5000，不仅其余4000余枝枪可能为军阀所用，在反直系各派相互联络呼应，孙中山已决心北伐，军队开始向韶关集中的情况下，对政府不满的商团一下子扩充为数千人的武装团体，这同样对广东政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极大地妨碍了北伐计划。故当商团为要挟发还枪支而宣布罢市之际，孙中山竟难以按捺其愤怒，公开表示：若经再三劝告仍不复业，必派军队拆毁其西关老巢，若有抵抗则不惜炮轰西关，使之变为粉末①。不想，商人此举竟有港英为之撑腰；在孙发出警告第三天，英领即向广东政府送来紧急公文，"抗议对一个无防御城市开火的野蛮行动"，并威胁说：香港海军司令已下令，如果中国当局向城内开火，则所有可动用的英国海军部队将立即采取行动来对付他们"。

英国之干涉和威胁，使孙中山大为恼火，其反帝之志愈坚。他甚至开始明确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达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同时又是反革命势力最强大的部分"②。而"现在已经是在中国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的时候了"③。

在陈炯明的军队仍旧威胁着广州，广州商人又结伙反抗，而广东政府所辖军队内部极不巩固和团结的情况下，要想不顾一切与英国炮舰相抗衡，无疑是凶多吉少。对此，孙中山十分清楚。但是，自1923年底鲍罗廷向孙中山灌输反帝革命思想以来，历时不足一年，反帝思想已渐入孙之脑髓，以致孙中山这时竟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惜为与帝国主义相抗而放弃多年营造的革命基地广东④。毫无疑问，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血淋淋的历史给了孙中山以极其惨痛的印象，而现实的条件也不允许孙中山存在任何非份之想。他虽多少同意对商团作些妥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78页。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3，40，46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2，56—57页。

协，答应在商团保证枪支仅用于自卫和为北伐筹款一定数额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归还大部分枪械。但他深知这只是权宜之计。即使商人们答应某些条件，他们最终也还可能要和港英当局，甚至和主张"保境安民"的陈炯明站在一起，来反对广东政府。正如鲍罗廷所警告的，一旦反动商团得到这批武器，广州就将陷入反革命的恐怖之中。因此，在孙中山确信英国炮舰不仅仅是虚声恫吓的情况下，他几乎别无选择。

9月18日，国民党正式发出北伐宣言。与此同时，为暂时求得稳定，孙中山宣布"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尅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并决定"现在一切苛杂捐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以期广东人能"热诚扶助革命政府"，便利北伐计划迅速实行①。然不料，半月后广州商人虽索回数千枪支，却始终没兑现广东政府所提条件，而且有消息称商人还秘密赞助陈炯明150万元，"约定罢市、反攻同时并举"②，致使广州局势骤然紧张。在鲍罗廷的鼓动下，他很快下令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自己为会长，鲍罗廷为顾问，"用种种方法打消商团罢市，并立即设法收回关余"③。结果，10月10日，广州商团开始罢市后不几天，广东政府就以武力平息了这场叛乱。而英国炮舰却没有像它所扬言的那样进行武装干涉。尽管由于广州平叛的顺利进行，广州的国民党人没有采取夺取关余的行动，但这一胜利仍旧使孙中山的反帝愿望深受鼓舞。

10月23日，冯玉祥等乘直奉大战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政权，至此，孙中山联合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卢永祥各派倒直计划大告成功。在冯等电邀孙北上共商国是后，孙中山立即暂停北伐，决定北上响应，以扩大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北

---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16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2页。

方的影响。当然，必须指出，孙中山并非相信这种政变可使其革命主张得以实现，他深知北京政权"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革命必不可"以时变而稍摇进行"，革命之胜利终"须靠兵力而定"①。但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理解，特别是镇压商团叛乱的实践使孙深感"努力宣传，扩张党势"以补国民党力量不足之必要。而所谓宣传，根本就是要以反帝的民族主义来唤醒民心。据此，他开始像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把中国的落后、黑暗和反革命势力猖獗等种种罪恶，统统归因于帝国主义了。他开始断言：中国"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由来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不在内政问题，而在外交问题"，故中国要想推倒军阀，实现统一与独立，必须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②。因为，"外国帝国主义现在是最大的罪恶，在我们摆脱他们以前，我们国内永远不能获得和平与进步"③。当然，孙中山深知："欲排除外力，仅中国一国民之力现尚有所不能"④。但在商团事件中与英帝国主义对抗的结果告诉他：平等和独立在于争。你不力争，别人就不会重视你的愿望，若全体国民"一致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那就一定能达到目的⑤。因此，他主张应当全力进行反帝宣传，"直到农村最后一个农民和最后一名人力车工人都能懂得：洋人是敌人，我们应当摆脱他们。"以此来"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把所有帝国主义者从我国赶出去"⑥。

他甚至开始相信，对于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那就象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如果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中国能够联

---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3，265页。

②④⑤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6，321，361页。

③⑥ 见《孙逸仙致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的国民党党部信》1924年11月。

合起来，用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一定有胜无败的！”①

孙中山试图使日本站到深受其害的中国一边，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固然是一种梦想，但孙中山无疑已经变成了一个异常激烈的反帝斗士，并且使国民党，特别是使中国革命，具有了鲜明的反帝革命的色彩。自国民党“一大”，特别是商团事件以来，孙中山到处宣传反帝主张，从广州到上海，到日本，到天津，在北上的过程中，孙中山几乎一路把号召人民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的唯一话题。毫无疑问，孙中山第一次变得如此革命，并且如此激进。这足以使苏联和共产国际感到满意了。实际上，自与帝国主义公开对抗以来，孙中山就已经在模仿俄国革命的榜样行事了。他断言：“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②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激进的反帝倾向，显然与鲍罗廷等人的影响有关。但对中国革命来说，反帝运动是否比反军阀运动更为重要，国民党人中的认识却大不相同。孙中山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并左右整个国民党，但国民党绝大多数领导人既不像孙中山那样日渐仇恨帝国主义，必欲把革命与排除外力相联系，也不可能像孙中山那样一言九鼎，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左右国民党的命运。而十分明显的是，当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的时候，孙中山向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实际上却与孙貌合神离。“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③，蒋介石虽对孙之主张表面赞同，内心亦颇多疑惧。他在1924年3月24日致廖仲凯的信中曾明告：对联俄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361，40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

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可惜“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①

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在联俄反帝问题上，已日渐与孙中山产生隔膜，就连孙中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多半并非缺少民族自尊感，但他们或者出于策略考虑反对过多地与列强为敌，或者对目前这种依靠外力排除外力的作法感到怀疑。蒋介石的担心明显地反映出国民党内存在着的一种对苏联影响渗透国民党机体和中国社会的强烈的反感情绪。对于长期受到英美或日本影响的许多国民党人来说，与其欢迎苏联的外力作用，倒不如让英美或日本保持其作用。在这方面，不仅政治的、而且各种社会的历史的联系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显而易见，苏联人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成为失败者。对于这个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而它的基本内核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远较与东方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要多得多的国民党来说，苏联人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这不仅因为，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而且因为，受外力影响的孙中山乃至国民党在某一方面的暂时激进，并不足以改变国民党自身的性质。相反，它势必要加强国民党内的反作用并增加其“免疫力”。

（二）谁主沉浮？

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革命的道路，这既符合共产国际世界革命

① 见《革命文献》第9辑，第1276—1277页。

的宗旨和对落后国家的策略，也符合苏联自身的外交利益。但是，要真正促使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并坚持下去，仅仅靠影响国民党和孙中山是不行的。这一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因此，他们始终不曾忘记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几乎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反帝革命影响的情况下，使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等人的支持者，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事实上，共产党人也确实成功地成为国民党内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并进入了其最高层。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人数虽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大约3%，出席"一大"人数却已占代表总人数的10%左右，更占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的大约25%，并在国民党中央7个部中占据了2个部长和3个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的席位，在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占据了1/3的发言权。加上鲍罗廷的顾问身份，共产党方面已在国民党决策层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全国许多重要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组建工作先后落人共产党人手中，从而使直隶、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山西等地的地方党部，均为共产党人或亲共左翼人士所掌握①。就连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亦有部分国民党支部为共产党人所左右。

如何利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对国民党上层决策发生作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可以肯定，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是寄予愿望的。他们甚至"相信"，就连国民党也会"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②。似乎孙中山国

---

① 根据1924年3月6日国民党中执委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部所提各省临时委员会筹备员名单可知，中共负责并控制者有直隶、山西、热河、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3，80页。

民党也会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要靠共产党。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这种认识，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它对国民党社会成分的机械的阶级分析之上的。由于国民党包容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士兵、学生等各个阶级和阶层在内，共产国际显然不相信它会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政党。它更多的只是把国民党看作一个带有某种阶级倾向性的松散的政治联盟，相信它并不具有高度集中的和排他的特性，因而便利于弱小的共产党在其内部发挥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认识，显然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决议案中，这种表面化的看法也成为人们认识的根据。他们确信："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①。因此，他们明确提出：我们应在国民党内组成中共党团，以便"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②，即"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

说国民党没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如同说国民党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一样，是一种不那么确切的说法。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确十分松散，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但并不是所有政党都必须像共产党那样高度集中和组织严密才算政党，世界上许多政党只是一种政治信仰甚或政治倾向的结合体，它们并不刻意要求所有党员都遵守同一戒律并保持同样的献身精神。对大多数政党来说，有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能力和献身精神的组织中心，就足够了。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政党。它的组织和行动中心，是由孙中山和一批效忠于孙中山的追随者组成的，党的一切重要主张和决策，几乎全都是由孙中山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如果以为孙中山个人因此可以随意改变党的政治方向，却是不正确的。同其它许多政党一样，党的组织核心的基本倾向构成了这个党的政治倾向，它既不受基本群众的复

①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187，147页。

杂成分所左右，甚至也不受领袖个人一时的激进态度所摆布。人们拥护和追随孙中山，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孙中山才能正确地反映和实现他们的愿望。毫无疑问，要在这样一个政党中形成新的中心和争取领导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比共产国际领导人有更多的思想准备。这是因为，要把国民党拉到共产国际所指定的轨道上，共产党人还深感自己缺乏足够的力量。为此，他们不能不极其小心谨慎地行事，一方面主张争取领导权，一方面又告诫党员“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①，一方面主张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统一行动，一方面又担心中共代表集中活动，容易“引人注目”，“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故不得不秘密集会。然而，这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况且，在当时共产党内部尚意见分歧并鱼龙混杂的情况下，秘密也是保守不住的。

1923年底，国民党改组事宜刚刚开始进行，共产党内即有人将鲍罗廷等秘密与广州共产党人讨论议定国民党党章政纲的情况透露给国民党人，顿时激起国民党内的强烈不满。直接受命参予负责改组事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大本营参议邓文仪等11人，闻讯后立即上书孙中山。并称：共产党陈独秀等不仅“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而且借鲍罗廷“替我党立言”，大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高调，企图“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置我党“于孤立无援之地”，并“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②此举仅因孙中山不愿“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③，使国民党联俄和改组计划受到影响，才未能发生作用。

---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147页。

②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0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

自1924年初起，至同年8月孙中山不得不同意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与共产党关系为止，国民党“一大”正式开始实行容共政策之后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国民党内发生的指控共产党人的案件，就有20件之多，连署党员几达2000人之众①。其中不仅有大批国民党老党员，而且也有许多国民党一般党员；不仅有各地干部，而且有包括孙中山之子孙科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内的国民党众多要员。但所有这些案件，在孙中山的作用下，几乎全都不了了之。

孙中山不重视国民党各地以及各级党员对共产党的检举和指控，一方面是这些指控大都缺少足够根据，另一方面则在于，孙中山显然已确信，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已丧失斗志，难以指望。他曾愤然痛斥一批告共产党状的国民党员，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②不难看出，孙中山看重共产党人并把组织发展等重任交诸共产党人，本身就是试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来推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孙中山显然意识到，在共产党难以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容纳共产党于国民党有诸多好处。首先，容共可以促使苏联更加重视并全力援助国民党。孙中山告诫那些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说：共产党人“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由于“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故必须与之联合。实际上，“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但“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岂不“正中陈独秀之计，而

① 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第306—31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助之得助矣”。①可见，把共产党容纳在国民党之中，正可避免共产党包揽与苏联的关系，并促使苏联对国民党愈加重视。其次，容共可以促使共产党人大量为国民党工作，利用其宣传和组织的特长。孙中山曾答复那些担心共产党打着国民党牌子“招摇撞骗”的国民党人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②容共政策恰可迫使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活动，为国民党宣传，助国民党发展，而避免其独树一帜或另谋他门。再次，容共可以促进国民党人的奋斗精神。鲍罗廷曾公开宣称：“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③鲍罗廷的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看作是孙中山的认识。对于一个已缺少生气的党，加入一些急进分子未必是一件坏事。孙中山曾公开承认：“国民党内分急进派与稳健派，亦不得已之举”。“时虽有意见之冲突、反目、抗争之状态”，只要有“我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者居中调和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矣”④。显然，容共政策对于国民党来说，不失为一种输血政策。凡此种种，在孙中山看来，恰如鲍罗廷所说：“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⑤

可是，作为久经苍桑的一位大政治家，孙中山无疑有着兼容和排他的两面性。孙中山无疑希望用其三民主义来包容共产主义，渐次使中国的“共产派”统统化为三民主义者；但同时，他亦绝不允许任何人试图毁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

---

①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

② 同上书，第11卷，第350页。

③⑤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6页。

为此，他一方面提议相当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另一方面却安排相当一批对共产党人持疑惧甚至反对态度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一方面批评公开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另一方面又责难共产党人试图吸引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并且破坏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威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民党内不满共产党的情绪难以平息，且愈演愈烈，甚至在国民党内已有相当势力和地位的共产党人，也颇多怨言，并苦恼万分。

共产党因其组织和人数有限，加入国民党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共产党一开始即按鲍罗廷所要求，把“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将所有的人送进国民党”视为其“首要任务”①，因此，它的主要成员很快就陷入到国民党的大量事务工作之中，难以自顾了。仅以广州为例，1923年底，全广州共有国民党区委9个，支部64个，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仅30余人，却全力主持着其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从事工人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共产党的自身发展。至于其它尚未建立和正在筹建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一方面共产党人数量亦少，另一方面工作任务更为庞杂，其影响所及自然不能不使共产党逐渐“失去同工人群众的某种直接联系”，而变得近乎纯为国民党的发展服务了。

不仅如此，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始，共产党就立即陷入到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冲突之中。其一，国民党内大批党员及至领导人，都极端怀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真正用意，许多人甚至从一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向共产党人发难，必欲把共产党人赶出去。而共产党人为求此种合作形式之保持，却不得不尽力隐蔽党团活动，甚至放弃为取得核心地位和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公开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146页。

表示愿意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及纪律①。其二，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要意见分歧，根据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有责任且必须以矫正国民党政治观念，推进其革命化为己任，但根据国民党章程和“一大”《纪律决议案》所规定的“民主集权制度之组织及纪律”②，作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却不得批评国民党中央的任何决定。由于共产党人难以放弃其批评的权利，因此它不能不经常违犯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造成国民党人不满和指控的种种口实。其三，作为国民党人，共产党各地组织及人员必须极力扩大国民党，但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则首先应该合力使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按照国民党的愿望，国民党应该包容一切阶级、阶层和群众，吸收所有的人，但按照共产党的愿望，则国民党只应当吸收社会上革命的分子和民众，把右翼分子排除出去，并把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交给共产党。但事实上，共产党左右为难，动辄得咎。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国民党必然反感；遵守国民党的规定，则共产党势必要放弃列宁所强调的独立性。

对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所产生的这种种矛盾，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就已经觉查到了。几乎很少有人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中关于争取领导权以及变共产党为群众性政党的要求，看成是必须立即实行的任务，但人们也决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员。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无疑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他们确信：一切必须服从于反帝斗争③，因此首先必须改造和发展国民党，只有如此才能巩固和扩大共产党。鲍罗廷甚至宣布说：他在报纸上谈国民党，归根结蒂就是“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巩固共产党”④。因此，他们

①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6页。

②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2，38页。

③ 索伯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④ N.米塔勒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发现的秘密文件》1927年天津版。

极力强调“严守纪律，不使用任何左的共产主义言词”① 的重要意义，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约束自己，不要“引起麻烦”②。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后立即通过一个妥协和调和的决定，劝告党员不要引起国民党人的任何反感，不要“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包括国民党内“左右之分歧”，而且应当使一切工作都“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甚至发展组织，亦应“十分慎重”，以免“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去拉他们的党员”③。为此，谭平山、林伯渠等甚至辞去了中执委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职，让与国民党人，以示诚意。但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国共关系，很快就证明是做不到的。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明确肯定：（1）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④，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2）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并设法改变国民党“一大”后过于集中和强调一致的缺点，应宣传“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从而便于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政策的公开斗争和进行反帝革命的广泛宣传。（3）必须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不仅如此，只有“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才能“防止资产

---

①②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182—184页。

④ 关于这次扩大会议对国民党性质的看法，似肯定其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见《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但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第2部分关于此次会议的介绍中说，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①。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旨在加强火药味的会议。然而，强调独立性，强调派别斗争和反对一切妥协倾向，在国民党内部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随着1924年春国共两党围绕着是否赞同苏联政府与反动的北京政府签约建交，以及是否赞同外蒙古自决的问题发生尖锐矛盾，他们之间的冲突迅速开始白热化起来。②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违纪以至反对共产党“跨党”的事件，日趋增多。到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共产党案发生，7月孙中山国民党签发“党务宣言”并决定正式开会讨论，国共之间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了。

两个性质不同，思维方式以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有极大差异的政党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乃至批评、指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一个政党之中，保持性质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两种党员，并允许各自独立和批评自由，则是十分困难的。1924年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陷入了后一种十分困难的状况。由于共产党人已全部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又不存在由下至上的民主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即便存在，以其绝对少数也不可能左右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和决定。因此，共产党人要想左右或影响其政策，多半只能采取组织分化和舆论批评的办法，以便争取多数和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力图使国民党在下层群众及舆论压力下不致右倾，但此举又必然引起种种纠纷。

1924年5月，为迫使国民党承认批评自由，使其不致过多以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186—195；202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4页。

② 参见1924年3—4月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刊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春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并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39—340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华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版，第300—301页。

纪律问题约束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使派别斗争公开化，为此特向鲍罗廷征求意见[①]。6月，鲍罗廷明确表示同意，并很快在与国民党中央监委谢持、张继的谈话中使用了这种策略。当谢、张等就中共党团问题质问鲍罗廷时，他公开宣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国民党内反对苏联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可视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由于许多右派分子加杂于中央执委会中，执委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共产党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此举虽属不得已，但他却"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②]。

鲍罗廷所谓"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其实只是一种托辞，他未必希望孙中山不作左派而为中派。事实上，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始终未意识到国民党内尚有中间派存在。直到众多事实表明国民党领导人与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之后，中共中央才开始相信：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他们断言：在国民党内，"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的话，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而国民党右派"控制了国民党的全部机构"。[③]为此，中共中央第一次开始怀疑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特别对国民党中央要开会讨论所谓共产党问题，表示不满。他指出：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有"许多反劳工的东西"，其"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俄的东西"，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并且无限制地给予支持，"这将对远东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强烈要求共产国际能够根据真实情况"制定新的政策"，再"不应当毫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了[④]。

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的通告，明确认为："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

---

① 《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6月。
②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页。
③④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8月13日。

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对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1）公开谴责右派，并在国民党内形成派别斗争；（2）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不应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时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以巩固和加强共产党人之力量，削弱右派势力；（3）准备迅速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使其成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以便必要时取代旧国民党而做“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①。

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了容共问题，并形成了相应决议。该决议虽再度肯定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但亦明确表示对中共秘密党团作用严重不安，要求共产党应将自身之活动，尤其与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于国民党。为此，会议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便直接负责了解和协商共产党的有关活动②。对于这种结果，直接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鲍罗廷显然抱着一种乐观的看法，他确信这将最终流于形式。但是，对于正在强调独立性和斗争性的中共中央来说，允许国民党人干预自己内部事务，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也是不可容忍的。何况，中共中央事先并不了解鲍罗廷将代表他们接受怎样一种决定。

8月27日，中共中央在获悉上述消息后，立即作出如下决定：（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③。紧接着，陈独秀向维经斯基通报了这一可悲的情况，称：这次会议“给了我们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虽不能开除我们的同志，但也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25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72—75页。

③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

敢冒犯右派，他们实际在利用右派"来压制我们，使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者至少是公开倒向它。对于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要反对。但是，鲍罗廷同志不但不反对，反而向他们建议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下而成立一个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并且拥有全权来解决两党的问题。"①

9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开始强硬地主张不妥协，要求共产党员我行我素，贯彻党的激进方针，坚定地站在工农阶级的立场上，不受国民党的任何约束，必要时甚至可以退出那些妨碍其坚持独立性的国民党中央部门。与此同时通过的另外一些决议则公开批评鲍罗廷回避矛盾的作法，认为用支持中派欺骗右派的手法来谋求团结，是绝对不可能的。进而，他们开始全面公开与国民党的政治分歧，直截了当地主张国民党必须立即完全放弃广州政府并停止军事行动，"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②。他们甚至要求共产国际以此为标准来重新考虑对国民党的援助问题③。

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无疑同鲍罗廷的策略主张发生了某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尖锐地主张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共产国际控告鲍罗廷的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大多数人至少认为有必要让鲍罗廷以至共产国际清楚地了解中共中央的强硬立场。为此，中共中央不仅派遣高尚德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州坐阵，而且干脆电"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不料，这时鲍罗廷在江浙战争和广州印厂工人罢工问题上又再度采取妥协态度，致使双方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

江浙战争是北洋直系军阀与江浙军阀之间争夺江浙控制权的一场内战，但由于江浙军阀卢永祥已秘密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国

---

①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9日。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89—591页。

③ 《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9月；并见《中共中央关于国民革命策略的决议》，192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1924年9月。

民党孙中山取得联络，孙中山对联合卢、张讨伐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极为热心，因而对于这一战争急欲响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公开反对，并深恐国民党再度与军阀势力相混合①，而鲍罗廷却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讨论决定北伐问题时，仅仅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应表明自己与其它军阀之间的区别了事②。

在广州印厂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及争取自身权益而举行的罢工问题上，鲍罗廷虽肯定了工人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对于工人在孙中山正计划开始北伐，以响应江浙战争之际采取的行动，却颇不赞赏，以致当国民党工人部部长为此强硬地要求工人复工之后，鲍罗廷不顾共产党人的反感，以孙中山已许诺实行改革并应服从大局为由，硬是劝告广东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说服工人停止了自己的罢工斗争。

9月中下旬，由于中共中央对江浙战争及对国民党压迫工农的态度等问题的强硬文件，先后到达广州共产党人手里，同时中共中央代表高尚德也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人同鲍罗廷之间的分歧立即公开化了。在10月初召开的广东地区委员会的专门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江浙战争问题上，以及印厂工人罢工问题上，双方始终各持己见。但整个争论的核心，实际上还是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即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并真正推进国民革命的问题。

这时的广州，正处在商团事件爆发的前夜，不仅商界，甚至广大市民对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而征收的各种捐税，已苦不堪言。加上港英当局的挑拨和地方军阀从中作梗，国民党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225—231页。

② 鲍罗廷当时提出了国民党人介入江浙战争的三种办法：（1）公开宣言反对江浙战争的参战双方，强调战争必然导致革命党的胜利；（2）公开自己的政纲，批评卢永祥和张作霖，军事上独立作战，不与结盟；（3）共同反对直系，但保持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会议大致接受了后一种办法。

的威信急剧下跌，政权统治极不稳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中山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公开宣布准备实行改革，作到市长民选、广东自治，“一切苛杂捐税悉数蠲除”①。但结果不仅改革之事遭到党内权势全面抵制，一事无成，而且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矛盾进一步突出。鉴于这种情况，在孙中山决心北伐后，国民党领导人几乎丧失了在广东坚持下去的信心，他们一心只想尽快北上，再也不想为广东民众徒费心力了。因此，当国民党人获悉印刷工人仍旧坚持其要求，并打算再度罢工时，他们竟对中共广东工运负责人冯菊坡声称：如果再发生罢工，他们将被迫动用警察部队强迫工人上工。而对中共广东地方委员会为表明自己立场起草的宣言，国民党中央不仅明确认为广东各报不得刊载，而且干脆以此宣言有碍国民党工作为由，要求共产党将其收回。更有甚者，共产党人前脚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国民党区党部后脚就强行予以解散；共产党刚刚召集了民众大会，就有国民党军队前来抓人。由于共产党人始终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出面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人的破坏很快就使得共产党人陷入困境，使民众产生恐惧和困惑。

面对这种情况，广东的共产党人忍不住了，他们开始尖锐地主张：“我们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我们应该拒绝在工人部和农民部中工作”，至少应该退出严重妨碍共产党人独立工作的工人部和农民部，以便独立地出面争取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但鲍罗廷却认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也就意味着暗中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同国民党决裂。”②而目前的问题并没有这么尖锐。他注意到的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成绩，他确信共产党人至少已经占领了包括黄埔军校在内的“八个阵地”，有了巩固的势力了③。可他甚至不知道黄埔军校支部局以及军事教官中有

---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页。

② 《鲍罗廷在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24年10月。

③ 《鲍罗廷在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24年10月。

多少中共党员。对此，谭平山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在国民党内至今还没有哪一个阵地共产党员真正具有了支配的势力，由于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孙中山和中派领袖的手里，因此所有共产党人有影响的地方，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他坚持认为，目前即使还没有到退出国民党的时候，我们也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谭平山明白断言："如果我们不选定这两条出路中的一条，那么，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消灭，反而会日益发展。这就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退。即使它得到成功的话，那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是顺利地实现了，可是共产党也垮台了。"①

10月初的会议未能有效的解决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尽管鲍罗廷被迫趋向强硬，共产党人也放弃了退出国民党中央的激烈主张，但双方在对国民党的认识上，以及在形势估计和相应对策等问题的看法上，仍旧相距甚远。在广东共产党地区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不久，陈独秀即正式致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再度重申了对鲍罗廷的强烈不满，要求"共产国际对他提出警告"②。

不过，10月初的会议还是多少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意图。会议成功地通过了两个决定：（1）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有关地区性的问题，鲍罗廷只能参加由谭平山、冯菊坡、周恩来等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以党员身份进行工作，涉及全国及全党性的问题，鲍罗廷则必须与中共中央代表协商并报中共中央同意；（2）鲍罗廷和谭平山目前应设法说服孙中山，成立一个特殊的革命委员会，以便应付目前的紧张局势，把政权从右派势力所掌握的广州政府和市党部那里夺过来，同时实行反对军

① 《谭平山在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24年10月。

②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1924年10月10日。

阀、居民自治、工农自卫、政治自由和取消苛捐杂税等项措施，设法把一切服从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

关于劝说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几乎是在商团事件爆发的前一天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而第二天发生的一切立刻把事情统统打乱了。由于武装反对广州政府的商团事件爆发，广东的共产党立即被迫重新进行政治选择：究竟是支持他们一向认为控制在右派手里并依附于军阀势力的广州政府；还是支持有港英当局背景的商团政府？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几乎别无选择。鲍罗廷的看法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许崇智比陈廉伯更有好处。""在许崇智支持的现政府下面，我们仍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既定的必要的大量合法的工作。陈廉伯上了台，工会就将被消灭，我们的组织就将被消灭，我们自己也得转入地下。"因此，宁肯暂时放弃反对军阀的宣传和其它改革的口号，也必须设法保证不使军阀们转到商团一边。当然，鲍罗廷并没有忘记乘机"把受我们领导的全部力量联合到统一的指挥之下"。根据他的提议，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选举蒋介石为黄埔军校、装甲车队、空军、工人纠察队及吴铁城部等力量的总司令①。而蒋介石指挥的部队确在许崇智、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及李福林等军阀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平息了商团的叛乱②。

然而，依靠军阀势力平息商团的叛乱，在所有共产党人看来，至多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鉴于商人因不堪重荷竟至沟通港英人士谋反，及至为维持广州政权自己亦不能不向军阀求助的事实，共产党人更加痛感放弃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的极端必要性。蔡和森尖锐地指出：坚持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只能进一步造成

---

① 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进行武力反击的决定，同时成立了政治部和军事部，前者由汪精卫领导，谭平山协助，后者由蒋介石领导，廖仲凯协助。孙中山任委员会主席，鲍罗廷任总顾问，并在孙缺席时有表决权。

② 这时广州地区总共有5个派系的军阀武装，即桂军、湘军、滇军、粤军、豫军。滇军、粤军较强，范石生，杨希闵均为滇军将领，许崇智、李福林均为粤军将领。

“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伕……等恶政”“此时毅然决然宣布停止北伐，收缩一切军事行动与准备抛弃广州政权，即使民众感情一时迷于反革命而不易转移，然将来必有翻然觉悟倾向革命之一日。”他宣称：“一个革命党只有积极促成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才能夺得全国的政权，只有夺得全国的政权才能实施其政纲以系民众的信任。”“所以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要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①。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出于对国民党现状的严重不满，苦于无力扭转其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方式的影响，拘泥于某些经验形式和理论观念，尚不了解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鲍罗廷自然没有类似的幻想，在经历了商团事件之后，他甚至开始对是否实行前此决定的反对军阀、取消苛捐杂税等激进口号，也表示怀疑。他明显地意识到，左派在同中派斗争时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策略就是应当利用中派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同时加紧同包括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在内的中间群众建立统一战线。进而，他再度想到了土地革命的问题。他主张，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促成国民党领袖左倾，关键还在于消灭现存的土地关系，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投身于革命。为此，他甚至建议共产党人立即改变以往的宣传鼓动的方法，迅速派部队到农村去，以武力解除地主武装，然后用收缴的武器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他相信，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国民党人将会在“原则上同意进行土地革命。”

孙中山真的会“原则上同意”共产党人的土地革命主张吗？这实在是一个大可怀疑的问题。好在历史没有给鲍罗廷提供这种

① 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4日。

实践预言的机会，紧接着于10月23日发生的"北京政变"再度打乱了共产党人的预想和部署。

北京政变的成功，使孙中山联合张作霖、卢永祥讨伐吴佩孚的北伐计划不战而胜。孙中山当即决定停止北伐计划，准备应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对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再次发生分歧。蔡和森等公开认为："继曹吴而起的北方政情，仍然为北洋军阀三派余孽争夺宰割的局面。"因此，"北京发生的一切实质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美国决定抛弃吴佩孚，代之以冯玉祥，"孙中山不应到北京去和军阀们搞在一起①。但鲍罗廷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十月廿三日政变及后来的发展为国民党踏上国民革命斗争的广阔舞台并成为举足轻重的政党，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应该北上，以便到处去公开捍卫自己的立场和口号。"同时，鲍罗廷主张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给予它切实的援助"，以便在北方"建立一个国民党的根据地"。他确信，"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定能回过头来收拾张作霖"②。

鲍罗廷的意见毫无疑问更能让孙中山等人接受，他甚至说服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一些持异议者。"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业已出发，中共中央继续坚持原议已毫无意义，所以他们也随之改变了态度"，他们迅速接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反对由少数军阀政客操纵所谓"善后会议"和"国民代表会议"来决定一切③。中共中央并通知各地党组织，立即建立筹备国民会议的委员会，设法造成广泛的群

---

① 《鲍罗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4年12月。

② 《鲍罗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4年12月。

③ 同上，并见《陈独秀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1924年11月15日；但一：《为国民会议奋斗》，《中国青年》第55期，1924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1924年11月6日附言。

众运动，促进其召开并成为号令全国的“临时国民政府”①。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相信鲍罗廷的意见是正确的，相反，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鲍罗廷独断专行的不满。在紧接着于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团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蔡和森、陈独秀等公开指责鲍罗廷“从来不同我们讨论问题”，“在许多场合下，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从来不和党打招呼”，他甚至不向共产党人控制的国民党地方党部提供必须的工作发展经费，就连一些答应提供的用于党的工会活动的经费，“也是通过孙博士给的”。他们认为，鲍罗廷过分注重孙中山、国民党及其军事工作，一方面是由于他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他对“苏维埃俄国”的责任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不重视。陈独秀尖锐地指出：数月来中共只得到鲍罗廷通过孙中山付给的1000元来进行全部工作，“而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报纸每月得到两千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一切②。

要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同鲍罗廷之间所发生的严重矛盾，无论如何是难以办到的。这种矛盾具体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症结显然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错综复杂的结盟形式上，和它们之间既一致又不一致的利害关系上。特别是，要想让同时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成员、国民党党员、苏联“国家经费”开销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承担者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时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和愿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就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看得很清楚。他在试图解释这一系列矛盾时明白承认：“国民革命运动、一切军事工作、外交工作等等，都不是由共产国际而是由苏维埃

---

① 《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4年11月。

② 1924年全年共产国际根据中共预算和追加预算总共提供了35000元以上的活动经费，但在夏天之后曾中断过几个月的时间，致使中共在这数月里不得不靠前此结余和鲍罗廷通过孙中山提供的1000元进行活动。陈独秀所称即指这一情况。

俄国进行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当然有时取决于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有时又不取决于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他显然对这种情况不那么赞同。他固然不主张“为此而谴责鲍罗廷”，但他明确认为：“如果鲍罗廷做得不对，共产党应该同他进行斗争”。而鲍罗廷也无权“不听党的意见”。他明确反对像鲍罗廷那样过分依赖国民党，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更多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共产党的身份进行活动”，“必须自己实行自己的路线”，必须更加猛烈地向右派进攻，以便“把我们同国民党区别开来”。他并且告诫共产党人：那种“认为我们的最低纲领与国民党的纲领没有特殊的差别”的想法，“是不对的”①。

继半年前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之后，维经斯基再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自身独立性和斗争性的直接推动者。在紧接着于1925年1月14—21日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人们迅速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重申和强化执委扩大会议方针的决议。这些决议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心愿望。它包括（1）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军阀、反对侵犯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立场；（2）对国民党实行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3）建立独立的工农组织，特别是把产业工人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此，中共党员及其领导下的产业工人，今后一般不再加入国民党②。它甚至还响亮地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主张③。

中共“四大”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共“三大”至“四大”，历时一年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增至近900人，仅1倍余。而自“四大”至10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不过9个月时间，党员人数却增加约两倍，达到2428人④。尤为重

①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1924年12月。

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271—297页。

④ 《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25年10月。

要的是，1924年12月的联席会议及其随后的中共“四大”，居然奇迹般的改变了中共党内自国共党内合作以来所存在的那种激烈的愤懑情绪，那种要求放弃广东根据地、放弃军事斗争和要求退出国民党中央乃至退出整个国民党的强烈愿望，人们开始从被动消极的防御态势很快转入积极进取的进攻态势。维经斯基使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应该并且可以对中国现阶段革命发号施令，但这只能通过国民党这个媒介物来实现，即只能通过其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和势力消长来实现①。看起来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时对运用派别斗争这个武器来扩大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势力和影响，都是相当感兴趣的，因为连鲍罗廷这时也对鼓励中共开展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形成了一些大胆的想法。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称：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问题在于（1）如何使右派分裂出去而继续使共产党保持在国民党内；（2）是否应该使国民党及其中派领袖与资产阶级决裂。他坚信：“民族解放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现在和将来都将掌握在左派手里”，而右派“完全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②。

鲍罗廷的预言很快得到了某种印证。3月8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旨在掀起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运动。但3月10日，在鲍罗廷的作用下，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委扩大会议，轻而易举地将一批右派开除出党。进而，由于3月12日孙中山突然逝世，长期集权于孙中山一人的国民党出现了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鲍罗廷更得以利用其政治顾问的地位和苏联援助的巨大效力，来施加影响了。

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全党注意借孙中山逝世之机为国民党“征求党员”，不惜改变“四大”关于在产业工人

---

① 参见维经斯基：《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殖民地问题》，《共产国际》第4期，1925年4月。

② 《鲍罗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5年2月14日。

中一般不发展国民党员的决定。因为若能乘此机会"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我们就可以"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①。同样，鲍罗廷也毫不懈怠。他看准了一心想依靠苏联力量的汪精卫，扶助其取得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并借廖仲凯被刺一案进行了一次巧妙的"政变"，使得地位不高但与苏联顾问过从甚密的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军事大权，从而一举改造了国民党的上层结构。

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广州这次政变后上台执政的完全是国民党左翼"②，他们"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③。以致斯大林干脆主张：共产党人不应再以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了，而"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到工人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把国民党变成"工农政党的形式"了④。而中共中央领导人则进而宣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已经"证实了"⑤。

毫无疑问，孙中山逝世后的形势变化，使共产党人在判断上发生了混乱。他们突然间发现过去以孙中山为首的那个左右着国民党方向的中间势力消失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切权力都在向左倾斜。人们在对容共政策的看法上，日益鲜明地分成两派。中间派迅速分化了，而那些走向右派的国民党人同右派一样，几乎都是以放弃权力为代价的。这种趋势太诱人了，就连一向保守的鲍罗廷也沉不住气了，他已开始设想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把国民党完全控制在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使之日渐成为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第328，332页。

② 《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5年10月7日。

③ 独秀：《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向导》第133期，1925年10月12日。

④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0页。

⑤ 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

“工农政党”的问题了。

这回轮到维经斯基保持冷静了。刚刚把共产党人的独立精神和斗争热情鼓动起来的维经斯基，很快发觉人们走得太快了。把权力集中在左翼手里未必是件好事，“这就党、就整个国民党说来多少缩小了政府的基地”，它无异于壮大敌对势力①。国民党中派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宣传“共信不立，互信不生”，提出“造纪律”、“集权制”、“排拒性”等等主张②，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在1925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上，维经斯基明白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群众目前多么左倾，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的程度”。“现在不应该混淆两种现象：一是极右的国民党分子已经把自己置身于党外，同他们已无法搞统一战线了；另一种现象是一部分国民党元老担心群众走得太远了。”对于前者，应该“使他们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以便于开除他们，但对于后者，即“以戴季陶为代表的重要的中派”，“则需要协商，以保持国民党的统一”③。因为，他们毕竟同老右派有所区别④。

维经斯基等人对“新右派”的分析几乎立刻得到了证实。在11月由“老右派”鼓动召集的以开除共产籍党员和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为中心内容的西山会议预备会期间，戴季陶等竟因主张“对共产党之同志，宜邀守常等为切实之协商而勿使为片面分裂之行动”⑤，遭到极右分子的绑架和殴打，结果戴季陶、吴稚晖等虽参予筹备却未参加会议。对此，维经斯基等立即抓紧时机，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对这些所谓“新右派”进行了苦口婆心的争取说服工作，甚至私下许愿可以“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

---

① 《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5年10月7日。
②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8月。
③ 《陈独秀同志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1925年10月。
④ 见《陈独秀同志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1925年10月。
⑤ 《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

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如1/3以下等等①。维经斯基进而还主张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也“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更加谨慎的策略”，如“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②。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显然是按照上述妥协分配中央权力的。尽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谓左派和共产党人占了出席代表的一半以上，会议从议程到决议内容都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等中央权力机构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严格遵守了1/3以下的许诺③。对于西山会议的右派参加者，除其头子邹鲁、谢持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外，其余多仅予以警告，戴季陶还被特意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④。不过，即便如此，同“一大”相比，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所获得的权力，仍旧大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特别是在中央党部的8部1处中，中共人员竟占据了77%左右的领导职位，从而控制了国民党的几乎全部实际工作⑤。更为重要的是，这时共产党人在广东已掌握了约10万工人和60万农民，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已分别达到2000余人和3万余人；在国民革命军中，中共党员已达上百人，其第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3个师中两个师的党代表，9

---

① 见邹鲁：《西山会议》，《邹鲁文存》，并见《维经斯基同志关于与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委员会谈的报告》1925年12月4日。

② 见《维经斯基同志关于与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委员会谈的报告》等。

③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51—154，210—211，226—227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3—294页。

⑤ 原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共52名，中共党员占10名，不足1/5，“二大”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共80名，中共党员占19名，约占1/4。“一大”后中央党部中中共党员仅5人，不足1/4，“二大”后达17人，约占77%。

个团中7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①。而苏联顾问团也满有把握地宣称：苏联顾问事实上是这里所有军事部门的头领，国民党的所有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②。

事情的发展太令人兴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破天荒地第一次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国民党"近期的革命发展趋势"。它甚至断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及其领导核心，是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摆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面前的独特的社会政治任务的完全合乎规律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特殊形式"，为此，它要求共产党人："不惜一切地保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斗联盟"，并"一如既往地参加国民党及其领导机构"，帮助国民党开展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③毫无疑问，在共产国际看来，进一步把国民党变为"人民革命政党"，即"工农政党"，多半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26年2月4日，鲍罗廷带着极为满意的心情"奉命回国述职"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国共之间长期积蓄起来的矛盾，由于"二大"后共产党大幅度膨胀自己对国民党的权力正在白热化，而他的离去则使国民党中央权力天平上失去了唯一的制衡因素，于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降临了。

3月20日，一系列颇为偶然的因素促使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突如其来的政变④。政变的结果，蒋介石取得了近乎军事独裁的地位，国民党并通过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从

---

①② 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杨文中关于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之说似可存疑，因当时最有实力也是中共影响最多的第一军只有50余名中共党员，整个中共也不过只有不足3000党员，其中2／5为军人显不可能。根据第一军中中共党员人数推算，"一千余名"或为100余名之误。）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1926年3月2日。

④ 参加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

而使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原有的权力及地位，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以及罗加乔夫等被毫不留情地解除了顾问工作，共产党人则先后被迫退出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和整个第一军，辞去了刚刚争得的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及秘书职务，并不得不承认其党员在国民党各级机关所占比例不能超过1/3，不得怀疑或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维护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一致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代表不得不违心地予以认可的《整理党务案》，终于就国共两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作出了一个正式的明确规定。它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容共政策的"两党合作"性质，但严格规定了这种政策形式发展的最终限度，即必须保证国民党及其"两党合作"的领导权绝对可靠地控制在国民党人的手中，不受共产党之左右和侵犯①。这就在实质上限定了国共两党的主客关系。

在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左右摇摆之后，国共两党关系走到了一个基本确定的位置。实际上，这个位置始终是存在着的，就像钟摆一样，虽左右摇摆，却不离其中。这是因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斗争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是相互需要的，任何一方的妥协都是以对方的妥协为代价的。尽管两种势力为各自前途的考虑，总是力图使之向左或向右，因此左右摇摆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也不会停止。但考虑到大致相同的革命目标和利害关系，考虑到自身力量及其敌友变化的危害，人们又不能不时时抑制过左或过右的偏向，从而保持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上的平衡和重心。在必须依靠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和政治旗帜进行斗争的条件下，这种力量上的平衡和重心，其实就是保持国共两党的主客关系，并排除任何反客为主以及主客分离的倾向。否则，就可能如中共中央所说：只能"对帝国主义最为有利"②。

---

① 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27—241页。

② 《张万和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

（三）出乎意料之外

念念不忘世界革命，念念不忘革命的彻底性，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1925年初中共“四大”通过的有关决议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决议明确认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一样，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决议提出了坚持民族革命的“世界性与阶级性”的问题，主张中国革命应当以“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包括“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为目的。为此，决议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不仅必须“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反对反革命和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行为，而且必须设法使无产阶级“取得领导的地位”，并“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准备“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尽管决议的作者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还幼稚”的事实，然而，由于他们相信“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因此，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的现象，寄予极大的期望①，仿佛这种主观的战斗精神将有助于很快弥补其力量上的“还幼稚”，有助于其坚持反帝斗争的彻底性而毫不妥协，甚至有助于其把民族革命引向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

阶级的力量通常由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所构成，物质的力量一般反映在组织上，精神的力量则通过心理或所谓觉悟来表现，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工人群众由于身受外国资本家中世纪式的超经济强制性掠夺和剥削，因而往往对奴役者充满仇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71—275页。

恨，容易演化为反抗和斗争。但在人口众多，破产农民大批涌入城市，劳动力远远供大于求，以至工人中行帮观念盛行，文化水平日渐低下的中国，要把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要求的阶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要把工人中弥漫着的反抗心理变成真正具有威胁的斗争，更是极为困难。这是因为，工人所面临的，是外国资本家、中国军阀政府、封建行帮、黄色工会，以及饥饿的失业大军与破产农民等各个方面的沉重压力。不仅无组织的工人无力与其抗争，就是把占全国人口2％左右，占大工业区域人口总数10％左右的工人全部组织起来，也难以独立地与其抗争。

在1924年底至1925年初，共产党人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区上海，仅仅掌握了8个工会和2227名会员；在革命根据地广东，也仅仅掌握了9个工会和29500名会员，并间接影响了国民党所控制的5个工会和14000多工人，尚不足国民党控制数的一半。加上湖南26400名会员、湖北约30000名会员、山东4300名会员、大连2300名会员和天津的20名会员，共产党总共只组织了大约10万名工人。加上其中理发工、人力车夫等非产业性工人占相当比例，实际上全国240多万产业工人中，共产党所控制的才仅占1/30左右。而在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共产党所组织起来的工人则仅占全上海产业工人总数的大约1％。不难看出，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不论工人中“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多么强烈，要想依靠这极少数工人来取得革命的“领导的地位”，并坚持“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实现其革命的“世界性与阶级性”，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奇迹出现了。1925年2月，由于一些日本纱厂推行野蛮的“养成工”制度，以大批男女童工顶替和淘汰成年男工，并且接连发生殴打和逮捕不满工人的事件，以至发生了以“反对东洋人打人”为主要斗争口号的日本纱厂罢工风潮。共产党人乘机加以组织和引导，从而使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迅速膨胀、工人群

众的斗争热情日渐高昂。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会员很快由2000多人猛增到近万人①。斗争断断续续延续到5月15日，因一纱厂日方职员无理关闭工厂，并枪杀工人顾正红，致使罢工风潮立即蔓延到全上海约20家日本纱厂，同时，中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抗议活动也大规模爆发。5月30日以后，英国捕头公然命令老闸捕房巡捕一连几天向手无寸铁的抗议群众开枪，并调集海军陆战队登陆，宣布租界戒严，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而点燃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各界人民的仇恨怒火，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浪潮由此兴起了。

用群众的革命的方法来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这无疑是共产党人的目的所在。尽管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这时还只能表现为罢工、罢课，以至罢市的文明斗争形式，但这已经足以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把激进的下层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中共中央显然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自己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并利用它所控制的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学联，通过在它影响之下的具有运动总的领导机构性质的“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五卅”惨案解决方案“十七条”，使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超出了地方的局部性质，具有鲜明的反帝革命色彩。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分为“先决条件”和“正式条件”两项。“先决条件”为“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被捕华人，一律送回”等；“正式条件”则为“惩凶”、“赔偿”、“道歉”、“优待工人”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撤销新增之“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华人充任捕头及巡捕之半数、及收回会审

① 参见《陈独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信》1925年3月20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7页；《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306页。

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和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并享有与外国人平等之投票权等①。

“十七条”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共产党人的愿望②。但是，提出解除巡捕之武装、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允许工人结社和罢工等等条件，已经足够了，因为共产党人重要的目的在于宣传和教育群众，而不在于指望反动的北京政府或简单的罢工、罢市来解决问题。陈独秀说得好：这次事件，不能“仅以惩凶赔偿了事”；不能“缩小战线对英、日或专对英国”；“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解决”，绝“无调和之余地”。因此，也只有使民众团结一致，“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以实力赞助国民党和国民军”，推翻北方军阀统治，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府，才有可能③。

6月11日和23日，接连在汉口和广州发生的两起惨案，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看法提供了更充分的根据。11日，因日人无理殴打中国搬运工人并将其随意囚禁，致使已因五卅惨案而愤怒的群众群起攻之，冲击了日人商店并打伤了日本人，英租界当局再度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其海军陆战队开枪射击，使群众大批受伤并有11人死亡。紧接着，香港及广州沙面租界工人愤而举行大罢工，在回到广州会同广州群众在沙面对岸之沙基长堤举行抗议游行时，又一次遭到神经过敏的英国水兵和巡捕的凶暴残杀，致使

---

①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1925年6月7日。

② 陈独秀6月6日在《向导》第117期撰文称，“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本领事；（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瞿秋白在6月22日的《向导》第119期，更进一步主张：应当“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三、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四、收回领事裁判权；五、永久撤退驻华的一切外人的武装势力”等。

③ 独秀：《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向导》第118期，192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351—352，361页。

50余人当场毙命，170余人受重伤。一个月之内，接连三起英人野蛮射杀徒手示威群众的血腥暴行，足以说明事件本身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和局部性的。它清楚地告诉人们，长期以来依仗武力并凭据不平等条约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革命运动，已经仇恨到了何等程度，而要指望他们立即自动放弃武力，适应时代的潮流，又是何等困难。

野蛮的屠杀理所当然地要激起极端强烈的反抗心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不能立起革命呢？可以肯定，共产党人这时大多也不抱如此幻想①。不过，他们至少还是指望这次事件能够掀起全国性反帝斗争的浪潮，并形成一系列反帝革命的组织，诸如“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等等，从而为进一步的民族革命运动做好准备。然而，这样的条件仍旧没有具备。工人不可能无限期罢工，商人更不可能长时间罢市，“十七条”中涉及不平等条约之诸条既然不能指望通过群众罢工、罢市乃至抵货等方式得以解决，那么不论出于何种考虑，斗争的策略都必须加以改变。为此，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人和梁启超、江元虎等共同开始公开主张“缩短战线”、“单独对英”，而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则力图折冲樽俎，以“简单易办”为原则，反对形成僵局②。妥协和调和的倾向出现了，这自然违反了共产党人的初衷。瞿秋白对此痛加斥责称：“妥协派的主张：一、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三、是缩小范围，只求就地解决”，以便“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长增高起来”，“实际上简直

① 这并不等于说当时共产党人都能保持冷静，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就明确主张领导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妥协退让。但被中共中央所否决。关于这种情况，邓中夏和陈独秀均有说明。见《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1页，并见《向导》第126期。

② 《上海总商会议案录》，1925年6月12日第三次五卅委员会议记录。

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①。可是，徒唤奈何，在工人的斗争还离不开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1926年6月12日，上海总商会修改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取消了其中具有全国性和较强硬的条款，缩减为"十三条"，提交北京政府与外国公使团正式交涉②。此一修改虽激起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但却"获得了广泛的拥护"，使总工会事实上亦不能不听之任之③。紧接着，随着交涉失败，大小商人因自身利益关系，被迫于6月23日在继续"援助工人坚持罢工"和"抵制英日货物"的条件下重新开业，而总工会亦不得不逐渐改变"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非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已"的强硬态度，接受总商会出面调停，不仅缩小斗争范围（单独对英），而且限定斗争目标到最小程度④。最后，上海这场以反帝反不平等条约和要求惩凶赔偿、中外平等管理租界的政治性罢工斗争，竟在几乎纯经济条件下先后于8、9月复工，英、日各厂商政治上的唯一让步就是："外国职员平时在厂内不带武器"和"各厂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⑤。谁都清楚，上海的罢工斗争没有达到最初的斗争目标。

应该承认，以上海工人罢工为起点的这场反帝斗争所产生的

---

① 秋白：《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向导》第119期，1925年6月22日。

② 参见《上海总商会议案录》，1925年6月12日第三次五卅委员会议记录；《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232—233页。

③ 见《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七月扩大执委会情况的报告》，1926年7月21日；另外，共产党人虽公开批评总商会的"十三条"是阶级妥协性的反映，但此后仍在各方面进行了协调和联合行动，甚至在7月10日还成立了包括总商会在内的、由工商学八团体组成的检查出货委员会，在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查封了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后，也由总商会奔走调解，得以启封。而关于工人救济费及复工等事，总工会也仍旧时常与总商会交涉，由总商会负责的工人救济费，也从未中断过。

④ 见《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坚持罢工告工人兵士学生》1925年8月10日；独秀：《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⑤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2—185页。

影响是十分突出的。它几乎波及了全中国所有大中城市，使五卅运动一开始就演变成一场全民族性质的反帝革命运动，民众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帝国主义奴役的危害和耻辱，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响应共产党人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革命性口号。短短几个月里，共产党人以其惯有的激烈的不妥协的坚定的斗争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渴望革命的工人和学生。仅在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在五卅运动开始后的3个月里，就扩大了两倍多，其中86%是工人①。而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则成了上海几乎一切工会组织理所当然的领导机构，这无疑是共产党人的一种重大胜利。

不过，遗憾的是，无论是上海的中共中央，还是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事实上都没有能够成为这场斗争的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在上海，运动一开始就不能不受到为共产党人所不齿的上海大资产阶级团体——上海总商会的影响，甚至就连总工会8月10日为结束罢工所提之最低条件②，作为调停人的总商会也未能为之力争和坚持，致使复工条件最后完全离开了五卅运动的基本目的，工人的罢工客观上似乎成为上海资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和地位的一种附助的威胁手段。五卅运动的直接结果，显然是对上海资产阶级有利的。从1925年10月1日外国公使团就五卅惨案解决办法所提出的方案和以后的结果看，上海资产阶级所最为反感的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等得到解决，越界筑路与华人加入公共租界董事会问题承认协商，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

---

① 五卅运动之初，上海只有中共党员290余人，至9月，发展至1080人，增加约800人。此后至1926年4月，又增加一倍，达2500人。可见五卅后中共影响之迅速扩大。

② 见《上海总工会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其中包括“无条件交回会审公廨”，“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发给罢工期内工资百分之五十”，“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赔偿死伤学生、工人”等。这些均未实现，所实现者，仅“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和“工资一律发给大洋”两条（实为一条半）。

的只有交还会审公廨一项①。而激进的工人、学生和一般市民所强烈要求的惩凶、赔偿、道歉、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利，以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事实上都未能解决。就连答应交还的会审公廨，也仍旧保留了必须由外国领事派员"观审"的不平等条款②。这说明，五卅惨案的解决，仅仅是中国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的结果，而共产党人和它所领导下的工会，还没有力量来阻止这种妥协并引导运动真正向着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发展。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许多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懑③。

共产党人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真正对这种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呢？紧接着五卅运动之后的省港大罢工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例子。

省港大罢工起于上海五卅惨案和汉口6·11惨案之后的6月19日，经6月23日沙基惨案后迅速扩大，香港及沙面租界罢工工人先后达25万人之多，罢工时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通过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对香港的封锁和排斥英货，使香港进出口及地价、房租等年损失50%左右，港英当局一天即损失700万元。加上数千家商店倒闭，肉蛋菜蔬等副食品供应奇缺，其经济上、生活上所受打击空前沉重。以至港英当局及外国公使团最后不得不同意罢工委员会提出的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来收束罢工的办法，从而使4年前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及附件》中有关附加税的规定，最先开始在广州政府的管辖区内实施，其税金并被用于资助那些正在为使中国进一步摆脱列强控制的罢工工人④。

---

① 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236—237页。

② 同上书，第263—264页。

③ 在五卅运动以后，这种敌视资产阶级的倾向在上海的共产党人中十分普遍。参见当时的《向导》周报。

④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把二五附加税的实施看成是省港罢工的一个胜利，并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中的新纪录"（第216页）。

省港大罢工同上海五卅运动一样，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省港罢工工人最初提出的口号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和要求香港政府实行“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以及“居住自由”①。此后，10月初，省港罢工委员会又提出过《香港罢工工人恢复工作草案》15条，把条件具体到香港地区，除重申“政治自由”等项以外，又具体就罢工工人的经济赔偿及工作保证等提出了要求②。但至最终解决，上述要求几乎全部没有实现，港英方面仅同意以二五附加税税金资助罢工工人复业以前的生活了事。而所谓二五附加税的征收问题，实际早已于1922年2月6日有华盛顿有关条约认可，并于1925年8月5日开始生效。只因此九国协定之二五附加税，不过是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前的一种过渡办法，北京政府已于同年10月24日提出新的临时附加税办法和取消关税限制的要求，为此正在召开特别关税会议进行讨论解决，故尚未实际征收③。可见，这一二五附加税的征收，也并不是多大的胜利。

其实，省港大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一样，就其最初目的和最终结果的关系而言，都是不成功的。这一点苏联人早就预见到了。他们告诫说：“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在十七点要求中得到体现的民族运动的目的，通过任何一种罢工，即使是最有力最持久的罢工，也是无法达到的”。它“只有通过全中国范围的武装斗争，通过胜利的战争才能做到”④。因此，他们早就主张在“不放弃争取全民族解放的口号，以之作为进一步开展全民族斗争的

---

①② 见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省港罢工概观》1926年8月出版。

③ 关税特别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北京政府提出（1）1929年1月1日即应实行关税自主，由中国自定关税定率；（2）此前海关税应在值百抽五以外，普通品加征5%的临时附加税，烟酒加征30%的临时附加税，其余奢侈品加征20%的临时附加税。此一方案较华盛顿会议所定一般物品加征2%，奢侈品加征5%临时附加税，有较大的不同。

④ 赫列尔：《上海的罢工》，《真理报》1925年8月29日。

战斗号召”的条件下，有步骤地从过高的要求上退下来，缩短战线并限定要求的范围，以至把惨案本身的解决交给南北政府去办理，进而迫使帝国主义作出某些让步。在他们看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当工业无产阶级愈益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因素的时候，帝国主义者的些微让步，也必然会使解放运动提高到更高的水平”①。所以，尽管共产党人的要求最初十分激烈，但无论上海还是广州，当罢工已经造成了必要的声势以后，他们都不能不从原来的要求上大踏步地退了下来。问题仅仅在于，在上海，虽然罢工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共产党人却已经深感力不从心；而在广州，罢工却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并且，人们丝毫不为最后的结果而感到沮丧。

不错，广州的运动和上海的运动之间有许多不同，如所处地区不同，斗争方式不完全一致，甚至罢工、排货对各阶层居民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等等。但最大的不同，显然在于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背后，有一个同情并支持他们的革命政府，而上海却没有。比较汉口、上海、广州三地的运动情况可以看出，邓中夏的下述看法是有道理的，即“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汉口、上海、广州同样发生了英人枪杀中国民众的血案，但因湖北省地方军阀竭力压制，汉口群众未能形成更大风潮；而上海因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抗议浪潮遂汹涌一时，但到奉军入沪，成立戒严司令部，并于9月中旬封闭上海总工会，整个运动即被扼杀了。与此相反，省港大罢工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广东政府的赞同和帮助，它不仅在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人对罢工工人的影响和领导，而且对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和执法机关，予以了最大限度的容忍，对罢工工人封锁香港和抵制英货，从各方面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它对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态度，从一开始

① 维经斯基：《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国》，《真理报》1925年6月14日。

就公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明确认为："救治之道，不当仅注意道歉、惩办、抚恤等枝节问题，尤当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著手，以谋根本解决"①，"非废除不平等条约，则类此之惨杀事件，终无由绝迹于中国以内也"②。尽管它每月援助省港罢工委员会不过1万元，其部分领导人对对抗英国持疑惧态度，但其多数领导人反英意志颇为坚定，有人甚至强硬主张"对英宣战，交还广州（租界）"，就连蒋介石也跃跃欲试，提议"除以和平方法与英国人奋斗外（如抵制英货等事），并应一方面实行武力之预备，于半年内准备了结，一方面与英国人为极长时之奋斗（或须至三年五年之久）"③。不难看出，省港大罢工明显地激励了国民党人的反帝爱国热情。

毫无疑问，省港大罢工是取得了重要成果的。它的胜利并不表现在其直接结果上，这是因为，不仅罢工，就是当时广东军民同仇敌忾并全力以赴反抗英国，也不可能使之屈服，更不可能很快改变各国政府特别是在中国的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帝国主义乃至殖民主义态度。省港大罢工的成功，表现在它动员群众充分，策略运用得当，统一战线巩固，斗争持久而且效果显著。特别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省港大罢工成功地避免了在上海五卅运动中出现的那种统一战线内部的纷争，共产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能够对国民党和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予以高度重视和保护，不过分坚持难以达到的过高目标和口号，从而使后者能够始终同自己站在一起。其实，省港罢工同上海五卅运动一样，开始都是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主张与列强经济绝交并全面抵制外货的，结果

---

① 《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关于上海五卅惨案宣言》，1925年6月7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311页。

② 《中国国民党胡汉民等催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电》，1925年7月，同上，第324页。

③ 参见《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1926年秋；《蒋介石为军事问题致加伦函》1925年6月26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二）。

"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①。不仅广州的日用工业品、粮食、燃料等方面的供应日益紧张，而且广东和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无法外销以至积压、霉烂，如此不仅工商业大受损失，农民利益亦严重受损，连广州市民生活也深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广州的共产党人很快灵活地变换了策略，接受了国民党人和工商资产阶级提出的"缩短战线"、"单独对英"的主张，确定了"凡不是英国货，不是英国船及不经过香港及澳门的，均可自由起卸"②的原则，同时积极加强工商联合，组织工商验货处及农工商学联合会等，使工商资产阶级享有相当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从而密切了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维护和照顾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保证了罢工运动的继续进行。

事实上，上海的绝大多数工商资产阶级同广州的工商资产阶级一样，都是富有爱国心和民族感情的，他们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同共产党人的反帝革命主张是有共同点的。上海的工商资产阶级之所以难于长时间坚持罢市、支持罢工和联合抵货，除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所具有的妥协性之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们缺乏广州那样的有利条件。他们不可能如广州一样另开港口码头，甚至上海的燃料、电力、粮食供应也统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仅工部局故意停供华厂电力一项，就导致13家华商纱厂被迫停工，6万多工人失业，两个月即损失326万元以上③。况且五卅运动不可能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长期坚持罢工、罢市和和平抵货，最终不仅可能得不偿失，而且难达目的④。

---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02页。

②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第297页。

③ 《申报》1925年9月22日。

④ 广州抵货运动因另开口岸通商，广东政府与商人两相获利，政府月收入增加4—5倍，进口商品量也增加1—2倍。而上海抵货运动虽使英日厂商暂时受损，但因粮、煤、电均受控于洋人，加之铁路阻塞，罢工工人需费颇多，不要说长期罢市没有可能，就是坚持长期罢工和抵货，也必将对上海民族经济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

一样的罢工，一样的目的，甚至一样有共产党在领导，其实际效果和最终的心理感受却如此不同，这充分说明，面对强大的外部敌人，确立阶段性目标，保持策略灵活并注意必要妥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同时，它也说明，即使在群众性的反帝斗争中，政权的作用更是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正如曾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部门负责人的共产党员蓝裕业当时所说："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在国民革命中是如何的需要。不但省港罢工因国民政府之保护，不致如上海之被军阀一样摧残，就是在每一次交涉中，因为有了国民政府能为人民利益抗争，帝国主义乃如芒刺背，感觉不安，屡次勾结叛军来攻击国民政府，务欲缴去然后快"①。实际上，不论人们最初是否愿意把反帝斗争的目标看成外交问题，最终都不能不承认应由政府出面与肇事国及公使团谈判解决问题，甚至不能不承认涉及全国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当时只能由得到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来进行②。事情很明显，所谓不平等条约以及上海、汉口与广州的流血惨案，既是一个民族压迫问题，也是一个外交问题，被压迫和受欺凌的民众有权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压迫者的愤慨和反对，但涉及国与国间关系，问题最终仍须由权威政府通过外交方式予以解决。然而，这时唯一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而具有解决问题权威的北京政府，却是一个在列强卵翼下生存而在国内已丧失权威的政府，不仅它自身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即便有，各国政府也不可能相信它具有这种能力。显然，在大多数列强看来，把自己国家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各种经济利益，交给一个连国家都不能统一，地方军队都不能约束，社会治安都难以维持的徒有虚名的政府来保护，放弃自己已经取得的哪怕是不平等的单方面的权利，无论

---

① 蓝裕业：《省港罢工交涉之经过及其现状》，《广州评论》第2、3合期，1926年10月。

② 见《中国国民党胡汉民等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事给北京段芝泉先生等的通电》1925年7月。

如何是困难的。当然，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协议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政府这时已不能不日益重视中国人民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强烈要求，1925年10月关税特别会议的召开和各国代表对中国1929年以后恢复关税自主的许诺，以及1926年1月法权会议的召开及其随后上海会审公廨的收回，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①。一些上层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进程抱以希望。但有谁能保证在中国继续分裂和混乱的情况下，各国会甘愿放弃它们的特权呢？事实上，在少数列强极力维护其势力范围的条件下，这种分裂和混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由此产生的外国人需要特殊保护的理由自然也是难以消失的。不难断言，出路只有一个，至少在广东国民党人和大多数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人看来是如此。那就是：应该毫不迟疑地尽快在中国建设一个真正统一的、有争取民族独立和恢复国家主权强烈愿望与实际能力的革命政府。这一点，应该说是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最实际的收获。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雄心勃勃地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随后，将其所辖各军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迅速出兵征讨异己之军阀，统一广东广西根据地，进而实行北伐。蒋介石声称：“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原属一体，吾人必先绝其根株”，“若竟听其祸国而无革命军与彼宣战，国家前途宁复有望？”②而在几个月之前还在批评国民党人“想占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反帝反军阀是“此路不通”，主张“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③的陈独秀，这

① 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247—265页；并见马士·宓亨利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77—680页。

② 参见《苏联驻大使馆武随员罗嘎乔夫及广东军事顾问鲍罗庭等参与广东军事之会议录》，1925年7月18日，7月26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二）。

③ 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独秀：《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向导》第91期，1925年11月12日。

时似也顿开茅塞，大声宣告：应“立起国内战争”，“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甚至于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以打倒统治北京政府的奉天军阀，“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权”。因为，“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①。

1925年秋，机会似乎来了。在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前后，以奉系军阀为支柱的段祺瑞政府开始全面镇压各地的反帝革命运动。山东张宗昌制造青岛惨案，封闭胶济路总工会，枪杀工会职员及同情工人的《公民报》记者。天津李景林亦协助日本厂主捕杀日本裕大纱厂罢工工人，并派兵至唐山赵各庄与英国矿主合谋弹压罢工，迫使工人复工。在东北，张作霖强行命令不准抵制日货，就连北京，段祺瑞亦下令：“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必依法从事，决不姑贷”②。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北京政府大肆镇压民众运动之际，浙江军阀孙传芳暗通受奉系军阀排斥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于10月16日挑起浙奉战争，出其不意，一举夺取了淞江上海等大城市，11月又与国民军联合，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徐州。紧接着，在加拉罕秘密作用下，奉系重要将领郭松龄于11月22日与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③，于次日在滦州倒戈，回师东北讨伐张作霖，而国民军则乘势猛攻李景林，于12月24日力克天津。一时间，反奉倒段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作霖和段祺瑞的统治摇摇欲坠。共产党人更是不失时机，多次组织反奉反段示威，并建立了以赵世炎、陈乔年等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的“行动委员会”，宣布“革命的民众，由实际革命奋斗中由统治阶级手里夺

① 见独秀：《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向导》第118期，1925年6月20日；独秀：《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第120期，1925年7月2日；独秀：《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② 李世军：《三一八惨案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27页。

③ 转见蒋廷黻：《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

取”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①]。11月27日，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决定于次日发动大规模驱段运动，并联络于国民军鹿钟麟部，得到赞同。不料，因冯玉祥担心倒段后不能独力支撑新政府并取信于国际，决心维持段政府，鹿钟麟亦被迫对28日的群众驱段运动进行拦阻[②]，致使此一运动未能达到倒段和驱段的目的。随后，因日本在获得了张作霖关于“日本国民在辽东半岛有居住权、租界工商业的权利”之后，公然出兵助张作战，形势竟又迅速逆转。12月下旬，郭松龄兵败身亡。1926年1月初，向来互为仇敌的奉直两派军阀公开联合进攻国民军，原国民军占据的开封、郑州、洛阳及马厂等地先后被攻占。而奉系渤海舰队进攻大沽口，国民军被迫安置水雷，限制外国船只航行，以便拦阻奉军舰只的行动，也遭到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公使团的严重抗议，日本等并以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大沽口岸须保持“自由交通”为由，公开进行武装挑衅并提出最后通牒以威胁[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的失败已成定局，本来已经朝不保夕的段祺瑞政府竟又狐假虎威，向愤怒的北京人民大开杀戒了。当3月18日北京各学校及各社会团体集会天安门，声讨列强，援助外交，督促国民军为驱逐帝国主义而战之后，游行请愿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门前时，段祺瑞的卫队竟丧尽天良地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致使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惨遭殴打。而段祺瑞政府当天居然颠倒黑白，称此惨案系“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致“率领暴徒数百名，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之结果[④]。

---

① 士炎：《政治近状与国民革命运动》，《政治生活》第59期，1925年11月25日。

② 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01—202页。

③ 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第266—270页。

④ 转见杨謇南：《北京惨案真相》，《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第4—5期，第162页。

北方革命形势的出现和国民军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卅运动以后更进一步认识到军队和政权的作用，并急切地期望革命的成功。因此，中共中央于1925年底第一次建立了军事委员会，开始在各地组织小规模的群众武装，并于1926年2月第一次决定暂时把军事目的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主张“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①，试图全力推动广东国民党人利用北方形势迅速出兵，推倒或打击北方军阀的统治。随着北方形势的改变，中共中央的这种热情开始降温，但从反对军事斗争，到主张军事斗争；从怀疑保持局部性的广州政权的必要性，到转而坚信必须巩固广州革命政权并由此面扩展全国的观念转变，无疑已经完成。尽管共产国际代表不同意由共产党人去设法控制军队，甚至怀疑在广州政府军队中保持“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一类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组织，将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使本来就不团结的军人进一步分裂，但中共中央必须注重军队工作的方针已经确定。为此，他们开始在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基层组织，并“打入一切政治部及其他部门”，以便“更好地掌握政治工作”，“使军队不致为国民党右派夺走”②。

要让刚刚开始熟悉工人工作并正在设法深入到农民中去的年轻的共产党人，去摆弄连孙中山都感到头痛的中国军人，这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那些对于不识字和无组织的工人、农民看起来颇具鼓动性的宣传，对于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以及将军们显然过于刺耳。尽管普通士兵们对于那些充任政治工作的激进知识分子未必没有好感，但素来把军队看作私有财产的将军们却往往提心吊胆。不论这些将军们革命与否，他们显然无法容忍在自己的军队中出现诸如左右派之类的派别斗争或阶级斗争。因此，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第2辑，第32页；并见《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9—380页。

② 《维经斯基关于霍米列夫同志军事工作报告的发言》1925年底。

冯玉祥甚至连三民主义的宣传也要加以严格的监督与限制①，而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允许共产党人在他军队中活动，但也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装装样子而已。三·二〇事件的爆发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连正在广州的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将领们还不习惯受到这种"过分的监督"，无论是苏联顾问，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还必须对中国将军们的这种封建心理和习惯保持"极大的忍耐"②。

三·二〇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苏联顾问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军事工作的干预是不成功的。一向被视为革命依靠力量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础、并以苏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轻而易举地被蒋介石用来进行政变的可怕事实表明：军队仍旧掌握在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将军们手中，对于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来说，它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也许，当时的共产党人应该进行反击，从而强行建立起一套抑制这些将军私欲和权限的机制。但是，没有人敢于冒这种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工人纠察队总共只有200支枪③，要抵抗强大的第一军必须依靠另外几支军队的情况下，有谁能担保这些平常远不如蒋介石左倾的将军们会比蒋介石更驯服呢？共产党人深知："蒋介石的兵力最多"，"第二军第三军再加第四军，其兵力才抵得上第一军"，谭延闿和朱培德虽稍左倾并对蒋不满，但其二、三两军并无与第一军抗衡的战斗力，若联合第四军之李济琛等，则必然助长右倾的"保定派"④力量，他们一旦上台，势必"比蒋介石还要坏"⑤。何况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奉系将控制北京，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史料》，（上），第200—201页。

②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大事提要》，第128页。

③ 见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1926年8月。

④ 保定派是指广东将领中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者，如李济琛、李福林、李宗仁及唐生智等。

⑤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广东军事形势及策略的指示信》1926年6月9日。

"国民党人、共产党、苏联以及一切革命分子受到很大压制"，"所有反动的势力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的危机，已迫在我们的眼前"，广州一旦内讧，势必"对帝国主义最为有利"①。因为，无论共产国际代表还是中共中央都相信，事变并没有帝国主义的背景，却可能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因此，尽管中共中央3月底方才收到广东党组织关于三·二〇事变的报告，而妥协退让的方案早已由苏联人做出，但这未必违反中共中央的初衷②。

4月伊始，中共中央开始检讨五卅以来工作上的失策，认识到自己前此往往"不注意当地的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而只有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和全国的普泛的政治煽动"，"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不顾群众的心理，把口号提得过高，完全不懂斗争的战术"，还"自已以为很革命"，"在各方面几乎要把C.P.的招牌挂在脸上"，对统一战线组织也往往喜欢"占据机关及多占职员"，包办一切，"强要各派都向我们投降"，不懂得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应当争取"事实上的政治领导"，并且不仅要使别人让步，"我们也不得不让步"的道理。鉴于内部外部危机重重，北京政府甚至敢于受"英日主谋驱逐加拉罕离华"，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强调争取群众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③。不仅如此，他们一反力主北伐的调子，开始大谈特谈"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的问题，确信"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④。

---

① 参见《张万和关于广州事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我们今后怎样工作》192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电》1926年4月28日。

② 有学者称陈独秀在1926年三·二〇事变后曾主张退出国民党，似不确。由3月29日"张万和"报告看，中共中央一得事变消息，即反对进攻政策，主张"拯救"蒋，以保持合作局面。

③ 参见《我们今后怎样工作》192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97号》192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通告第101号》1926年5月7日，等。

④ 参见《中共中央通告第101号》1926年5月7日；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如果说三·二〇事件之后最初共产党人还曾以为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决心“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①，那么，这种印象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显然很快消失了。在《整理党务案》通过以后，共产党人在广东支持蒋介石保持其地位的原因，更多的已经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不包含对蒋介石的信任在内了。蒋不再被看作左派，而是被直截了当地看作中派乃至“新右派”了。这意味着，三·二〇事件，特别是《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共产党人确信，国民党乃至广东的革命的领导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去了”②。甚而言之，由于蒋介石已经迅速攫取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撤销了过去被鲍罗廷用来发挥直接作用的政治委员会，逼走了国民党继孙中山以后公认的最高政治领袖汪精卫，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已日渐带有军事独裁的色彩，任其发展，势必带来灾难性后果。问题进一步变得微妙起来：由于蒋介石既限制共产党，又公开反对国民党右派，蒋充其量只能被当作中派或“新右派”看待；由于中派一般的只能被看作是同“买办阶级”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按照民主革命的性质只能又斗争又联合。但是，对于一个理论上的阶级可以又斗争又联合，对于现实中的军事独裁统治如何又斗争又联合呢？在国民党已日渐成为军人手中的玩物的情况下，陈独秀等人不能不设法利用军队间矛盾或另组武装以与之抗衡，而共产国际代表却仍旧寄希望于运用谋略取胜③。于是，结果只能是这样：“‘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为了不左不右，共产党

① 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张万和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
② 《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七月扩大执委会的报告》1926年7月21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0月。

人只好一方面将“争取中国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问题提上日程”，力图排除蒋介石“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领导”；一方面则为避免再度与之直接冲突，决心团结群众，扶植左派，让左派国民党人而不是自己出面与之斗争①。

不过，在1926年《整理党务案》通过以后，无论利用军队间矛盾还是扶植左派出面斗争的策略是否真有意义，也已经为时过晚了。尚未完全巩固阵脚的蒋介石已决定发动北伐战争了，利用战争状态来加强军事统治是最方便不过的了。至少，它容易使军人们摆脱那些碍手碍脚的国民党左派人物，特别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包围，从而迅速成为蒋介石实现全面独裁统治的工具。这太令人担心了。既然党和政府统统成为一班军事领袖“达到个人某种目的之工具”，那么，即便有北伐之胜利，也将“是革命的破产”。可是，谁都清楚，既然权力已经落到军人手中，又进入军事时期，再想“以党来支配一切”，“是非常艰难的”，“问题不在党员群众，而全在军事领袖自身”，他们“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可他们能不能“真正站在革命的见地去牺牲一切”呢？能不能“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接受民众和党的“制裁”呢？中共中央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怀疑②。

中共中央在北伐问题上转变看法肯定曾受到过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③，但同样可以肯定，即便是鲍罗廷，这时也已经失去了影响国民党决策的可能。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被迫全力以赴地为蒋

① 参见《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七月扩大执委会的情况报告》1926年7月21日，《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

② 参见述之：《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8日；独秀：《革命与武力》，《向导》第179期，1926年11月25日。

③ 自3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加拉罕及鲍罗廷等都明确表示反对开始北伐，见《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97—399页。

介石的战争目的制定全套作战计划，而不问其政治意义如何。尽管鲍罗廷及军事总顾问加伦未必不准备利用这些计划减少蒋介石迅速加强其统治的机会，但他们显然很清楚，今后依靠谋略获胜的机会肯定比过去少得多。也许这个时候他们对靠近外蒙古的“其战斗力甲于全中国军队”的国民军①更寄希望了，因为到1926年8月为止，莫斯科在仅仅一年时间就向国民军提供了价值近1100万卢布的军火②，但结果冯玉祥在莫斯科签署军火收据的几乎同时，整个国民军却几乎全军覆没了。不过，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们仍旧相信，只要蒋介石背后没有帝国主义的阴影，事情就不那么特别令人担心。可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他们告诉人们：帝国主义是无孔不入的。

其实，“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行动了。7月9日，北伐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西路军迅速夺取长沙，并开始向武汉进军。9月初，西路军各部队已包围了武昌城。眼看半壁江山即将落入有布尔什维克背景的国民党人手中，英国政府有些沉不住气了。英国炮舰开始在武汉长江一带向国民革命军鸣炮示威，与此同时，它们先后在9月4日和5日分别在广州和武汉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制造了两起武力干涉事件，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在广州，英国西江舰队有预谋地奉命占领了省港码头，扣留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船只，试图胁迫广州政府禁止排货运动。在万县，英舰借口川军扣留英国轮船，悍然向万县县城滥加炮击，造成上千名中国平民伤亡，数百家商店和民房被毁，以此来警告那些“不负责任”的“武装挑衅”者③。而英国一些人士更大力鼓吹联合美、日等国，实行“支北压南”政策④，孙传芳、吴佩孚及北京政府

① 《中共中央通告第101号》语。因其兵力（13—15万）较广东政府当时兵力（9—10万）要多近1/3。

② 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二）。

③ 见《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件》F0405/252A，第240页。

④ 见《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胶卷），893.00/7532。

也看准时机，频频遣人出入英国驻华领使馆，极力恳求予以合作乃至军事介入①。但美国与日本显然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手法。

9月9日和13日，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局势及英国政府的态度，措辞温和地发表了“不介入”中国事务的声明。美国并拒绝了英国关于共同派舰拘押和摧毁广州工人纠察船，以威胁广州政府的提议②。10月，它更进一步通知英国政府：它主张“随时准备与任何表现出有能力代表中国履行其所负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并进行谈判”③。毫无疑问，许多美国人早就注意到了敢于“发动反俄国人的政变”的蒋介石已经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④，相信他能够“逐渐驱逐俄国人和中国共产主义势力”⑤，并预见到以蒋介石为“独裁者”的广州政权有可能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对蒋介石应“稍加鼓励”，甚至“伴以多少慷慨一点的财政和军火援助”⑥，反对象英国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武力把打算走日本、泰国式改良道路的国民党“温和派”，推向“激进的广州赤党领导人”一边⑦。美国出席中国关税特别会议的代表史朝恩这时明确告诫国务卿凯洛格：“武力干涉将破坏中美贸易，而且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也公开宣称：像上海五卅那样“开枪把人打倒，看着一个民族象挨了鞭子的奴隶那样屈服，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⑨尽管这种看法并不代表美国所有官员的意见，美国军人同英国人一样傲慢地在武汉、宜昌、九江等长江口岸炫耀武力，但是，美国政府毕竟注意到了事情的另外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性很快就露头了。在北伐开始之际一再申言“北伐

---

① 见《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件》F0405/252A，第218，458页。

②③⑦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26年第1卷，第723，726，855，999—1000页。

④⑤⑥ 《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胶卷），899.00/7412，893.00/7473，893.00/7539。

⑧ 《史朝恩致凯洛格》1926年9月16日，《柯立芝书信文件集》。

⑨ 见《纽约时报》1926年11月17日。

的最大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①的蒋介石，8月20日在长沙却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对外宣言》，声称“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其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军者，中正爱之敬之”，恳求“友邦谅解”②。如果说这篇宣言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手段，那么，紧接着国民政府湖南交涉员向英国驻长沙领事透露的蒋介石的私下谈话，就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了。该交涉员声称：蒋曾私下亲口对他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他目前正在利用俄国人为其服务，这符合他目前需要，并且某些布尔什维克主义宣扬的纲领，诸如反帝、改善民生，也同样是国民党的纲领，但他不赞成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百姓内心最深处的天性是不相容的”③。甚至北京还传出风言，说是蒋介石已经向外国记者表示，将决心清除苏联顾问④。

有了第一次自然可能有第二次，何况蒋已大权在握呢？不过，这会儿可不是时机。北伐伊始，蒋介石还不能不指望那些“载着武器弹药”的“俄国船”⑤和忙里忙外的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他把军队向北推进。为此，他不能不尽力同加伦等搞好关系，甚至违心地去表示自己犯了错误⑥。但这未必能够使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改变对他的戒心。随着北伐的进行，蒋介石军事重心北去，而因北伐胜利群众中的“左派空气日益高涨”，再度使共产党人感到“恢复左派在党及政府之指导权实有历史的必要”，遂全力推动国民党内掀起迎汪运动⑦，连加伦亦受嘱在军事将领中鼓吹请汪精卫回来“主持国民党”的必要性⑧，共产党人的目的

① 见蒋介石1926年7月9日就职训令、26日谈话，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② 见《国闻周报》第3卷，第35期。
③ 《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件》F0405／252A，第459页。
④ 《北洋时期北京邮政总局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465。
⑥⑧ 《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一飞报告》1926年10月23日，见余沈阳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4页。
⑦ 《中共中央通告第17号》，1926年9月16日。

一望而知，双方之间的裂痕由此而迅速崩开。

因“三·二〇”事件后汪精卫出走，蒋介石独裁，国民党内自7月起即出现“迎汪复职”的呼声，其中不乏抑蒋乃至倒蒋之动机。但显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9月16日联席会议主张迎汪并不主张“就要倒蒋”，甚至声明若因迎汪回来会影响国民政府稳定，及致使蒋介石“因此离开北伐战线或反动”，则“不宜急进”。“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①。到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解释会议主旨时更进一步声明：虽应争取汪蒋合作，但若蒋不同意汪精卫回来，则不可坚持，只可放出拥汪的空气并保持汪蒋合作的口号，以便“胁蒋左倾”，“使蒋不得不对民众让步”，直至“由蒋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领袖”②。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犹豫不决、含混不清、态度颇有些暧昧的决定。人们试图削弱蒋介石的权力，恢复失去的阵地，但并没有足以遏制蒋不因此而发生反动的能力；提出了逼蒋的口号，却又疑虑重重，缩手缩脚不敢实施，内心里仍旧寄希望蒋自己能够“觉悟他把军权、政权、党权集于总司令一人身上之危险”③。

几天后，因蒋介石派人至上海请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勿赞成汪回”，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④，颇有示弱表示，共产党人遂又态度转硬。一面虽仍表示“决不拥汪以倒蒋”，亦“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一面却决心利用其它军阀，如唐生智与蒋介石的矛盾，逼迫蒋介石“1.将党权、政权速交与汪；2.清洗军中反动分子”。一时间，似乎不是中共无力倒蒋，倒是蒋面临

① 《中共中央通告第17号》1926年9月16日。

② 《中共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

③④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年9月22日。

"众叛亲离的形势"，非中共"无法维持其不倒"①。这样，迎汪的宣传自然"听其充分的做"，而迫蒋"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领袖"的设想，当然"不可提起"，且认定其为"事实所难能"②。可是，又过了不过10多天，中共中央却又考虑"前敌战况不佳，不顾蒋之意硬迎汪回殊太危险"，主张"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作为妥协③了。

共产党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尚无足够实力或条件阻止蒋介石走向反动的情况下，贸然公开提出迎汪主张，无异于助长左派群众和共产党人中的反蒋情绪，并向一贯多疑的蒋介石挑战。但共产党人仍旧沉不住气，贸然推动了这场迎汪风潮。尽管他们心里没底，以至反反复复，朝令夕改，麻烦却已经造成了。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没有能如中共中央所愿，把迎汪决定"推到第三次全国大会"④，而是一致议决通过"请汪精卫销假案"⑤。进而，广东开始出现"迎汪倒蒋运动"，蒋介石"大发脾气"⑥，竟致亲自写信劝汪勿归。与此同时，蒋三令五申地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或中央执委会"速迁武昌"⑦，以便就近操纵并"使其失所凭籍"⑧。但当迁都开始，蒋发觉此举可能便利鲍罗廷和共产党利用唐生智等"保定派"将领控制两湖地区的既成事实压迫自己就范时，便又立改初衷，强令政府及党部迁至他所控制之南昌，不顾一切挑起纷争，准备"生出一种冲突破裂出来"⑨。

---

①②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年9月22日。

③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1926年10月3日。

④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1926年10月3日。

⑤ 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77页。

⑥ 见《王一飞传略·文存》第86页。

⑦ 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05页，第19册第59页。

⑧ 见《国闻周报》第4卷，第18期。

⑨ 同上书，第16期。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北伐军已经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绝大部分地区。鲍罗廷明确主张继续沿京汉路北上，迅速与进入陕西省的冯玉祥国民军汇合，直捣北京，然后再回过头来向东进占中国最大的工业和经济中心上海。显然，鲍罗廷担心过早地威胁帝国主义侵华的这个主要基地，会迫使帝国主义很快出面干预，从而给自己造成被动。但鲍罗廷没有料到，英美各国会如此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刚刚在1926年9月对广州政府施以武力威胁手段的英国政府，10月中旬即一改前此狰狞嘴脸，宣布要与广州方面“捐弃前嫌”，并决不干预中国内政①。12月9日，英国新任公使兰普森亲赴汉口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接触。18日，更抛出《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表示同意立即征收二五附加税，待中国新税法颁布，即允许中国关税自由；同时准备在中国有权力谈判之政府出现后，即与之开谈修约②。此后，日本及美国也更进一步一唱一合，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尊重保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对于中国内争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③，并愿意尽早放弃“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④等等。

与美、日相比，英国人在对华外交上明显感觉迟钝，而且过于刻板，即使在美日报刊公开宣传国共之间的矛盾和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态度⑤，并派要员频频与南昌方面接触之后，他们仍旧对蒋不抱任何奢望⑥。但是，美日特别是一向僵化的英国政府的怀柔政策，对国民党人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却是共同的。它向那些渴望取得列强支持的人们发出了重要的信息，即他们并不坚持与国民党人为敌，关键在于双方要达成必要的妥协。这种信息对于一心想东进上海以便离俄分共的蒋介石可太关键了。在这时，他用不着象麇集武汉的左派国民党人那样高喊反帝废约的口

①②⑥ 《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件》F0405／252A，第277，691，707—708页。

③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91页。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6页。

⑤ 转见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4日。

号了，特别是在汉浔租界事件发生以后，谁更容易为列强所接受的问题已经一目了然了。

1926年10月武汉三镇为北伐军占领后，汉口英租界警兵不断与北伐军及武汉工人、学生发生纠葛，双方敌对情绪与日俱增。不久，因天津英租界应张作霖之请逮捕并引渡国民党员，上海公共租界应孙传芳之请封闭上海《民国日报》，武汉群众遂掀起反英运动。国民党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亦于12月22日认定："租界已成为反革命大本营"，"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①。4天后，英轮在汉口下游撞沉中国商船，使数百名中国平民淹死，更使群情激昂。到1927年1月3日，租界当局又调水兵登陆以武力驱赶在租界附近集会的群众，致使数十名中国人受伤，终于引起群众的狂怒。在武汉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坚持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迫使英国人从租界撤走了英国水兵，解除了英国义勇队的武装，并由中国军队和工人纠察队接管了租界的治安警戒，由国民政府官员组成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租界的市政管理事务②。而九江的租界，也几乎在同样的情况下被北伐军和工人纠察队接管了。

汉浔事件对英国以及各国政府的打击极为沉重。一向惯于借口保护其侨民而动用武力的不可一世的英国人，这次居然惧于有北伐军和国民政府为后盾的中国民众，为保护其侨民而忍气吞声不敢重演"五卅"、沙基及万县惨案，其威风扫地可见一斑。但这并不等于列强可以对此听之任之，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汉口及九江英租界内外侨不过数百名，而上海、天津等地，仅"英人男女老幼"就有1600人，投资总额约1亿英镑③，一旦汉浔事

① 《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4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22日，转见刘继曾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② 参见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8页。

③ 《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件》F0405／252A，第161—162页；《申报》1927年1月28日。

件风潮随北伐军挺进而蔓延全国，则英国在华利益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甚至可能在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度发生连锁反应，导致英国在远东殖民体系的全面崩溃，这对英国政府以至美、日、法等国政府，都不能不是一幅可怕的图画。为此，英美日法纷纷开始向上海调兵遣将，"公开作好使用武力"保护上海侨民的一切准备①。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已开始对同武汉国民党人建立值得信任的关系，表示由衷的怀疑。

蒋介石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1月下旬，蒋通过王正廷密告美国驻沪总领事：北伐军可以不在上海驻军，进而并亲自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表示将尊重现有条约并保护外国人的利益②。随后，当美国政府马上将要求维护上海租界中立的照会故意递交给并无对外交涉权力③的蒋介石时，蒋却又故作矜持，既不理睬武汉方面的抗议，也不正面答复美国的提议，而是秘密通过中间人去讨价还价，要求列强代替苏联向他提供武器弹药，以换取他"同鲍罗廷决裂，制止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④。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军务繁忙中特意安排时间与日本官方代表佐分利贞男、小室敬二郎、铃木贞一、山本太郎及松冈洋右等会面，表示他既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也不打算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态度，并保证："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⑤紧接着，蒋开始公开攻击共产党和鲍罗廷，并且放言："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象个别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同样，列强若能以平

---

①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第2卷，第47，60—61页；日本外务省亚洲局：《最近中国诸问题概要》，1927年，卷2。

③ 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曾通过决议，除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任何机构和党员个人均不得办理外交事务。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95页。

④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8502。

⑤ 见《英驻日大使蒂雷向外相张伯伦通报蒋与小室的谈话记录》，英国外交部：《中国机密通信》，F2664／2110。

等待我，我亦同样可以与之联合①。这当然也是一种信息。

不过，对于列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辞令"。正如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麦耶在1月20日所表明的："国民党人在我们眼中恢复名誉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具体行动证明他们愿意并能够在其控制区内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②。在这方面，蒋介石的能力不能不受到怀疑。3月24日，北伐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由于部队未能及时控制局势，被打败的直鲁联军的散兵游勇以及刚刚"易帜"的原孙传芳军阀部队的官兵发生了哄抢外侨住宅和英美日领事馆的情况，造成外国人6人死亡，6人受伤。英美炮舰为此向南京城猛烈炮击，造成上百名中国人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列强各国并没有把这次意外事件看成是蒋介石无力控制局面的表现，相反，恰恰把它当成了对蒋介石能力和意向的一种考验。各国"总司令一致同意，尽可能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直至蒋介石将军有机会履行他为所有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诺言。"③而蒋介石确实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第二天即从芜湖赶到南京，并公开支持了这次事件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说法④。随后，蒋介石赶往北伐军已占领的上海，公开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并"将镇压一切不规则举动"⑤。进而，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加紧准备公开与共产党人及武汉左派国民党人分裂了。

蒋介石这时还不完全具备与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以及苏联顾问公开对抗的条件，在蒋介石的外交代表黄郛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的多次秘密会商中，黄郛曾明确表示过蒋介石对"断然采取行动"的"实施能力"和来自"汉口共产党的攻击"

① 见《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8339。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第2卷，第147页。
④ 见《森冈致币原电》，1927年3月2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⑤ 参见《北华捷报》，1927年3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的担心[1]。但蒋介石不顾鲍罗廷的反对和苏联顾问的阻挠，挥兵东进夺取江浙及上海的行动已经为其采取断然措施创造了基本的物质前提。况且，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在3月10日召开的由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军人部长，以及中央军校校长等职，并严格规定了他在外交和财政方面的权限[2]。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关系，多疑的蒋介石未必相信那些人不会连同他的总司令头衔一并摘去。而南京惨案的爆发，导致民众激进情绪与日俱增，一旦各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立场，势将使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3月30日，矢田将列强将采取强硬态度交涉南京事件的信息直接通报给了蒋介石[3]。4月1日夜，矢田又将币原外相要求蒋介石"深刻反省"，立即"管束共产党的跋扈"，以"赢得内外信赖"，"平定时局"，否则难免受到列强"共同自卫的手段"打击的要挟，通过黄郛转达给蒋介石[4]。

蒋介石孤注一掷了。他秘密地通过黄郛告诉矢田，他已决心在"四、五天之内"采取行动，只是希望各国军舰能在这时向汉口集结以施加"某种军事威胁"[5]。4月3日，日本水兵果然一反常态地在汉口租界内殴打并刺死一中国人力车夫，进而公然向激愤的群众开枪射击，挑起了事端[6]。日、英、美、法、意等国共27艘军舰迅速集结到武汉长江江面，开始对武汉政府进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

---

① 见《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② 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6—326页。

③④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⑥ 尚无资料证明"四·三"汉口惨案是日本官方为支持蒋介石政变而故意制造的。但在此之前，日人与中国群众发生纠纷在汉口虽时有所闻，但日方从未在武汉政府辖地因此纠纷而杀人或下令军队开枪，日领事也多次表示不准备因汉口租界问题与中方发生冲突，甚至要求有纠纷发生时希望武汉政府派军警入日租界维持治安。对照之下，"四·三"惨案的发生颇足使人怀疑。

用不着再小心翼翼的了。蒋介石立即于4月8日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进而颁布了《战时戒严条例》，并解散了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4月12日，蒋遂唆使流氓队伍袭击上海各工人纠察队驻地，然后以"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妨碍地方安宁秩序"为名，将工人武装全部强行缴械[①]。4月18日，蒋干脆在南京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方面相对抗，同时公开发布"清党"令，明令通缉共产党员等190余人。与一年前在广州的那次近乎盲目的小小的政变比，蒋介石这回是心满意足了。他再也用不着象上次那样心里把俄国人恨得要死，嘴上还得毕恭毕敬故作虔诚地宣誓效忠于共产国际[②]。维系他同苏联关系的最后那点儿纽带，由于同江浙财阀和列强关系的建立而彻底断裂了。不管共产党人怎样去看待他的阶级背景，作为中国一个典型的军事领袖，他显然更热衷于为巩固和扩大其军事统治地位，保护其军事集团利益而斗争。因此，他最终到底同那些可能给他最大利益的人走在一起了。

（四）妥协与冒险的代价

国民党人中的右倾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廖仲凯公然被杀，"西山会议"派揭竿而起，到"左派"领袖蒋介石发动"3·20"事变，炮制"整理党务案"，竟至走上军事独裁，公开排斥打击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国共关系迅速进人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十分明显，国民党领袖摆脱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乃至反目为仇的可悲结局已经遥遥可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

---

① 见《申报》1927年4月12日。

② 蒋介石：《军校纪念日演讲辞》1926年6月7日，《蒋中正演讲录》，1926年11月版，第77—90页。

这一点。相反，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居然沉浸在一种极度的兴奋之中，仿佛这一胜利足以改变一切，甚至会使已经开始右倾的国民党大踏步地向左跃进。《真理报》开始连篇累牍地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不仅相信“它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①，而且干脆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②。斯大林则进一步宣称：欧洲式的人民起义和暴动，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③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说明斯大林确有远见卓识。但是，尽管他发表上述至理名言之前曾留意过中共代表谭平山的报告，他显然对报告中关于蒋介石已经实行了军事独裁这一点没有任何印象。很难猜测斯大林是否真的不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或者同中共中央的担心相反，他这时也认为北伐为蒋介石在“3•20”事件中“所纠集的力量的解体创造了条件”④，而不是助长了其加快独裁步伐的野心。无论如何，在这时斯大林的谈话中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文件中，几乎看不出有对中国革命危险担心的任何迹象。不仅如此，人们相信，由于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掌握着十分之九的地方组织和绝大部分的党员群众，“国民党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很薄弱，每一分钟都有被左翼推翻的危险”，因此，他们只能同左派及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互

---

① 《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
② 同上，1926年12月5日。
③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66—267页。
④ 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相利用”，而不能有所作为①。这意味着，随着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有可能进一步采取进攻的而不是防守的态度，使中国革命和国民党迅速左转。

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

（1）“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2）因此，阶级力量将重新组合。“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大部分大资产阶级将被“排除在外”，工业资产阶级在革命向前发展时，“要么脱离运动，要么企图阴谋破坏”，而“不能独立行动”的小资产阶级，则只能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影响。“无产阶级是这一联盟的领导成分”。

（3）在目前阶段，只有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推动反帝斗争的高涨和革命的深入发展。为此，共产党应该支持农民“消灭农村土豪和官僚专权”，夺取农村政权，同时，实施以“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确保佃农“永佃权”，和建立农会及农民武装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纲领。

（4）为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并使中国革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革命和土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83—185页。

地国有化，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革命化措施的实施，从而“进到向革命专政过渡的阶段”。①

要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左倾，以至民主革命的措施还不够，还要“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让中国革命特别是国民党染上社会革命的色彩，这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看来，恐怕无异于天方夜谭。

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等，刚刚在汉口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明确认为革命面临严重危险，而“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②。也就是说，由于掌握着实权的仍旧是蒋介石集团，随着北伐胜利而日渐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显然进一步加剧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实力派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严重矛盾，此种形势继续发展，必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③。为此，会议决定再度提出“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口号，劝告军事领袖支持或同情民众，且“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同时决定“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④。

于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或者勿宁说在欧洲莫斯科指挥中心和远东汉口的前线指挥官之间，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政策分歧。当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安德列也夫大厅里大声告诫人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8—284页。

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389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389页。

们：不要试图阻止工人罢工，不要试图妨碍在农村掀起革命，不要害怕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中跑掉①的时候，中共中央却恰恰在为此而提心吊胆。他们再三告诫人们："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商人三层剥削"，故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不便向厂主店东提出他们经济力限制以上的过高要求，更不可轻取罢工手段"，以避免使其濒于破产或投向大商买办一边；工人罢工亦不应"自由封闭生产"或"破坏秩序"，工人纠察队更不应"随便捉人"或"再有胁迫及侮辱商人之事发生"，致"侵及政府之司法权及警察权"；而农民也只应以"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为"迫切要求"，不宜马上就试图解决土地问题②。

然而，提倡也罢，劝阻也罢，共产党毕竟只能依靠工农运动的浩荡声势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和阻遏国民党的右倾，他们只能而且必须给群众以利益。就连试图制止蒋介石独裁趋势的左派国民党人也开始寻求工农群众的支持了，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一个异常激进的"最近政纲"，公开许诺要给工人和农民种种好处③。这样一来，随着旧有统治秩序的瓦解，北伐军所过之处，到处都充满了浓烈的革命气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被压迫和受歧视的人们，立即组织起来，向历来压迫和歧视他们的上等社会宣战了。在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共产党人由于缺少人手、经验乃至意见不一而难于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的情况下，要想使这种革命激情始终保持理智和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地的工农运动都出现了一些过火的倾向。

武汉仅两三个月时间，竟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以至出现了"工资加到骇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0—27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384—391，402，404页。

③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86—283页。

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①。一些罢工人员甚至要求老板“一律发给中山服一套（外加大衣一件，皮鞋一双，等）”；“每年休假四十天（不包括路程和病假），亲属婚丧喜事给假一个月，工资照发”，并“应得补助二百元”；“最低工资六十七两（元）”外加“膳费十五元，房租二十元”，家眷亦补二十元，同时“每年加薪一次，加薪金额不得少于十两（元）”，且半年“得一个月工资的慰劳金”，一年得整个经营生产“纯利百分之三”；另外“加班两小时，按整日计酬”，退休“领养老金”，由百分之三十到全薪不等，“免费提供医药”，工作一年以上离职，领三个月以上工资的退职金及全部旅费，等等②。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激行为。加上战争和动荡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生产，两湖地区迅速出现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仅武汉一地，工人失业人数就突破了10万大关。仅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个军，就欠饷200万元以上③。而武汉政府控制之鄂、湘、赣三省，财政收入较革命前均减少三分之二以上。仅湖南一省，月收入就由革命前的360万，锐减为70万④。其中，仅盐税30余万，厘金20余万，杂税数万，原应征收之大宗赋税，如田赋、米捐、特税、及烟酒、印花、屠宰税

---

①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② P·埃斯顿，《中国真相》，伦敦1927年版，第229—231页；并见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65—66页。

③ 此仅至1926年12月。见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战士》周报第41期，1927年4月17日。

④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28—229页。

等，均因工人特别是农民抗税抗捐，而无法征收[1]。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战争难以继续，即使是武汉政府本身的维系也大成问题。于是，人们不能不开始设法控制工农运动，力图使其遵守“纪律”及“秩序”。

1926年12月，李济琛首先在广州采取行动，“禁止工会擅自捕人”，“严禁工人封锁工厂或店铺”，“禁止工人抢劫工厂和店铺的一切财物”，“未经政府许可不得成立任何工会”及罢工纠察队和自卫队[2]，试图把广州纳人“安定”和“秩序”的轨道。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也相继劝告工人农民“应当恪守秩序”，“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不许可自由行动”，“不得擅自争打暴动”[3]。就连共产国际也有指示称：必须对农民加以约束，并“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4]

但是，能不能认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已经预见到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军事集团以及其基本利益之间的危险冲突，而决心限制工农运动了呢？恐怕不能。与此相反，中共中央这时担心的，还是“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5]。故他们一方面设法防止工农运动中之过激现象，另一方面仍全力推动工农运动之发展，并呼吁国民党左派不要“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

---

① 见《湖南民报》1927年5月14日。
② 见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7页。
③ 同上，第72页，并见刘少奇：《在省市两党部招待全省工人代表会上的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④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第554页；《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97页。
⑤ 独秀：《革命与武力》，《向导》第179期，1927年11月25日。

反对工农民众”[①]。宣称“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哪来什么“工农运动太过火”！若说什么“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②]。而共产国际出于把中国革命引向更深层次的需要，更是坚决反对“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认为“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③]。因此，其防止工农运动“过火行动和冒进现象”的措施，实际上均不发生效力。各地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迅速使日趋恶化的国共关系陷入严重危机。在蒋介石军事势力控制的地区，共产党扩张工农运动的努力接连受到摧残和打击。在两湖地区，虽因武汉政府及军事领袖还碍于同苏联及中共关系，不得不实行保护工农的政策，但部队由于欠饷而开小差以至哗变的情况已时有发生，军官们更是因工农运动侵害其切身利益而日趋反动[④]。

这时，如何估价军队及武装在革命中的作用，对于处于危机中的共产党人来说显然至关重要。斯大林无疑是最早注意到军队和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他不仅注意到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暴动，甚至还注意到中国的土地革命也只有“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方式才容易实现[⑤]。但或者是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无知，或者是出于对苏俄当年改造旧军队经验的固执，他竟然相信在国民党那些由旧军队改编而成的部队里派上几名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人员之后，就已经把它们变成一支革命军队了。因此，尽管他认为共产党人若能在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辑，第11页。

② 独秀：《革命与民众》，《向导》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第554页。

④ 在当时忠于武汉政府的部队中，有5个军（第二、八、十一、三十五、三十六军）和几个独立师、旅都是湘籍，其军官多为地主出身或与城乡富绅有亲戚关系。

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67页。

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将会更易于保持军队的革命性，但他显然并不担心国民党军队的目前状况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多大的危险。他甚至相信，现在就可以“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①。

多半也只有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才能产生出可以利用蒋介石或唐生智的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之类的念头。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都断然不会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身上。自从袁世凯利用军队攫取了大总统的宝座，并使其手下的军官同时成为地方军政首脑以来，中国的将军们就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权力阶层，成为一种以军事权力为中心，并兼有政治、经济乃至外交职能和特权的政治实体。历来受政治权力支配并为之服务的军人，开始支配政治权力，并使之为个人或派系集团的欲望服务。枪杆子第一次如此紧密地与个人的和集团的利益结合起来，以至非有枪杆子不能占有地盘，攫取权力，不能有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而有了枪杆子就有了一切。于是乎，不仅有军必阀，而且无军即无政，政治本身也日渐成为军事权力的附属物。国民党及其军队本身也毫不例外。特别是鲍罗廷为之引进苏联的党军一体的形式，而蒋介石又借机攫取了最高军事权力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了，即一方面国民党之党、政等各方面均不得不依赖并受制于军事权力，另一方面其军事权力又因其下属之将军们把持各自的军队以维护自身利益而受到削弱。毫无疑问，不论蒋介石与将军们之间，还是将军们各自之间，更多的只是利害关系而已，并不存在多少政治取向问题。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军人的特殊利益已经把他们同维护富人权益的社会制度牢牢地捆在了一起，当绝对倾向平均主义的贫苦工人和农民在共产党的鼓动下，起来同地主资本家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之际，他们注定了只能同后者站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1页。

在一起。

一方面面对军事反动的严重危险，另一方面受命务必更迅速地把革命推向左倾，这不可避免地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策略很快陷入到混乱之中。几乎没有办法不重新施展政治手腕，如同当年利用蒋介石搞掉许崇智一样，鲍罗廷再度计划利用唐生智来对抗蒋介石。但是，在这个时候玩弄这种手段恐怕连鲍罗廷自己也有些心惊胆战。当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军队中的反蒋倾向之后，他几乎立即"感到后怕"，"不知道做得对不对"[①]。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1925年他算是成功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来调整国民党的领导结构而不担风险的话，那么这次他所冒的风险未免太大了。他不再拥有那样的权力和威信，而蒋介石也决不是许崇智。何况战争正在进行，蒋介石是整个北伐军的总司令，不仅投鼠忌器，难于下手，即使下手，蒋手握军事大权，挥师东去闽浙赣，甚至直取沪宁等中国工商重地，投向帝国主义，结果势必助纣为虐，替他人做嫁衣裳，使北伐革命半途而废。况且，有谁能担保刚刚投向国民政府不过一年时间的唐生智会比蒋介石更革命呢？当然，谁都清楚，继续保持蒋之军事独裁地位，同样对革命具有严重危险，但是，两弊相权，害取其轻。与其立即造成公开分裂，把蒋介石及其他所统率下的大批北伐军推到敌人一边去，不如巧与周旋，把汪精卫弄回来削弱蒋之地位，通过合法手段来重新把军队置于党权之下。为此，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当此国内国外反共反苏运动日甚一日，而国民党中右派、中派以及左派一部分均掀起反共浪潮，形势"较之三月二十日之事尤为严重数倍"之际，务必要减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惧怕心理，把斗争矛头指向英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官僚、买办、土豪、劣绅，不宜扩大斗

---

① 见纳佐洛夫、弗基内、阿尔布雷希特：《上海来信》（1927年3月17日），载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407页。

争范围，尤应对小资产阶级作出必要的让步①。然而，局面已不可改变，尤其在汉口租界事件爆发之后，人们的革命热情已到达极点，不仅鲍罗廷不能不屈服于革命舆论的压力，站出来反蒋；就连一直有些提心吊胆的中共中央，也不能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革命气氛激励下，迅速左转。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立即通过了一个相应的决议，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即是在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为改变这一错误，中共中央决定立即依照国际决议，"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仅要努力争得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②紧接着，中共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相信"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而上海工人暴动成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③。当然，陈独秀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而目前，工人群众还未必有这个力量。但他仍旧主张：共产党"要马上动作"，要准备一个抵抗，在上海工人起义胜利，蒋介石右派

---

① 《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问题之报告》1927年1月26日，转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

② 《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

③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1—25日。

军队试图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际，坚决"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①。

3月下旬，随着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和北伐军开人，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开始"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严阵以待"，决心保持手中的武装，并建立由共产党和右派国民党人控制的临时市政府②。不难断言，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真正重视独立地掌握武装和政权，以与国民党军队抗衡和斗争问题。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否则在军队右倾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共产党人说话的地位。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南昌、九江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市党部遭暴徒捣毁的情况，无疑向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就连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内部形势十分乐观的苏共中央，这时也在悄悄地告诫中国共产党：必须加紧发展群众运动，"必须把我们的方针指向武装工农，把各省农民委员会改造成为有自卫武装的、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还必须"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③。

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中心上海的占领，不论其对武汉国民政府意义如何，至少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看来，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居然领导上海工人成功地尝试了欧洲式的武装起义的革命方式，这似乎可以说明上海工人已经在发挥当年彼得堡工人在俄国发挥过的同样作用了。因此，他们显然更加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了，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支柱上海的光复，无疑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左转的因素"④。大批苏联的和各国的共产党人以及工人代表，纷纷涌到中国的武

①②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

③ 转见艾享瓦尔德：《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方针》，《真理报》1927年5月11日。

④ 《真理报》1927年3月22日。

汉、广州、上海以及其它一些"光复"了的城市中来，他们都想亲眼目睹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伟大进展，都想亲身体验一下这里如火如荼的革命气氛，都想为加速这场革命的胜利提供自己的意见，或为共产国际的指导总结一些经验。但与此同时，几年来几成定式的指导及信息渠道——由鲍罗廷、维经斯基到加拉罕——被打乱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发表意见，几乎都有不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团长洛佐夫斯基简直不能理解："这算什么革命，每个将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①]而纳佐诺夫等则斥责说：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纯粹象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已经丧失了原则立场，而总是处于摇摆与妥协之中[②]。

不过，无论如何，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总算从大量观点各异的报告中发现，中国的情况并不象过去了解的那么乐观，不仅蒋介石具有危险性，其他各处的将军们也不十分可靠，整个中国革命形势还处在于混沌的、甚至危险的环境中，不可须臾大意。鉴于此，从3月下旬起，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开始向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泼冷水，力图使其头脑冷静。他们接连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汉口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军队联合干涉的口实，应当把斗争矛头只指向英帝国主义，以便集中火力并使之陷于孤立；（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在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的情况下，共产党不要仓促地出面进行公开斗争，更不要放弃军队工作，与之对立，甚至目前在表面上应缓和反蒋主张，工会亦应少谈政治，以隐蔽发展并保护自己；（3）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绝对不要将武器交出去，必要时则隐藏起来[③]。与此同时，斯大

---

① 转见尤里耶夫：《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
② 见《上海来信》。
③ 参见《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28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等。

林公开发表谈话，改变了前此发出的应当把右派驱逐出国民党的说法，主张仍旧需要利用右派的才干和经验，“就象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①。而共产国际则公开宣称：共产党人必须立即通过发展工农运动、参加政府和谋取军中要职的办法来加速革命阵营中阶级关系的变动，全力控制国民党，“以保障国民党的重心左移”②。

中共中央当然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意图去行动的。4月5日，陈独秀在向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巩固国共统一战线，加速国民党左倾的有关指示之后，同汪精卫联合发表了一个宣言，准备通过委屈求全的方式来显示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之意图，并试图以此来压迫蒋介石及上海之国民党右翼人士，使其多少收敛一下反共和反工农的行径。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秘密指示上海及广州等面临严重威胁的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加紧武装工农，“准备动作”，城市中因敌我力量悬殊，以准备秘密组织为宜，而农村中则应当暴动。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与蒋介石等右派军队的冲突是“不能免的”了，双方“争斗的中心问题”，就是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问题，也就是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问题，这场斗争一旦失败，“我们所提的民主独裁制的政治将完全无望”。因此，他们不同意将武装暂时收藏起来，认为“这是自杀的政策”，他们下决心一方面极力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准备作出“大的流血与牺牲”，甚至不惜暴动③。

与此同时，蒋介石确实在紧锣密鼓地布置“护党救国”的“清党”行动。他秘密召集了两广及长江下游各路将领到沪磋商，以中共阴谋离间军队，篡夺国民党和自成武装，有冲入租界，造成外交冲突，破坏北伐之虞为借口，决定立即采取非常措

① 转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第123—124页。

② 见《共产国际》第14期，1927年4月5日。

③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并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

施[1]。而公共租界总董和法国租界总巡也以出枪和借路的方式，公开帮助青红帮[2]，鼓励其与蒋介石携手共同收拾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于是，4月11日晚，首先由杜月笙和26军第二师师长分别骗走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及党内负责指挥纠察队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等。随后，于12日凌晨，公共租界畅开通向工人纠察队驻地的主要路口，让青红帮流氓武装向纠察队发动攻击。紧接着，26军按计划火速赶到出事地点，以调解纠纷为名，解除了战斗双方的武装，从而轻而易举地达到了预定的目的。等到共产党人和工人们醒悟过来，表示强烈抗议之际，他们已失去了抵抗的可能，只有被屠杀的份了。

上海共产党人的失败，不容否认与极度缺乏经验有关，他们只注意抵抗军队的强行缴械，却未曾料到蒋介石会采取如此手段。但共产党人之所以如此失败，而未采取他们曾决心付诸实施的"大的流血与牺牲"的暴动行动，则与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明确认为，面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强大武装，"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它只会使"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3]。因此，从上海到广州，以至南京、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凡是国民党右派军人举起屠刀的地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工人武装和国民党基层组织，都很快被打人地下了。工人最集中、工人武装也曾经最强大的上海和广州，人们的反抗至多也只是罢工罢课而已，但这种反抗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要抵抗军队的反动，当然应当依靠军队，但共产党人有什么军队可以指望呢？4月16日，上海党的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武汉政府迅速出兵讨蒋，以免蒋巩固政权与军队，反使

---

① 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反共秘密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9—15页。

② J·B·鲍威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第158—159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

左派灰心，革命失败①。事实上，东讨之说几乎难以成立。还在“四·一二”事变发生的第二天，鲍罗廷就明确表示：“我们用现有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败和被消灭”②。

这时，严格地说，真正支持武汉政府的，只有叶挺领导的新编第二师一个师，其他部队之所以仍旧麇集在武汉政府的周围，或者因为需要靠武汉政府发饷，或者因为是在唐生智的率领下并象唐生智那样和蒋介石有矛盾。总之，没有哪一位将军真心支持武汉政府的政策。相反，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倒很快在这些将军和军队中引起了共鸣。一个万分危急和极为黑暗的时刻降临了。毫无疑问，几乎没有哪一个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认真地考虑过讨蒋问题，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后接连召开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革命从危机中走出来？而危机的关键则在于：当蒋介石的部队叛变之后，如何才能防止剩下的军队也走上同样的道路？所有的与会者都清楚地看出：在目前形势下，武汉政府中将军们同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翻脸，几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能不能设法拉住将军们，使他们为革命出力呢？这显然是一个难题。已经深谙此中利害的鲍罗廷相信可能使将军们保持驯服的唯一一种方案，就是设法继续驱使他们进行战争，而不让他们停下来往回看，使他们远离自己家乡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并且没有办法腾出手来打击共产党人。同时，只要能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打到北京、天津以至张家口，就可能接通外蒙和苏联，从而象过去在广州那样，通过供应武器弹药使将军们获得甜头，再反回头来收拾蒋介石。不难看出，鲍罗廷仍旧在玩弄政治手

① 见《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4月16日；《李立三等六人的报告——主张迅速出兵讨蒋》1927年4月16日。

② 《鲍罗廷在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时的发言》1927年4月13日。

旋，而这一套如同过去一样，很难保证其众多环节中某一个环节不会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而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但鲍罗廷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①。他坚信：如果我们不采取过于激烈的工农政策，"如果我们不在湖南实行一种由我们控制政权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制造象（查抄）佛教协会这类事件，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但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将继续发生。

作为苏联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委派的工作人员，鲍罗廷没有勇气批评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他甚至一直竭力按照这一政策把中国革命向左推进。但是，在这时，透过他发言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开始对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怀疑。他曾经试图说服国民党在广东推行土地革命政策，但如今他否认这一政策的可能性，他声称：不仅"在广东进行土地革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只要"同现在的国民党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进行这种土地革命"。他曾经力主发动工农并依靠工农运动，但如今他却把广州工人说成是"尘土"，把上海工人看作"软棉花"，相信工农运动不应该过分地刺激军事领袖。当然，他清楚地知道，他不能因此而主张革命向后倒退。不仅如此，在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会议之后，革命还将进一步左倾和激进。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事变爆发，与其看着将军们就地恼羞成怒，反目为仇，大打出手，何不冒险继续北伐，既可以接通冯玉祥、阎锡山以及苏援为诱饵，又可使其忙于北方战争，给两湖工农更多的安全保障呢！况且，这也是武汉

---

① 《罗易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27年4月13—15日，罗伯特·诺思等：《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主张①。

对鲍罗廷的建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多半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如怀疑北伐是否会削弱了武汉及两湖地区的防卫力量，是否会同前一阶段一样，再次造成对资产阶级军事力量有利的局面，能不能先在占领区干一番革命事业，为人民做些好事再北进，等等。但刚刚从莫斯科转经广州、长沙等地来到汉口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却极为敏感地意识到鲍罗廷主张背后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不可否认，鲍罗廷建议的主旨，是力图避免日益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怀疑或者说不相信工农群众目前有战胜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武装的可能，而这是与共产国际历来的主张，特别是和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精神相违背的。罗易尖锐地指出："鲍罗廷主张的实质，就是想"一走了之"。它"不是把动员广大群众（他们代表真正的革命民主力量）放在首位"，而是"把在军队间施展策略放在首位"；不是面向工人阶级，而是"把拉拢利用军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摆在武汉小资产阶级政府面前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执行一项真正革命的政策，完成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前途的唯一保证就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主的基础，而在中国，革命民主力量的核心就是农民"。只有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把农民充分动员起来，投身革命。"但是，在必须立即北伐的借口下"，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正在回避这项工作"，而鲍罗廷竟也跟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下"转身逃跑，抛弃群众"，放弃全力开展土地革命的努力，"这无异于帮助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罗易认为，根本的办法在于："1.通过土地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最低要求以动员民主力量；2.在农村由农民夺取政权；3.革命军队的改编和集中领导"；同时，通过忠于武汉政府的军队的起义

---

① 其实这主要是汪精卫的意见，并且是与南京方面李宗仁等秘密约定的结果。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69页。

和工农的行动来恢复广东等省国民政府的权力。总之，罗易认为，决不应再指望诸如唐生智或冯玉祥等将军们，"这些人很可能又变成新的蒋介石"，北伐势必要同这些随时准备背叛革命的反动分子实行合作，以至"跳出油锅又跌入火坑"。革命必须靠工农自己，而"动员革命民主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①

罗易的主张鲜明地反映出共产国际历来理论的本质特点，即（1）必须把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的程度当作衡量革命成败的根本标准；（2）必须把革命深入及彻底与否当作衡量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程度的根本标准。尽管罗易也注意到军队的重要性，强调"我们需要军事力量保卫和巩固基地"，需要靠忠于国民政府的军队来恢复国民政府在邻省的权力，主张武装工农，改编军队等等②，但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深入革命和组织工农的本身也需要军队的捍卫。他只看到："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没有劳动群众热情的、自觉的支持，武汉的左翼政权连一天也不能存在。"故而主张不再做国民党的尾巴，让武汉政府按照共产党的意图行事③。但是他却没有看出，无论工农运动，还是武汉政权，这时都还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没有那些"随时准备背叛革命"的将军们的支持，不仅武汉政权，连工农运动也一天都难以存在。因此，要么独树一帜，不顾一切地深入革命、发动工农，准备流血牺牲；要么只好委屈求全，见机行事，为维持统一战线局面暂时使自己的言行保持在国民党，特别是将军们所允许的范围内。

为了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私自利的将军们保持某种统一战线，而委屈求全，乃至妥协退让，哪怕是暂时的，也

---

①② 《罗易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3—15日。

③ 《罗易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3—15日。

是大多数共产党人所难以接受的。这颇不合共产党人彻底革命的性格。为什么不能独树一帜呢？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为代表的激进的"反对派"，率先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今天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乃是将军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它最终势必走上反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人的基玛尔道路。在"军队底首领们利用每一个机会镇压共产党员"的情况下，决不应再做"国民党底一个附属品"，更不要死守着"推进国民革命军到完全胜利，即中国统一"，然后再"开始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彻头彻尾的门雪维克观念"①。相反，共产党应当挺身而出，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真正发动和武装工农，"制止资产阶级的专政之企图"②。为此，有必要使中国革命脱离国民党的阶段，公开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他们声称："只有苏维埃能够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开始造成新的（政权）。"③"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④被国民党及其地主资产阶级将军们捆住手脚的共产党，是绝不可能把中国革命真正引上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道路的。

反对派的主张，无疑充满了一厢情愿的俄国色彩，但其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却并非毫无根据。上海、广州的反共事件刚刚发生，武汉政府领导人就一面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依法惩治"⑤，一面直截了当地向共产党人发出警告，要求共产党人设法约束工农运动，并务必不要垄断工农运动的指导权，以免妨碍国民政府同各国政府及军官们之间的关

---

①③ 季诺维也夫：《中国革命提纲》，1927年4月15日，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附录，第99—128页。

②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底提纲》，《中国革命问题》第40页。

④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二次演讲》；《觉悟与矫正的时期到了》等，同上，第77—79页。

⑤ 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30页。

系。而鲍罗廷及陈独秀则亦被迫表示让步，公开主张“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约束工人和农民。不仅要把工农运动统统置于武汉政府之行政与司法之权力管辖之下，“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两湖农民不得擅自“由下造起，去推翻反动的势力”，而且要“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①，同意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指导工农。鲍罗廷甚至亲自参与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制定和发布劳资纠纷处理条例，禁止工人及店员提出过度要求及干涉厂店之管理，不许工会及纠察队有任何恐吓罚款及压迫惩办厂主和店主的行为，并极端严厉地主张对那些有意无意触犯政府规定之组织和个人，从重予以处分②。不难看出，为维持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避免武汉国民党人右转，共产党人不能不开始出面阻止工农运动继续发展了。

保持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这是长期制约着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一个行动准则，不仅在共产党只有几百人的时候是如此，就是在这时，共产党已经有了58000党员和上百万、上千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支持的时候，他们仍旧不敢怀疑这个准则的必要性。可以肯定，他们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数量的增多而相信自己已经强大到可以独树一帜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军队，而且也因为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策都是这样规定着的。甚至在“四·一二”事变之后，斯大林还进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同国民党的合作，明确认为：“没有这种合作则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与前不同的只是，他宣称：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四个阶级在内的“全民族联合战线底革命”，而随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

① 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0日；《怎样解决土地问题》1927年4月26日，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03—207页。

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4—1169，1175—1176页。

的叛变，革命已经进入没有资产阶级的第二个阶段。它意味着，“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把中国一切旗帜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而且有必要把武汉政府进一步改造成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①。

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资产阶级已经叛变，统一战线只剩下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自然左倾，还有谁能够阻挡工人和农民提出更为激进的革命要求呢？还有谁能够妨碍人们把武汉政权改造成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并得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支持的工农民主专政机关呢？毫无疑问，至少在理论上，缺少独立性的小资产阶级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有人能够这样做，而且正在向共产党提出过去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提出过的同样的问题。

难道领导武汉政府和左派国民党的仍旧是资产阶级？在1927年4月底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对此含糊其辞。他声称：“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②。但他却肯定地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③那么武汉政权的武装是哪个阶级的呢？这似乎有点不言而喻。不过，他并没有加以说明。七年来，关于理论及政策上的阶级分化组合之类的问题，大都是莫斯科那些苏联权威讨论的事情，中共的任务只是对决定的东西加以理解、消化、阐发和执行。但是，至少这次他清楚地知道，罗易所谓在地主资产阶级已经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之后，再也“没有理由担心加强农村的阶级斗争会导致统一战线的分裂”④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206，231—234页。

②③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④ 《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7年4月30日，《罗易赴华使命》第191页。

的说法，是再荒唐没有的。汪精卫、唐生智之流，并不是毫无主见和独立性可言的三流货。这种情况很快就反映了出来了。

中共"五大"在罗易的努力下，通过了两个比较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精神的工农运动的决议案。在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里，明确提出了"耕地农有，平均耕地"的口号，主张没有除属于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的一切土地，并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组织农民自卫军[①]。在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里，则不仅肯定了工人群众为争取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而且明确主张"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以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及没收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收归国有，并参加生产管理等目的[②]。但结果，上述主张统统被国民党中央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给否绝了，不仅没有一条能够实行，武汉政府反而还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对工农运动加以种种限制。特别是在5月中下旬四川杨森向武汉政府发动进攻，而夏斗寅部和许克祥部又公开叛变，威胁武汉并占领长沙之后，国民党领袖的右倾就更加明显了。

罗易终于明白陈独秀的看法是对的了。5月24日，罗易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上坦率地承认，他前此关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已脱离革命，国民党已成为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民主政党，因此，预料一切事情都会顺利进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转向反对革命，但它们的代理人依然留在国民党内，并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然而，他依旧未能摆脱旧的观念的束缚，他又重弹起国民党上层领袖"并不代表、也不能代表其广大党员和拥护它的群众"的老调，相信仍有可能通过帮助国民党左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辑，第54—5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辑，第56—58页。

派“在党的地方组织中占优势”，进而“同群众建立反对反动领导人的统一战线”的办法，自下而上地“除掉反动的领导人”[1]。

这个办法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从前就从未真正成功过的办法，这次也不会成功。况且，局势已经恶化到了极点，要么分裂，要么让步，没有别的选择。夏斗寅和许克祥叛变的事实已经说明，国共冲突的中心就是农民问题，因此，如何对待农运，成了能否保持统一战线的关键。此时，国民党否定了中共“五大”提出的土地纲领，其将军们更举出了农协随便捕人、罚款、游街、毁庙、侮辱军人家属及没收土地和士兵汇款等种种“过火”行为，要求根本制止。而事实上，湖南农运中也确实存在一些诸如毛泽东所说，平分富农土地、侵犯军人家属，乃至分配士兵寄回家去的钱，一些农会为哥老会把持，完全不懂政策的情况[2]。对此，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主张，对幼稚行动和过火行为要坚决制止，而在土地问题上应适当让步，通过暂时的让步来避免当前的危险，“使我们能够为了未来而生存下去，”“把我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而罗易却声称：“在目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去‘纠正’它们”。因为被国民党指责为“过火”和陈独秀谴责为幼稚的行动的，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因此，他坚决主张不管国民党的规定和限制，毅然“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没收土地”，以此来对国民党左派进行“考验”[3]。

难道还有必要进行“考验”吗？对于鲍罗廷来说，国民党

---

① 《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5月24日，《罗易赴华使命》第283—290页。

② 参见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上的发言，《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9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32—1233页。

③ 《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5月24日，6月9日，《罗易赴华使命》第290，311－312页。

左派领导人为了避免自己被军阀势力所推翻，“实行退却是正确的”，“应当支持”；对于陈独秀来说，同这些左派领导人的关系充其量只是相互利用，在目前自己还没有力量单独进行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考验”只能使自己被军人打败。无论如何，人人都清楚：“我们迟早必须退出国民党”，但究竟人们还是渴望能够胜利的退出，而不是失败的退出。因此，人们仍旧下决心采取让步策略。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通过了两个决议，明令限制工会和农会的司法权，并提出没收土地必须在确保军官中立等条件下进行，否则即应停留在宣传阶段，以首先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①。

从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后退，这在共产国际看来无疑是难以容忍的。不论这种后退是不是暂时的，它不仅违反了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所描绘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而且势必为一直在激烈谴责斯大林等人妥协退让的反对派提供炮弹。因此，当共产国际获悉谭平山在担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就职演说上，居然没有提到没收土地问题，而且竟同意用和平方式“查办”长沙许克祥叛变问题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他们声称：“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至“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这正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因此，他们明确表示赞同罗易“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和“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的主张，反对用和平的方式来对待诸如许克祥之类的反动军官，而为了避免继续依赖于不可靠的将军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辑，第103—106页。

们，他们更是明确提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电报特别注明：这样做"目前还不迟"[1]。

然而，这已经太迟了。自蒋介石叛变，鲍罗廷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军事发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五大"即明确决定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此后并确实大力动员工农加入军队，试图由此而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使之革命化。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成功地控制了在武汉的联合军校，并积极发展工农自卫武装。但是，要武装，必须有枪弹；要军队，必须有军官。而枪弹、军官统统控制在国民党人手里。湖南工农组织武器最多，亦不过千余支枪[2]。而中共可信赖的指挥官，这时也只有叶挺等几个人。不仅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军队是雇佣军性质，采取募兵制，一般有生活来源者决不当兵，动员工农参军十分困难。而且即便参军，因缺少军官及避免国民党及将军们无端怀疑，只能往现有军队中送，结果依旧是为他人所用，根本无法指挥。加上组织军队，既须训练，当时训练至少要三个月时间，否则根本没有战斗力。联合军校的学生因训练不足，在配合叶挺部队抵抗夏斗寅部的战斗中，临阵慌乱，打伤自己指挥官多人，被叶挺下令连毙几人才压住阵脚，但仍不能作战的情况[3]，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立即组建军队一点，都颇不能解。而军队、武装既不能建立，其它改造国民党中央，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等等，自然都形同虚设。

---

① 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辑，第554—555页。

② 参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370页。另据1927年彭公达报告，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之报告，1929年潘心源报告，可知当时长沙工农有枪不满400，浏阳约600，衡阳约100，株洲160，水口山200，郴州100，岳州100，余均甚少。

③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86—1187页。

6月4日，罗易在中共中央常务会议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并提议组织特别委员会准备湖南暴动。同时，中共中央遵照国际来电精神发出了致国民党书和告全国农民书，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之流为“反革命”，并火速派兵予以讨伐，呼吁农民夺取大地主、反动豪绅以及庙宇祠堂的土地，但对于小地主、革命军人、士兵的家属和土地财产，绝对不能侵害①。随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以粟去湖南组织临时省委，共产国际代表团则派两名苏联代表前往湖南实地考察组织暴动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重新呼吁夺取大地主土地，并不表明它已完全屈服共产国际的压力，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同时下发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更明确重申了前此主张的时限，即“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②

6月上旬，江西朱培德公开分共。同时，因北伐部队与冯玉祥部已会合于原定之作战目标郑州，唐生智等不愿再往北去，故武汉政府决定回师武汉，整理再战。但实际上，因冯玉祥与蒋介石勾勾搭搭，唐生智北伐得不偿失，无论鲍罗廷和加伦等怎样鼓动转而讨蒋，国民党人也不决定东征。相反，原先颇寄希望的冯玉祥，也有了联蒋的迹象。共产党人深知形势的严重，特别是唐生智数万湘军开回武汉，势必使军事反动更加加剧。不仅如此，此时武汉的物价上涨已经到了天文数字，武汉政府发行的各种币券，其信用更是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元，支出竟达1300万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来汉的革命者、避难者，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以万计，整个武汉

①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就长沙政变告全国农民群众》，1927年6月4日，见《罗易赴华使命》第303—30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辑，第145页。

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满城风雨，叠卵可危的时候。”①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于4月18日正式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布告，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并且基本上接受了英、美、日等五国就南京事件提出的全部要求②，开始与各国积极谋求发展双边关系。与武汉政府交好的苏联政府，却接连遭受沉重打击。4月6日，在北京各国外交使团的支持下，北京奉系军阀的军警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随后公布了查抄的大批秘密文件，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的大量事实。紧接着，天津法租界的苏联商行和上海苏联领事馆等，同时遭到搜查或包围。到5月12日，英国警察亦对苏联驻英商务代表团大楼和英苏贸易公司，进行同样的袭击③。10天之后，英国政府以苏联人员从事了间谍活动和反英宣传的名义，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④。一时间，法国要求苏联召回大使，美国外交人员呼吁对苏联发动十字军远征⑤，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也跑到武汉去游说国民党领袖，拐弯抹角地提醒他们认清时势放弃联苏联共政策。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和国际国内反苏反共浪潮的强大压力，武汉国民党中央终于在6月初下决心解除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

解除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决定，是武汉国民党人准备不惜破裂与苏联及共产党关系的一种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一切形势都告诉共产党人，他们必须再次选择：要么防御，要么进攻。在罗易看来，防御就是退让，退让就意味着投降国民党并任其摆布。因此，“只有一条道路：我们必须进攻。”否则，不仅国民革命将会失败，而且共产党人“可能在全世界被打败，第一个社会主义

---

① 《商民运动周刊》，第9期，1927年6月。

② 即所谓《宁案通牒》，1927年4月11日提出，全文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398—399页。

③④⑤ 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五卷（下），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51—653，672—673页。

国家的存在也将受到威胁。”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如果帝国主义成功地在中国重新树立其地位，则包围苏联的计划就将完成。”罗易宣称：“在这种时刻，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已经失去其政治意义”，“共产党必须站出来领导土地革命”，而不惜与国民党破裂。据此，他提议，在唐生智军队回师之际举行总罢工，并召集群众大会，要求国民党公开表态，开放工农运动，惩治反革命，免去朱培德的职务，同时派50名党员去江西鼓励和组织农民暴动。进而，瓦解国民革命军，鼓动士兵反抗军官，进攻广东，夺取长沙，武装工农并改组国民党①。

罗易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关系上所犯的根本错误，就是没有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并且第一次提出：共产党决不应再同目前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国民党必须改组。但是，恰恰在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罗易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他一面宣布“国民革命军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必须瓦解他们”，一面又表示要依靠其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打回广东。他声明，如果不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我们党就将灭亡”，但却不说明怎样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这样一支军队和广泛地武装工农。他号召揭露和驱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头头们，只同改组后的国民党合作，却又主张在基层组织工作没有准备完成、拥护共产党的工人和农民没有源源输入国民党地方组织之前，不要提出推翻国民党中央的口号。他说，“大概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召开代表大会，“推翻国民党现中央”了②。可是，不论是否按照罗易所说的去做，留给共产党的时间绝没有三个月了。

6月15日，国共双方开始举行联席会议，这无疑是双方领导

---

① 《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9日，《罗易赴华使命》，第312—320页。

② 《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9日，《罗易赴华使命》，第316—318页。

人为改善两党关系所做的最后一次尝试。但罗易却再度提议向国民党发出一件类似最后通牒式的《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要求国民党必须同意考虑和解决诸如"立即恢复广东"、"消灭湖南的反革命"、"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日"等问题，否则就没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①。这一提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蔡和森和瞿秋白的同意。显而易见，人们纷纷开始对两党关系这种无休止的混乱和冲突感到不能忍耐了，但却没有人敢于下决心立即与国民党决裂，这毕竟是莫斯科才能决定的事情。而莫斯科这时却说："我们还来不及聚集力量"，"也来不及达到能够打败敌人的地步"，因此，不仅不能退出国民党，而且必须制止过火行动，"必须在对待小资产阶级，也包括中等资产阶级的态度上相机行事"，以"保证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完全不受侵犯"，经济生活不致完全瘫痪②。因此，就连强烈地主张与国民党摊牌的罗易，也不能不表示，即使国民党人不接受他的条件，也不能退出国民党，因为"这是为了清除反革命领导人。"③但这纯属书生气。鲍罗廷明确地警告说：我们如果不能在"政治行动"、"控制群众运动"和"工商业政策"三方面与国民党迅速达成谅解，"在未来几天之内马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同国民党决裂。"

不过，在短时期内，不要说进攻或退让都已经无助于事，甚至共产党人连任何一种进攻或退让的策略都难以推行。人们从来没有做过应付这种非常情况的哪怕任何一种精神上的或者物质上的准备工作。陈独秀几乎是以无可奈何的口吻电告共产国际：他们所提出的主张统统都是正确的，但在短时期内统统都行不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了，但马上破裂更加不利，似还以暂时让步，纠正"过火"，准

① 《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15日。

② 参见布哈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真理报》1927年6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27年5月，等。

③ 《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15日。

备武装，等待时机为宜。①

当然，中共中央并非还抱有多少幻想。17日，国民党人正式通知鲍罗廷等已被解除顾问职务。21日，冯玉祥提议送鲍罗廷等回国，共产党人下野，武汉南京两政府合并迁宁。②同时，唐生智及所属湘籍国民革命军部队明显趋向反共。2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昌、汉口分别设立秘密办公地点，以防不测。此后亦开始秘密布置撤退党员和保存实力的工作。但发展独立武装的工作实在颇伤脑筋，因无独立武装，一旦全面破裂，后果实难设想。为此，陈独秀、蔡和森等再度求助于群众运动，决定致信上海区委，以"抗议帝国主义军队开往华北"为理由，在上海设法掀起第二次五卅运动，并诱使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占领区进行干涉和占领，"因为，如果是帝国主义占领，我们就可以发动一场新的反帝战争。这场战争将直接导致武装工农和没收土地的必要性。"③在陈独秀等看来，既然事已至此，与其"光荣的灭亡"，④倒不如破釜沉舟找个合适的机会拼一场。而要拼命，只靠少数工人农民武装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唯有这种驾轻就熟的反帝运动足以调动亿万民众，或许还能拼出个好结果来。

陈独秀等人的主张，遭到罗易的强烈反对，他坚信这种没有充分准备就"将工人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的斗争"，"是一种冒险。"但与此同时，他却极力提倡另外一种冒险。他提议，不论还有多少日子留在武汉合法地进行工作，"我们必须要有自由，并且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军队和一个左派集团。"他相信，汪精卫在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举行徐州会议后正处于孤立和恐慌中，应该把他"争取回来"。由于这时得到了莫斯科关于可以向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提供数百万金卢布的电报，罗易显然相信他可

① 《陈独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1927年6月15日。

② 徐州特别会议，1927年6月21日上午十二时（第二次），中国革命博物馆档案2·327号。

③④ 《中共中央致上海区委的信》，1927年6月23日。《罗易赴华使命》，第344—346页。

以把汪精卫争取回来，为此，他决定“将共产党的决定告诉他”，甚至把共产国际5月关于改组国民党等问题的指示告诉他，“不要耍外交手腕”，使他知道“我们为什么支持他们，他们能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从而以他为中心改组国民党中央，并请他指派邓演达担任一个军的军长，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合法的机会建立一个军，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服左派全面实行我们的政策，并占领广东作为推行我们计划的根据地。他声称，目前只有采取这种“决定性的步骤”才可能改变危险局面。①

把共产党的决定乃至共产国际要求改组国民党中央、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工农军队的指示和盘托出，甚至还直截了当地要汪精卫为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开绿灯，这无异于要汪精卫放弃国民党，或者变国民党为共产党。这更是冒险，而且是不折不扣、毫无希望的冒险。但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自从汪精卫途经莫斯科回国起，苏联人就对汪精卫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为争取汪精卫反蒋并支持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斯大林甚至亲口许诺为汪精卫提供1.1千万金卢布的援助，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指示也经常被透露给他②。罗易的行动不过是为了更直接的让汪精卫体会到整个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他的信任，以及寄予的重大期望。而与此同时，莫斯科竟也致电汪精卫，希望他“在目前危急的形势之下”，认识到“解救的办法就是同农民合作”，“实行土地革命”，并且更多地同共产党联合起来，“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新的领导人”，而不是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停，以至采取反对工农的立场。

---

① 《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23日。

② 从1927年4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中罗亦农的报告可知，汪精卫一到上海，就得知了共产国际关于必须武装工农以及必须开展土地革命，使中国革命超越民主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关指示，并“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按指中共）的训令”。自罗易到武汉后，罗易更是三番五次地找汪密谈，使其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意愿，并给予支持。

这简直不可思议！当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了解到莫斯科发给汪精卫的电报内容之后，显然感到无法忍耐。明知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却硬要它接受"没收土地"的口号；明知汪精卫等不过是将军们手中的玩物，却硬要共产党人去求助于他；明知事态危急，军事反动一触即发，却不顾一切地要求国民党允许武装工农，甚至要求其自动改换上层领袖使之工农化！6月2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度召开联席会议，并通过决议，向共产国际发电表示不能接受其指示。陈独秀明确讲：只有允许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否则，向右或向左"我们都将垮台"，继续目前状况，也是不可能的。只好再去寻找第四条出路。但事已至此，还有没有第四条道路呢？

6月28日，因探悉何键将挑起事端在武汉演出反共事变，中共中央因尚无国际复电和决裂准备，遂不得不亟亟下令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交出武器，试图避免何在武汉象蒋介石和许克祥一样以此为借口，大开杀戒。① 随后7月3日，中共中央又急忙通过了瞿秋白6月30日起草的一个准备正式宣布退让范围和条件的维持国共关系的决议案。② 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其实，还在6月23日苏共中央就已经一改其5天前的主张，宣布武汉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可能"发生新的叛离"了③。尽管他们始终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不得不在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报告中游来荡去，以至有时朝令夕改，但这时他们不再怀疑自己的判断了。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武汉政府已经转入反革命营垒，"共产党员不能再

---

① 因6月28日风闻何键部队要制造新的"马日事变"，中共中央军事部在请示中央讨论同意后，决定自动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以防何键以此为借口发动袭击，不意交枪后，纠察队迅速解体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辑，第170页。

② 此决议由瞿秋白提议并起草于6月30日，但讨论及决定于7月3日。

③ 见《真理报》，1927年6月23日。

留在政府里”，“必须退出政府以示抗议”。同时坚持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和群众中，为争取“在真正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召开代表大会”，以改变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国民党领导机构而斗争。自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忘记提醒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纠正党的领导的根本错误”，共产党人“最好是秘密地”召集一次“紧急会议”，并准备转入地下。①

一切都结束了。在蒋介石背叛之后，苦心孤脂地经营了近4年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告一段落了。尽管当中共中央还未来得及将他们根据国际指示起草的谴责武汉国民党领袖的宣言散发出去，国民党人已经抢先一步于8月14日夜决定了分共的步骤和措施，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共产党人没有能够达到他们最初预期的目的。他们早就知道合作的双方将来可能是敌人，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分裂会来得这么快，更不曾想到准备一鼓作气把中国革命引上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会被软弱的且缺乏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半路给赶下车来。可令人不解的是，共产国际竟仍旧命令他们去乘坐那辆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车，并且还要他们去驾驭车的方向。对此，陈独秀自然是无能为力了，他已经被这种局面搞得焦头烂额了。鲍罗廷、罗易等等当然也过时了。于是，一切要重新开始了。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27年7月8日。

第三章 从“彻底”到“不彻底”

（一）为苏维埃而战

1927年7月，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冲突和磨擦之后，中国革命向左发展的势头终于被国民党人遏止了。共产党人控制并以为依靠的上千万有组织的农民、成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以及大量国民党基层党部，转瞬之间就被反动武装压垮了。尽管不论南京政府，还是武汉政府，都并没有放弃反帝反军阀这种带有明显左倾色彩的革命口号和行动，但国民党人领导下的反帝反军阀运动的主体及其实际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仅失去了前此的革命内容，离开了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轨道，转而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而且日渐失去群众运动的特点，逐渐成为国民党政府乃至上层领袖推行其外交及内政方针的附属物。甚至，随着国共斗争告一段落，国民党及其政府统一问题重新提上日程，军事政治的弊端立即显露无遗。各派人物迅速依据军事实力展开了权力上的公开勾结或争夺，反帝反军阀的目标早被置诸脑后．共产党人几年来辛苦经营的结果，在国民党内只剩下形式上的激烈和下层的某些激进情绪而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上层领袖，甚至公然开始以取缔反帝运动为代价，来谋求列强对自己的支持①。这说明，国民党上层领袖

① 1927年9月底至11月初，蒋介石曾亲赴日本要求其首相给予支持，声称一旦他“完成革命”，“排日运动当可绝迹”。见佐藤安之助在蒋介石与田中义一首相会谈时所作记录，译文见：《近代史资料》总第15号，第218—224页。

已经不惜抛去这形式上的革命外衣，并和下层群众的革命情绪相对立了。

国民党的这种变化，当然是所有主张坚持前此反帝反军阀的彻底革命立场的真正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早已预料到的。但是，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当怎么走呢？对形势的不同估计和对俄国革命理论及经验的不同理解，迅速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因此，当国民党上层各派开始围绕究竟应当以谁为中心来统一国民党，和在统一政权之后如何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勾心斗角以至大打出手的时候，作为革命一方的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以及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纷争以至对立。整个中国迅速陷于混乱和动荡之中。

最早意识到革命失败，国民党已无可指望，试图寻求新的出路的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这位前黄埔军校教育长，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武汉行营主任、联合军校校长、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等职的国民党人，还在1927年5月左右，就已经在探求新的革命出路了①。而当中共中央和罗易等人讨论是否应当向汪精卫推荐他来组织一个军的时候，他则已决心离开武汉，秘密前往苏联，力图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重振国民党，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了②。但是，邓演达和随后也来到莫斯科的宋庆龄及陈友仁颇不走运，他们恰恰赶上了苏共党内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中央派与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刻。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败，正在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就连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中

---

① 这时的邓演达曾打算第二次改组国民党，并解散共产党，统一革命的领导权，见施存统：《第三党问题》，见《第三党讨论集》，第28页。

② 《第三党的面面观》，《机会主义的第三党》，第75页。

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也成批地受到反对派观点的影响，而对反对派表示同情。在这种形势下，力图依靠苏联，白手起家，重新使已为多数共产党人所反感的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的努力，自然不会受到重视。事情很明显，不论在哪一派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革命都绝不应当停留在国民党阶段了。

不可否认，斯大林曾试图继续利用一下国民党这面旗帜。但也仅仅是试图“利用”而已。因为，在斯大林看来，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当然“不要太跑在前面，不要现在就成立苏维埃”①。但他显然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可以作为当前口号、作为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对抗而提到日程上来了。”②到那时，国民党的旗号就可以抛弃了。

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毫无疑问是同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当前形势、性质、内容及其动力和对象的考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所有人都承认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如果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把这种失败仅仅看成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至多经过比俄国当年七月到十月更长一点的时间，革命即可“重新走到大街上”去扫除一切反革命③的话，那么，相当多的人无疑并不是这样看的。

人们此时的认识，大致走向了两种极端。在右的一边，最悲观的莫若施存统等，他们似乎把革命的这种失败看成了一种观念的毁灭，以至成千上万地脱离了共产党。而更多的人则把革命的失败类比于俄国的1905年，而并非1917年7月，相信革命力量的重新积聚和爆发，需要的不仅仅是“半年”或“一年”，而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④。在左的一边，最激进的莫过于中共地

---

①②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82—283页。

③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81页。

④ 持有这种认识的有谭平山以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等。

方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明确认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①，故强烈主张抛弃国民党的旗号，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②。似乎革命的失败并不十分紧要。

就中共中央而言，它虽深知斯大林的类比仅系"就其程度讲来"③，并非指其性质，知道中国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④，但它同样认为失败并不十分严重，不仅革命力量本身"还没有大破坏"，而且由于国内局势更加动荡、恶化，毫无出路，革命必将迅速"重新高涨"起来⑤，进到"工农民众暴动的时期"⑥。但实际上，中共中央一分钟也没有等待这个"必将"和"进到"的过程，它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革命已不在"高涨"之中，故其从武汉分共之日起，与其说在"准备"迎接"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和"工农民众暴动"的到来，不如说在全力以赴地按照革命高涨的形势组织各省的武装暴动。从"八·一"南昌暴动，到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从两湖暴动计划，到"九·九"鄂南及湘赣边农民暴动，到"十一·一"海陆丰的农民暴动，这一系列暴动计划和暴动行动统统反映了这种心态。不仅如此，尽管各地暴动先后失败，中共中央仍从这星星之火中感受到强烈革命冲动，故而断言："革命的潮流普遍的高涨"了，准备暴动的方针已经不行了，武汉反动以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工农民众暴动的新时期，客观条件上已经"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了。

---

①② 《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湖南省委当时明确认为"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俄国的1917年10月"，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③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81页。

④ 《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

⑤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

⑥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

暴动，是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突发式的群众革命形式，其特点主要在于它的突发性和群众性。因此，它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群众的革命情绪及其物质的准备，都有较高的要求。由于暴动是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因此它显然较为适合那些工业比较发达，城市能够在支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和行政统一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欧洲国家的革命党人。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通过这种暴动获胜的。而仿照俄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从一开始也就把这种群众性的突发式的夺取政权的方式，当成了自己未来革命成功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他们为此甚至还怀疑和反对过孙中山的军事革命方式，坚信凡革命都必须从群众运动开始，到群众暴动结束，不可保持部分的政权、部分的军队，否则就必然妥协堕落而不能彻底革命。这种观念其后虽有改变，但亦不过只是把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之间划了条线，因此，一旦由共产党人自己发动革命，它仍旧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暴动的形式。但是，在城市化① 和工业化水平很低，政治及行政尚不能统一，敌人军事力量十分强大，而群众运动刚刚遭到严重失败，尚无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的中国，强行推行暴动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实，即使中共中央自身，对武装暴动也是缺乏准备的。武汉国民党 7 月15日决定分共后，一度尚未公开。在加伦建议下，中共中央初拟利用中共在张发奎部队上层军官中的影响，促使张脱离武汉政府，返回广东老家，到广东后另树一帜，掀起土地革命运动。后因发现张亦有驱共意图，且共产党和共青团公开发表反对武汉政府叛变行径之声明，国共分裂之事已完全公开，遂不得不下决心摆脱张发奎，独立策动可影响之军队举行起义，使之完

① 还在1913年，俄国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8%，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有100多座，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亦有20座之多。而中国此时城市人口数尚不足全国总人口数的10%。

全为共产党所掌握，以实施南征返粤之计划。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八一"起义，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政变，它有力地表明了共产党人试图独自掌握武装力量，以反抗武汉政府的叛变行径的决心，但它还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武装暴动。

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严重的缺陷，故随即"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秋收暴动计划"，"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①。至"八七"紧急会议后，则更进一步强调：南昌事变的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②。但无论是以秋收暴动响应南昌事变，还是以南昌事变帮助秋收暴动，结果都没有做到。中共中央虽三令五申督促各地，并缩小暴动范围，集全力鼓动两湖，"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③。后两湖省委不顾一切于9月9日前后将暴动在湘赣边和鄂南发动起来，还是很快就被敌人压了下去，仍未能实现中共中央的暴动计划和胜利预想。紧接着，中共刚刚掌握南昌起义部队，在孤军南下福建、广东过程中，亦为强敌所灭。

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程度，事实上与中共中央并无太大差别。从这时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苏共中央《真理报》的有关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于"革命的暂时失败将在较短时间内为革命的新高潮所取代"的前景，充满了信心。④他们甚至在进入8月份之后，就已经在主张"把苏维埃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斗争的口号"了。当然，条件是"如果革命趋

---

① 《中共中央致前委信》，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5日。

②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9日。

③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

④ 《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社论），《真理报》，1927年7月26日。

向高潮"的话① 。而他们出于常理，并不认为在革命失败后的几天之内就会出现新的高潮。因此，他们最初并没有鼓励中国共产党人去立即组织武装反抗，并且对新派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加伦与中共中央策划的南昌起义，也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犹疑态度，声称："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②。应将张发奎军队中的党员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③ 。但是，在"这一拼死的尝试"变成现实之后，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在各地先后发生之际，他们立即毫不犹豫地断言："这场运动并没有被完全扼杀，革命群众也没有被吓倒，组织武装起义的任务是不言而喻的"④，"建立一个更加符合自身要求的新国家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⑤

于是，尽管他们仍旧说："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阶段"，阶级力量对比仍旧"十分不利"，出现革命浪潮迅速高涨的前景还只是"极有可能"⑥，但他们已经把苏维埃的道路和目标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声称：在中国，"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⑦。

9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纳兹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告：鉴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当然，"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决议强调苏维埃的组织应当在"我们有决定

---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关于布哈林同志报告的决议》，《真理报》1927年8月10日。

②③ 转见《张国焘致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1927年11月30日。

④ 马马耶夫，《南下大进军》，《真理报》，1927年9月27日。

⑤ A.伊文：《中国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北方各省》，《真理报》，1927年10月14日。

⑥⑦ 见《真理报》，1927年9月27日，11月29日。

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建立“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而决不应首先在小县城里组织苏维埃①。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后的9月下旬，正是两湖暴动先后失利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陷于困境，生死不明之际，不仅中共中央，就连罗明纳兹等国际代表，亦对胜利前景不再乐观。因此，当中共中央宣布开始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同时，却被迫离开“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秘密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去了。它并承认，从前于短时期间暴动夺取广大政权的希望，暂时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的策略虽仍是继续暴动，但大城市的暴动计划应暂时停止，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也只是“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②．而不存在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

“苏维埃”，俄语为Cobéт，其实只是“会议”的意思。它之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一种简称，最初只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很快则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日渐成为和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进而，布尔什维克利用它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的优势地位，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以苏维埃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作为一种权力机构的苏维埃的特点在于：（1）它不是按区域，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来选举代表，从而保证了代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2）它废除了三权分立，使代表会议本身成为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高效率的独裁机关；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12—313页。

② 《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

（3）它完全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因此，列宁对它十分推崇，并极力推而广之。

不过，由于苏维埃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构的两种形式，因此人们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也颇为矛盾。尽管斯大林断言它既是"起义机关"，又是"政权机关"①，但事实上二者之间仍有区别。其一，作为起义机关，苏维埃是适应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作为一种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它则是布尔什维克根据阶级斗争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创造；其二，作为自发的起义机关，苏维埃是充分民主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事实上它是一种包容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作为权力机关，它则是以阶级专政乃至党的专政为特点的，它绝对排斥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党派团体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作用。不难看出，要把二者同时推广到中国来是相当困难的。实际上，不论斯大林怎样强调苏维埃的二重性，作为具有自发性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等重要特点的群众斗争组织的苏维埃，在群众组织程度较低，白色恐怖又相当严重的中国，显然是缺乏客观的生长条件的。因此，共产国际向中国引进的苏维埃，其实只具有一种形式，即作为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的政权机关形式的苏维埃，只不过根据中国的条件，称之为工农苏维埃而已。可是，即便如此，在工农运动刚刚遭受严重挫折，敌人力量还极为强大的中国，不是想方设法扩大革命势力，而是极力把革命力量局限到工农两个阶级，乃至进一步缩小到工农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到处推行排斥阶级统一战线和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工农独裁"政权，这仍旧未必是明智的。

当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乃至革命发展不平衡的

---

①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5页。

特点，决定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乃至工农运动仍旧存在着某些特殊的发展条件和地区，而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和战争甚至为共产党人发动工农起义和夺取少数地区的政权，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自然很难一下子意识到把这种纯粹俄国形式的东西硬搬到中国，所具有的历史性缺陷。况且，按照斯大林的规定，苏维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了，对于各国共产党人来说，它还是一种标志着特定革命阶段、革命形式和革命内容的重要的革命象征。在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际，共产党人除此之外再不能有其它的选择。

按照斯大林在国共分裂后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说，中国革命应该是按照三个阶段一级一级地向上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就是所谓"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反帝，革命阵营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到第二个阶段，革命开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阵营内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第三个阶段，即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开始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社会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政府的压迫"，而"脱离革命"，革命阵营就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了①。

按照斯大林所勾勒的这幅革命发展趋向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在理论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一种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中去了，而他内心所追求的，只是革命的不断深入，即革命

① 参见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1927年8月1日；《中国问题》，1927年8月5日等。

的彻底性问题。似乎革命越深入，革命阵营自然就越小，革命对象也就自然加多，革命表现形式也就越激烈，而由此也正说明了革命的彻底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迅速理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有关这一系列新的革命形式和革命阶段的理论问题。自国共分裂以来，中共领导层内部在新形势面前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对眼前发生的巨大变动难以适应。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前后，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更加突出，渐至出现了组织上分裂的严重迹象。

首先是关于革命的阶段和策略问题。中国革命现阶段是不是到了俄国革命的1917年？革命是不是应该采取苏维埃的暴动方针？最激进的如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中的一些与会者，干脆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达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程度。其它如湖南省委等，对中国革命的阶段和性质的认识也已发生近似的情况。罗明那兹和中共中央虽坚持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看法，但在把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以便直接导致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论断[①]时，也陷于一种极端的状态。以至提出了“无间断革命”的观点，主张“现在”就“必须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②]。但一些基层党员却看不出这种前景，他们“大半消极并离开党，不赞成新方针，以为CP没有出路”[③]。而另外一些从苏联回国，受到苏共反对派观点影响的党员，自然更是坚信中国革命必须将民主革命的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毕其功于一役，但他们虽主张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取代“工农民主专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4、284页。

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0页。

政”的口号，却反对把革命现阶段看成是1917年，而相信这不过是俄国的1905年[1]。

其次是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早在罗明那兹来华之际，他就曾明确地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不要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这种主张在强调中国远未达到1917年的人看来，当然不妥。甚至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也多少有些模糊。资产阶级出走，这或许不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共产党人历来只是习惯于把资产阶级看成自己潜在的敌人，并视之为软弱无力的依附者。但放走小资产阶级，却显然与此不同。因为几乎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一旦让整个小资产阶级站到自己的反面，革命队伍势将极端孤立。当然，没有人敢于重蹈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覆辙。况且前此经验已经证明，土地革命稍一彻底，就将吓跑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确实表示赞成只顾土地革命的彻底与否，而不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此仅指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而已，对富农如何，对中农如何，对城市小商人、店主以及手工业主又如何呢？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意识到这是当前政策的“中心问题”，并总以为继续利用国民党的旗号就是为了争取小资产阶级[2]，因此虽确信小资产阶级必然反动，但仍旧强调其两面性，政策上也较为含混。至苏维埃方针提出，此种动摇自然公开停止。但为什么俄国革命并未反对小资产阶级，而中国革命反而必然要赶走小资产阶级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从武汉时期的经历体会到，一旦贫苦的工农民众起来革命，势必要侵犯包括自耕农和各种小业主在内的小私有者的利益，苏维埃革命自然更甚。不过，中共中央毕竟还有些犹豫，对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仍旧希望“吸引他们参加革

---

① 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更明确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已经失败，暴动及苏维埃政策应当停止，共产党应仿照俄国1905年革命后之策略，争取通过合法运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引导群众重新走入政治生活。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89页。

命”，对小商人、小店主等，也不主张没收财产，甚至对正在形成的介乎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第三党”，也不知是否要坚决反对，甚至对于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还引为“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①。正如瞿秋白所说：“对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根本未成熟。”

第三是革命的方式问题。在国共分裂之后，采取何种革命方式的问题几乎没有选择。共产国际的指令亦很清楚，即“可以在国民党旗帜下来组织暴动”。尽管共产国际强调了发动暴动的必备条件，但它毕竟只指出了这一种革命的方式。还有没有其它的方式可供选择呢？或者说，是否还有比暴动的方式更适合中国条件的革命方式呢？不难断言，从南昌起义以拉部队回广东，重新开辟根据地的目的来看，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在某种形式上重演国民党的军事革命方式，是有所考虑的。但是，这种考虑事实上并不是十分自觉的。在脑髓深处，人们依旧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暴动的方式上，甚至把武装部队，如南昌起义部队，也仅仅当成一种辅助的手段，生怕过分看重军事的准备而堕入所谓军事投机的泥坑。因此，尽管毛泽东早就主张建立和保存自己的武装②，并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③军事革命观点，却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苏维埃革命任务的提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以民众暴动为唯一革命方式的倾向。苏维埃本身不就是起义机关吗？熟知欧俄苏维埃革命历史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只能变得更加墨守陈规。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劝告他们注意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条件不成熟时应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很难设想中共中央会把这种极不规范的语言写在自己的决议上。只

---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13、376、433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1927年7月4日。

③ 《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要看一看11月扩大会议对于在湘赣边秋收暴动中，因强调保存军事实力而没有按照中央既定暴动方针行事的毛泽东的严厉处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的固执。事实上，虽然中共中央在一系列挫折之后，已多少悟出中国“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因而需要建立工农革命军甚或革命根据地①，但他们显然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的效力感到怀疑。在11月扩大会议不久之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瞿秋白就明确要求赴莫斯科的代表告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虽然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但许多同志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②。

这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形势相当严峻。无论理论上、实践上，人们都明显地感到不知所措。武汉的党员，7月时有8000人，8月初骤然减至3000人，8月中又减至2000人，到9月只剩1000人左右③，这种势头似乎无法控制。到11月底，中共中央实际可以掌握的党员人数，已经从五大时的5万人，减为1万余人，减少了约4/5。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共中央感到焦虑。

更让中共中央深感不安的，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问题。人们十分担心，革命的失败是否会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尽管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断然否定中国有走上凯末尔道路的客观条件，但罗明那兹却坚信：“中国长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能的”，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如何能使工农革命潮流迅速高涨起来，并使国民党人始终处于动摇和危机之中。中共中央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罗明那兹的这种看法，不过没有人怀疑应该由此出发得出“无间断革命”的观点。尽管实际上人们这时还并不十分清楚罗明那兹提出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但显而易见，无论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0期，1927年12月10日。

② 《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11月27日。

③ 《罗亦农关于湖北工作的报告》，1927年9月10日。

出于哪种考虑，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国民党政权会趋于稳定。多亏国民党自身的内讧不断地在帮共产党的忙，使中国无一日不在战乱之中，群众的不满总可以激起一些暴动。广东国民党自身的争战，甚至一度为海陆丰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农村割据，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进而更为共产党人乘虚发动广州暴动，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此前中共中央领导的暴动，几乎清一色都是农民暴动。客观上，因组织农民暴动远比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要有效得多，中共中央亦不能不承认在此时首先成熟的还只是农民暴动和农民苏维埃，其整个工作的重心也不得不放在农村。但在理论上和苏维埃的历史上，只有城市工人的暴动才是革命胜利和巩固的“先决条件”，没有城市工人暴动作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①，因此，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不能不寄希望于城市工人的发动。广州暴动显然刺激了人们久已梦想的这种渴望。

广州因国共合作和省港罢工等原因，共产党人在工人中确有基础，前此曾几度试图大举暴动，均因广州敌人兵力强大，又无军队配合及群众响应而成为小规模的骚动。此次张发奎勾结汪精卫于11月17日发动广州事变，赶走桂系势力之后，战火渐渐在广东燃起，广州顿形空虚。起初，虽因张发奎等有意对共产党表示好感，共产国际在广东的代表曾主张利用汪精卫、张发奎等反对桂系及南京政府，但到11月26日晚，人们已一致决定了准备暴动的方针②，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准备于12月13日发动暴动。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获悉汪精卫9日密电，知其已了解暴动计划，要解决共产党控制之第四军教导团，并搜查全市共产党人及俄国领事馆，遂立即电告上海中共中央，并通知广东省委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2—373页。

②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1927年11月29日。

立即提前举行暴动。

对于广州暴动，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是明确的，即暴动应当建立在广州四郊及附近各县农民暴动和国民党兵变的基础上，并且应当尽早公布各种革命口号及法令条例，组织集会、罢工和工农赤卫军，以便发动群众。否则，将难于坚持。广东省委突然被迫提前暴动计划，使原计划的各种准备及配合工作无法继续，这使人们在暴动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次暴动未必能取得成功。但是，广州的大规模暴动毕竟是第一次中心城市的暴动，这似乎使人们的判断再次被盲目的乐观和急躁心理所吞噬。毕竟是城市工人开始暴动了，毕竟是在人们无比熟悉的革命"圣地"广州，人们仿佛一下子从前此的种种疑惑中惊醒过来，忽然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降临了。

12月11日，广州工人和起义的士兵在张太雷、叶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共同指挥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并占领了广州市区，宣告组成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两天之后，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很快便重新把广州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暴动的工农群众惨死于报复性的血腥屠杀之中。事实再次证明了敌人力量的强大。但是，正当敌军重新回到广州街头之际，中共中央却在上海认真地研究如何立即在广东全省、在两湖及江西，以至在全中国开始"大暴动"。人们甚至相信："广州市政权能否长久维持不大重要，而主要的是要扩大暴动"，立即向周围放射，因为"广州可说是全国大暴动的开始"。为此，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告全国工农民众书，号召工友、农友、士兵弟兄统统暴动起来，并宣称："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只要四处发动，必可得"最后的胜利"①。

---

① 《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192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年12月18日。

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也同样充满了幻想。在此之前，苏联刚刚同英国以及中国北京当局发生过一系列外交冲突，斯大林特意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上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发出了“保卫苏联”的号召①，接连召开的莫斯科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以及柏林世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董事会扩大会，也都被明确要求提出了保护苏联的方针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外交人员本应格外小心谨慎，但实际上，他们却不顾一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一道投入到广州暴动中去了。广州苏联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等直接充当了起义军队的军事顾问，领事馆的汽车更是插着暴动者的红旗招摇过市，仿佛胜利已经成了定局③。甚至远在千里之遥的斯大林，也对如何指导这次暴动格外感兴趣④。显而易见，共产国际以及苏共中央对这次暴动曾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广州暴动的迅速失败，并不能使共产党人的头脑完全冷静下来。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在获悉广州苏联领事馆副领事等5人同大批共产党人及暴动工人被杀害之后，已深知“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故明确表示“不能作如此的盲目争斗”，应重新“继续作农民游击战争”和“建设我们秘密的组织”的工作⑤，制止了中共中央进一步扩大暴动并发动全国总暴动的盲动措施，使之意识到自己对形势估计不妥，从而很快放弃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② 参见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③ 参见《晨报》，1927年12月13日；《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82页；黄平，《往事回忆》，第48页。

④ 据说广州暴动前夕，斯大林曾亲自打电报给纽曼予以指示。转见《党史研究丛刊》，1982年第2辑。

⑤ 见《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1927年12月17日，此文件系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后，于12月16日得到中共中央同意，并作了文字上的加工后发表的。

了扩大暴动的方针①。但是，人们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倾向仍未有所改变。

广州暴动失败给中共中央最突出的启示，就是使他们再度明确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同俄国一样，通过一两个或更多的中心城市的暴动，一下子取得全国的政权。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虽然承认"农民激进工人落后"的现实，被迫主张在农村首先进行小范围的农村割据，但却从未放弃过通过城市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幻想。如今，他们认识到：由于"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且"在中国条件之下，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是许多半独立的区域"，各地"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也有强有弱，因此，马上夺取全国政权是困难的，但"开始于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②。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仍旧过高。这时，基于前一阶段的暴动指令，各地不断有暴动的消息和要求传来。这里，确有存在较好的暴动割据条件的地区，如湖南某些农村，农民协会势力之大，使地主乡绅之流乃至当地少量驻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公开与对抗。但也有许多地区，只是少量激进分子组织起来，采取红色恐怖的手段，在那里逼迫群众进行罢工和反抗。甚至南洋新加坡少数共产党人拿了几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去袭击了一次新加坡各界欢迎国民党要人的集会，也立即送来报告宣布南洋已开始暴动③。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混乱。他们固然开始批评那种毫无群众基础和割据希望的"无动不暴"的盲动倾向，但却认为"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更加明显，武装暴

① 参见《中央告湖北同志书》，1928年1月1日，《中央告江苏省委同志书》，1928年1月1日，《中央致陕西省委信》，1928年1月2日，《中央致浙江省委信》，1928年1月18日，《中央致罗迈同志信》，1928年1月20日，等。

② 《秋白给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10日。

③ 《中央致南洋临时改组委员会信》，1928年3月3日，及南洋改委2月9日信，转见《中央通讯》第23号。

动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的问题”①。因为广州暴动使“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它意味着：“工农革命的热烈的高潮与高度的成熟已经明显的固定”，“预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之胜利，领导暴动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部分”了②。也就是说，广州暴动后中国已进入更高的革命阶段，革命的胜利已经更加临近了。

然而，在实际上，人们甚至还搞不清苏维埃革命的准确含意，“苏维埃”的宣传和表示，纯粹还只是一种决心仿照苏联模式进行彻底革命的标语口号。在1928年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甚至对苏维埃革命的性质、政权的成分，以及是先有苏维埃还是先有暴动，暴动是否必须先经过总同盟罢工等许多问题，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则一面宣布“苏维埃政权是最彻底的民主政权（德谟克拉西）”，一面又断言“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③。当人们意识到把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似乎否认了现阶段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而出来纠正时，却又不能不承认“它已经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国民革命了”，而是“中国工农民主独裁制的政权”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即是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的一种革命④。但就在人们大谈苏维埃革命的工农独裁性质之际，他们却再度离开了斯大林对这一阶段革命阵营变化的说法，重新又关心起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

①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1928年1月12日。
②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1928年1月3日。
③ （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布尔塞维克》第11期，1927年12月26日。
④ （社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第14期，1928年1月16日。

的地位来了，断言："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以及革命的军官，都赞助苏维埃政府"，就连中等资产阶级也可以保持"中立"，因而主张"须要赶紧实际上去吸引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及知识阶级到革命运动之中来"，并满足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①。

要按照俄国革命特定的模式来具体规划中国革命每一个行动步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会公然主张中国革命必须亦步亦趋地模仿俄国革命的每一步步骤。但是，当这种特定的革命模式被纳入到一种特定的阶级理论的观念中去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当实际的革命步骤需要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它不仅要计算它偏离成功模式的危险性，而且还要考虑它是否完全符合那个既定的理论观念，而后者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对于落后的中国。因为，人们往往只能从形式上来判断一件事物的阶级属性，而在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极少数，其自身运动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强大压力和改良主义政策的诱惑下四分五裂的中国，要想完全保持苏维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俄国革命的模式。否则，任何一种改变都可能丧失这种无产阶级形式，从而被指责为一种"非无产阶级化"的倾向。而事实上，类似的指责，至少是担心，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因为，工农运动及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农民运动明显地处于较活跃的地位，并具有较大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共产党人易于推动农民的反抗斗争和武装割据，并迅速征收了大量的农民党员。相反，在敌人力量十分强大和集中的城市中，工人运动普遍处于停滞中，难于推动。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发展方向自然要引起许多人的担心和怀疑。有人公开认为："党好象变成了农民党"了。作为中共中央派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中国工农代表团负责人的向忠发，则干脆上书国际领导人，声称这是小资

①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

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占主要地位的必然结果，因而主张“簸箕这样的党”，以便根本改变忽视城市工人运动的情况。而一些地方党的领导人，也把人们认识上的不同和暴动的失败等等，统统归结到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成分上，声称“以后低级至高级的指导机关都须有多数的工人同志参加，方能始终坚决的领导暴动，达到最后的胜利”①。

然而，只要有工人“坚决的领导暴动”，就能迅速“达到最后的胜利”吗？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鉴于党内认识分歧，接连召开政治谈话会，讨论形势及策略问题。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坚持认为“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一省与几省夺取政权的目标仍然是要有的”，但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简单说革命潮流是高涨的，认为革命正处于历史转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动摇不一定马上就要崩溃，而广州暴动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暂时的胜利，革命潮流已经低落了，继续要求全国暴动或一省几省马上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他们批评中央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大，看不到党的力量非常之弱，并且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恢复和建立起来的，战略只知道一个劲儿向前走，以为不暴动就是不革命，不了解在目前情况下应设法恢复组织，准备力量，暂时采取退守的策略②。

对形势的估计问题，直接与党的策略方针相联系。在理论上和俄国实践上，苏维埃只是革命潮流极端高涨，需要夺取政权时的产物。没有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自然也就没有苏维埃这个组织起义的机关，也就谈不到暴动夺取政权。中共中央当然也只能这样理解问题。尽管不论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共产国际驻中

---

① 《中共广东省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1928年1月1日至5日全体会议通过。

② 参见克鲁：《目前几个主要策略问题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19期，1928年2月27日。

国代表都表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不能机械地模仿俄国，但究竟哪些相同，哪些不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似乎并无解释之权。事情很明显，当有人怀疑革命潮流是否高涨时，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来，自然也就是怀疑暴动政策，乃至怀疑苏维埃革命，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告，再度断然肯定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不但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更加紧迫起来①。”当然，他们已深刻地意识到，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对整个苏维埃运动以及人们的心理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造成了“工人阶级有不能领导农民争斗，城市有不能成为农民暴动中心的危险”，这可能使整个苏维埃革命背离俄国革命的轨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声称“革命反革命已开始互争政权中心之大城市”，之所以未能夺取城市，“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各地党部没有争城市的决心，而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归根结蒂，同否定革命高涨的观点一样，这都是“机会主义余毒”在作怪。因此，中共中央坚决地提出了“党的彻底改造”问题，主张要“提拔工农的指导人材，刷除机会主义的成分”②，似乎这样一来一切问题就统统解决了。

然而，中共中央这次显然走得太快了。他们不知道，正当他们决心全力以赴地准备把武装暴动的政策再度引向中心城市的时候，最先指导他们实行暴动政策的那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经在莫斯科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激进观点。按照他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意见，广州暴动之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高潮”，共产党人有必要运用持续不断的武装暴动的政策，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把中国推进到社会

①②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1928年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1928年3月10日。

主义[①]。但紧接着于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却明确地批评了罗明那兹的这种观点。决议称：中国"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工农革命只不过"正在走向这种新的高潮"，革命本身在各省以及在城乡之间"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党的中心工作，还不是立即暴动，而是争取群众，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②]。那种"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同时认革命为'不断革命'之倾向"，是"大为有害"的。

4月下旬，中共中央收到了上述决议案，同时并于4月26日收到布哈林以个人名义拍来的电报，电报亦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在决心集聚力量进行武装暴动时必须格外谨慎，尤其是夺取重要城市的政权的斗争，必须到自己的力量超过敌人很多时才可以进行。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仅必须改变自己对形势的估计，而且必须全面修正自己的暴动政策。而这竟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刚刚把党内的不同意见指责为机会主义，共产国际竟然发出了与之相似的指示，这无论如何让人难以接受。中共中央此时对共产国际的权威显然还没有太多的畏惧感，以致在讨论共产国际指示时还敢于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见。虽仍有人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但多数人明确认为共产国际的批评不够恰当。他们强调，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民主主义性质，其所谓无间断革命只是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至于形势，他们主张仍应"肯定的承认革命潮是高涨的"，只是没有达到"最高潮"而已，称国际对形势的估计缺少了积极的一面，对盲动主义

① 见《国际新闻通讯》，第8卷，第1期，1928年1月5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2—46页。

的批评有些“过分”，“如不很好的解释是可以使机会主义分子投机的”。于是，会议作出5条“秘密决议”，准备向共产国际提出质疑。而在随后发出的关于共产国际决议问题的通告里，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而且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在其它方面，也无不适之处①。

自5月初起，中共中央主要成员及各地党的代表先后启程前往莫斯科，准备按照共产国际3月里的提议，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本解决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6月初，中国党的代表先后抵达莫斯科，人们迫不及待地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质询。从瞿秋白汇集的大量问题可以看出，人们不仅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感到困惑不解，而且对共产国际的指导颇有怨言。

比如，人们提出：列宁曾说过，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际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也明确讲中国革命必须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必须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现在否认它具有不间断的性质？究竟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中国革命才应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人们提出：中国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它们有几个阶层？各自代表什么势力并起何种作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什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还能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作斗争？人们提出：共产党人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关于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的主张，现在是否仍然有效？人们提出：革命潮流高涨和革命高潮有无区别？能不能说中国现在正经历着暂时的高涨？国际革命运动形势如何？在世界革命低落的情况下，中国革命能否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在高潮之中，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85—87页；并见《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略？只能准备全国总起义，某个地方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时，党应采取什么策略？人们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为什么大革命时共产国际总是右倾，总是不能预防国民党的反动和纠正党的错误，其代表又总是摇摆不定？为什么共产国际当时大力帮助国民党军阀武装起来，却不帮助共产党武装工农，以至国民党最后得以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弹枪杀中国工农，而共产党人却不能利用这些武器来推翻国民党军阀？如此等等①。

6月上中旬，瞿秋白等先后同布哈林和斯大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接触，斯大林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革命目前还不是高潮，只有当革命发展到已有胜利可能时，才可以说达到了高潮。

6月14—15日，在布哈林的提议下，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与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举行了政治谈话会，讨论关于当前形势的估计以及过去的经验教训问题。会上，人们仍旧意见分歧。瞿秋白公开表示，他不理解斯大林对高潮问题的解释，鉴于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也一度主张不参加议会，以为革命会迅速高涨的情况，他确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则上并无错误。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更进一步坚持说："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的，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必须肯定："革命客观上是走向高潮，是向上涨而非低落，亦非停滞"，虽可不说高潮，"但是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②。考虑到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且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准备总暴动的方针固不可说"即是直接暴动，同样也不是说既不是直接暴动，就一动也不动"，否则必使党员的意志变得消沉③。

---

①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答的问题》，1928年6月。

②③ 《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8年6月20日。

在这时，对共产国际固执己见，虽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也多半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并不是由于组织上的畏惧感，而是由于理论上及经验上的极度欠缺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不能不存在着某种迷信的心理。当共产国际领导人再度重申了自己主张之后，除了对苏共理论及其历史较为熟悉的瞿秋白还在引经据典地试图为自己的看法进行辩白以外，中共中央的其它成员已经迅速地站到了共产国际的一边。瞿秋白的辩白自然受到了包括过去他的支持者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代表的批评。在对于革命形势发展的估量上，人们显然认为布哈林的说法最完满也最科学，因为他既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尚未出现"高潮"的情况，又没有断然使用那个始终让中共中央感到有取消主义味道的让人气馁的"低落"字眼儿，而是十分巧妙地用"波谷"的现象来解释了这一切，即所谓中国革命正处于从旧的革命浪潮向新的革命浪潮过渡的中间阶段。尽管人们对于革命究竟处于谷底，还是在上涨时期，还有不同意见，但人们毕竟已意识到目前尚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前此以武装暴动作为直接行动口号，把夺取一省数省政权看成马上可以实现的斗争任务，是属于盲动主义的错误。不过，当布哈林解释暴动政策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斗争形式时，又有人得出了连"割据"观念也应取消的结论。他们以为，中央此前关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念，以及瞿秋白会上所谓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念，都是革命的阶级性所不相容的"农民割据"观念，是以农村及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进而夺取大城市的旧式农民革命形式来指导今天的中国革命，这种办法势必使革命失去城市工人的领导，并且使暴动政策失去自身的实际价值。

先有成套来自俄国的系统理论和观念，后有党的生长和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的种种差异，以及研究时间、研究资料的极度匮乏，再加上两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革命内容的极大不

同，使得必须按照俄国革命的理论和观念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在重要的历史事变关头由于难于把俄国革命的理论和观念有效地付诸于自己的实际斗争，而陷于某种困境，以至不得不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以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目标之后，人们就始终在革命的性质、阶段、形势、任务、对象、动力等等概念上纠缠不清，因为似乎一切条件都与俄国的革命有所不同，但又必须尽可能严格地却不能机械地把它们统统捏合在一起。这难免不发生种种争论和分歧，但这似乎又不能全怪中国人。因为当有人仅仅出于通俗的目的，提议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提法，直接称之为“人民”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几乎不屑一顾。布哈林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在他看来有时简直象“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意去考虑如何使俄国革命的形式转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

“苏维埃”，对共产国际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俄国特有名词，在共产国际的辞典里，它已经是一种包含着具体革命内容、标志着具体革命阶段和革命形式，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成功范例的革命模式。没有人怀疑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没有人怀疑应当以它作为一切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斗争形式和根本目标。因此，尽管布哈林十分成功地使中国共产党人理解了“不间断革命”说的左倾盲动本质，纠正了中共中央一味进攻，不考虑力量对比的“蠢汉”作法，提出了争取群众，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的任务，甚至还预见中国的以工农民主专政为特征的反资产阶级的新式民主主义革命将持续“一个整个的时期整个的阶段”，并不立即转入社会主义，因而与俄国不同。但是，他仍然还得在那个纯粹是俄国特有的模式里兜圈子。他并未真正注意到诸如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农村武装割据、工农红军等这些与俄国苏维埃革命模式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具有的特殊意

义①。他固然承认在“非常巨大”，有着许多不同省份和不同情况的中国，千百万群众不会“在一两天之间”突然起来全面暴动夺取政权，暴动可能会从一些省份开始，然后蔓延到其他省份，割据的苏区可能作为革命的中心存在，红军可能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与几个地区苏维埃存在的问题混同起来”②。他坚信，还是要靠群众暴动解决问题，“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③。可是，在苏维埃的阶级革命的观念束缚下，他甚至不知道在情况完全不同的中国，究竟应当怎样最广泛地团结和动员群众。他看不出在中国代表所提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里，包含着某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意向，反而依据俄国的经验，断然宣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无情最残酷的敌人”。他注意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极大，社会影响更甚，因而对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但在阶级观念的困扰下，他却反对公开抑制中国店员和工人以及农民中自武汉时期就充分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认为在这种情况发生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惜侵犯和剥夺小资产阶级④。

于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由中共六大所通过的决议中，固然否定了不顾力量对比和不考虑群众发动状况的一味进攻的盲动主义倾向，却仍旧继续着前此的苏维埃革命方针及其模式。党的根本任务，依旧是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革命的直接目标，依旧是力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而革命的动力，依旧“只是中国底无产阶

---

①③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②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8年6月19日。

④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级和农民"①；革命的对象，则不仅有帝国主义、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军阀，而且还有"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底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于其它小资产阶级②。

（二）世界革命万岁

1928年5月，正当中共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代表秘密前往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仅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代表团极不完整的调查，在此案中被日本军人杀害的中国军民达到3608人，南京政府之战地政委会外交部主任暨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余人，竟在交涉员公署内被剜鼻割耳后残杀致死③。此一事件，在中国再度掀起了强烈的反日浪潮，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强硬的扩张主义政策，公然声称：满洲为"我帝国之特殊地域"，前内阁"将中国之赤化视为他国国内事务"，完全错误，"当滔滔赤化之狂澜将侵及接壤地域之际，尚且将其视为隔岸之火"，"此决非忠于帝国之自卫"④。

5月28日，因南京国民党军队逼近徐州，有进入山东，并与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决战之可能，田中内阁借口山东及京

① 实际上农民也并不都是革命的动力，其"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只是"同盟者"，富农则属于"剥削者阶级"，虽暂时不必加紧反对，但仍是农村阶级斗争对象之一。见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

② 《政治决议案》中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统统看作革命对象；把"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直接列为反动派，把有雇工行为的城市店东等类小资产阶级列为可能的斗争对象，但相信贫民小资产阶级有参加反帝运动及反军阀斗争的可能，不过并未将其视为革命动力。

③ 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443—450页。

④ 转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第226页。

津地区日本侨民甚多①，公然下令出兵山东②。此举虽因南京军队在徐州战败，未酿成重大事件，但显然为济南惨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而田中内阁在此同时召开的"东方会议"所通过的《对华政策纲领》，则更是赤裸裸地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惜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并独霸中国满蒙的决心③。

1928年3—4月，田中内阁在公然压制了日本民众的对华不干涉运动之后，又对共产党人采取了严厉措施，并取缔了其各种外围群众组织，为其进一步推行专制和扩张政策创造条件。

至4月19日，因南京军队沿津浦路再度发动北伐，攻入山东，田中内阁悍然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到4月底，约3000日军抵达济南。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人立即蓄意挑起事端，在5月3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并不顾蒋介石的百般退让，耀武扬威地发出最后通牒，进而干脆攻占了济南城及胶济路沿线的各个重要地区。其兵力骤然增加到了15000人以上。

日军此举的真实目的，显然在于牵制南京军队的北伐，而并非单纯为了保护其在济南的上千侨民。但到5月18日，鉴于南京各集团军不惜躲避日军绕道北上，张作霖处于危险之中却又不愿听从日方劝告退守满洲，田中内阁遂作出了《解除中国军队武装之主义方针》的议定书，决定利用这一时机由"驻外军司令官相机行事与发挥胆识"，以便根本"解决我国关于满洲之诸问题"④。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狂妄的日本军人为所欲为，他们先是决定出

---

① 此时胶、济、京、津地区日本侨民共约24000人左右，其中胶、济两地为15854人。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下卷，第134—135页。

③ 同②，第139—140页。可以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文件还有产生于这时的所谓"田中奏折"，其中更露骨地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为狂妄计划。该文件虽或系伪件，但证之以后之事实，及当时强硬派森恪等于东方会议上即图谋拟定分裂满蒙之方针的情况，可知此件必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为，并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狂妄野心。

④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第236页。

动日本关东军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迫张下野，“建立符合帝国希望的新政权”，把满洲引向独立。在此一行动未能实现之后，则干脆炸死了张作霖。南京政府在占领北京之后，则公开宣布准备实行革命外交，于7月7日发出重订条约之宣言，声称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已届期满者，当即废除”，“尚未期满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①。

自实行暴动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工作几告停顿。这不仅由于共产党人全力以赴地从事于暴动夺权的各项工作，而且还由于其一方面处于地下状态，一方面又不能不坚决拒绝同公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帝团体进行合作。济南惨案的发生以及群众性反日运动的兴起，促使留守的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此前工作的某些欠缺。他们决心不顾有“回复旧的联合战线面蒙蔽阶级意识”的嫌疑，参加到“小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中去，但同时又要求把反帝运动“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担心不如此“简直是替我们的敌人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摇旗呐喊”②。可是，他们所起草的“有国民党无反日运动，有反日运动无国民党”的“告民众书”，虽印了5000份，却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通告，承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领导了”，共产党完全“没有能够领导”，遂决心改变前此策略，“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以便“运用城市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众，也就是取得公开的地位以便到群众中去活动”，同时用“检查日货焚烧日货阻运日货……等类激烈的动作，以惹起许多小的冲突”，使国民党暴露其妥协投降立场，同时以此来复兴自己的城市工作③。这一策略迅速发生了效力，“五卅”、“六三”两天，在中共参

①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456页。

②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1928年5月9日。

③ 《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1928年5月18日。

加的反日大同盟以及工人反日后援会等组织鼓动下，上海有上千群众举行了示威活动，相当一批工人进行了反日罢工，群众反日斗争开始突破国民党的限制。但这还仅仅是在上海。

策略手法上的成功，促使留守中央进一步重视日常的口号和斗争。

这时，留守中央估计，日本制造济南惨案，是开始以武力占领山东、满蒙、华北及全中国的最初步骤，并且“是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因为日本的侵略将严重危害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由此必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①。他们不知道，美国及法国此时正在倡议各国签订一项非战公约，共同致力于制止好战者如日本等，发动侵略战争。因此，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共产党人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反对日本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②，另一方面则试图加紧鼓动群众倾向革命，以便在战争到来之际，能“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③。

留守中央这时提出的进一步的策略主张，是“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为此，他们提议向群众提出“要求公开外交”、“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民众政权”、“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收回山东满洲的主权”等斗争口号，并“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④。当然，他们特别说明，这只是一种斗争手段，“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⑤。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实际上已经多少意识到，在城市工作中，尤其是对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不能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至少应该有个过渡，以适应

①③ 超麟：《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月15日。

② 《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同上。

④⑤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1928年6月21日。

民众的心理，迂回地前进。

然而，留守中央的这一方针立即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主席团及国际东方部于8月上旬致电留守中央，批评要求恢复民主运动及国民会议、民主政权等口号有使民众对国民党产生幻想之嫌。瞿秋白则干脆把留守中央的这种作法称之为"机会主义重新抬头"，即"新的右倾"，说提出这些口号就"意味着否定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①。由此一来，9月初回国开始工作的新的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重新回到彻底革命的立场上，连策略手法也不要了，因为那是"迁就落后群众的"。在新的中央看来，要真正把群众从国民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就必须坚决地提出最鲜明而且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战斗口号，丝毫也不要拐弯抹角，"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尤不应反日不反其它帝国主义和假反帝的国民党及各种改良主义派别，"而竟跟着资产阶级于不知不觉中做了美帝国主义在华发展的工具"，"使革命的反帝运动变成了反革命的作用。"②

此时中国大陆虽已在国民党旗帜下表面上实行统一，东北奉系军队也在张学良率领下决心易帜服从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其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整个局势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战争随时都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对于这种局面，中共中央自然极为重视，并且视之为革命高潮必然要迅速到来和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必然无法稳固其统治的一种证明。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在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通告里，帝国主义同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各派之间的利害关系得到了突出的强调。他们明确认为，中国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3—384页。

② 《中央通告第三号》，1928年9月18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

问题的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争夺。特别是英美日三大国之间的争夺，已经达到"只能靠战争来解决"的程度。就世界范围而言，英美矛盾已成为"全世界冲突的中心"，而就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而言，则日美冲突已"表现出他是太平洋未来大战的根源"和"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中矛盾的中心"。考虑到日本的急剧扩张企图，英美不得不暗助中国资产阶级掀起反日运动，而担心美国利用中国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财政资本垄断中国，英国又不能不与日本相勾结，共同扶助中国南北之买办豪绅地主阶级"共同对美"。因此他们认为，"桂系军阀买办豪绅西山会议派"，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怀抱中"；而奉系张学良以及冯玉祥、阎锡山两军阀，则在日本帝国主义"挟制"之中；中国资产阶级蒋系军阀的背后，则是美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这时相信国民党各派战争之所以暂时还未爆发，只是因为英美日帝国主义还处于相持的局面，一旦这一相持局面被打破，则不仅国民党各派要爆发战争，帝国主义也"终必出于武力之一途"，"靠着战争来解决问题"。而战争则是"一个发展革命最好的环境"①。

把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由于争斗和内讧而引起的一切战争，统统看成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证明和暴动夺权的关键时机，这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确信不移的一种观念。在这时，即192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则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大会通过的文件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严重危机"的"第一时期"、"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开始进入"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的"第三时期"，这个时期必然是充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

① 《中央通告第20号》，1928年11月30日。

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从而成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成为“把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①。因此，共产国际“六大”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即党应该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准备并实行武装起义，以之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及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手段”②。当然，共产国际并没有马上改变前此对中国形势的估计，他们依旧强调了“积蓄群众力量”的问题③。中共中央也相信：“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夺取千万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中国无产阶级不能强健起他的革命领导，工农兵士群众不能在无产阶级很正确的政策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则中国统治各阶级的混战，帝国主义争中国的大战，便是爆发，也不会于中国革命有多大助益”④。但是，究竟怎样夺取群众，怎样强健领导，又怎样才能实行正确的政策呢？

自1927年以后，尽管国共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及军阀内部争吵不休，但国家至少已在形式上开始统一于国民党政府之下，使辛亥革命以来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的社会各阶层群众迅速对国家的和平和统一寄予了强烈的期望，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群众中的革命情绪，使力图通过和平改良与合法斗争来实现国家政治稳定和民族经济复兴的主张日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以及大批知识分子中，占了上风。而1928年，“民族资本的状况，的确比较一九二七年是进步了些”，外交如关税等，也“相

---

① 《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纲领》，1928年9月1日，见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②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1928年9月1日，见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731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73页。

④ 《中共中央通告第20号》，1928年11月30日。

当的改善了”，这连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①。他们甚至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一天天地“突飞的进展”着，民族资本1929年的推进势头势必比1928年还要明显得多。其不可避免地“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其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能调协的”，故“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同时要引起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②。这种情况自然赢得了大批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使之“在广大群众中都发生了相当的影响”③．而共产党人迅速引导和组织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努力却受到明显的挫折。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美帝国主义不但要求中国，而且要求世界和平”，以便通过它的经济势力“垄断世界”，因此在中国，它必然要支持中国资产阶级“统一中国”，摧毁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和影响进一步发展的担心，显然更加强烈。

一方面，世界上“战争与革命的时期”随时可能降临，另一方面，形势发展似乎正在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辟道路，这种形势对于一心指望以武装暴动取胜的共产党人来说，当然是极端危险的。为此，他们不能不发出通告，把这种“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则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派别，宣布“为我们目前争夺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④。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并且发表文章告诉人们：“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以及欧战以来“一贯”“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的“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尤其是他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的扩大，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而“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⑤。当

---

① 《中央通告第30号》，1929年2月8日；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

②③④ 《中央通告第30号》，1929年2月8日。

⑤ 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年3月1日。

然，此时群众中和平改良情绪的增长，也使中共中央深感革命主观力量的薄弱，因而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形势的估计颇不乐观，以至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重新演化为一轮新的内战之初，不仅没有发出进攻的讯号，而且还明白告诫全党："军阀战争的本身，并不就是革命的高潮"，"他只是造成革命高潮的客观上可能条件（统治阶级的破裂与工农的痛苦加深）之一"。"革命高潮是要依靠着群众的组织力量，觉悟力量与斗争的勇气，尤其是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力量"。"群众自己没有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即使发生战争……对于革命运动仍然失却了客观上帮助的意义，反而更增加民众的痛苦与压迫"①。

但是，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进而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和平和统一的目的，出于稳定和发展民族经济以壮大自身力量的目的，绝不会扩大内战的规模，"乃是企图尽量将战争的范围缩小"，而帝国主义也"还不愿直接冲突"，美国更是站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边，因而"最近或许还不会发生普及全国的军阀战争"②，这不仅意味着革命高潮暂时还没到来的可能，而且可能使相当一部分革命者逐渐对革命的前途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认识，既然"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那么当然"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②。尽管这样看问题的人还只是极少数，但过多地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国家统一、和平改良、经济发展的重视和作用，过多地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政策的区别，客观上势必要导致出类似的结果。

---

① 《中央通告第33号》，1929年3月15日。

② 《中央通告第34号》，1929年4月10日。

对于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及其最终前途，共产党人之间在看法上当然没有多少分歧。但是，对于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甚或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时间及其意义的估计，人们之间却互有区别。斯大林、布哈林是完全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可能性的。布哈林声称中国民族经济是破坏的，不能稳定的，斯大林则更是断言没有哪一派能够统一中国，因而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发展，帝国主义必然瓜分中国。但共产国际中也有人注意到了中国所出现的新情况，他们主张重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并且相信短时期内不存在出现革命高潮的必要条件。同样，中共中央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人强调中国殖民地化的危险性，而有人则认为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走普鲁士道路的可能性，更多的人则面对现实，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中，但他们强调说："这个进步是培养革命势力的发展的"。然而，不论怎样强调革命的必然性，承认资本主义有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的倾向存在，对于一个急于立即鼓动并领导群众进行彻底革命的党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危险。

1929年2月8日，在反复讨论和统一认识之后，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该信至3月下旬才送交到中共中央①。信中明确提出了反对那种"以为在中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健全'底纪元，已经开辟政治经济和平发展底道路"的右倾危险的任务。并且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基本问题，并且也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一切关于中国有基玛尔式的发展之可能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空谈。"它们充其量只是"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来遮盖着它对于帝国主义

① 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称此信"于四月才收到"，但实际上中央政治局3月26日已开会讨论，因此收到时间应为3月下旬。

的忠诚孝顺，替帝国主义开辟道路，来使中国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缚”①。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各派军阀也好，他们统统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斗争的现成工具”，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统一中国和打击豪绅地主买办阶级方面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转入反革命的营垒，投降在帝国主义面前”，它“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了”，“再也不能而且不愿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了。同样，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是一样的，它们都是要加紧“对中国的殖民制度的束缚”，所区别的只是侵略方法罢了。因此，无论国民党的中央政权还是其它军阀势力，要想真正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统一中国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是和土地革命及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联系着，分割不开的”三大革命任务，“只有革命高潮中涌出来的工农专政政府”，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②。

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并没有背离中共六大及共产国际“六大”就中国当前形势所规定的策略路线。如果说这条策略路线的核心就在于肯定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和强调目前革命并不存在高潮的话，那么，来信丝毫不比“六大”更激进。它甚至声称:“新高潮底成熟，至今还是进行很慢的”，“在理论上不能否认直接革命形势（有）延缓多年的可能”③。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来信是旨在扼杀中共中央内部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接近实际，但又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尤为严重的是，它或多或少地与托洛茨基等苏共中央反对派的观点近似。因为过分注重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可能性，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或者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势必会导致出与托洛茨基一样的结论。即相信中国目前绝无革命形势，

①②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1929年2月8日。

③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1929年2月8日。

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必然逐渐趋于稳定，经济生产也必然日趋复兴，若“没有意外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①。因此，共产党人应当模仿俄国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革命形势降临之际，象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直接把革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1929年，托洛茨基的观点通过回国的留苏学生，已经对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托派小组织迅速产生，甚至前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及政治局委员彭述之等，也迅速接受并转到托洛茨基的观点上去。7月中旬，陈独秀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国际来信指示的精神，并批评中共中央接受国际训令的通告“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至8月5日，他则系统提出了类似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宣称中共中央有一条“系统的在政治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其关键就在于，中共中央至今“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不知道大革命失败后，“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帝国主义施以“让步与帮助”，而且封建残余也“受了最后打击”，“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因此当前国民党内部之军事的政治的冲突，“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决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战争。不论他们之间“哪个是纯资产阶级的，哪个是带封建性的”，都毫无进步性可言，“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②。

---

①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第224—225页。

②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

对于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直到6月中旬左右才开始发现。这时，已有十几名党员组成“中国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小组织，秘密出版了4期《我们的话》，专门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的文章和著作。他们多半确信，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民主革命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了，进而宣传改组中央以改变党的整个路线。陈独秀这时并不完全赞同反对派主张，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强调党内不同意见应以民主的方式在党报公开讨论，“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①。但这无疑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成员已被苏共中央开除出党②。托洛茨基并于1928年1月17日被强行逮捕押送到阿拉木图进行政治流放。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正式通过决议，斥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为“孟什维克反革命”，“号召其他各国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反对在它们队伍中建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任何企图”③。到1929年1月，托洛茨基干脆被宣布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的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以至“准备武装暴动”，“颠覆苏维埃政权”，被驱逐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去了④。在这种情况下，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态度问题，乃至在思想倾向上同托洛茨基主张的任何一种接近，都不能不被共产党人看成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当然不存在任何商讨的余地。192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明确决定要“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任何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任何同志“有反对

---

①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19—420页。

③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38页。

④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1930年英文版，第562页。

派的思想宣传”及“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均须“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否则“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①。

其实，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种强硬态度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开始试图禁止任何独立见解。从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文件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前此关于当前国民党内部冲突具有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阶级性质，以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与英日帝国主义有不同策略，它必然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认识②。为此，他们甚至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但他们无疑是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足以证明其忠诚的重要机会。

1929年春，国民党政府开始有预谋的打击苏联在中国东北三省特别是北满地区的势力，试图利用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于是，5月27日，张学良的军队对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在强行搜查后宣布已逮捕了数十名正在密谋鼓动满洲革命的苏联侨民，起获了各种犯罪文件③。6月初，他们又逮捕了苏联领事馆的官员和中东铁路的苏联董事④。7年10日，他们更进一步全面夺取了中东路的电报、电话系统，封闭了苏联的各种经营管理机关，逮捕了200余名苏方铁路员工，强行接管了铁路⑤。同时，把苏联方面的铁路局长及副局长等驱逐出境⑥。这一事件，引起了中苏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激烈冲突。

战乱尚未停止，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政府，敢于公然向苏

---

① 《中共通告第四十号》，1929年8月13日。

②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

③④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第726页。

⑤⑥ 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下），第718页，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二），第208—211、213—214页。

联挑衅，这只能被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看成是其背后的帝国主义挑唆的结果。

7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向中共中央代表通报了事件发生情况，明确认为这是整个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的一部分，它不仅直接损害海参崴的战略地位，影响外蒙古的安定，而且威胁了苏联远东的安全。尽管由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内部瓜分苏联的计划尚未商妥，使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还面临严重困难，但战争的爆发"是决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天天地迫近"。为此，他要求中国党根据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和当前局势，立即开展"拥护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宣传，特别要在"八一"反帝日掀起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大示威。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8月1日，当成共产国际动员群众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检阅自己力量的示威日，这是共产国际"六大"以后才决定的。而在苏联利益遭受威胁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立场，"六大"已有明文规定。这就是，对苏联构成战争威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毫不犹豫地"促使本国政府在这一战争中失败"，"不要让资产阶级以叛国罪名把自己吓唬住"，因为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祖国①。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

7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全面动员，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组织"八一"示威。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否定了李立三提出的命令朱毛红军占领一重要城市，举行大示威发宣言的建议，但人们仍旧决定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并在一系列通告、宣言、告同志书中，公开号召"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②。甚至断言：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之日，就是

①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54—58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1929年7月27日。

世界革命爆发之时，它必然“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①。

还在7月15日，中共中央就在上海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并由罗登贤、李立三、李维汉三人组成了主席团。22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联合反帝、青年反帝及东方反帝三个同盟共30多个进步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召开了代表会议，力图通过它来领导“八一”大示威，并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同时决定26日先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下进行一次大演习。但26日，中共中央总行委只组织了数百人的游行，而国民党29日却组织了上万人的反苏大会。到8月1日，有组织的群众总共也不过1000—2000人，由于没有集中行动，各区受影响围观集会者虽有万人，但亦未形成大的声势．罢工的发动则完全失败。

对于中共中央的行动，共产国际是比较满意的，但中共党内却明显地存在不同意见。陈独秀首先于7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率直地批评中共中央“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了解国民党在“拥护中国”、“拥护民族利益”的口号下宣传收回中东路问题，“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要真正争取群众，宣传口号上必须讲求策略②。当中共中央指责陈的主张是“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试图“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③之后，陈独秀更愤然责备中共中央“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完全不懂得对于阶级斗争中“夹杂的民族问题”，必须“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

① 《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1929年7月24日。

② 《陈独秀1929年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③ 《中央复陈独秀的信》，1929年8月3日。

意”，盲目以为“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以至“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把群众发动不起来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客观，这仍旧“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即“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①。

不论陈独秀此时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是否正确，显然已经毫无意义了。其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要观点，提出了中央的路线问题，从而把自己摆到了中共党内的反对派一边，被中共中央看成是“以托落斯基主义来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完全离开中共六次大会以至国际的路线，并以许多挑拨的言辞来制造党内的纠纷”。甚至怀疑陈独秀已有小组织的活动和分裂党的阴谋。

9月底，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约见陈独秀，指出陈独秀作为党员应当遵守六大决议，只有在革命失败后、大会召开前，或中央违反了阶级利益时，才能讨论原则问题，同时严厉批评了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远东局并召开会议，建议中共中央就陈独秀的来信形成决议，连同来信下发支部讨论，告诫陈停止小组织活动，并强行分配其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接受此一建议。但半月后，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关于反右倾反调和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已无可救药，不应进一步迁就调和，遂于20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紧接着，江苏省委于21日首先通过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决议②。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批准江苏省委决定，并公开宣布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③。在发给下级支部的有关文件中，中共中央严厉谴责陈独秀关于中东路及政治问题的信件“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

---

① 《陈独秀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② 《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红旗》，第52期，1929年10月21日。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

骨的表现”和“一小撮托洛茨基反对派立场的大暴露”①。

中东路问题，自中苏双方于7月底开始军事接触，到11月底满洲里、海拉尔等重镇失陷，张学良的东北军上万人被歼，国民党政府的挑衅已彻底失败，被迫开始求和，主动表示愿意遵守中苏1924年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并就此开始谈判，但中共中央却更进一步推进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和行动，声称“最近几月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所以武装保卫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它与党之争取群众反对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已成为不可分离的路线，而且更加重了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②。“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才看不出现在新的革命浪潮“要更快的成熟为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③。因此，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④。而“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⑤。

中共中央这种形势估计和策略方针，无疑与此前有了重要的不同。而这明显地不是客观形势变化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决议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精神影响的结果。

严格地说，十次全会并没有对整个形势的发展作出较前此更

---

① 《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② 《中央通告第60号》，1929年12月8日。
③⑤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
④ 《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12月10日。

为脱离实际的分析，特别是在对中国革命形势及策略任务的估计上，它仍旧在继续中共六大及国际“六大”的认识，共产国际领导人莫洛托夫和米夫都断然认为：“目前谈论在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问题，还为时过早”①。但是，解除曾经帮助并主持了中共六大各项主要工作的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职务，并指斥他为“共产国际内部的一切右派分子的重心”②，进而要求各国党坚决反对一切“右倾观点”、“取消派分子”、“调和派分子”，以至宣传“目前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各国共产党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发展速度的危险（尾巴主义）”③，对于唯恐走上右倾保守道路的中共中央，很难不发生消极影响。陈独秀从分配工作到开除出党，就已经反映出这种情况。

中共中央担心被指责为右倾，而极力向左，是有重要原因的。1928年底至1929年初，中共中央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矛盾的看法，和对美帝国主义作用及政策的看法，无疑是和共产国际不同的。共产国际2月8日来信，实际上正是对这种倾向的一种委婉的批评。同样，六大之后，根据六大关于“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主张，中共中央曾着重强调富农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的情况，决定“吸引富农到革命战线之内来”④。当共产国际断言中国富农多半“都是小地主”，批评中共中央在富农政策上犯了错误⑤之后，他们甚至一度还没有根本转变态度⑥。与此同时，在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始终认为“要以赤色工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42、51页。

②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92页。

③ 同上，第157—158、160页。

④ 《中央通告第28号》，1929年2月3日。

⑤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

⑥ 在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就富农问题与远东局代表的谈话中，他们明确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走得太远了，反对富农而不顾其中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愿意参加革命与否，“是要发生毛病的”。

会在黄色工会中起党团作用则是不可能的”，“黄色工会是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不好再有秘密工会的组织”，而且对黄色工会只应当全力去夺取，而不应当另立工会，以至造成工人群众的分裂、对立，或出现统一战线问题。这种态度同样遭到共产国际的激烈批评①，从而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在客观上“取消赤色工会组织发展”的“不可否认的错误”②。不难想象，这些接二连三的批评同十次全会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的强硬决议结合在一起，可能造成怎样一种心理压力。

不过，直接推动中共中央向左转的，还并不是这些情况。

1929年12月初，远东局就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十次全会决议问题通过了一个决议，并将该决议的副本送交给中共中央。该决议除谈到远东局对全会决议的态度外，还特别指出中共中央在三个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即富农问题、赤色工会问题，和同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关系问题③。在9个月之久共同工作④中，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固然在一些问题上发生过争论和分歧，但远东局从未正式指出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如今远东局竟在共产国际执委十次全会突出强调反右倾反调和倾向的时刻，向共产国际指控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强烈不满。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远东局决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远东局避开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反右倾的正确立场和工作方针不谈，抓住个别道听途说或早已纠正，并且有历史

---

①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35—38、59—60、6—67、70—74页；《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1929年8月。

② 《中央通告第62号》，1929年12月14日。

③ 由于俞作柏、李明瑞等与蒋介石等存在尖锐矛盾，并同情共产党，中共广西特委曾试图与其结盟，李立三甚至曾经考虑吸收俞作柏入党，但由于共产国际视俞作柏为国民党改组派左翼，故对此表示反对，后中共中央改变态度，要求广西特委反对改组派及俞作柏，广西党代会亦就此通过了决议。

④ 远东局受命作为代表团来中国上海帮助工作，是1929年2月底。

原因的枝节问题夸大其词，上告国际，不仅徒增纠纷，而且可能严重损害中共中央的威信和工作，便利取消派的攻击。他们明确要求远东局立即修改决议，否则，中共中央有必要派人到共产国际去进行争论，人们甚至认为：恰恰是远东局有一条“一贯的右倾路线”。因为他们曾经不同意说中国党内目前最严重的是右倾危险；曾经试图取消游击战争；曾经认为英美有相互勾结以稳定南京政府的可能；曾经怀疑陈独秀是否有变为反对派的危险，甚至决议中最后还对陈独秀能否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问题抱有幻想。

12月10日—17日，双方接连召开了三次联席会议，围绕着相互之间的指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相反，双方关系中的一些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了。远东局代表奥斯丁颇有些傲慢地教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代表应当“规矩一点儿”，罗伯特则断言中共中央只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才“进行了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在其它问题上“是很糊涂的”。这意味着远东局不仅不打算修改自己的决议，而且根本上就看不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然而，由于共产国际规定远东局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帮助工作和代表国际具体指导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颇不客气，一再指责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路线”，并扬言要“坚决的与之斗争到底”。

12月3日，张学良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派代表在双城子与苏联签订了和平草约。22日，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代表与苏联代表在伯力签订了有关中东路等问题的议定书，全部接受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基本恢复了中东铁路原来的情形。至此，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中苏冲突告一段落。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反苏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的估计也不能不随之改变。可是，由此而来的对于国内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加速罢工、兵变、暴动等工作的布置，却由于对十次全会决议反右倾精神的理解，和远东局

的指责，而无法改变了。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来信，承认自己对反苏战争的爆发的估计过于简单，没有能象国际一样意识到："反苏联的冒险行为使一切矛盾尖锐化，结果就使全部局势复杂化"①。但与此同时，来信中关于现时"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的认识，也使中共中央敢于确信自己从12月上旬以后加紧暴动的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由此也"证明远东局的错误"，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总的路线和总的部署，实际上是同意的，并没有丝毫的否定和批评。

不过，严格地说，共产国际这次来信还不能看作是大幅度政治升温的标志。事实上，来信所强调的依然还是"准备群众"的方针。与前不同的只是，它注意到中国党在"五卅"、"八一"等斗争日里，已经能够发动成千的工人群众进行"革命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了，从而相信工人运动开始"复兴"，革命高潮的发展有了"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可以把"准备群众"的方针向前推进一步了。但共产国际仍旧特别告诫说："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依然落后于不断增长的群众的不满情绪、积聚的革命热情和自发的运动"，"党没有解决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的任务"，"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这不能不成为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危险"②。考虑到共产国际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这种警告是很值得注意的。

1929年底至1930年初的中国工人运动，特别是上海工人运

①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

②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

动，的确处于复兴状态。工人斗争十分踊跃，罢工怠工此起彼伏，斗争内容及形式也多种多样，共产党人在上海已能够深入到各个主要工厂中，并分别组织起大约2000人的赤色工会会员或纠察队队员，发动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但是，其它城市或工矿企业，几乎就没有赤色工会的组织。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现在的赤色工会薄弱到极点”，人数最多的赤色工会也不过百人左右，中共领导的上海电车工会总共只有30多人，最少的只有几个人，而国民党领导的各种“黄色工会”却有大批群众。因此，在1929年底讨论国际来信时，他们不能不明白承认：“赤色工会数量的微弱，黄色工会的影响还大”，“目前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发展”的事实①。而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同志对来信中的形势估计发生误解，他们特别决定将原信中“高潮”一词译为“浪潮”，使不发生过分的估计。

然而，中共中央在形势的估计和工作的部署上，毕竟已经走得太远了。在他们的认识当中，客观的革命形势实际上已经接近成熟了，关键仅仅在于主观力量还准备不足。但是，一旦革命高潮迅速到来，难道可以等待主观力量成熟而听任直接革命的形势从眼前白白溜掉吗？

1930年2月，蒋冯阎中原大战逐渐揭开帷幕，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以及桂系李宗仁、粤军张发奎等，公开与冯玉祥、阎锡山携手，密谋讨蒋。一场大规模的混战已迫在眉睫。

战争，历来是共产党人借以判断革命形势成熟与否和加剧革命步骤，乃至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在误以为革命形势已接近成熟的条件下，国民党自身大混战的爆发，自然要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于形势作出更加激进的判断。

2月1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颇为偏激的政治报告，开始把问题引向极端。他声称：“现在全国大混战又

---

① 参见《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1930年1月11日。

要爆发了”，它必较前此之内战更大更持久，从而使得经济破产，群众痛苦不堪，以至“现在某一时期某一问题上都有可能爆发革命高潮”。他认为：“在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无直接革命形势，然而它的到来并非很远。”因为各方面革命势力已“发展平衡”，不仅“工农兵平衡发展，在全国区域上，亦是比较平衡发展”。因此，必须准备“组织全国总的暴动”。而目前，鉴于湖北可能成为混战之地，“武汉的经济恐慌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其四周苏区红军“特别发展”，故湖北为中心的暴动方针“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同时，在顺直、广东、江苏积极准备发动，以江苏为“主要领导力量”，以湖南、江西、山东、满洲及广西为相应之配合①。

李立三的报告，显然得到了中共中央其它领导人的全面赞同。人们一致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到了崩溃的剧烈程度”，而全党却陷于右倾，其实，“在军阀战争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因此，会议提出了“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的“四大口号”，以此作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决心“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并以湖北暴动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②。由此，暴动的各项实际准备和发动的工作迅速开始进行。

3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推进，同时又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以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开始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李立三明确认为：中国的红军与苏联的不同，它不是为保卫政权而产生，而是为夺取政权而产生的，“是工农革命的军队”。红军一旦能打下武汉，并不一定非要机械地等待武汉工人的总同

---

① 《柏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30年2月17日。

② 参见《中央通告第17号》，1930年2月26日。

盟罢工。但目前红军的力量还不够，工人的力量也不够，因此，必须把各种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才能真正夺取中心城市。而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推进，则必然会促使城市工人起来进行广泛的斗争。

对于力量对比的估计，是这时人们普遍关切的一个问题。考虑到各中心城市，特别是象武汉这样的中心城市，党所领导的工人力量还十分弱小，包括李立三等在内，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深知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党所规定的暴动夺权任务还不相适应。因此，共产党人内部对于形势和任务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怀疑在主观力量如此弱小的情况下，革命高潮会有很快到来的可能性，他们主张对革命高潮的判断不应仅仅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还必须联系于主观力量的情况。另外一些人则怀疑由于城市工人力量弱小，革命不能决定于工人暴动及总同盟罢工，将会导致过分突出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的力量，从而使革命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李立三与中共中央则一致认为，革命条件的成熟与革命高潮的到来，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条件，而主要取决于客观条件。“在当前存在着白色恐怖和迫害的条件下，把几十万名工人组织到红色工会中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决不能幻想“把组织政治总罢工的任务推迟到几十万或几百万工人加入了我们的组织的时候”才进行。实际上，“在五卅运动时，我们只有一个大约三四千名会员的群众性组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只是依靠一些政治口号发动起来的”，一切取决于客观形势。何况，党的工人党员已增加到25%，红军的力量已达到5万人，而9个省区都已建立了革命政权，加上各国因经济形势恶化，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帝国主义的灭亡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正在加速到来，立即以加倍的努力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①

3月5日，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

① 李立三：《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1930年4月。

及巡捕发生冲突，以至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迅速激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普遍愤怒。在中共组织下，3月8日，近2000工人和学生涌上南京路，并引起上万群众的响应，10余辆电车被砸，群众和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冲突①。紧接着，南京和记蛋厂因资本家雇用流氓打伤工人，又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不满②。4月5日，因资本家请日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③。上海部分工人学生也迅速起而予以响应，四处讲演、集会，开展抗议斗争。这种情况不能不进一步使中共中央感受到革命情绪的强烈冲击。有人提出：现在形势下再说革命形势正在复兴已经不够了，"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但是，能不能有"几万人上街"的情况呢？李立三对此并不抱多大幻想。他指出："现在离高潮不远了，但不是说今天就是革命高潮"，目前的关键是要跟上形势发展，采取新的策略。

4月7日，李立三正式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系列设想。首先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他确信：（1）没有一省数省在革命高潮之中，而其它省份不在革命高潮中的情况，革命高潮是在全国平衡发展的；（2）各省统治的情形程度虽不同，其日趋崩溃则为共同的前途；（3）一省数省的胜利，必然引起全国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反扑，造成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存在一省数省革命政权单独存在的可能。其次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李立三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由于其统治相对薄弱，其内部矛盾又极端尖锐，中国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但由于中国革命的任何胜利，都会带来国内的残酷战争，而这种战争又必然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从而势必引起全世界阶级战争，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殖民地革命的大爆发。因此，中

---

①②③ 《申报》1930年3月6日，9日，10日；4月5日，6日。

国革命乃至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就是世界革命的开始。而中国革命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取决于世界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再次是革命的转变问题。李立三相信，目前阶级关系的转变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只是由于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目前阶段的革命性质还不能改变。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为了保证稳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也还不能立即宣布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和宣布社会主义政纲。但由于革命政权建立以后，阶级战争必然愈加残酷，需要建立最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势也必然要求没收一切中外资本家的财产，因此，“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任何间隔，革命的转变必然是很快的。最后是政权形式问题。李立三认为，中国与俄国不同，革命将首先从一省数省开始，同时也没有苏维埃的组织，因此，中国革命还不能马上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而必须首先建立公开领导暴动的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在胜利后充当临时政权机关。苏维埃只能成立于革命委员会的使命完成之后，作为正式的政权机关而出现①。

可是，尽管李立三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乃至与世界革命关系的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他这时却并不是在“左”倾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在湖北省党代会上，他明确批评了那种以为现在就是革命高潮，应该马上组织暴动的观点。在给杭州市委的信中，他同样批评了杭州济难会机械地理解中央关于坚决“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要求，反对提出“半个月内围攻杭州”的盲动计划②。同时，他几次提出防止“左”倾危险的问题，甚至认为中央内部有些领导人的思想有时会发生“左”倾的危险，“这是一个很应注意的问题”。他甚至在4月下旬又开始重提城乡革命势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告诫人们注意在工人群众还没有掀起具

---

① 参见：《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中共湖北省代表会议政治决议案》，1930年4月。

② 见《中央给杭州市委的信》，1930年5月16日。

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大罢工的情况下，目前暴动夺权的口号还仍旧在宣传准备阶段，还不到行动的时期。

李立三对形势的估量，明显地基于两点：第一，“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而斩断其头脑，炸裂其心腹，主要是靠城市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①。第二，“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暴动形势的到来”，也就是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因此，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二者不应分开。一旦高潮出现，准备暴动的口号自然必须立即转变为行动口号。而从这两点出发，李立三明确认为，由于工人的政治斗争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在上海80万工人中工人党员只有700余人，赤色工会会员仍不过2000人左右，远不足以担负伟大的历史任务②，因此，还不能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自然也不能认为马上就可以在武汉、上海等中心城市部署暴动工作了。

不过，5月以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工人斗争的形势确实十分突出。电汽车工人罢工坚持三周，取得了胜利。5月1日，25日，30日，共产党人接连三次成功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斗争，每次均有上千以至数千工人参加。而党员一个月内即增加约240人，仅产业支部即增加了17个。这种斗争局势不能不进一步加剧了中共中央内部的“左”倾倾向。

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就其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说明。他特别强调了“目前形势的估量问题”。他提出：由于统治阶级动摇崩溃，他们不得不放弃乡村，积全力来保守城市，以至造成城乡革命势力发展的不平衡，“乡村已经是革命高潮了”，但“城市还未到革命高潮的时候”。在

① 柏山，《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红旗》，第88期，1930年3月29日。

② 《中央关于发展工人党员问题致上海总行委的信》，1930年5月7日。

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①。

然而，李立三的这种认识立即在中共中央引起了争论。说城乡革命势力的发展依旧不平衡，甚至承认农村斗争已经是革命高潮，城市工人斗争尚不在高潮之中，这不能不使重视形式的其它一些领导人发生怀疑。全面的暴动准备和部署，都是根据革命势力发展已基本平衡的估计来的，否认平衡，岂不是等于说整个策略都错了？承认农村斗争的发展远远超过城市斗争的发展，工人运动还落后于农民运动，岂不是说农村领导城市，农民运动领导了工人运动？或者城市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斗争？对于长时间工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说，多数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有深刻印象，他们不能不怀疑李立三关于必须以城市工人掀起广大的政治罢工为革命高潮之标志的意见，是否太机械了？他们认为，革命高潮是工农兵斗争全面发展和高涨的一种综合表现，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承认不平衡，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客观上已经可以看见革命高潮了。他们甚至提出，着重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置，也是不妥当的了。因为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中心省份，都存在着争取首先胜利的种种可能，因此必须向各地作平行的布置，以避免消极的等待。

6月11日，中共中央内部在主要观点上显然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在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里，人们明确表示同意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以及革命转变的观点②。与此同时，会议显然同意使用农村斗争“已经进到极广泛的高潮”，而“城市和乡村发展尚未平衡”的提法，承认工人斗争、农民暴动、士兵暴动与红军的发展，都“还表现着不够”，进而承认就全国范围而言，今天还不是革命高潮，暴

① 《伯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内容的报告》，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

动夺权还不是行动口号。但是，会议同时认为，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只是“表面的形势”，目前“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它必然是统治阶级无力镇压革命斗争，无法进行统治的时候，因而必然是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了①。在这种情况下，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自然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因此，不仅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要争取首先胜利，“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②。

6月11日决议显而易见是符合李立三思想发展的轨迹的。所不同的只是，自4月以来，李在同各地来人的接触中，对各方面的形势发展有些深入的了解，在形势估量上多少有些慎重，但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在形势认识上却明显地在升温，以至使决议本身变得有些自相矛盾。这种矛盾立即被远东局注意到了。

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11日决议精神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称：“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③。可是，让远东局代表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正是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相联系着的吗？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根据地，实际上不是否定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吗？

紧接着，远东局在6月11日决议中进一步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事实上，决议关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以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的观点，是明显与前此共产国际的看法有区别的。据此，远东局不仅扣发了中共中央的电报，而且明确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停发11日决议。并坚持认为，在这种重大方针及策略原则问

---

①② 《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1930年6月11日。

③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1930年6月12日。

题上，必须有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为依据，随便成立这一决议，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将十分严重。

远东局对中共中央决定的断然干预，不能不再度引发了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之间的对立情绪。人们再度对远东局无原则的吹毛求疵感到强烈不满。李立三当场表示，中共中央不但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目前形势间不容发，决议完全为适应形势及工作要求而提出，这并非违反组织原则。作为一种妥协，李同意先将远东局意见交政治局讨论。但讨论结果，中共中央仍旧决定下发这一决议。

6月20日，远东局致函中共中央，再度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停发6月11日决议，信中明确批评决议忽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夸大全国革命形势，盲目主张“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和立即夺取全国胜利的观点。对此，中共中央于22日复函强硬地表示：“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不能接受远东局停止发出的提议。”并针对远东局的批评明确认为：“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党的任务决不是准备夺取部分的政权，如果认为现在还是准备夺取部分的政权，无疑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在信中还对远东局德国代表罗伯特提出指控，称其“有一贯的右倾路线”，“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要求远东局代为致电共产国际，“立即停止他在远东局的工作”①。

罗伯特是远东局负责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和具体指导的主要代表，他曾参加了1929年12月远东局同中共中央的初次争执，这次又是罗伯特首先提出反对意见，挑起争论，自然成为中共中央指斥的对象。但是，6月底，共产国际复电否绝了中共中央的指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忠发致远东局信》，1930年6月22日。

控，这预示着中共中央在这场争论中势将陷于困境。

7月，中共中央全国组织会议的统计资料表明，党员的数量从2月的71119人已增加到193422人，净增12万余人①。尽管产业工人仅占党员总数1.2%，但也增加了一倍左右。赤色工会会员从无到有，已有60000人的规模，其中中心城市已达到大约20000人。在上海，共产党人已经在总共130多个工厂中的30多个工厂中取得了重要影响。在不足5个月里，党的力量成倍的增长，自然使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量仍旧感到振奋。

7月10日，中共中央接获国际来电，来电共分五点，即（1）党在目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号召工农群众为苏维埃而斗争；（2）必须尽量谨慎地选择政府工作人员，同时在苏区成立中央一级的党的机构，巩固地发展红军；（3）在苏区里应没收一切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主的土地，并尽可能扩大到没收富农土地，防止对富农的右倾，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和中农；（4）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委员会；（5）不要禁止土地买卖及实行集中供给，应该容许贸易自由。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实际上是其6月即已在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的一部分。在决议里，共产国际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对于当前形势的种种估计，肯定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中国目前"新革命高涨底增长过程，带着特殊形式"，它"是在个别区域成熟起来"，"后来才渐渐地扩展到其他区域"。因此，在目前阶段，不仅"进行斗争的群众不能够立刻抓得工业中心，"而且"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底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就是总合起来看，这些运动也还不能够保证必须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统治。也就是说："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而"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关键在于中共能否实行正确的策略。这包括：（1）组织并

① 《党的组织任务报告》，1930年7月。

巩固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此作为号召群众和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的一面旗帜；（2）使红军强大到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3）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浪潮扩大到新的区域去；（4）加紧组织和推动城市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斗争。同时，决议还委婉地批评了李立三关于革命转变的设想，明确认为：由于中国是落后国家，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无间隔和无阶段的，它决"不会剥夺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恰恰相反，它应当允许资本主义"表现向前增长的趋势"，同时，利用独裁的政治及经济地位，"逐渐造成一些前提和优势"，"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而逐渐地和一贯到底地""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上述决议的主要精神，实际上是根据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作出的。还在1930年5月，在斯大林与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他就突出强调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意义。他明确指出，由于中国是一落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德国工人在柏林暴动即可夺取全国，而中国却只能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存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性。据此，斯大林强调，中国革命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发展起，首先发动广泛的群众斗争，进而创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党的领导，并逐渐开辟和扩张革命根据地，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争取中心城市。他甚至一再突出强调红军的作用，确信红军是中国革命希望所在，应视为中心问题，并以吴佩孚为例，称吴还能在四川存在，中国党总不会不如吴，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对于夺取中心城市，他不反对红军攻城的办法，声称：如果红军确有强大力量，工人即使还没有起来，红军进攻时也自然会起而响

①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30年6月。

应。在此，斯大林突出地强调了红军、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问题。

然而，共产国际7月初的电报并没有全面地反映斯大林的上述意见，甚至没有提到共产国际6月决议案中所强调的形势估计和转变问题，以至使整个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中共中央显然对来电精神作了错误的理解，以至于相信共产国际指示与前此中共中央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布置，没有什么不同。其关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的提议，恰恰是要求中国党加速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实际上，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早就是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争执不下的一个重要问题了。还在1月中旬，远东局就提出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主张先在上海开准备会，然后确定一巩固的根据地召开正式会议，以便公开号召为苏维埃而斗争。对于此一工作，共产国际亦十分重视，不仅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而且在其各种机关报上大力进行公开宣传。可是，中共中央对此却不甚重视。他们显然以为，在农村根据地而不是在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哪怕是召开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会助长党内的割据保守倾向。因此，他们一开始就主张在上海开会，只派代表去苏区参观，甚至并未计划先开准备会。

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言和通告①。3月20日，才又根据远东局要求改为召开"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②。但到5月19日，在所到正式代表仅几个人，多为非正式代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避免会议无限期拖延，干脆把准备会开

① 分别见《红旗》第75号，1930年2月4日；第79号，1930年2月15日。

② 见《红旗日报》第37号，1930年3月20日。

成了正式的大会，会议名称又改回为“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①]。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在忙于暴动布置的情况下，对于此次会议并未十分重视。

6月初，远东局对中共中央擅自决定改变会议名称及形式表示异议，明确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政治损失，而且是一个政治错误”。但由于远东局最初并未明确意识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是同政权问题相联系的，只注意到宣传效果问题，因此中共中央丝毫不觉得自己的作法有什么不妥。直至6月中旬，远东局提出苏代会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问题，中共中央才同意以后再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补救。但是，这样一来，由于中共中央历来反对割据观念和强调城市的中心作用，召开苏代会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又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暴动部署的新的助推器。李立三明确认为：苏代会一定要在一省几省胜利的地方开。至共产国际来电提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问题，李立三更确信不疑：苏维埃必须在对全国有很大意义的区域来建立，即使一省数省胜利较迟，也必须夺取一重要城市，如湖北之沙市、宜昌，使之建立于重要城市中，并很快地移到中心城市武汉去。

这时，中共江苏特委提出了组织南京士兵暴动，打击国民党统治的计划，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甚至连远东局也怀疑中共中央“企图在江苏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②]。但事实上，中共中央完全了解自己在江苏的实力，其虽迅速提出了南京兵暴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的行动计划，但其目的显然在以此为配合而全力夺取武汉[③]。在7月16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中，中共中央明确认为，由于“现时革命突飞猛进发展的形势”，“有很大可能实现”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及

---

① 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于5月21日，历时4天，24日结束。

②③ 《柏山同志在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1930年7月13日。

"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暴动部署，要求苏共及国际立即从人力物力各方面予以支援①。

如果说此前的中共中央，包括其6月11日决议，还没有断然肯定全国革命高潮已经降临，暴动布署应当立即由动员准备转入实际行动的话，那么，现在的态度完全不同了。可以肯定，李立三及中共中央这时虽并不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甚至还不同意立即提出武装暴动的口号，但他们无疑已经把它看成是日内就要发生的事情了。

7月27日，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长沙，并宣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红军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一举攻占象长沙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的程度，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进一步走向极端。

7月30日，远东局接到共产国际来电，并于次日通知了中共中央。来电明确认为中共党的组织过于薄弱，缺乏广泛的工人基础，没有争取到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只靠少数先锋队决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党目前的暴动路线是盲动的和脱离实际的。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国际来电，承认自己在组织上没有能够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目前也还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因此表现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但根据几个月形势发展和工作成效，他们确信自己在政治上已经夺取了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在一两个月内，仅上海党就可以发展3000—5000工人党员，革命高潮到来时，就是发展20000—30000工人党员也有可能。因此，一旦重大事变发生，党在几天之内或数周之内，就完全可以组织起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工人群众组织②。他们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

---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1930年7月16日。

② 参见《目前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红旗日报》1930年8月3日。

在两个政权对立的方针下来成立苏维埃号召群众，也是不必要的，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速度。据此，他们决定继续前此之暴动方针，并决定立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以统一指挥暴动准备工作。

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显然是同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力图坚持真理的独立个性。他们认为：如果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是忠实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实于革命，不忠实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因为国际的总路线是对的，不过对现在形势的发展，尚未详细知道。

但是，把忠实于国际与忠实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甚至以忠实于中国革命作为是否忠实于国际的衡量标准，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思维方式，而且多半会导致另一种极端：既然世界革命爆发在即，中苏两党同属于共产国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中共可以为保卫苏联而战，苏共为什么不可以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战呢？

8月3日，为了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暴动计划，能够迅速导致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把暴动部署进一步推进到北京、天津、郑州、开封、唐山以至满洲去，并开始相信“北方的客观形势……绝对与南方形势一样”。尽管北方的暴动，特别是满洲的暴动，可能引起日本“很剧激地向苏联进攻”，成为“国际战争的序幕”，但李立三认为，这正是“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的“战略”，“正是国际路线，并没有错误的”。恰恰相反，“长沙事件，帝国主义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在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了现在，还没有一个字打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太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的估量的不足”。为此，必须“求得国际的了解”，“国际在目前形势”“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首先是“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中国暴动一起，蒙古就应出兵中国北方，

苏联则应在满洲与日本作战，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①。李立三扬言：必须据此“与国际力争”②。

紧接着，中共中央正式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称现在红军在全国已有“二十二军计三十余万人”，“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五百万，有组织的群众三千余万”，十余万国民党伤兵及镇江、汉口驻军的大部分在我们影响之下，长沙、大冶、沙市已攻占，南昌九江指日可下，京汉路已切断，广大工人“都要求武装，要求暴动”，因此，请国际务必“批准中央的决定”③。

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日和3日的会议记录很快被送到远东局，远东局立即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8月5日，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宣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在“冒险”“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因为李立三公然扬言忠实于共产国际决议和忠实于中国革命是两回事，公然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很了解情况”为借口，把共产国际反对“盲目冒险”的指示看成“是中国革命的障碍”，执意命令全国“准备过左行动”和“没有群众参加的暴动”，调动红军和“着手发动世界战争”，甚至“怂恿政治局作出关于苏军出兵和苏联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的决议”④。

远东局的信在引述李立三谈论共产国际指示的发言时，无疑不尽准确。但无论如何，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特别是看待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及其和苏联的关系，毕竟是破天荒的和难以让人接受的。这不能不让远东局感到不可容忍。不过，远东局仍旧不希望事态扩大，因而他们竭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李立三个人，而对中共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依旧表示肯定。可是，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席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样强烈的反应表明，这件事绝不是给李立三一个

①② 《中央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1930年8月3日。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1930年8月5日。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930年8月5日。

人扣上反对共产国际的大帽子就能够解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仅态度严厉地断然拒绝远东局关于李立三“反国际”的指责，而且声称：除非共产国际解散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否则中共中央将继续前此之一切工作布置而决不中止。

8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央总行委。李立三在成立会上就共产国际关于党的组织薄弱和城市工人的争取及准备严重不足的看法，作了全面的辩解。李立三这时固然仍旧主张中心城市的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但他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农民革命的作用和红军的作用，摆在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位置上了，确信即使工人还没有起来，党的组织力量还十分薄弱，一旦红军开始进攻，他们也自然会“暴动起来，响应红军”的。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客观上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以此来作为抵御共产国际批评和坚持全面暴动方针的依据，却未免过于软弱无力。这不仅因为共产国际的批评多少依旧是从城市中心论的角度出发，强调中心城市工人斗争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的，而且因为事实上国民党的统治还没有动摇到已经迅速崩溃，以至其军队一见红军就会潮水般地投降的程度，红军和农民革命也远没有强大到“已经直接动摇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基础”，可以攻占或已经攻占武汉周围重要城市的程度。

然而，“左”倾的情绪和观念往往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视觉系统，以至逐渐造成人们自我感觉上的完全紊乱。在8月7日远东局同意与中共中央联名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国际“重新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南京暴动及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计划之后，中共中央亦决定可以同意远东局关于应马上派人去武汉实地考察的建议，以为这或可以使远东局进一步改变认识。8月8日，他们更致函斯大林，宣称：“现在武汉、南京工人都迫切的要求暴动”，“极广泛的农民群众都猛烈的兴起，与军阀决战，向着武汉进攻，红军第二、六两军已占领沙市，第八军占领大冶，第一军占领孝感、花园，都已逼近武汉。特别是武汉南京的军阀军队异常动摇，在武汉的主要驻军大部分在我们影响之下，南京驻军

几乎全部都倾向我们，组织上能领导的都占大多数，而且异常迫切的要求暴动”，“这一形势无疑的是暴动的条件已在成熟，暴动的发生，已经是时日的问题”。①

中共中央8月8日信，毫无疑问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不仅红军并未攻占这许多城市，长沙业已被迫放弃，而且在武汉国民党军队中并无多少工作，在南京也仅有几个支部在驻军中活动，甚至在一直认为形势最为成熟的武汉，也“仅有同志四十人”②。很难说中共中央领导人完全不了解这些请况，至少这时他们已得知了武汉和长沙的情况③，但这丝毫不能阻止他们继续作出极端盲目的部署。8月14日，他们发出时局宣言，公开宣称“革命的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故而号召人民群众“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④。同时，明确决定红军五军“反攻长沙”，“扑灭何键”，“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进攻沙市、宜昌，必要时可直取汉阳；一军则“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拿下南昌并九江后，亦汇合八军进逼武汉。此时武汉党组织则应“猛烈的扩大组织”，“十倍努力扩大”工人运动，准备“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⑤。

1930年8月20日，2月底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周恩来被派回国，并带回了共产国际研究通过的10个有关决议。由于周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不了解中共中央8月初开始与远东局发生严重分歧的内容，因此整个态度尚属温和。但周所转达的斯大林、莫洛托夫、库西宁等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国际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争论的两个决议⑥，都再清楚不过地

---

① 《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给斯大林同志的信》，1930年8月8日。
②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
③⑤ 《中央致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
④ 《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1930年8月14日。
⑥ 《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争论的决议》，1930年8月；《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1930年2月—7月底期间的争论）》，1930年8月。

表明了其对中共中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革命转变、与远东局关系，特别是暴动政策等问题上的批评态度。显而易见，中共中央再没有任何理由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情况了，他们不能并且也没有权利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同斯大林进行争论。于是，情况开始发生某些变化，李立三不能不承认：自己和中央在对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上以及形势估计上，确有“模糊不清之处”，以至“把国际对于某些策略上的适时的指导，当成了整个路线及原则的改变，因而发生了怀疑”。特别是没有重视和执行国际关于“必须有根据地的向前发展”，以及“不应在今天便实行武装暴动”的一系列指示，这“确有缺点”①。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两次谈话和两次政治局会上，都确信“国际的路线与中央路线毫无二致”，甚至以为国际并不“反对我们武汉南京的暴动”，只不过“要我们巩固的建立根据地，更加紧全国工作的实际布置与配合，更加紧准备武汉南京的暴动，以及全国各地的暴动”，因此，在工作部署上仍然没能完全摆脱前此的某些作法。他们明确认为，为了立即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必须迅速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成立中央临时政府的指示，必须迅速“争取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胜利”，“使巩固苏维埃区域与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密切联系起来”②。为此，他们再度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将湖南国民党军队“完全予以消灭”，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并攻占岳州，紧接着立即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然后“应向武汉中心前进”。一旦占领长沙，即可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③。

9月初，在南京党组织遭到严重挫折后，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放弃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系列暴动部署④。而在红军再次进攻长沙

---

① 《中央致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26日。

②③ 《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中央致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20日。

④ 《中央致长江局信》，1930年9月1日。

失利之后，中共中央才完全停止了立即夺取长沙、岳州等中心城市的脱离实际的盲动计划①，决定遵照国际指示，首先致力于农村根据地之建立，红军之加强与集中，红色区域群众之广大发动，和苏维埃政府之成立了②。至此，中共中央决定撤消为暴动计划而成立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开始重新回到日常工作上来了。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③，如对中国革命不平衡性发生动摇，对时局有过分的估量，把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当成"割据保守"的农民意识来加以反对，等等。但会议依旧认为：中央的基本路线"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④。当然，会议已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政治中心。"⑤会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开始真正重视苏区、红军及其政权工作了。他们不仅立即组成了苏区中央局，分别向各苏区派遣重要领导干部，而且下决心要在湘鄂赣边建立统一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以此为依托来向外扩展，并决心首先把红军"发展成为真正能够担任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的任务"，和"争取全国革命总的胜利"的强大武装力量⑥。

不过，用这样一种近乎轻描淡写的方式来批评中共中央所犯

---

① 《中央关于加强红军干部问题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9月9日。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1930年9月8日。
③⑤ 特生：《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30年9月。
④ 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
⑥ 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中央通告第91号》，1930年10月12日。

错误，并且继续坚持对过去有过不同意见的党内干部的批判和处罚，是很难不引起异议的。特别是在前此因形势估量及策略运用等问题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过争论，以至遭到处罚的何孟雄、陈韶玉（即陈绍禹）等人，不能不对此表示不满。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接到远东局提交的自7月底之后与中共中央争论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1日、8月3日等一连串的会议记录，同远东局的最初反映一样，他们迅速被中共中央在这些报告和记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凌驾于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利益之上的态度所激怒。对中共中央错误的批评，立即被拔到整个路线错误的高度上来了。在给中国党的新的指示当中，李立三被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并明确认为其错误"并不只是个别的错误，而是造成了整个错误系统的，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其行为更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更突出地强调了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特点，甚至据此得出结论说："正是在那些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点，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心点，不但是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底直接打击之下，而且帝国主义把这些最重要的工商业的行政的中心点，完全拿在自己的直接的经常的军事政治监督之下"，因此不仅工人还没有力量通过暴动夺取城市，红军也还没有力量去攻占城市。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说，瓦解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①

共产国际的这一精神，立即在各个方面引起了强烈反响，并

①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

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影响到国内。沙发洛夫率先召集正准备回国工作的4名共青团干部，要求他们回去后应当坚决地与立三路线作斗争。随后，青年共产国际亦根据上述精神致信中国共青团中央。至11月10日前后，团干部4人及青年共产国际信已先后到国内。于是，一直受到严厉压制的不同意见立即公开化了，并且很快就异常强烈地表现出来，使中国党迅速陷于一种危机之中。

11月13日，陈绍禹和秦邦宪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开批评三中全会"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仍旧继续"立三路线"①。16日，沈泽民等亦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就三中全会提出的形势分析等问题向中央发难。17日，陈绍禹和秦邦宪更进一步致信给政治局，对李立三新近发表的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继续斥责其为"右倾机会主义"，而表示强烈不满，宣称"立三同志代表的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等的混合物"，而他们的政治意见才是"绝对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故而要求中央立即"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及"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消我们的处罚"，同时"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②。

11月16日，中共中央接到国际十月指示信，并接连两次进行讨论，承认了三中全会不彻底的问题。12月1日，周恩来并代表中央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公开承认陈绍禹等过去与李立三的争论，"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仍强调其在形势估计以及革命转变问题上与李立三"同样错误"，故要求他们正视自己的问题，停止"超组织的活动"③，结果陈绍禹等反倒愈加采取对立的态度。陈绍禹、秦邦宪、沈泽民、陈昌浩等多

---

① 《秦邦宪陈绍玉给中央政治局信》，1930年11月13日。

② 《陈绍玉秦邦宪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1月17日。另，11月20日何孟雄也致信中央，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见《何孟雄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1月20日。

③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12月1日。

数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几乎一致开始提出否定三中全会决议、改组中央，乃至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公开拒绝执行中央布置的工作。于是，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军委、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到江苏省委、全总党团，以至部分苏区干部，都开始纷纷决议、写信，甚或要求国际出面否定三中全会了。进而，连远东局也表示说：不能说三中全会是基本正确的。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再次作出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不正确”，并且是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的，决定一周内召集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共青团中央委员，举行一紧急会议，重新成立一个正确的政治决议[①]。同时决定分配陈绍禹去苏区，秦邦宪去全总，何孟雄根据承认错误与否重新决定是否保留其江苏省委委员一职[②]。

12月16日，根据远东局的建议和与各方面谈话的结果，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在纠正立三路线问题上不宜拖泥带水，尤其对何孟雄等，不宜在其对的中间找错处，对陈绍禹等坚持不同意见的行为，也不宜定性为小组织活动。据此，政治局通过了有关对何孟雄以及陈绍禹等人取消处罚的决议[③]，并委任陈绍禹为中央组织部指导员兼党校校长[④]，秦邦宪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沈泽民为宣传部长，康生（赵容）为组织部长，王稼祥为《实话》主编，夏曦任江苏省委常委委员。陈绍禹并参加紧急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至此，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干部相继得到重用。进而在23日中央发出第96号通告，进一步指责自己12月9日的决议仍旧存在着“不能斩断调和主义尾巴之不可容许的错误”[⑤]之后，陈绍

---

① 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1930年12月9日。

② 江苏省委已通过决议开除了何孟雄省委候补委员一职，但中央尚未有正式决议承认和批准，故仍有此议。

③ 《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1930年12月16日；《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1930年12月16日。

④ 后因江苏省委改组，陈绍禹又接替罗迈代理江苏省委书记。

⑤ 《中央通告第96号》，1930年12月23日。

禹、沈泽民、康生、王稼祥、秦邦宪等更是一步登天，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开始直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了，从原来的一般干部一跃而进人了最高决策层。

对留苏学生的高度重视，无疑是有重要的国际背景的。共产国际向来是重视能够"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的，在得知"李立三和现在中央同志对于莫斯科，对于共产国际领导，对共产国际那种'毒狠'的态度"之后，他们显然把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看成是"最可警心"和"最紧张的问题"。以至确信由莫斯科回国的陈绍禹等"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的""很好的同志"，是"挽救党于危机之中的唯一动力"，务必不能"妨碍他们加人领导机关"①。但在11月李立三根据共产国际要求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于同时得到了中共三中全会各种文件之后，发现三中全会不仅丝毫没有触及李立三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态度问题，对前此错误的批评纯粹成了"极端外交手段"的"一纸空文"，而且"秋白或者立三"不要陈绍禹等"作党的工作"，甚至继续抑制和打击他们。因此，共产国际不能不感到极大的不满，以至下决心根本推翻三中全会，直接插手改组整个中共中央领导结构。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一面提出报告，斥责中共三中全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②，一面由其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米夫亲自出马，赶往中国上海策划和组织这次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的重大政治行动。

米夫的目的是很明确的，第一是扶植陈绍禹等由莫斯科回国的"好同志"，以确保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忠诚；第二是改造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共中央，使其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为此，米夫夫妇一到中国，就试图避开中共中央进行幕后活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

② 《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

动，以便于全盘改造中共中央。他们一开始即看上了正在积极鼓吹反对三中全会的陈绍禹派，以及全总和海总系统的罗章龙、陈郁等人，专门找他们进行谈话，力图把两派捏合在一起。只是由于罗章龙等势力较大，看不起陈绍禹等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留学生"，甚至更不驯服，米夫才不得不放弃根本改造中央的计划，转而利用国际的权威，强行把陈绍禹等同中共中央嫁接在一起。但这样一来，为使陈绍禹等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央，并取得统治地位，米夫竟不得不左右开弓，尤其是必须向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陈郁等一派人开战，以至使党内矛盾更加复杂化。

12月底，陈绍禹主持的江苏省委和秦邦宪主持的团中央，根据米夫的旨意，分别通过了反对《中央通告第96号》的决议。与稍后不几天的全总党团的相同决议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已经根本对立。前者只是吹毛求疵，其目的实际上不过是要宣布中央的继续存在，和向反中央的"右倾分子"施加压力①。而后者却断然主张："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坚决的实行引进工人同志及群众组织能干的干部到领导机关参加工作"②。

毫无疑问，这时根本推翻原有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在秘密环境之下，基层推举的代表必多为受何孟雄、罗章龙等影响的江苏省及工会系统的干部，这当然对保证陈绍禹等进入中央极端不利。因此，至12月29日，米夫及远东局决定不召集紧急会议，而应改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便保证原有中央委员可占会议的大多数，从而便于贯彻国际改组中央的方向和意图。30日，中央政治局亦正式接受了这一提议。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东方旅社内召开了，不少与会代表直至会议宣布开始前仍不知道

① 转见《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② 《全总党团关于对中央九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1931年1月1日。

会议的性质。尽管会议邀请了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但由于会议的内容、议程、改组后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早已内定，特别是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有选择地指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从而使得反对派一开始就不能不属于少数。远东局代表艾伯特并且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压制了罗章龙等人挑起的争论，最后罗章龙等人甚至不得不以放弃表决权表示抗议，个别人干脆大吵大闹以至退出会场。但结果，会议仍旧达到了米夫等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陈绍禹、沈泽民、夏曦等被补选为中央委员，陈绍禹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应当指出，陈绍禹等并没有一下子升到顶峰，陈开始甚至没能进人到政治局常委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在米夫看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正是“陈绍禹”，以及“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等他所信任的旅莫学生①。

（三）失败的战争

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革命，1931年一开始就明显地充满了危险和灾难。当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和远东局代表玩弄政治手段，拉一派打一派，强行把一个他们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央塞给中国共产党，并且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培养的学生一个个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之后，中国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特别是上海各种党的领导机关，就立即被强烈的不满情绪所笼罩了。

1月8日，即四中全会第二天，何孟雄、林育南等18人就立即发出“告同志书”，抗议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强行召开四中全会

① 米夫：《英雄的中国》，1936年。

和取消紧急会议[1]。

随后，全总党团、海总党团、上海外县委员会、上海工联党团等相继做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政治局内徐锡根、王克全等也公开出来反对四中全会。很快，反对派公开联合起来，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对抗办法并上书共产国际。全总党团会议在远东局代表出席并极力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与会代表竟群起抗议，谴责四中全会是米夫与陈绍禹玩弄的政治把戏。在会议通过的决议里，全总党团不仅要求撤消多数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韶玉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而且抗议国际代表"对于多数同志们提出的政治意见，不采用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而实行一种无原则的谩骂、挑拨、诬蔑同志的宣传和煽动，并且一再强迫同志通过其无理由的决议"，"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2]。

1月17日，以林育南、何孟雄为首的包括全总、上总、左联、江苏省委、反帝大同盟党团等20多名重要负责干部，在秘密举行反对四中全会的联席会议时被捕，使党内反对四中全会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仍旧迅速演变成具有组织分裂性质的行动。王克全公开宣称否认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局及其陈绍禹改组过的江苏省委，号召立即召开省代会重新选举省委，并支持下级区委反对派干部的分裂行动。罗章龙等亦四处散发秘密印制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小册子，宣称"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必须"根本上废除他"，号召举行紧急会议以挽救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3]。

---

① 见《何孟雄文集》，第241页。
② 《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17日。
③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1931年1月。

事至于此，根据米夫及远东局的建议，中共中央不得不宣布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其党籍，开除王克全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委员，并对其他有类似分裂行为者施加同样严厉的处罚。

但问题依旧是极为严重的。党内接连几个月的争论和斗争，使下级组织及其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中共中央因自身屡犯错误及远东局代表在紧急会议问题上出尔反尔，又极大地损害了最高领导层的威信。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助长了部分党员干部的反抗心理。于是，罗章龙轻而易举地拉起一批追随者，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公然派遣干部到各地去争取基层组织，特别是原工会系统的组织，反对中共中央，力图取而代之。尽管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国际能够予以理解和支持①，不过是个幻想；其因毫无经费来源和物质基础，也必然要遭到失败，但这一分裂行动对中国党，特别是对党在工人中的工作的打击，仍旧是惨重的。仅上海一地，据2月底的统计，赤色工会会员数就已经从1930年的大约2000人，骤减到只有513人了。而随之而来的思想混乱，工作情绪低落，更使相当一批干部感到苦恼和无出路，于是自首叛变之风平地而起。4月，多年负责中央保卫及特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亦被捕后叛变投敌，迫使中共中央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至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居然也被捕叛变，以至中共中央将近5个月时间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所有在上海活动年限稍长的中央负责干部，都不得不全部撤离或转移。

四中全会后略有成就的只有根据地工作。1930年以前，由于中共中央一直把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看成是“割据保守”观念，对红军亦因其农民军队性质而不甚重视，先是根据中共六大精神，使其尽量分散，后又出于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需要，要求其集中攻坚，因此始终未能真正有意识地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① 《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致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3月4日。

在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逐渐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大力发展红军、巩固地扩展根据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加紧了对红军及苏区工作的指导。而至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在1931年1月即接连数电督促中共中央务必加紧选派得力干部到各主要苏区去组成以集体领导的方式进行工作的中央局，同时务必成批输送军事人员及工人到苏区去加强其军队战斗力，并改造其各级领导成分，且再三要求尽快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①，因此，中共中央于2月以后不能不陆续选派了大批干部分赴赣西南、赣东北、湘鄂西、鄂东北、鄂豫皖等各个根据地，并按照国际指示，把60%的党务人才统统派遣到中央苏区去。

把大批党的各级干部及城市工人骨干派遣到苏区去，无疑对城市工人运动及地下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带来影响。但共产国际这时显然更寄希望于苏区红军的发展，而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看成是一个相对长久的工作。至4月份得到的统计数字，全国党员总数除苏区外，仅有不足11500人，城市中党员仅4000人左右，其中工人党员不足一半，受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工人，除满洲外，尚不足1000人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减少。上海赤色工会会员数从2月至4月不足两个月，就进一步减少了200余人，即从513人减少到只有300人左右。这样一来，由于工作的停顿、组织的分裂、干部的减少以及惧于对“立三路线”及“调和路线”的批判，思想方式更加僵化等种种复杂原因，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人斗争规模迅速开始萎缩，群众基础越来越小，以至渐渐党的工会组织已成为空架子，不得不在远东局的督促和资助下通过在工厂周围开办茶馆、夜校等消极方式，重新去接近和影响工人群众。与此相反，国民党仅在上海就已建立起120多个大小工会组织，他们通过支持各工厂工人的经济斗争以及反帝斗争，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电》，1930年1月15日，等。

② 《李竹声关于四中全会后全国组织状况的报告》，1931年4月。

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立法等等，动辄就可以发动起数千工人的示威游行。而共产党人却渐渐失去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各种条件，竟不得不通过强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级党员干部及群众骨干冒险举行各种飞行集会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1931年，共产党在红军、苏区及其政权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几乎是同它在城市工作方面影响力的缩小一样明显的。自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红军在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三次“围剿”，歼敌数以万计，将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4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5万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中央根据地[①]。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全国红军已达到10万人以上，其所控制的区域已有数万平方公里。

苏区的发展，无疑是以红军的不断巩固和壮大为前提的，而红军的巩固和壮大，也离不开苏区的发展，特别是离不开苏区有效的政权建设和正确的政策实施。没有苏区为依托，红军势将疲于奔命，难于长久支撑；没有苏区的发展扩大，及其有效的政权管理和正确的政策，在战争日益频繁，规模愈来愈大的情况下，红军也绝难应付日渐加剧的物资需求和人员损耗。仅以江西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役为例，第一次红军伤亡约2000人，第二次即增至4000人，第三次更达到6000人，总计12000人，其中死亡约2000人，残废约1000多，并死亡军长一人，师长二人，中下级干部伤

---

① 通常史书均认为，至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江西中央苏区已扩大至21县，拥有250万人口（见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等），但查苏区中央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后于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此时“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至于人们通常所称之21县之其它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宁化、清流、归化等，还全在国民党手中，电报称：对这些地区“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他”。结合欧阳钦9月1日报告，似可断定，此时除瑞金外，周围各县多数尚处于拉锯状态中，一时还未能成为真正的根据地。

亡数目尤甚。而第一次战役时，士兵尚有每天0.15元的伙食标准，月发生活费平均不足1元，加上医院费用，总计开支可达25万。但此役之后，伤病大增，兵员亦急需扩充，而筹款及物资却日渐困难，以至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降至0.1元乃至0.08元，生活费完全停发，月耗总计已不足18万元。但即便如此，情况仍旧十分困难。加上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须补助，“兵兴之后，宣告免收土地税”，“红色区域无款可筹”，苏区政权及武装月需约30万元全部要靠红军在敌人“围剿”间隙之际，向外扩张或到白区去打土豪才能获得。然而，打土豪毕竟范围有限，数量有限，不足持久；而扩张越多，政权、武装等各种消耗和负担越大。因此，红军及苏区最终还要靠自身条件来解决主要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共产国际过去曾反对红军集中，主张红军应该分散在许多区域，对建立和保持农村根据地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当时“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集聚了那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终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因此，他们必然“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最终难免要和农民“发生相当的误会”。所以，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认为必须将红军分散到各个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①]。然而，随着斯大林对中国红军作用逐渐重视，以及人们对中国革命特点的逐渐了解，共产国际在1930年以后明显改变了前此的看法，开始确信在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和集中红军一步一步向外扩张的方法，来推进革命，直至“以农村暴动包围城市（包括较大的和最大的城市）”，最后“由起义工人和红军去夺取这些城市”[②]。而这样一来，在

① 见《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

根据地大致建立起来之后，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的问题，自然应当得到格外的重视。

可以肯定，共产国际这时对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军事工作等等，都是极为关切的。自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应当把苏维埃政权立即建立到有红军拱卫的农村根据地去[1]之后，它就一直在不断地催促中共中央尽快召集各地苏区代表会议推举代表，以便尽快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初，它甚至亲自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了《土地法令草案》、《劳动法草案》、《关于经济政策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草案》，以及有关苏维埃组织建设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文件[2]。同时，它还专门为中共中央军委派来了军事顾问，以便可以就近指导中国红军应付大规模的战争。不过，共产国际显然并没有从它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那个角度考虑问题，在它看来，此时重要的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生存条件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地发展，即如何进攻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使之正规化，以达到足以同国民党政权相对抗，足以号召中国劳苦群众的程度。因此，共产国际急于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却很少为之考虑应当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和建立必需的税收财政制度等重要问题。

其实，急于立即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在他们看来，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已经可以达到很快地将分散的军事行动和零散的根据地统一集中起来的程度了。也只有如此，共产党人才能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形成巨大的政治号召力，进而准备同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进行决战"。因此，共产国际的军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

② 上列文件分别可见于1931年3月9日和9月7日的《红旗周报》，第1期和第15期，等。

事顾问一到上海，就立即支持中共中央提出以“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为“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①。当然，在1930年底国民党开始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之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们也一度感觉到形势的严重。因而他们在提出红军“应最高限度的坚决的去执行”击溃敌人实力，以实现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中心任务的同时，也一再叮嘱红军务必采取灵活的战略。如“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②。“我们要红军主力军打破游击主义的传统，但我们决不是主张放弃游击战术的运用”③。“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④。“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尤其不应忘记：“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据此，他们甚至预先就为主力红军放弃现有根据地安排好了退却的方向和地域⑤。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现实的。

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够在华中、华南几省交界的偏远地区存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的和地理的背景。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多数地区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便利于造成割据的局面。

---

① 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设想，最早是中共三中全会提出的。但把它作为现阶段“中心任务”，却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起草《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时明确下来的。

②④⑤ 分别见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起草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1931年3月2日。

③ 《中央对苏区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

而由于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这种情况仍未根本改变，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或致力于争夺中央政权，或致力于防卫其交通要道及城市，很难有更多的实力把其统治伸入到其所占地域的偏远角落，这就更进一步为共产党人进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仍有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根据地虽处于几省偏远地区，但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之统治及其国家整个交通大动脉和主要中心城市，均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其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势必要以大力加以清剿，这自然使根据地和红军不能不经常处于战争之中。其次，由于敌人志在必得，战争越打越大，红军势必不断扩充，而根据地亦须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员及物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但根据地越扩大，必然越接近交通干线及主要中心城市，从而越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愈发扩大和残酷。如此则必然形成恶性循环，迅速造成总决战的局面，使既无足够物质准备，又无必要的回旋余地的红军很快陷于困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使红军保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以“保全红军实力”为原则，而不以死守一地为原则，确有重大意义。事实上，过去红军正是在这样一些军事思想指导下成功地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自从共产国际三番五次地主张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付诸实施之后，继续着重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很快就变得不那么现实了。因为，所谓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实际上就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而所谓苏区、根据地等等，实际上也就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现有的区域和领土。这样一来，人们显然很难再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了，一切都政治化了。红军的进退胜败，将不再是军事问题或实力消长及存否问题，而将成为整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也就是说，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地会使红军和苏区，特别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渐渐失去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

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不仅如此，政权和国家概念的提出，还必然要激起人们进攻和决战的强烈心理，从而再度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情绪，以至日渐对形势发展、敌我力量对比，以及阶级关系的状况等等，发生过“左”的估计。

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责令“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同时，明显地开始主张改变前此军事上的灵活策略，明确要求红军必须“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必须致力于“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而必须以坚壁清野和群众游击战争的办法去困扰敌人，抽调出红军主力“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①。

8月30日，当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还没建立”，红军“困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时，依旧主张“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依旧强调“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来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而其解决军事危机的办法，却是什么“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在他们看来，只有愈加紧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群众的发动力和团结力才愈能加强”，从而“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进”；而只要群众都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战争，就不愁打不败敌人②。

① 《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1930年6月16日。

②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

9月中旬，当国民党广东广西军队联合发动讨蒋战争，日本关东军又悍然攻占东北沈阳等地，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亦受挫而中止之际，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①进而，他们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②，并立即提出了全面进攻的战略，宣布目前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保守和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④。

---

①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

②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会议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③④ 《中央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1931年12月4日；《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

1931年6月以后，由于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要成员接连在上海被捕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已纷纷隐蔽起来，中央工作仅由各部联席会议维持。至8月，远东局建议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陈绍禹等前往中央苏区②，另组临时中央以便正常进行工作，随后遂有以年仅24岁，一年以前刚刚回国参加实际工作，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秦邦宪牵头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产生。其成员除卢福坦外，几乎全部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并且均非中央委员的留苏学生③。在刚刚否定了所谓“立三路线”之后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再度提出了占领中心城市和迅速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这突出地表现出在这些留苏学生中，同样存在着城市中心论的倾向和严重的“左”倾激进情绪。

当然，临时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并不完全是对“立三路线”的复制。他们暂时至少还没有走到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地步，还没有象李立三那样突出强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必然紧接着全国总暴动乃至世界革命的形势，还没有妄乎所以到命令红军可以离开根据地去夺取大城市，甚至于还注意到“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不是（只要）客观形势的发展，不需要主观力量”，注意到没有无产阶级大多数在我们手里，我们便不能领导群众实现这一目的。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同李立三一样，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简单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极端复杂并且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把世界经济形势的动荡，中国民族情绪的激昂，以及红军反“围剿”的暂时胜利和苏维埃全国政权的建立，统统当成了帝国主义和国

① 除向忠发外，据报载，6月15日被捕的还有远东局重要成员牛兰夫妇（即一般认为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会议办事处负责人者，实际为远东局交通系统的负责人）；另8月9日还有所谓“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米雷被捕”。（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其人情况不详。

② 后陈绍禹因坚持要去莫斯科，得到批准，故未去中央苏区。

③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目前所见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有秦邦宪、卢福坦、陈云、洛甫、康生、李竹声等。

民党即将死亡的证明和根据。

这时，最使临时中央政治局感到振奋的因素有二：其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严重经济危机。“1929年美国的债券价格指数约为200—210，1932年已下跌到 8 —40。同时期商品价格一般下跌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世界上主要工业制造业国家的生产，各种制造品都缩减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1932年的世界贸易值只及三年前的三分之一”①。这一空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看起来不仅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共产国际“六大”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预言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而且似乎到处推进着革命高潮，使“深刻的革命危机”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迅速成熟”②。

其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悍然发动了夺取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民众掀起的空前强烈的反日运动。这场以罢工、罢课、抵制日货、晋京请愿、组织反日团体和广泛宣传抗日主张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反日运动，由于与蒋介石南京政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的公理判决”的解决办法相矛盾，因此不断与南京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出现了捣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和殴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等重要官员的情况，许多重要城市陷于混乱③，以至蒋介石也被迫辞职下台。显然，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群众斗争已经“走上了直接反国民党的冲突”，“统治阶级的崩溃和革命危机的成熟”正在到来④。

---

① L.罗宾斯：《1929—1934年的大萧条》，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2年版，转引自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②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255—256页；并见《博古关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的报告》，1931年12月18日。

③ 见《申报》1931年9月27，28，29，30日，12月10日；并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3页。

④ 《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1931年11月15日；《博古关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的报告》，1931年12月18日。

不能否认，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共产党人面临着大好的宣传时机；而由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群众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形成尖锐对立，确也存在着引导群众走上反国民党的革命道路的某种历史可能性。然而，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注定了不能有效地去把握这种机运。

早在大革命之前，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渐渐习惯于按照共产国际那种机械的黑是黑，白是白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复杂的国际关系了，习惯于从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根本对立的角度，把一切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统统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大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六大"公开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保卫苏联"的历史使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一度直接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根本摧毁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确信"中国革命高潮到来，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将立刻引起一切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进攻"，因此，"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绝不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义"，甚至绝不能运用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与某一帝国主义达成暂时的妥协与和平，因为苏维埃政府的存在，将"决定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生死关头"，二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不能有任何调和的余地"①。即使在这种过份极端的观点被共产国际否定之后，人们也仍旧看不出有太多改变自己的必要。他们依旧鄙视（或者说害怕任何一种形式的妥协与调和，只不过承认反抗或者进攻应该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在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可以拘捕一些外国资本家和其他侵略者，作为人质，迫使其军舰等等

① 《中共中央对于政治形势的一般估量》，1930年；《中央关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与路线》，1930年。

退出革命的地域，同帝国主义玩一玩手段；一旦有了极大的群众力量，则不必采用什么外交手段，而应坚决反抗和进攻。

事实上，正如共产国际所再三说明的那样，人们始终确信："最妨碍苏维埃运动继续扩张到中国最重要部分去的因素，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底力量，国际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运动。愈往下去，外国帝国主义者将愈成为与中国劳动群众革命运动作斗争的基本力量。"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等等，都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和镇压革命的一些御用工具[①]。在这里，帝国主义是毫无区别可言的，它们统统都是中国革命的死敌。因此，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共产党人依旧只能从这样一些观点出发来思考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公开发布宣言认为，这一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同时，"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中国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②]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尽管他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之间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与矛盾，并不是没有看出"这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1931年8月，等。

②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

事变给予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①，但他们并不认为有可能或有必要充分利用这里面的种种矛盾。他们依旧坚持最彻底的革命方针，坚信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或企图劝说国际联盟来干预日本的侵略，无异于“与虎谋皮”和“引狼入室”②。同样，他们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③。因此，“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只有国民党的拥护者，才会对于国民党有任何幻想”。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称：“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和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的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④

“九一八”事变，显而易见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其1927年“东方会议”所确定的独霸中国满蒙政策的必然结果。尽管对于这种以武力夺取满蒙的方式，日本此时政界及军界内部还有不同意见，事变的发生就日本自身而言具有极为复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背景⑤，但在张学良易帜，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逐渐深入东北，而日本坚持把满蒙看成其生命线，大肆

---

①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

③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

④ 见《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1931年10月12日。

⑤ 有关日本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之间关于以武力夺取满蒙问题的分歧，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密谋发动事变和日本上层对策变化情况，可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等有关内容。

渲染其意义，乃至不惜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事变的发生至多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的事实证明，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并不是以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间"共同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因此，它并不是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反复告诫人们的那样，是以进攻苏联和进攻中国革命为根本目的的。恰恰相反，这场事变的发动，纯粹是以阻碍国民党统一中国，防止其引进英美势力，牢固控制和占有中国大陆满蒙地区为目的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和力图保持各国在华势力均衡的《九国公约》的其它主要签约国，特别是要和正致力于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

可以肯定，蒋介石并不是甘愿作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或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的。从其"九一八"事变后手书"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①看，蒋或许是打算抗日的。问题在于，蒋确信："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②。"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只有全国上下"共同一致，努力于和平统一守法自强二语"，才能实现"救国御侮之目的"③。这里的"统一"、"守法"云云，自然是以承认和遵从国民党以及他自己的独裁地位为标准的。尽管大敌当前，蒋介石也赞成"兄弟阋墙，外御其侮"④，愿以暂时下野的姿态来谋求宁粤双方的和解，但他显然依旧把共产党人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至有所谓："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⑤的说法，必欲首先消灭共产党。

同是中国人，同样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这自然构成了某种

---

①③④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33页。

② 见《蒋总统集》，第1卷，第577页。

⑤ 转见《中国国民党大事记》，第213页。

相互妥协与合作的基础。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还并不存在国共两党相互接近的任何一种现实条件。不仅如此，双方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断言对方是自己走向抗日的最大障碍。特别是在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之后，两党之间的斗争进一步走到两个政权、两个国家和两种命运的决战阶段，抗日的问题更明显地让位于阶级斗争了。

通过阶级斗争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和利用民族斗争达到阶级胜利的目的，或许都不失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有效方法。但问题在于，必须善于把握轻重缓急、掌握时机，并且善于运用。由于在整个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人处于绝对劣势，通过某些灵活的策略手段，并且适当地为自己规定一些阶段性目标，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特别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继续坚持通过内战的方法来实现国家统一的作法，显然为共产党人推倒蒋介石的统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他们却既不注意民族口号的提出，也不能为自己提出比较适中的阶段性目标，仍旧一味地追求革命的彻底性，盲目地幻想群众会由于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而急剧地走向革命。

不能否认，“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整个反日民族情绪极度高涨，以至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压制反日斗争的作法日渐形成激烈冲突，部分群众确有严重不满于国民党和倾向革命的情况。据1932年2月中共上海党组织统计，此前上海有党员700余人；至4月统计，已达1200人左右；至10月统计，竟增加到2726人。可见这一阶段革命的影响在急剧地扩大。但是，这毕竟只是群众中的一种情况，而绝大多数人民却不能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于他们来说，“四万万中国民族，已到生死主奴之最后关头”，“所有阶级利害，党派感情，思想派别，个人爱憎，事实上完全一扫。盖整个民族将被摧毁，受蹂躏，左倾

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今日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即“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应停止破坏工作，一致对日！”[②]国民党亦当立即“取消一党专政”，“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容许共产党等各种党派合法存在，“以厚集国力”，共同对敌[③]。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武装侵略，和南京政府“逆来顺受”、“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各个阶级、阶层的爱国人士，都不能不深感屈辱。开始，人们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国际公理之判断”[④]。但事实很快证明，直接受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威胁的苏联，只能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以图自我保护[⑤]；对日本在远东地区大肆扩张其势力范围深感不安的美国，最多也只能采取“不承认主义”，而不愿过分刺激日本[⑥]；以英法为主的国际联盟，虽两次决议限期日本撤兵，但不想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对日本施加压力，其随后所派之李顿调查团，干脆提出“国际共管”使东北“自治”的办法来解决矛盾[⑦]，其结果只能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事情很清楚，要根本遏制日本的侵略，最终还要靠中国人自己。

为此，中国各界爱国人士不能不极力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2年5月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公开呼吁成立“中国废止内战大同盟”，明确

---

① 《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大公报》1932年2月2日。

② 《覆巢下之各党派》，《大公报》1932年2月20日。

③ 《申报》，1931年12月20日；1932年4月6日。

④ 转见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第322页。

⑤ 转见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

⑥ 参见王桂厚：《三十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5页。

⑦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20—227页。

认为："外侮纷来，源于内乱，内乱靡已，由于内战"，故"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运动"，要求国内各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①。许多重要报刊和著名人士甚至开始公开批评南京政府的剿共政策，声称共产党乃是"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背景"的政党，"不能目为匪"，更不是"剿所可灭"的②。况且，"中国五千年不闻共产党，而亡国数度，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亦未必免于亡"③，丁文江公开要求南京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停止剿共战争④。胡适更断言"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因此是消灭不了的，应该"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用全力整顿江浙皖鄂赣五省的政治"，彻底裁遣其不良军队，惩治一切贪官污吏⑤，据此，人们明确认为：只有"对内有所不为，而后对外可以有所为"⑥。因为"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让步"⑦。因此，他们主张南京政府应允许中间人士"躬赴江西，径访共党首领，问其能否废战，及如何方能废战，彼共党亦同胞，且多知识分子，对于此代表多数民意之使者，势不能无条件拒绝"，"倘能发见一致之点，则和平之途径启矣"⑧，国民党亦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⑨。

---

① 《申报》1932年5月25日。
② 《申报》1932年4月12日；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吗？》，《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
③ 《剿匪要义》，《大公报》1932年6月19日。
④ 见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期，1932年5月26日。
⑤ 同上。
⑥ 《申报》1933年4月30日。
⑦⑨ 《"清共以前绝不言抗日"》，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2日。
⑧ 《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1933年4月3日；《再论废战运动》，《大公报》1932年7月22日。

总之，“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既为今日惟一之需要，凡足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无不可用”①。

然而，面对全国各界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南京政府却一意孤行，不仅接连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而且公开扬言：“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②。这种情况逐渐促使相当一批国民党人开始同蒋离心离德，甚至促使冯玉祥等秘密与共产党人联络，一些高级军官甚至秘谋发动以联共抗日反蒋为目的的兵变，从而使苦于应付国民党强大军事压力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某种转机。但是，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显然并不对此感兴趣。他们既不准备利用各种反蒋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屑于接过中间阶层的“停止内战”的口号，来打击蒋介石南京政府，争取和团结广大民众。他们甚至于公开认为：“一切国民党的派别，都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与屠杀民众的能手”③。而所有中间阶层及其在野派别，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④。不难看出，共产党人中间此时已经形成一种观念，似乎中间派、妥协派、改良、右倾等等，比公开的反革命还要可恶和危险。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不敢有任何附合及联合中间派的主张，而且唯恐避之不及，以至不能不极力以打击所有中间、妥协、改良和右倾的派别及其主张来作为自己“左”倾革命的证明，以彻底的不妥协的“进攻的路线”，作为自己决定一切的原则。

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九一八”事变以后所采取的策略，共产国际显而易见是竭力支持的。从其1931年底给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指示可以看出，这时的共产国际同样对形势作出了脱离实际的判断，并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同样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它明

---

① 《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1933年4月3日；《再论废战运动》，《公大报》1932年7月22日。

② 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1日。

③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年1月1日。

④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确主张，应当以“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为“中心口号”，并以此为号召“推翻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因为“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同时应当告诉群众：“只有苏维埃中国与中国红军才能够保证民族独立与解放及统一中国”①。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并开始向热河推进之际，告诉人民必须首先推翻南京政府，开展国内革命战争，由正在某些偏僻乡村割据的苏维埃政府来统一中国和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其结果不难想象。然而，共产国际却认真地以为，群众一定会在两种政权之间作出选择，并会在苏维埃的号召下投身到反国民党的战争中来。因为中国的工农群众一定会同俄国革命中的工人兵士一样，认识到民族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首先取得了阶级革命的胜利之后才能取得。正是由于过多地习惯于进行这种类比，以至于当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发生时，共产国际竟头脑发热地以为，十月革命的情景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从而把外国入侵当成了共产党人推翻国民党政权，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大好时机。

1932年1月28日，由于东北被占，民情激昂，而部分日侨颇为狂妄，致使上海接连发生街头冲突，日本方面在逼迫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各种抗日会之后，又由其海军舰队司令致送通牒强迫中国军队撤出闸北地区，交由日本海军陆战队接收，同时并发起进攻②。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并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支持。该两军约五师兵力以伤亡14000余人的代价，顽强抵抗了1个多月的时间，毙伤日军3000余人。以当时中国军队的落后装备，和南京军政当局的犹疑态度，能取得如此

①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关于反帝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2月。

② 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9—64页；《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38—596页。

战绩当属不易。可是，这种情况无疑同共产党的认识相差太远：国民党是绝不可能抗日的，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们是绝不可能抗日的，因为“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本帝国主义走狗”，他们只会“以血的屠杀镇压反日运动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以‘不抵抗’‘退让’来将千百万劳苦群众供日军屠杀污辱，以缴械枪杀来抵抗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士兵群众”①，他们怎么可能抗日呢？他们至多不过是在“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②罢了。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事变一爆发就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起革命战争，“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③。并且断言：“要救中国，要救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④。

在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号召群众乘机四处夺取武器，向国民党及其军官发起袭击，这无论如何是让人难于理解的。上海部分地方干部显然对此表示消极，他们明确认为：在十九路军作革命战争时，各区不应发动斗争，否则将成为捣乱后方。共产国际表面上似乎也不主张发动那些可能妨碍十九路军作战的工人（如铁路运输工人）起来斗争，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⑤与这些‘抗日军官’的个人的口号”，不主张在战区内发动兵变，但是，他们却十分郑重地主张立即在全国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进而组织全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来推翻

①②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

③ 《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⑤ 蔡廷锴，即“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十九路军军长。

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1]。在这些自相矛盾的指示里，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此时希望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他们同样相信国民党及其军官是不可能抗日的，因此共产党人将很容易利用“士兵群众不再服从投降的军官及一切民族情绪之高涨”的条件，“打入军队”和“争取士兵群众”，以至建立起武力拥卫的革命政权[2]。

据事后统计，“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共共组织义勇军约700人，有长短枪不足100枝，送入十九路军约100人，但多仅从事于运输工作，党员及宣传很少能接近前线和士兵。接到国际电报指示后，临时中央政治局确想抓住士兵工作，进而组织起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扩大成为武装暴动，最终成立苏维埃政权，可结果却一无所成。至3月2日十九路军退却后，虽宣告成立过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不过徒有虚名；提出义勇军去闸北和南市去抢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也纯粹只是纸上谈兵。十分明显，事情并不象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观想象的那么简单明了，泾渭分明，更不象他们计划的那样容易实现。然而，这仍旧不能使他们考虑问题变得多少客观一点，复杂一点。他们依旧武断地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造成马占山[3]那样的‘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他们丝毫不想把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至少是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境，他们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地上的根据〔地〕”。“他们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4]而当十九路军被迫后撤

①②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③ 马占山，原东北军第三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最先率军抵抗日军于嫩江桥，受到全国各界的欢呼。

④ 《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胜利？》，1932年2月26日。

后，他们更进一步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正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十九路军的兵士撤退"，"去攻苏区，压迫民众的反帝运动"，同时"要日本军事用到满洲去进攻苏联"。尽管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去做士兵工作，他们仍旧四处散发传单，呼吁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①。

由于日本方面此时尚无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计划和准备，在十九路被迫后撤后，上海的战争很快就停止了。这样，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所希望发生的种种革命性突变，也自然失去了凭藉。相反，他们又开始相信，停战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日本加紧"反苏战争"的步骤，并会同列强"占领上海，及广州、汕头、汉口"，以便"包围及封锁中国苏维埃"②。可是，这似乎也并不能使他们感受到多少压力。共产国际在其3月初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中国红军必须注重夺取诸如南昌之类的大城市，以便（1）使革命进到更高阶段；（2）使敌人失去进攻苏区的基础；（3）使城市与农村经济流通。而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开始大批特批所谓"对于国民党统治过分的估计，与对于革命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宣称那些"以为中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是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断言中国革命实际已不存在革命发展不平衡，之所以存在着"有些区域已经有了苏维埃与红军，而有些区域还没有"的不平衡现象，纯粹"是由于我们党的主观力量薄弱与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目前中国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② 《德法英美捷波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保卫中国革命及苏联告工人劳动群众书》，载《红旗周刊》，第34期，1932年4月1日。

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在决死斗争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就是“必须绝对不调和的同一切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同时“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①。

1932月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对日宣战，但其真正目的却是要以此号召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②。临时中央政治局明确认为：“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是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的，是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③。而具体到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指示，也就变成了“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大胆设想④。

此时的中央苏区，已取得极大的发展。至4月，仅江西苏区面积已达约70000平方公里，跨有18个县的范围，并占有7个全县及县城，控制人口约240万左右⑤。加上闽西苏区近10县，总共已有面积近100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300余万。红军甚至一度占领了福建重镇漳州，把自己的势力伸向了沿海地区。与此同

---

① 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红旗周报》第37—38期，1932年4月25日。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

③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

④ 《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27日。

⑤ 见《江西苏区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内称已占有瑞金、兴国、云都、寻邬、会昌、石城、宁都、广昌”七个全县，七个县城”，并跨有赣县、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乐安、安远、南丰、宜黄等“十八个县的范围”。

时，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但是，苏区的这种发展既不表明红军已有夺取中心城市的能力，也不表明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转变。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宁粤双方重新和解，国民党的力量已变得更加强大，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国民党人这时疲于应付日本军队的入侵分不开的[①]。而上海停战协定刚一签字[②]，蒋介石便立即调集大军，重新开始策划第四次"围剿"[③]。由于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仍旧盲目坚持所谓"积极的进攻策略"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均先后被国民党军队攻占，两部红军被迫离开湘鄂豫皖这一要害地区，退往偏远的川黔一带重新开辟根据地。中央苏区虽因军事领导人继续保持了机动灵活的战术特点，同时因日军攻陷热河并试图大举攻入长城，国民党被迫分兵，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但是，在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被敌各个击破之后，不要说继续坚持进攻策略和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是继续保持中央苏区的存在，在军事上也是很少可能了。这是因为，无论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发，还是从其巩固自身，统一中国，以及建立"自强的空间"的战略设想出发，国民党都必须以共产党为"最大而且最近的一个敌人"[④]。在1932年12月，蒋已认定："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肃清赣匪，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⑤]因为，"强国之国防，重边陲，取攻

①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二），第280—282页。

② 1932年5月5日，中日《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签字。

③ 蒋介石于5月21日就任鄂豫皖剿共总司令，并亲往庐山亲自布署第四次"围剿"计划。

④ 转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708页。

⑤ 《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

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1]，中国必须“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2]。如今则首先必须统一长江流域，以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而苏区所在之处，恰是“中心的区域”和“中国的中枢”[3]，因此蒋志在必得。即便日军进犯华北，蒋介石只要有可能对日求得暂时妥协，势必会集全力对中央苏区作最后的打击，以期完成其建立所谓“自强的空间”和统一长江流域，进而统一中国的计划。特别是在第四次围剿之后，不仅中央苏区已失其倚角之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大苏区，更形孤立，而且中央苏区本身也日陷于分割和封锁之中，[4]在国民党军力更加集中和强大的情况下，蒋介石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所谓“总体战”策略显然足以对中央苏区构成致命的打击。

对于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没有共产党人看出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公开说：“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广东军和十九路军[5]的欺骗宣传怎么会不发生效力呢？这种情况就是“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6]。

共产国际自然不可能了解苏区群众的心理，他们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他们也已清楚地看到，红军不仅还不具

---

①② 转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676，747页。

③ 蒋介石：《剿匪的成效如何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1932年6月22日。

④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中央红军实际控制的地区只有吉水、峡江、兴国、乐安、宁都、石城、云都、会昌、黎川、建宁、宁化、连城及瑞金，比较1932年5月情形，可知中央苏区面积实际已缩小约一半，并已遇到严重分割。

⑤ 十九路军1932年5月下旬即被调往福建剿共前线。

⑥ 转见《中央局关于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斗争》第8期，1933年2月12日，等。

备向城市进攻的实力，而且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也只能处于战略上的守势。为此，他们开始反复告诫中共中央："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札的敌人"，因此，必须"注意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不能不惜重大牺牲地让红军固守领土，应该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作好准备"，"要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他们批评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进攻南昌等大城市的总战略，认为现在只应"力争从内部去攻克那些残存在苏区，已成为反动堡垒的城市中心"。"对大城市，在具有足够的力量和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包围的策略"，但目的也仅限于"扰乱敌人并把它的军队从苏区诱开"。因为他们确信，依照红军目前的力量，红军首要的任务只能是设法"巩固现有的一些根据地"，而不是向外进攻①。他们甚至委婉地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放弃原有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赏，鼓励人们必要时向西退却，声称"扩大四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意义重大"②。

最足以证明共产国际较临时中央政治局要现实一些的，是它这时破天荒地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一些策略主张。这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及《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等。在这些以中共中央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起草的文件中，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旧在重复着关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是一丘之貉的说法③。但与此同时，它又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帝统

①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4月14日。

③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

一战线”问题、声称：可以公开提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并宣言在此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①。尽管共产国际提出这一策略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揭破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②，但它毕竟注意到中国党此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意识到只有重新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才有可能使共产党人适应中国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于满洲这一特殊环境，他们甚至提出了“一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的策略方针③。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又重新开始具有了某些灵活性。

很难简单地断言，究竟是哪些原因促使共产国际又重新拾起了统一战线这一实际上早已被摈弃的策略武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共产国际已经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力量上仍旧处于劣势，远未争取到广大群众。“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说明绝大多数群众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还相差甚远。如果说人们并非完全站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一边呼吁统一和平的话，至少多数群众是主张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斗争，国共冲突让位于抵御外侮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固然不得人心，共产党的“民众

①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

②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发展中的新现象》，《共产国际》第4卷第4—5期，1933年5月31日。

③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

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同样难以发生宣传效力。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接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让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国民党成为众矢之的。

共产国际的这一策略，即使仅仅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对于正处于严重军事危险之中的共产党人和苏区红军，应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三条件”宣言，若能付诸实施，必会使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发生分化乃至混乱。不论这在实质上是否有利于抗日，但显然有助于共产党和红军摆脱危机，以至利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联合一切不满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剿共战争的党派团体，动摇和推倒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治。可是，仅仅根据“三条件”之类的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乃至共产国际远东局，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

还在1932年12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到共产国际要他们搬到中央苏区去的电报指示，开始分别动身前往苏区了。新设立的上海中央局负有同远东局联系的使命，但实际上因交通及通讯均不便，对白区工作的指导乃至整个党的指导工作，都由远东局实际承担起来了。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但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来指挥中国革命，结果不仅不比临时中央政治局年轻领导人在上海时好，甚至更为糟糕。中央苏区乃至苏维埃革命最后的一线转机，就葬送在了他们手里。

1933年初，冯玉祥因不满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试图以抗日为号召重新聚集旧部，开创局面，故与中共北方特科秘密结盟，并组成了作为共同领导机构的工作委员会。鉴于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冯迫切希望苏联再度从外蒙给予援助，因而对中共人员的帮助和意见极为重视，甚至愿意“由我们党来主张一切的

办法，他绝对服从”①。3月初，冯玉祥正式接受了中共北方特科提出的《抗日同盟军纲领草案》②，并经过中共人员的具体帮助，在5月26日正式于张家口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由冯就任总司令。

从中共北方党组织最初的策略看，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苏维埃和红军的前途，但其开始毕竟意识到应以抗日为号召，以“抗日反蒋”为手段，联合可能反蒋的国民党军人，“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发动和扩大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战争”③。尽管他们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同盟军的直接作战目标只能首先“严重打击蒋和张④的军队”，“‘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话”⑤，但提出联合反蒋派“推翻蒋介石”的策略思想，至少对分裂国民党、打击蒋介石，缓解中央苏区所面临的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压力有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这样一种试图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统战策略，在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那里也不能通过。尤其当抗日同盟军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下，不顾一切，首先挥师北上，恢复失地之后，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局以中央名义对北方党的工作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明确提出：第一，组织抗日同盟军必须以“在华北创造新苏区”为目的，故军事上只能向南移动，“不能与日本军队作战”，以便提出攻打南京政府的口号，使其与南京政府的军队进行战争⑥，而“不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则我们反对日本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是不能胜利的”⑦；第二，不论冯玉祥、方振武，或吉鸿昌对抗日或革命有何种忠诚的表现，他们的社会地位

---

① 《马同志关于张家口事变的经过报告》，1934年1月30日。

②③ 《关于抗日同盟军纲领等问题的报告》，1933年3月10日。

④ 指张学良，因当时中共方针计划由张家口南进，进攻北京等地，而北京及河北前线部队则多属东北军。

⑤ 《关于抗日同盟军纲领等问题的报告》，1933年3月10日。

⑥ 《中央给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1933年6月13日。

⑦ 《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1933年7月3日。

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我们的敌人”，至多只是“比较有远见的敌人”①，他们之抗日，既是同蒋在帝国主义面前争宠，更是借此来发动“争夺北方领导权的新军阀的战争”②。因此，对这些上层领袖不能有任何信任，应把工作重心放到下层士兵群众中去，发动士兵群众进行“反冯及其他反动军阀的斗争”，孤立冯并打击冯，甚至举行以兵变为中心的暴动，“逮捕冯和他的要人”③。于是，冯玉祥在日蒋两面夹击、共产党人又极力孤立打击之，苏联不仅不予援助，反而斥责其有意挑起苏日冲突的情况下④，终于在8月初被迫重新宣布下野。冯去后，抗日同盟军立即分崩离析，共产党人虽终可调动一部实行南下方针，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

就在抗日同盟军举事不久，秘密准备与中共及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的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远东局及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等，先是指示上海中央局拒绝了蔡廷锴的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继而在明知十九路军有联共企图的条件下，下令中央红军组织东方军，乘蒋介石为应付抗日同盟军尚无力南下进剿，广东方面亦因与蒋矛盾重重，不会主动进攻的时机，转而向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攻势⑤。至9月下旬抗日同盟军濒临失败，蒋介石重又聚集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远东局虽不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尽快与十九路军达成停战协议，并强调宁可“给以小的让步”，也“不能失去时机”⑥，以便抽调东方军参加对蒋军之防御战，

---

① 《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1933年7月17日。
② 《中央宣传部关于“八一”宣传大纲》1933年7月5日，等。
③ 《中央八月份第一号指示信》，1933年8月3日；《中央八月份第二号指示信》，1933年8月9日。
④ 哈马丹：《中国军阀屈膝投降》，《真理报》1933年6月4日。
⑤ 见《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电》，1933年6月13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方面军改变原作战计划的意见》，1933年7月。
⑥ 《中央关于同十九路军谈判的指示电》，1933年9月27日；《中央关于迅速与十九路军订立休战协定的指示》，1933年10月。

但结果，尽管红军与十九路军签订了关于反日反蒋问题的有关协定，远东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依旧把这些决心公开反蒋的将军们，看成自己的敌人，并且不分清红皂白地指责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的各种派别和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激进的社会政策，“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的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其目的都是“为了要将群众把持在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之中，为了要拦阻群众走向他们的先锋队所指示的革命道路”①。因此，他们不仅不对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抱以希望，而且极力主张用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对付福建事变的领导者及其将军们。11月下旬，福建十九路军开始受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后，红军亦只是受命“假装帮助十九路军”，实际上仍然暗中以十九路军为敌。在蒋军巨大压力下，红军不是助共破敌，反而借机扩张根据地，甚至要“堵住十九路军入粤去路”②。到1934年1月中旬，十九路军已陷于内外交困之际，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去帮助十九路军维持其独立因素，但延长其实际与南京军队作战过程”，以争取时间，“使我争取其最大部分群众和武装”的行动原则③，乃至主张发表宣言和口号，“使十九路军哗变”，“用暗杀的方法，瞒着十九路军指挥者，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把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拉过来④。然而，随着十九路军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迅速瓦解，不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企图乘人之危，从中渔利的计划完全失败，整个中央苏区更是完全暴露在南京政府军队的攻击之下，使红军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

当然，红军及中央苏区之失败，并不仅仅取决于上述政治谋

---

① 《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1933年11月18日。
② 《中央局关于今后任务的指示》，1934年1月8日。
③ 《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的意见》，1931年1月20日；《中央局关于抵御福建军阀战争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策略》，1934年1月20日。
④ 《中央局转发国际对福建局势估计与策略的意见》，1934年1月26日。

略严重失误之一点，实际上这时苏维埃政策及中共军事指导方针各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但从根本上看，红军及中央苏区之失败，还在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囿于机械的阶级关系分析法，不能面对敌我力量极端悬殊这一严酷的现实，十分客观地为自己寻找出路。他们机械地把政治上的分野看得高于一切，盲目追求革命的彻底性而反对任何一种妥协和退让，以至极端主观地相信敌我力量的对比主要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应看成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以为阶级革命、阶级斗争以及一切革命的政治工作，都具有鼓动和吸引广大劳苦民众为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奇特效力，而“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斗”的口号，足以成为中国工农劳动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决战的最高动员令。为此，在苏区实际面积锐减的情况下，他们竟荒谬地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1]，大搞“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2]，反复分田，查田，一再打乱阶级划分，以明确所谓阶级路线，同时还在军事上提出了“保卫苏区的每寸领土”，“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划地为牢的纯粹防御战略[3]，雄心勃勃地摆出了一幅一战”决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生死的斗争”的架式，自信“民众的革命力量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与一切现代武装所不能战胜的力量”[4]。然而，1934年4月一个广昌保卫战，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40000余人，竟损失约5000人，国民党进攻部队仅伤亡2400余人；至8月高虎瑙、高兴圩一战，一、三军团又损失约2000人，敌伤亡不过千人[5]。

---

① 《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案》，1933年6月6日。

②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第一步一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1933年6月18日。

③ 见《第一方面军对北面军分区的密令》1933年8月1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1934年2月1日。

④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1934年2月1日。

⑤ 参见蒋纬国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第四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派来了军事顾问，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几乎全是在驻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这位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的直接指挥之下。对共产国际领导的驯服和迷信，使临时中央政治局把一切军事指挥大权统统交了出去。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失利，特别是广昌战役，终于使博古等人开始意识到敌人的强大，并多少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权威性开始有所动摇。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虽开始秘密考虑撤出苏区问题，但各种策略方针仍无丝毫变化，相反，形势越紧迫，其“左”倾作法越变本加厉。自5月以后，其不仅极力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没收征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一再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变相剋扣农民，以应战争之需。据不完全统计，自1933年底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共征新兵10余万[①]，发行公债300多万[②]，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约100万[③]，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④]。特别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在群众中更造成严重影响。至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岁—55岁左右），仅当兵、作挑夫及出外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⑤]。若以200万农民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至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

---

① 见陈潭秋：《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

② 《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1933年7月22日；等。

③ 见《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关于二期公债的谈话》，《红色中华》报，1934年5月24日。

④ 《红色中华》报，1934年7月5日，8月8日，5月3日。

⑤ 根据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及《才溪乡调查》，可知苏区农村中男劳动力所占人口比例约为25%左右，（长冈乡407:1785；上才溪554:2318；下才溪765:2610），外出工作及当红军者已占70%～88%左右。

劳力大部抽空[①]。而一面竭泽而鱼，一面又极力加剧内在矛盾。在查田查阶级运动中，“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20天内即在1512家里查出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②]。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均被强行编入永久劳役队，或“驱逐出境”，或“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均遭没收。由于大批中农不可避免地被划为富农或小地主，从而造成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以至连田也宁肯荒掉的恐慌情绪[③]。

1932年7月1日，天津《大公报》曾有则社论这样说：“共党占地，首重分粮分田，故贫民趋之，然战斗无已，生产不兴，粮尽后则如何？此事实问题也。是以共党之飘忽不定，不久守城邑者，非特军事上之避冲，实因根本不可久守。故中国现在之经济环境下，共党苟非久占一富源雄厚区域，外无战事，内有建设，则其势力不足久支，久则穷矣”[④]。这种看法虽过于简单武断，但其说确实抓住了红军及苏区生存的两大基本条件。即，第一，土地政策；第二，游击战争。前者使自己在贫苦农民中得以立稳脚跟，获得兵源及政治上、物力上的种种支持；后者则可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免强敌所击，同时通过打土豪及四处筹款的办法来维持战争所需，不致过分挤压农民。固守一地，不论所在富庶与否，在敌我各方面实力相距甚远的情况下，终必造成竭泽而渔，殊求无已，生产不兴，人心背离的局面。当然，在国共双方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尚须有赖军

---

① 关于1933年底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人口总数，很难有确切统计，初时或有200—300万人口，广昌失守后实已大大少于200万，即以200万为平均数，青壮年男子也只有50万左右，故若以农村男劳力外出80%之数计，可知再征兵10万，从城乡两方面人口数看，也已无法承担了。

② 《红色中华》报，1934年7月5日，8月8日，5月8日。

③ 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34年6月。

④ 《大公报》，1932年7月1日。

阀割据局面的长期存在和统战策略的灵活运用，通过纵横捭阖的策略手腕来不断扩展自己的阵线，以保证自己有足以和对方抗衡的实力。可是，临时中央这时不仅划地为牢，竭泽而渔，而且外拒友邻；为丛驱雀，这当然要走到捉襟露肘，内囊掏尽，弱不抵强，失土亡国的结果。

1934年7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7个县的范围，形势极端紧迫。为便利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做退出苏区，向西突围的准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先是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开辟苏区，以此调动敌军并减缓其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随后又命令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并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为保证突围的高度机密与安全，李德、博古等突然变得极其谨慎，他们不仅向外界，而且向党内，包括中央政治局严密封锁消息，并且把干部分为几类，除需带走的外，竟决定把其信不过的干部如瞿秋白等留在苏区，对他们怀疑可能成为隐患者，则干脆下令杀掉。于是，相当一批红军学校教员、被俘军官，和各种人等被秘密处决。与此同时，他们在公开场合，乃至在军事干部会议上，仍旧摆出一幅准备死拼到底的架式，要求部队按计划与敌决战，要求地方务必再送3万名新战士上前线去①。然而，除粮食尚可暂时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等各种物资供应这时已完全陷入绝境，甚至民心也开始动摇，仅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数千至上万人之多②。显而易见，形势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

① 《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1934年9月3日。

② 参见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军委总参谋部第五局局长及军委动员武装部长杨岳彬叛变后所写文章，载《申报》1934年10月13日。另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第154—158页所列表格可知：1931—1933年秋，中共自首者共276人。而1933年秋—1934年9月，除被捕4505人外，自首达到4213人，可见此时动摇者之多。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普通的夜晚，8万多红军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从瑞金及其附近那些村镇和尚未被炮火摧毁的堑壕中、掩体中涌了出来，极其秘密地向西潜去。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银行、医院、印厂等等渐渐远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地图上消失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人类历史上实际只存在了1070天。但是，为了这个“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的存在而进行的斗争，却已经历时七年。七年的暴动、战争和流血牺牲，以数十万人的生命所换取的成果，竟至毁于一旦，这当然是一种悲剧。然而，更大的悲剧却在于，这些匆匆离去的共产党人，其主要领导人这时还不知道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们仍旧从“左”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因而相信：政治分野和阶级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没有意识到，革命固然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平等的重要手段，但革命手段与革命目标之间却并非总是划着等号。特别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以后，继续机械地坚持彻底的毫不妥协的苏维埃革命立场，只能使自己日益陷于孤立，以致面临失败的局面。

（四）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坚持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特点，它始终支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方针、政策和策略。但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革命的涵意还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时期的共产党人的立足点，事实上还有区别。对于三十年代初期那些有幸登上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的留苏学生来说，他们显然更习惯于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理解革命。在他们看来，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苏联的存在，已经造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对立”的局面，苏联因

此不仅成为“动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最有力因素”，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主义极端恐惧，必欲置之于死地的敌人①。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革命也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②，但同决定着世界共产主义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苏联的事业比较起来，它仍旧只是一种革命的局部利益，仍旧必须时时准备以局部利益来服从于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这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每时每刻要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看成自己“最主要的危险”；“十倍、百倍的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满洲国的反苏联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的群众的保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运动”③，“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④；而且要能够随时随地根据苏联利益的需要，来变换自己的策略方针，直至作出某些必要的牺牲。用共产国际比较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要准备“用你们的身体造成一条环绕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活的、不可摇撼的壁垒！”⑤。

要想了解这些这时还习惯于按照苏联教科书进行思想的年轻留苏学生的思维方式，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言论都可以在苏联现成的理论和历史的课本中，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中，找到根据。他们尤其了解“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⑥。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列宁是怎样论述“变现代

①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202页。

③ 《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1932年3月25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1932年6月24日。

④ 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1932年3月31日。

⑤ 转见《红旗》周报，1932年第43期；《实话》1932年第3、4期，等。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页。

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①，以及如何在实际行动中促使本国政府“在军事上接二连三地失利和失败”②，来实现这种转变并发动革命成功的。毫无疑问，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是很容易接受“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而苏联这一无产阶级祖国的诞生和两个世界对立局面的形成，更进一步使正在与本国反动政府斗争的共产党人容易理解列宁关于变国际间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容易接受“拥护苏联”乃至“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共产党人固然“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并且必须首先在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内活动，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确信：“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③。甚至完全有义务保卫“涉及千百万人的、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④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只能时时处处高举着“武装保卫苏联”的大旗，即使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情况下也毫不例外。这是因为，如同世界早已被划分为两大壁垒一样，中国也已然成为两个世界对立的缩影。作为社会主义苏联一方的“苏维埃中国”，同作为帝国主义一方的“国民党中国”，二者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没有任何形式能将它们沟通。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的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内容，让人难以把握，而共产党人则多半只能纯粹从阶级的和革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于是，谁亲谁疏，更是一目了然。

然而，苏联是否如此刻板呢？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外交上的一系列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并不完全依照书本行事。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尽管共产国际一再告诫各国共产党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6，23，256页，等。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19—420页。

人，反苏战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苏联的宣传机器却试图告诉全世界，日本的行动是帝国主义为“彻底瓜分中国”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大阶段”①。在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苏联一方面宣布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是一个不知民族耻辱的政府”，只有苏维埃中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才能赢得并捍卫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保障国家的真正统一”②，一方面却公开派员拜访国民党中国的代表，要求恢复同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③。而在日军占领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之后，苏联则干脆直接同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谋求缓和，明确提议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④。到1932年2月日本扶助的傀儡伪满洲国宣告成立，苏联方面更是率先予以默认⑤，不仅公开承认满洲国任命的一切人事和机构，而且声明“确认满洲政府对于中东路之主权”⑥，进而直截了当地与满洲国代表团接洽和谈判让售中东路的权益问题。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积极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复交谈判，并很快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了双边关系。

当“苏维埃中国”正在与“国民党中国”作殊死战斗，向日本公开宣战，并发动东北民众向日伪作游击战之际，苏联却极力向“苏维埃中国”的敌人谋求妥协与和平，这无论如何不是中国共

---

① 《满洲分赃的斗争》（社论），《真理报》，1931年10月18日；并见《消息报》，1931年9月21日，等。

② 米夫：《中国的革命斗争》，同上，1931年11月13日。

③ 参见《消息报》，1931年11月15日。

④ 见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下），第752页。

⑤ 乔纳森·哈斯拉姆：《1930—1931年苏联外交政策》，1983年香港英文版，第73页。

⑥ 见《苏俄评论》，1932年第3卷第1期。

⑦ 该项谈判自1933年6月1日起，于1935年3月12日结束。苏开始提出让售价为25000万金卢布，最后实际让售价仅14000万日元，约合3500万金卢布。参见莫尔著，曹未风节译：《苏联的远东关系》，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7—20页。

产党人所希望的。但是，还有什么能够比维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安全更重要的呢？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于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共产党人来说，苏联的作法总是必要的，勿庸置疑的。特别是1933年1月德国法西斯上台之后，苏联开始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东西两面的严重威胁，从而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它不仅开始更加主动地和那些它一向认为是同样抱有反苏野心的欧美各国政府，提议和谈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互助条约之类的和平协定，而且破天荒地向那些仍旧被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看作仇敌的帝国主义国家，呼吁建立什么集体安全体系，仿佛一夜之间魔鬼也可以变成朋友了。

苏联的所作所为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明显地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苏联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而重又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大俄罗斯民族国家了呢？这当然不能。作为共产党的苏联，不论其出于何种现实的自我保护的考虑采取怎样的外交策略，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其基于意识形态而为自己规定的标准和目的。忽略了这一点，就如同忘记了这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同一位领袖斯大林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这时真正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的，仍旧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说，尽管苏联此时极力向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推销和平，但其内心深处依旧相信：魔鬼终究是魔鬼，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它虽然注意到欧美各国中有许多“由于某种动机不愿意破坏和平而愿意和苏联这样一个有信用的主顾发展贸易的国家”①，可资利用，但它充其量仍不过把它们看作是些“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其出发点也仅仅是在“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和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3—266页。

"一切利害冲突"而已①。

不过，利用矛盾总比固步自封，坚持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端政策强得多。1932年底1933年初，随着苏联策略灵活性的加强，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注意到这种利用矛盾的灵活策略的积极意义。在他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也明确出现了"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②的相对灵活的策略主张。只不过，他们仍旧没有忘记提醒满洲的党组织："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因此，即使"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也"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并且，这种统一战线必须"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③。

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意义，是1933年共产国际行动主张的重要内容。当德国法西斯上台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欧洲最大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率先呼吁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使一向把社会民主党看作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罪恶帮凶的共产国际，一度深感被动，以至出此下策，以便能够排除其上层影响，把握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但值得注意的是，继续坚持这种纯粹脱离实际的割裂上层下层的机械作法，已经不大符合追求策略灵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

② 《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

③ 《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

活性以便利用矛盾的变化趋势了。1933年10月，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开始从此前打击中间势力的传统作法中摆脱出来，注意强调斗争口号的民族色彩，而不再突出强调其阶级性了。他们指出：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抗日救国”．“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因此，目前“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的、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①。尽管在这里人们仍旧把国民党视为自己的敌人，并且尚未试图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但它显然不再把那些介乎国共之间的社会名流及中间分子统统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并试图利用这些“名流学者”，甚至“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中间知名人士，来赞助他们提出的丝毫不带阶级色彩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②。

几个月之后，当苏联共产党确信可以全面推行其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之后，共产国际也开始全面改变以往的僵化政策了。人们不再重复那种“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③的激烈口号，第一次明确主张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的斗争目标，而以争取扩大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为具体的斗争纲领，进而开始全

---

① 《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10月27日。该信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包含以下六点：（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② 《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10月27日。

③ 《真理报》，1933年10月8日。

面改变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事包办的制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新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甚至直截了当地主张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吸引广大工人劳动群众在我们领导下投入革命斗争"的僵化领导，主张今后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根本抛弃"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口号①。

1934年7月，随着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中共代表团也开始在统战策略上变得更加灵活起来。7月19日，王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应当把民族革命任务与国际革命任务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张在宣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同时，还应该指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②。不论这种提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考虑，把民族问题提高到与阶级革命问题平等的地位上来切实加以强调，这毕竟是一种很大的变化。

8月3日，中共代表团第一次不再简单地把国民党内的各种派别统统看成是反动的一帮，而提出了利用其内部矛盾，以便集中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策略思想。在9月16日康生和王明二人联名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们更进一步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同时，在反蒋运动中"不要象过去只等人家来找我们，而要我们去成为反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到处去抬出我

① 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

② 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

们党的招牌”，应当更注重实际工作的效果①。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非完全没有策略头脑，即使典型的靠啃苏联书本成才的王明等人，也并非完全不懂得利用矛盾这个道理。王明等人说得很清楚：“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应当“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②。

1934年11月，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向西突围之际，中共代表团开始明确地批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及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在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上的错误作法。王明公开认为，今后党的工作必须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反帝浪潮空前高涨，以至“许多军阀军队都不能不带有情愿为保卫祖国而对日作战底情绪”这一新形势，实行反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就是：“第一，无论军阀派别之间存在和发生某种矛盾和冲突，我们党都要尽量使之发展并特别使之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底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因此，红军必须与一切反蒋派别实行联合。第三，由于“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早迟不免转变为反蒋武装斗争（如十九路军行动），同时，每一个大的反蒋武装行动，也有可能变成与日本帝国主义底公开战争（如吉、方、冯等在北方行动），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

① 《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② 《王明、康生给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1934年8月3日。

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进而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底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分”①。

从利用矛盾的角度出发，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是“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一种外交手段，把同反蒋派别的关系看成是同“暂时的、动摇的和不坚决的”“军阀派别”及“敌人军队”的相互利用关系②，这反映了人们这时仍旧继续强调阶级立场和政治分野的出发点。不过，即然确定了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为头号敌人的方针和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为具体斗争目标，这势必要导致对前此一系列方针政策之策略的变动，并将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苏维埃革命方针发生重要影响。

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是彻底革命的方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剥削阶级的派别集团，采用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法，通过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和阶段，在半殖民地中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性质固然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革命任务亦包含资产阶级民族解放和打破封建及半封建专制统治，争取自由平等的内容，但由于它事实上排除了作为理论上的革命主体的资产阶级，甚至把它当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以争取巩固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统治权，而不是以争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为基本的政治目的，因而早就在各方面脱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成为直接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的革命了。依据这样一种方针，共产党人在阶级关系上回旋的余地是十分狭窄的。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只承认“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可以享

①② 《王明选集》第3卷，第114—142页，《中共代表团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11月14日。

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对一切“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是主张实行阶级专政的，甚至连广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被排除在外①。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贯彻以抗日反蒋为中心的新的统一战线策略，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5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试图扩大以往相对狭隘的阶级界限。6月3日，在王明、康生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出现了“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的新提法②。“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显而易见是同前此只承认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地位和革命作用的方针大不相同的。虽然，这还仅仅是针对东北沦陷区党的工作提出的具体的工作方针，但同时，人们毕竟对整个中国的敌友关系也开始做了新的划分，即“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建立“人民统一战线”，“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贼、兰衣社匪徒！”③这里，“人民”的概念固然与“全民”的概念还有明显区别，但显然也不是过去所强调的工农阶级概念了。

紧接着，在1935年7—8月召开的决定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它准备包括中国“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即“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一切已经用武器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

---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

② 《王、康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1935年6月3日。

③ 《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年6月15日。

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们压迫的民族”。中共代表团甚至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愿意和一切反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①。

在殚精竭力地为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了8年之后，突然宣称愿意同它一向视为敌人的各种中间的和敌对的党派团体一起组织一个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央苏区丧失之后，共产党人对继续苏维埃革命丧失信心了呢？这当然不是。从共产国际“七大”热烈欢呼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展，和明确希望强大的红军“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②看，可以知道，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丝毫没有想到过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问题。当然，改变是明显的，前此的“工农”开始由“人民”所取代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再也不仅仅局限于下层的工农劳苦民众了；甚至还有了在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外，另外建立一个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设想，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开始比较现实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而不再一味自信苏维埃革命的号召力了。

然而，事情也仅仅是开始而已。由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而带来的种种变化，这时多半还停留在策略上。甚至“人民”概念的提出，也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报告强调红军必须同时“反对本国资产阶级”③，而变得有些黯然失色。共产国际尤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牢记自身所肩负的苏维埃革命责任，并坚信：“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的统一中心，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统一和团结一切反帝势

① 见《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5卷第60期，第1488—1491页。

②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363—364页。

力，来进行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斗争”①。故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使苏维埃“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②。这里，共产国际对“抗日反蒋”方针的实质作了最好的脚注。即是说，所谓“抗日反蒋”，就是要把坚持苏维埃革命与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把阶级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并要以苏维埃为统一和团结的中心。

坚持苏维埃革命与人民反帝运动相结合，并以苏维埃为中心，这确曾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采取的一种策略方针，但是，在1934年秋中央苏区不复存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极端惨重的打击之后，再来实行这种方针，却未必是十分明智的了。这是因为，随着中央红军开始向西撤退并被迫进行长征，蒋介石南京政府也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一向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云贵川康等省，一方面红军越走越远，并又接连放弃了川陕及湘鄂川黔两大根据地，被迫折向西北远离腹心之所，先后损失兵力达10万以上；另一方面蒋介石乘机扫除异己，“将一向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了③，既去了所谓“心腹之患”，又极大地扩大了其势力范围，奠定了所谓“民族复兴的根据地”④，蒋介石的地位及势力也随之愈益巩固和增强，其“安内”及“统一”的目的也已接近实现。

不难看出，在1934年秋之后，敌我力量的消长正在向着不利于共产党方面发展，随着红军势力被迫从华中、华南及西南等重要地域退出，共产党及苏维埃的影响和号召力自然大大降低。而与此同时，随着红军从各要害地区退出，不再对南京政府构成严

①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3年版，第136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119页。

③ 蒋介石：《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1936年1月16日，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709页。

④ 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747页。

重威胁，蒋之安内攘外政策也开始有了某些变化。1934年夏，当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形势已完全明朗之后，蒋介石即开始认真着手对苏交涉，甚至试图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而其军事部署上，也似乎有了由所谓“剿匪”转为“以抗倭为中心”[①]的倾向。蒋介石于1935年秘密调集大批部队构筑由苏州、常熟、嘉兴、江阴等地，向长江两岸及黄河流域逐次推进的以南京为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同年，蒋并下令成立“陆军整理处”，准备四年内整理陆军60个师。不仅如此，当日军进一步威胁平津华北地区时，蒋竟以演习为名，先后向平汉路南段沿线及京沪线南段沿线调集了20余万中央军，而把非嫡系的地方军队调去应付共产党了。这种情况表明，蒋介石似乎已经开始把来自日本的威胁放在了更重要的地位，对共产党的威胁不那么担心了。而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不论以苏维埃为号召，还是以抗日为号召，来发动反蒋运动，结果都将变得愈来愈困难。

当然，在1935年，蒋介石对日态度还是动摇的和不明确的，以抗日为号召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还是有些号召力的。但是不是要处处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呢？还在3月间，原福建人民政府的一些反蒋头面人物，在宣布赞同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决心以共产党为唯一的真正盟友之际，就明确表示希望中共能够放弃还不适宜作为直接斗争目标的苏维埃革命方针[②]。尽管共产党人对此还断难接受，但在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不久，人们还是从“七大”那些关于必须以苏维埃为中心之类的空洞口号上退了下来。人们显然已经有所意识，依据目前的局势，仅仅做出某些策略手法上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不是苏维埃革命方针应当改变的话，苏维埃政策上的变化无论如何是必须的。否则，绝不可能使共产党人与各个反蒋派别建立起统一战线来。

---

① 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绪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一）第742页。

② 《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代表给王明康生的信》，1935年3月10日。

9月，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议，决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肯定要以反日为号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只有不仅与农民，而且与地主，不仅与小商人，而且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实行合作，才能有出路。

10月1日，中共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时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集中一切国力"，"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①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讲的是外争高于内争，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公开把各种反日反蒋势力，"不管什么阶级"、"不管什么党"②，统统看作"兄弟"或"同胞"，并且提出为"民族"、"国家"、"领土"乃至"人权自由"而战的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口号，这标志着共产党人正在从早先"彻底革命"的立场上大踏步后退，甚至在从共产国际"七大"的立场上后退。他们已渐渐注意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只承认共产党和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性，将其他党派和阶级统统视为反革命的狭隘观念，而首先就必须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给予工农劳苦大众以外的阶级，即"所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武装斗争的人"，以公民权；使"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底非共产主义的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能够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他们的代表，包括资产阶级出身的专门人材，则应允许参加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工作。

①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

② 《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

同时，应当停止剥夺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停止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私人工商业，等等，以便“使我们的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本身适应目前策略变动的需要①。

以往的工农苏维埃自此失去存在的可能了，“人民苏维埃”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尽管“苏维埃”的形式及其旗帜依旧保持着，但从“工农”到“人民”这一阶级范畴的大幅度变动，不能不使苏维埃革命的基础日渐缩小以至动摇。实际上，渐渐地，苏维埃作为一种革命形式，只是共产党人用以保持与蒋介石南京政权对立的一种革命标志罢了。策略上的转变导致政策方针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人们最初始料所不及的，却又是不可避免的。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苏区。这支一年前从中央苏区撤出时总计约8千人的庞大队伍，这时只剩下不过5千人左右，以至其自9月始不得不实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全力北上，准备“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以便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使这数百名干部和数千战士得以保存下来，然后再“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②。直到他们发现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存在，这才停下脚来。但是，即使和陕北红军汇合起来，红军的兵力也只有1万人左右。加上陕北地贫人稀，苏区面积极为有限，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依旧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

11月中旬末，张浩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派遣秘密

---

① 分别见王明，《中共的新政策》，《布尔什维克》1935年第20期；《为争取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救国报》1935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新策略》，《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70期，1935年12月21日；《中国共产党新策略的基础》，《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71期，1935年12月27日；《全面转变我们的工作》，《国际新闻通讯》第16卷第8期，1936年2月8日。

② 转见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

潜来陕北，使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长达一年多之后，又再度直接了解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包括（1）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3）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4）富农政策及相关政策亦加以改变；同时，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等等。不难看出，就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来说，共产国际关于策略转变的这一指示，是至关重要的。

早在1935年1月，当军事失败已成定局，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而博古等人仍旧无所措手足之际，中共中央就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成分，以洛甫为最高领导人，并重新起用了毛泽东，随后并委其以军事上的重任。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关于转变策略的重要指示，即使洛甫、毛泽东等人，要想迅速摆脱前此关门主义的倾向，也是极为困难的。很明显，遵义会议并非是人们自主地摆脱共产国际影响的一种尝试，相反，人们依旧相信共产国际是正确指导的化身①，并且仍旧对共产国际的指导保持着某种依恋的成分②。值得庆幸的是，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及时调整，使面临危机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免于重蹈覆辙，并且为其纵横捭阖，扭转危局，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由此，共产党人的统战工作迅速展开。

12月25日，中共中央于陕北瓦窑堡通过决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自己的各项政策。这包括：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及财产，允

---

① 参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1935年1月8日。

②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曾采取过各种办法来打通与国际的联络，以便求得后者的指导与帮助。

许有产阶级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①。毫无疑问，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转变之后，中共中央开始对国内外形势以及阶级关系有了新的估计。他们相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并吞中国本部"，挑起华北事变，全中国人民已陷入"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从而"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不仅过去脱离革命乃至一度倒向反革命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就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也"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②。当"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弱点"的时候，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共产党人"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而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要从敌人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以便于孤立和打击敌人③。不难想见，这一策略思想的提出，对于正处于绝对劣势之下，却又必须坚持以苏维埃政权形式与蒋介石南京政权对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很快，只有1万余人的红军同国民党张学良、杨虎城统率下的10余万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从而迅速在陕北站稳了脚根。中共中央甚至与张学良结成了秘密同盟，准备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以西北为中心发动全国的抗日战争。为此，中共中央明确主张，按照实力原则推举张学良为未来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应吸收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从给予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公民权，到允许有产阶级

---

①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

②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0，152页。

④ 《洛甫致王康电》，1936年7月2日。

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从取消入党参军的严格的出身成分限制，到准备吸收中国最著名的“大军阀”之一张学良入党，这鲜明地反映了新一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洛甫、毛泽东等人的务实精神。尽管在共产国际关于坚持以苏维埃为中心和以“抗日反蒋”为方针的具体指示下，他们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灵活务实的精神来分析形势和从事统战工作，但他们显然力图更多地从实际需要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来处理问题。1936年4月13日，刘少奇即公开向全国各界宣告：在抗日的前提下，共产党人将不仅进一步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与财产，而且将停止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和行动，直至“援助南京”①。随后，在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中所提出的谈判协定草案里，更明确提出：一旦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共将同意国民党在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占指导地位；而依据将来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或将更进一步赞成全中国真正的民主统一②。十分明显，所谓“赞成全中国真正的民主统一”云云，表明中共领导人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在一定阶段放弃苏维埃及红军的形式的必要性了。

以彻底的阶级革命为内容和特征的苏维埃革命，作为一种革命运动和特定的革命模式，自从共产国际转变其在中国的统战策略及其有关政策以来，就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存在意义了。这是因为，统战策略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共产党人对阶级关系认识的改变和阶级政策的大幅度调整，而重新把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看成是革命动力③，把富农乃至抗日的地主看成是革命的同盟者④，甚至重新向自己最大的敌人国民党呼吁和平与合

---

① 陶尚行（即刘少奇）：《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5月2日。

②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③ 参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④ 参见陶尚行：《关于共产党问题的一封信》。

作，乃至准备依据实力原则承认后者的指导地位，这无疑使自己的政策又重新回复到国民革命的阶段去了。所谓苏维埃革命，只是名存而实亡。当然，要立即放弃这一人们为之浴血奋斗已将近十年的革命旗帜，还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苏维埃”，作为一种特定的革命模式，或许适用于俄国，却并不适用于中国，尤其不适用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中国，这时多半还只是极少数共产党人开始有所意识。而共产国际竟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清楚地反映了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以往革命形式所怀有的那种眷恋之情。

来电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本不要求削弱苏维埃，不要求将红军溶入抗日大军和将共产党溶入中国某种总的政治联盟。”具体说来：“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它组织在完全保持它们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在共同的抗日立场上的协调一致。在军事方面，抗日统一战线应该是红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在组织抗日联军问题上的协调一致，而这些力量当中的每一支力量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都对自己的作战地段负责，在完成共同的作战计划任务时都服从统一的指挥。”因此，来电尖锐批评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的“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钻进党内的决定”；“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不加选择地接收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队伍的做法”；以及“允许有产阶级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的规定等等，认为这统统有损于党和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纯洁性，不利于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①。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的权威性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挑战，共产国际的批评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致拥护。在8、9两个月里，从中共代表团到中共中央，都不得不忙于起草各种指示和开展自我批评，以便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全面修正自己前此的政策和策略①。

当然，共产国际的批评并非仅仅是教条式地重申关于阶级纯洁性和坚持苏维埃的方针的，而尤其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受到其英明的，甚至并不在这一点，而在于它及时地注意到继续实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纳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将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为整个中国确定的民主制度"②。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设想，这是否表明共产国际及苏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在中国有放弃苏维埃革命方针及其革命形式的必要了呢？至少，在此时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那里，还不存在这种明确的意识。季米特洛夫不仅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巩固苏维埃"，声称"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而且主张有必要"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以便据此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促使群众

---

① 中共代表团于8月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于9月15—17日，都相继召开专门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展开自我批评，同时并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中共中央还于1936年9月22日发出了自我批评的通知。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

“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①。在他们看来，民主共和国、全国议会、国防政府等等，固然可以视为“目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抵御日寇的最好手段”②，但真正的民主只能靠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来实现③。

不过，在民主共和国和联蒋抗日的策略思想提出以后，处于斗争最前线的中共中央对于“继续巩固苏维埃”的理解显然与共产国际开始有着某些细微的却是重要的不同了。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也在强调“继续巩固苏维埃”，但他们实际上已经看出，根据目前的实力对比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平等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关键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④，其它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当中共中央刚一得到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指示，它就立即发布了“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的指示⑤。而在紧接着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里，更明确表示：中共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⑥。随后，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开始考虑如何承认目前“最有力量的”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在红军名称、苏区政权

---

①③ 参见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救国时报》1936年9月18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36年7月23日。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

④ 《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0月8日。

⑤ 《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1936年8月20日。

⑥ 《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

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有关政策方面实行改变的系列重大问题[1]。

改变对蒋策略，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问题。早在1935年11月，中共代表团就曾经尝试着做出过类似的表示[2]。并且不止一次地声明，其“抗日反蒋”的方针“不包含说我们不准蒋来抗日”，“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3]。同样，中共中央也一直秘密地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表保持着政治上的接触，寻找着双方接近的可能性，并在公开宣传上逐渐放弃了直接号召反蒋的作法。现实力量的悬殊对比，以及排除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无法真正实现抗日的种种考虑，使得共产党人不能不对“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渐渐发生动摇。特别是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也都因西南地区无法立足而最终被迫退往陕北苏区，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旦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发动进攻和围剿，以“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4]的陕北甘北地区为依据的红军，势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或者与张学良东北军高揭“抗日反蒋”旗帜，另立西北国防政府、夺取陕甘青宁绥，发动全国性的反蒋战争，或者只能和蒋介石南京政府谋求妥协。毫无疑问，在1936年整个华北地区都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严重关头，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反蒋内战，不仅难以得到全国要求团结抗日的各阶层

---

① 分别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谈话》，1936年9月22日，《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0日。

② 王明：《驳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救国报》1935年11月7日。

③ （通信）《关于抗日讨蒋》，《救国时报》1935年12月14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最近谈话》，《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④ 《洛博周毛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并见《毛周彭关于陕甘各苏区情况致宋张任电》，1936年9月4日。

群众的响应，而且也得不到极度担心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张其军事野心的苏联政府的赞同。而得不到全国广大民众的响应，尤其是得不到来自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要说张学良东北军不敢贸然动作，就是实现了与东北军的军事联盟，仅以陕甘两省之物质条件和两军现有之兵力及装备，也难以同南京方面相抗衡。很明显，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与蒋介石谋求妥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而以现有条件来谋求妥协，设法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和党对苏区及红军的控制，自然成了唯一重大的问题。

然而，要寻求国共双方的妥协又谈何容易？国民党人这时的条件十分明确，即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①。而共产国际则要求共产党人"动员全国舆论"，使自己成为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通过普选来召集新的"中华全国议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真正代表各个党派组织的新的"全国国防政府"，不仅取消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地位，而且在全国实行区别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制度，乃至继续坚持苏维埃，推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解决土地问题"②。

中国共产党人未必不希望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行事。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① 具体条件可见1936年7月21日《雪夫工作报告》，即"（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于统一指挥之下；（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札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担负民族革命之任务。"

② 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

等文件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得到了全面的阐发和论证，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不能不为自己规定了一种“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旨在一方面向国民党“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并“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使自己最终实际成为“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运用舆论和实力两方面的压力，努力取消国民党的中心地位和强大影响。但理论上的这种“压力”将从哪里来呢？

8月25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洛甫、毛泽东、博古、周恩来联名致电王明，称：“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二、四方面军一旦加入，经济上将更加无法负担。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因此，中共中央“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立即占领宁夏，进而向青海及甘西推进，以解决粮食问题，并取得苏联之“技术兵种”、“飞机大炮”的军事援助。否则，红军“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向着“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的甘南、陕南、川北、豫西及鄂西地区进攻，结果将“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①。显而易见，“逼蒋抗日”的中心盘子正在于此。一旦有了苏联军事技术特别是飞机大炮的援助，不仅生存发展问题迎刃而解，南京以外反蒋各派亦将趋之若鹜，最终蒋介石集团多半也不得不放弃其苛刻条件，按照共产党人的意愿来达成双方间的妥协和平。

---

① 《洛博周毛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给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的这种考虑显然也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久已酝酿讨论过的问题。两周之后，即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明确复电批准了中共中央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的作战计划，并告知中共中央：在红军夺取宁夏后，苏联将通过外蒙向宁夏之定远营运送约200吨左右的军事物资①。

9月中旬，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全面展开，但蒋介石对西北红军的大规模围剿也相继展开，陕北苏区之大部迅速陷于敌手，而蒋之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及汤恩伯部等亦源源赶来，战局很快变得复杂化。随着10月底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受挫，整个宁夏战役遂告失利。而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为求红军生存计，竟不得不改取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的下下策，准备重新进行新的战略大转移了②。可事实上，一旦红军再度打入内地，不仅抗日和联蒋均成泡影，而且其生存和发展问题势将变得更加复杂而严重。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军政高级官员来到西安，亲自督阵，试图对红军实行毁灭性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当此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危急关头，早已暗中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于万般无奈之中，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官员。于是，整个局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试图最后置共产党人于死地的蒋介石，反而竟成为共产党人的俎上肉了。

勿庸置疑，对蒋介石直接握有生杀大权的，当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但是，共产党人对张杨决定的作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张学良等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及筹划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等等，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通过共产党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同情和援助，以便实现其抗日救亡，收复失地的宿愿。张学良深知，这时唯一能够给予中国抗日

① 《共产国际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9月1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

以强有力援助的国家，只有苏联；而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政策和对日妥协的作法，也必为苏联不满。尽管张学良因1929年中东路事件，已深深结怨于苏联，然而在中共中央代表的反复说明后，张已深信，只要与中共同一步调，不难取得苏联的谅解。但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取消“抗日反蒋”方针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之后，张之迅速取得苏联谅解和直接得到苏联援助的愿望自然再难实现。加以张协同中共实行劝蒋无结果，秘密配合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又告失利；眼看“剿共”大战在即，红军势将突围而去，与苏联络再无可能，靠蒋又绝无收复东北之希望，张学良自然只能下此破釜沉舟之决心，以求其联共联苏共同抗日之计划，有最后一线实现之可能。

不难看出，张学良之发动西安事变，至少有两层目的和考虑：其一，自然是以兵谏的形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转而抗日；其二，则是在蒋介石坚不让步的情况下，以此来取得苏联的谅解与同情，公开联共联苏，号召全国，以西北为中心率先发动抗日。可以肯定，依蒋之地位、威望及其性格，张学良绝不会过高估计蒋介石在武力胁迫下妥协让步的可能性，因此，其整个的计划和措施，实际上正是向着其第二层考虑布置和演进的。事变之初，张学良、杨虎城即迅速以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的名义，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公开接到西安，直接参予同南京政府方面和蒋介石等人的谈判工作，明确表示出愿与中共同进退的姿态。随后，张学良更进一步主张与共产党人公开组织事实上的西北政权组织一西北军事政治委员会，力图促使正在开始极力争取第三者地位的共产党人完全与其站在一起。

张学良的上述作法表明，他尽管不顾一切地发动了兵变，但他对最终的结果显然没有太多的把握。他并非不知蒋介石当时的影响和威望有多大，为此他不能不再三公开申明：“我们这种举

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①，但同时却又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在西安被攻时应不惜对蒋采取最后手段的主张，逐渐从不置可否进到表示赞同②。他虽有逼蒋劝蒋之心，但他深知此种局面对蒋羞辱之深，故不能不以全力做应战之准备，并在极大程度上把成败荣辱之希望，一度放在了中共和红军的身上。而事实上，张之寄希望于中共和红军，极力要求与之公开联合，根本目的仍在试图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也就难怪张学良、杨虎城一开始就把这次所谓“兵谏”行动，在内部明确称之为“革命”③，不仅愿知中共方面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④，并再三要求中共中央通报“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⑤了。很显然，只有不仅得到中共和红军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中共背后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援助和同情，这次“革命”才会有最终成功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张学良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张学良观察问题过于表面化了。他不仅忽略了苏联制定对华政策的复杂背景，而且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实际性质。其实，苏联这时考虑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多半并不从个人好恶出发，而只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样，由于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必须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承担义务，而不是相反，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丝毫也不会因为中共及其盟友的举措，而决定或改变自己的行动原则，中共中央却必须根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要求，及时修正自己的决定。于是，当苏联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决定支持蒋介石及南京政府，而中共中央也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坚持保持第三者立场之后，张学良

① 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② 参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7日。
③ 转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④ 同②。
⑤ 《李毅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17日。

“革命”的期望自然无从实现了。不论这是否促成了张最后贸然送蒋回京和自请处分之举①，但事变之后，西北“三位一体”之难于持久，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西北军，势将为此付出代价，似可想见②。这是因为，事变的经过表明，中共中央最终只能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希望，去努力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求得妥协，以便根本停止其剿共战争，并支持其领导下的统一和抗日，对各反蒋派及地方实力派，再难采取公开支持和纵容态度。

不过，西安事变毕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成果。顽强抵抗了将近10天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飞到西安，叙说了南京方面“戏中有戏”的情况后，终于开始松口，并很快通过宋子文等与张、杨和周恩来达成某种和平统一，共同抗日的政治默契③。这就不仅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且使10年来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重新找到了相互接近的立脚点，从而为全国和解，走向抗日和统一，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1937年1月2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放弃苏维埃制度，放弃普遍没收地主土地的作法，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的重要主张④。这种情况表明，在经过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尝试，特别是经过了西安事变这一重大政治风波之后，共产国际终于认识到：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运动，是不适应当前建立全国范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要求的。而中国共产党人也只有在放弃以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种种革命形式之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蒋

① 张学良在12月22日仍去电中共中央，力劝中共中央同意公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可见其这时尚无“负荆请罪”之想。只是在中共中央于23日讨论和委婉表示不同意公开成立这一政权机构之后，张才有此举动，或许此一拒绝对张之行动有些影响。

② 以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杨虎城被杀，东北军和西北军均被调散。

③ 关于蒋介石或受蒋委托进行谈判的宋子文、宋美龄对张学良、杨虎城等承诺的条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不论其说若何，蒋介石为布置剿共军事而来，却以停止剿共而去，这毕竟是历史事实。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1月20日。

介石达成真正的谅解与妥协。在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形势要求下，承认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作出某些重大的让步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从千方百计地试图"继续巩固苏维埃"，到最终不得不表示应当放弃苏维埃，这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那里，无疑是十分不情愿的。为此，他们甚至在电报中明确要求中共在中心城市保留根本不存在的"作为群众组织的苏维埃"，仍旧恋恋不舍地寄希望于未来的中国革命政权将会象俄国一样从那里产生①。而当中共中央根据国际来电起草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准备公开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②之后，共产国际竟一时感到难于理解。他们吃惊地提出疑问：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呢？事实上，共产国际本身就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甚至怀疑这种让步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目前只要声明共产党和红军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准备与之协商民主改组苏区政权，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权的基础上调整二者关系就足够了。关于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问题，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③。

很难相信，在1月20日电报指示之后，共产国际竟会对中共中央依据其指示提出的四项保证，提出如此多的疑问。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同以往一样，在这一新的政策转变背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1月20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2月5日。

后起作用的，又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毫无疑问，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和红军对国民党的战争接连遭受严重挫折，苏共中央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统治地位的巩固和日蒋矛盾的不可避免性了。为此，他们早就开始试图促使国共之间政治和解和公开反对一切反蒋内战。尽管他们最初未必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并且同样对放弃苏维埃问题犹豫不决，但是，当德、意、日三个法西斯侵略国家开始在反共反苏的基础上公开联合[①]之后，苏共中央领导人再没有其它选择了。它不仅促使苏联激烈地反对西安事变，而且直接导致了共产国际关于放弃苏维埃的决定。不管共产国际是否认为"需要仔细加以讨论"，事情已经不容改变了。就在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关于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疑问的当天，另外一份电报表明了这种情况。在这封仍旧是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的电报里，人们明确地表示赞同中共中央所做出的种种保证，并支持其据此而采取行动[②]。

2月10日，中共中央公开发出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在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并"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下，明确做出了"四项保证"[③]。这"四项保证"，满足了国民党一年多来始终坚持的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改编的基本条件。尽管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十分强硬地通过了所谓解决共党问题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即（1）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2）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3）根本停止其赤

① 在1936年10月26日，德意两国外长达成了秘密协定；在11月25日，德日又缔结了《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2月5日。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

化宣传；（4）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①，但事实上，明眼人一望便知，双方的条件已经相距不远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

至此，十年的内战结束了，那种充满了血与火、死亡和期望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厮杀也告一段落了，全民族联合抗日，救国救亡的局面即将来临。但是，随着苏区和红军将被迫改制改编，服从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领导，随着共产党人将被迫放弃自己的苏维埃及其革命标志，把蒋介石看成民族领袖并穿上过去敌人的服装，这不能不让共产党内"所有有思想的同志和左派人士表示〔感到〕有种说不出的烦闷"②。但是，共产党人是绝不会承认自己失败的。他们也并不因新的统战形式的建立和与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握手言和共同对日，而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目标。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和国民党争夺群众和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明确认为：本党所有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③，直至"成为民族革命领导的核心"④。而他们迅速抓住了"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的一环"，以便于"在彻底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下联合一切其他派别，团结与组织全国的左派及非蒋派"，抵制和削弱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⑤。与此同时，他们鲜明地告诫全党："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

①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1937年2月21日。
②⑤ 刘少奇：《关于建议解答有关国共合作的各种理论问题的一封信》，1937年3月26日。
③ 《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
④ 《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1937年春。

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牢记："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①。

被迫放弃苏维埃，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未必不是一种空前惨重的挫折与失败。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善长宣传鼓动和做群众工作的共产党人，与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一枪一刀地夺地盘，倒不如在和平统一和民族战争的环境下来夺民心。大革命的失败显然在于共产党人没有掌握政权和武装，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多半又因为共产党人不能有效地影响和争取民众。而新形式下的国共合作，则不仅使共产党人得以保存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而且使他们获得了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和群众工作的广阔天地，这样一来，顽固地坚持半封建式的传统统治方式，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国民党独裁政权，自然要相形见绌了。这也就难怪后来毛泽东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帮了中国革命的大忙呢！

①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3，266页。

第四章　在有意与无意之间

（一）“兄弟阋于墙”

作为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双重使命的承担者，共产党人的敌人是多方面的。然而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直接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构成障碍和威胁的实际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尽管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充其量不过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之一，自己对国民党的战争最终势必要演化为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直接反抗，但共产党人终究无缘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直接交锋。而且，仅仅一个国民党，就已经使共产党人发展受到抑制，并且使其越来越远离国家权力的中心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共产党的环境不可避免地更加恶化了。远比国民党要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同时，必须准备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不管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上级指挥机关——共产国际最初是否意识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客观的力量对比导致人们最终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这几乎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者必欲吞并中国大陆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身处陕北靠近华北前线的共产党人更是别无他途，他们只能以“兄弟阋于墙”的方式，暂时与同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不得不走向抗日的国民党人重新握手言和。

但是，“兄弟阋于墙”并不是放弃各自的主张，甚至并不是真正停止双方的争斗和对抗，它只不过改变了争斗和对抗的形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

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只不过“变为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因为鹬蚌相持，渔人获利，如果我们仍要与国民党打，便是对帝国主义有利的。”① 因此，国共之间的重新妥协合作，实际上只是在抵抗外国入侵这一点上达成了暂时的一致，而在其它政治、思想、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分歧、矛盾和对抗，丝毫也没有减少或消灭，它们不可避免地将以新的磨擦、竞争，乃至激烈的对抗和冲突的形式反映出来。虽然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不得不在表面上“臣服”于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然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以及最终由谁来领导和统一这个国家的问题，丝毫也没有解决。对于这种情况，不仅共产党人十分清楚，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也是非常清楚的。

还在1937年初，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就公开扬言中国共产党“其性质无异土匪，不过阴谋依附外力与国际组织，以谋危害国家而已！”“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停止其阶级斗争”，同时“须与第三国际断绝关系”②。他甚至下定决心：“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③。

相比较而言，这时共产党人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他们无论在公开的还是在秘密的场合，都没有直接提出消灭或根绝国民党的任务，甚至没有直接提出打击国民党的任务。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结果，他们这时提出的最高要求，不过是建立一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种进步势力在内的民主共和国；所希望实现的，不过是一个改革政治、改良生活，以便动员人民共同抗日的“十大救国纲领”④。当然，他们不相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能够领导人民走上“全面的民族抗战”的道路，更不相信坚持独裁统治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45页。
② 参见《蒋介石与日本武官喜多诚一的谈话》，1937年3月15日，等。
③ 见蒋介石1937年2月8日日记，《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192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1--344页。

的蒋介石会自动放弃"一党专政"，走向民主政治的前途。为此，他们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政治领导的责任问题，确信"目前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实现我们的领导"，"孤立民族资产阶级"，"把群众抓在我们手里"，以此造成"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但其所提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方法，却不外乎（1）"把党的影响占优势的区域变为彻底的抗日模范区"，"创造活的样本来教育全国人民站到我们方面来"，同时"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并使共产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1]。（2）通过要求民主自由的方式，掀起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迫使国民党承认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利，改革政治制度，"一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不难看出，共产党人这时对新形势下两党矛盾斗争的估计，更多的还是从理论的和道德的范畴出发，相信这不过是一种多少平等的党派之间的政治竞争。他们甚至认为，这种竞争将不会以传统的军事对抗和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所谓："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2]。

"模范"和"民主"，这是共产党人用来向国民党人进攻的拿手好戏。立足于下层，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共产党人，对于立足于上层，习惯于传统统治方式的国民党人，在争取群众问题上有着先天的优势。毫无疑问，在共产党人看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等等，只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是用于达到一定阶段的革命目标的一种权宜之计，它不能也不应该妨碍革命最高目标的实现。恰恰相反，它应当成为实现革命最高目标的"必经的桥梁"[3]。十

①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41—242、149页。

② 毛、朱、周关于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等问题给张云逸的指示，1937年6月24日。

年内战的曲折经历，使人们这时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人们已不再幻想那种“纯粹又纯粹”、“笔直又笔直”的革命力量和革命道路①，他们这时开始格外地重视策略的应用了。他们知道，放弃苏维埃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的革命目标仍旧是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同时更清楚，以他们目前的实力，他们是不能同时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人的。毕竟洛甫说得好：“天下的乌鸦不是一般黑的，理由就是其黑的程度颇不一致”。因此，“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打倒一切是小孩子的幻想，结果是被一切打倒”。“只有懂得在适当时机集中主要力气打击最坏的敌人”，才能使革命不断走向胜利。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明天反对资产阶级②。基于此，中共中央不能不在国共合作之初，就明确提出了“联合”和“孤立”国民党的双重方针，即是说，必须联合国民党以推动它向抗日和民主的道路上走，同时又必须注意孤立国民党，以便于争取领导权和牢牢地把群众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选择一种最便宜的形式来实现革命的转变③。人们显然已经看到，“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可走两条路：一是打仗，像十月革命那样；一是不打仗，将来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到底要不要社会主义社会？表决一下，通不过，慢慢再来。”④如果共产党人掌握了群众和领导权，那么就完全可能不打仗不流血，比较容易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去⑤。

所谓“和平转变”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并不是新的创造。还在大革命时期和苏维埃革命时期，人们就已经有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但是，在十年内战之后，在取得了军队、政权、根据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7页。
② 《洛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5月。
③⑤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46—255，263—267页，等。
④ 毛泽东：两党合作问题，1938年4月5日。

地等种种武装割据的手段和条件后，试图与执政的并且是一味主张独裁的国民党保持一种平等的政治竞争关系，甚至试图掌握群众，孤立对方，争得领导权，而又不致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

国民党对国共关系的态度是明确的，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编共而不容共”①。自恃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军队的国民党，自国共谈判之初就抱定了一种“招安”的架式，对共产党人百般刁难，力图把其政权和军队搞掉，进而把共产党全部“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②。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直至七七事变和日军进攻上海之后，蒋介石下决心全面抵抗，国民党才被迫于事实上承认了两党的合作关系，放弃了全面控制共产党军队和政权的预谋。但这并不等于说，国民党由此改变了他们对国共关系的本质看法，真正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恰恰相反，正如毛泽东在抗战开始后不久所深切感觉到的那样：“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统制政策不变”③，对共产党及其军队、政权“限制”“破坏”一日不停，对各种群众组织和团体更是全面控制，反对共产党人插手。很显然，国民党自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对共产党人抱以高度的戒备心理，担心共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故而全力以赴地“设法防制之”④。

一方面要争取民主，掌握群众，打掉国民党的独裁和统治政策；一方面则必欲限制和消弱共产党，维护并完善其独裁统治，这不能不使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充满了种种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在共产党人看来，他们既肩负着引导抗战胜利的重大使命，又肩负着最终引导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直至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重任，因此，他们不能不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壮大自己，不能不

①④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192，112页。

② 《蒋总统集》，第1038页。

③ 毛泽东电报批注，1937年11月11日。

对国民党同样保持高度的戒备心理。毛泽东明确告诫自己的同志："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他们对共产党的种种作法，不可能不包藏祸心，而要想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并切实奠定未来胜利的基础，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在战争中注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使自己的军队不仅能够在强大敌人的打击和国民党的阴谋中生存下来，而且能够成为广泛扩大共产党力量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重要工具。

1937年七七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一度准备迅速出动主力，集中作战，同国民党正面守军一起担任一线防卫[①]。但是，随着战争逐渐展开和国民党对共产党军队、政权竭力加以控制，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7月28日，中共中央还明确表示：（1）红军主力三个师于8月15日编好，20日全部出动；（2）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3）拟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②]。但三天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即改变前议，主张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部队东移不必开得太快"，"宜缓不宜急"，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应"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至红军主力出动也以出动三分之一为宜，"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③]。不仅对日作战必须有一定条件下之保障，否则"有损无益"，而且"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布"，如此"方不吃亏"。毛泽东做出此种改变的前提很清楚，即"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

① 毛、朱、彭关于拥蒋抗日问题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② 洛、毛关于提交国民党之红军改编原则问题给周、博、林电，1937年7月28日。

③ 洛、毛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给周、博、林的指示，1937年8月1日。

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简而言之，毛泽东担心把红军主力统统投入对日作战，不仅会为强敌所伤，而且可能正中了蒋介石的“渔翁之计”。

不能认为毛泽东的担心是毫无道理的。红军是共产党及其政权和根据地得以保存的唯一支柱，不管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合作关系寄以多少期望，但他清楚地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而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因此，“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因为“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①。况且红军这时只有4万余主力，而国民党在其根据地附近的兵力就有10万之多，十年内战之后，出于“防人之心”，主张对国民党提高警惕，未必不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在平津迅速失守，国民党几十万装备远远优于红军的军队，竟至对日作战不数日而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愈益感觉到其“长时间性和残酷性”。可以肯定，即使红军倾巢而出，对于整个华北前线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其或能阻敌于一时，但势必要付出致命的代价，致使整个共产党及其事业，失去实力的依托，并为国民党吞并共产党提供可乘之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自然使毛泽东等人变得格外小心谨慎。

在大敌当前，抗战初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不惜与日寇玉石俱焚的激烈气氛下，要人们迅速理解毛泽东的苦心和远虑，无疑是十分困难的。随着红军正式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出动抗日，部队内乃至共产党内，要求与日军作战的情绪也日渐强烈。尽管毛泽东一再主张“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甚至反对集中打仗，断言“集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5—535页。

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故强调目前应立即分散兵力，转入山地，以创造根据地和发动群众为主要工作，同时配合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实际上，党内大多数干部以及前方将领仍旧主张相对集中兵力参加正面抵抗，结果八路军主力不仅全部出动，而且一开始就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诸如平型关战役这样较大的作战行动。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后取得的一个较大的军事胜利。这一仗，八路军115师不足三个团在国民党正面守军的配合下，伏击日军辎重部队，以伤亡400余人的代价，歼敌近1000人，缴获并销毁敌汽车70余辆，炮一门，炮弹2000余发。然而，此一战役固然提高了八路军的士气，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却也从侧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以400余人的伤亡，而且大量是营连排干部和部队骨干的伤亡来换取一个辎重部队的胜利，对于八路军来说，仍是相当沉重的代价。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人们的想象之外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22000人，步枪手为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10000余枝，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到12月，部队人数虽发展到92000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其余均为徒手，以致在尽量避免正面作战的情况下，部队仍旧伤亡了4000余人。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顾一切，把八路军如数投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人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正如彭德怀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八路军在那样一种武器装备下，要消灭日军一个战斗连队，往往要近十倍的兵力才能奏效，而在战争之初，日军相对集中的情况下，要从容地调集部队进行这样的战斗，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此看来，毛泽东确实是有深谋远虑的。他一开始就注意到

这场战争的“长时间性和残酷性”，并且意识到要打赢这场战争决不是以中国一国之力在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他明确指出：中日战争决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而且更是政治力和经济力的较量。由于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各方面都明显不如敌人。因此，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失败和领土的丧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决不是哪一支军队或哪一次战役所能改变的。特别是考虑到日本军队民族教育异常深刻，士兵受到武断的欺骗宣传，作战顽强，宁死不降，武器装备又十分先进精良，在战场上占有极大优势，这就更加注定了力量弱小、装备落后的八路军不能够也不应该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它首先应该全力使自己“由壮气军的地位到实力领导的地位”，进而使“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这样才真正有助于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坚持每时每刻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和策略的根本出发点的坚定态度。十分明显，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利益上的考虑，当共产党人开始同时面对两大强敌之际，他们迅速调整了自己的阶级政策，并且也不能不相应调整了自己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目前只有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才有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可能，而要挫败日本侵略，单靠共产党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出于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不信任，他们不能指望国民党，甚至也并不指望与日本有深刻矛盾的英美等国政府，因此他们不能不设法尽力发展壮大共产党八路军，以便最终通过自己的成功领导和政策，通过广泛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反日统一战线，通过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各种矛盾，造成“全面抗战”的局面，打败日本侵略者。

还在1936年，毛泽东就曾经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表示，中共愿意把那些“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列强，看作自己的朋友，中共愿意和苏联以及所有反日反侵略的国家一起，“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①。到1937年5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洛甫等中共主要负责人更明确告诫那些历来习惯于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丘之貉的共产党人：目前决不是和帝国主义算总帐的时候，必须注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善于利用它们，以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尽管英美帝国主义各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暂时的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共产党人仍应放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作法，努力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共同反对日本。他们并确信不移：列强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从来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国内外政策的基本依据。国民党抗日与否及其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英美等国政府对日采取何种政策。因此，国际反日及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能否形成和巩固，同时也决定着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由于在日本侵略和中共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条件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关系对于共产党人及其革命事业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努力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自然也不能不成为共产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一向束缚在共产国际圈子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开始独立地走向世界了。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与世界的联系，不过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作战。抗战开始前后，他们则主动地把触角伸向外部世界，直接向英美等国的外交

---

①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7页。

人员和新闻记者敞开根据地的大门，极力使自己受到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的重视。

当然，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对国际舆论和各国政策发生什么影响。甚至，日本对中国的大举入侵，也并没有立即引起远东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美等国虽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不时地作出某种姿态，发出一些有气无力的警告，但他们并不真的打算立刻放弃以往的对日政策，即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以对日关系作为维持远东均势的主要环节和战略重心。因此，它们一方面试图遏制日本扩张的势头，另一方面却不能不以维持对日关系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避免破裂对日关系，不惜通过牺牲某些中国利益的办法，把中日战争限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全力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一度积极向中国和美国提议缔结太平洋和平条约和中苏互助条约的苏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抑制。当中国各界乃至国民党政府都寄希望苏联能够出兵援助中国之际，苏联政府却只同中国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保证缔约国中一方受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形式的支持和帮助①。

不过，苏联毕竟是当时唯一敢于不顾日本抗议，向中国提供大量实质性援助的国家。仅从战争之初至1939年9月，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约值2亿5千万美元的军事物资，并派出了上千名军事技术人员和志愿飞行人员，协助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与此同时，苏联在各种场合公开号召国际社会联合对日本实行集体制裁，明确反对并谴责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的“骑墙”态度②。这种情况自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和对于国内外政策的发言权，并且使之更加坚信苏联的帮助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必将发生决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册，第17—18页。

② 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册，第898页。

定性的重大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共政策本身仍旧要受到苏联外交方针的某种制约。这是因为，从苏联的利益考虑，它需要中国保持稳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把日本牢牢地拖在对中国战争的泥沼中使之无法腾出手来向苏联进攻。中共的一切政策和策略，当然要无条件地服从这一目的。

1937年11月29日，王明等人带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这一意图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来了。他们被要求回国贯彻“抗日高于一切”、以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行动原则和斗争口号。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远较阶级矛盾要尖锐得多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反对“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和口号。但“抗日高于一切”显然是同毛泽东等前此所强调的党和阶级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相矛盾的。共产党人能够为了抗日的目的，而不惜使党和军队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吗？他们能够为了维护统一战线而迁就资产阶级国民党，不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吗？按照王明所表述的国际指示精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在他看来，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总是有的，我们“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然而，即然承认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毛泽东也承认“和为贵”是必要的，主张对国民党应当“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凡事应注意经过国民党，并且力争“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进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洛甫甚至公开发表文章，不仅肯定了“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口号，而且断言：那种准备“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说法，“显然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完全不相符合”，“目前蒋介石先生

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①。

不过，在经历了诸多实践和种种挫折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认识毕竟很难再不折不扣地左右中国共产党的思维逻辑了。在仅仅两三个月之后，人们就再度意识到保持自身独立自主和争取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了。这是因为，就连王明在去了武汉，见了蒋介石之后，也不能不深感国民党过于专横跋扈，任其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势必难以生存、巩固和发展。于是，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一度否认争取领导权说法的洛甫，不能不再度强调起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来了。只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国共关系的重视，以及国际国内两种统一战线并存的形势，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绝不可能立即带来中国革命的阶级胜利，它多半将是一个较长的斗争过程，国共合作势必要从战时一直延续到战后，即国民党与共产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可能要共同建国。毛泽东这时估计：国共两党在抗战过程中力量都会壮大起来，因此“不但共产党打不倒，国民党也不可能打倒”，结果战后多半打不起来，只好共同建国。据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不搞苏维埃”，只能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②。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即使将来转向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经过如西洋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③。

不管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否真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高于

① 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第28期，1937年12月21日。
② 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提出的九个问题，1938年5月4日。
③ 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等之谈话，1938年7月2日。

一切”的原则下，不惜迁就国民党以维护统一战线，国共之间的矛盾斗争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中国共产党人多么希望迅速争取到“实力领导地位”，取代国民党并推进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现状也不是很快可以改变的。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不能不是在坚持“和为贵”前提下，实行又斗争又团结的作法。在1938年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政治报告中，中共中央一方面明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主张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另一方面则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主张“以最大努力”“巩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力量”，“使着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军事上能够起得更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坚持必要的批评与斗争，以推动并帮助国民党进步①。对此，就连共产国际领导人也认为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考虑，至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那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也是打了某些折扣的，它绝不能有损于共产党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尽管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注重策略的运用，“友谊的说服国民党的领导者”“在军事环境之下实行进一步的民主的政策”，但它显然对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和削弱共产党的作法深感不安，因而明白主张共产党必须坚持“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独立性之目的”，“要特别注意克服一切孤立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企图”②。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本质上并不主张无条件地迁就国民党人，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此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看法，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立足点。

---

① 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提出的九个问题，1938年5月4日。

②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大纲，1938年4月24日，任弼时关于四月十四日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1938年5月17日。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思想倾向上的这种沟通，迅速促成了毛泽东党内地位的崛起。自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即已开始高度重视这位土生土长但具有“丰富经验”和突出能力的中共领导人①。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已经被共产国际看作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旗手”和“象征”，并享有和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季米特洛托、“七大”名誉主席台尔曼等少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一样的殊荣和赞誉②。尽管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洛甫推举为新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但在双方失去联络的特殊情况下，这无疑并不是共产国际的意图。可以肯定，共产国际对于洛甫主持中共中央期间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而这正是他们派王明等“新生力量”回国的重要原因③。但是，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内的强有力的扶持者、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1938年在肃反中被整肃，共产国际对王明自然也立即失去信任。于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很快即告诉中共中央，应该“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公开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党的最高领袖。

这是共产国际最关键的一次，也是它最后一次从组织上直接干预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了。他们注意到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基本一致的“政治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毛泽东是那种更加重视自己国家革命事业的土生土长的共产党领导人。与王明以及大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更不会以服从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恰恰相反，他多半只是把苏联的存在和巩固，看作是便利于自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而已。1938年9—11月间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而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甚至立即就开始反映

①② 参见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六期。

③ 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会议上就中国问题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出这种情况了。

六中全会显然是全面贯彻共产国际意图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确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而且突出强调了“长期抗战，长期合作”，“抗日高于一切”的思想。会议明确认为：“在现时条件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①。毛泽东更坦率承认：“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为了表明这一诚意，他甚至特别提出了“所有各统一战线中的党派，互不在对方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进行秘密活动”的建议，并且主张：将“国民党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共产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既“不组织秘密党团”，也“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认为这种“大家相安，有利无害”的办法，可以为“长期合作”、“互助互让”两党关系奠定基础②。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了变国民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主张，重申了必须使共产党八路军全面扩充实力，改变目前与国民党不平等地位，“将来成为战争决定因素时，才能有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思想。因此，毛泽东仍旧突出强调了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的重要意义。很明显，尽管毛泽东反复说明斗争的目的在于求团结求统一，但既然国民党还没有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目前包含有大地主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又不能领导抗战胜利，那么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因为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关系而单方面捆住自己的手脚，领导权的问题也是依然存在的。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要对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之类的口号发生了疑问，因为这在

①② 见《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实际工作中意味着一切都要经过和服从国民党，而国民党还并没有被改造成为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

怀疑共产国际的某些具体指示和口号，这在中共中央并不是破天荒之举。但人们这时显然已经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应当如何正确地"把马列主义的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中间"来。为此，人们甚至提出了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尽管最初提出这样的口号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早期，但人们无疑只是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正是从这样一种新的思想高度出发，人们开始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指示注意进行具体的分析乃至提出大胆的怀疑，并且迅速开始努力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认识问题了。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远水近火"的观点，主张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立足于长期抗战和未来的国际变化上，短时期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目前指望国际范围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大规模的援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现时抗战的方针只能是"自力更生，力求外援"，准备持久抗战。而相对于国内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现状，国民党内亲日反共顽固势力依然存在，共产党力量相对弱小，共产党人应当以"有所不为可以有所为"的办法来求得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争取改造国民党并取得实力领导地位。毛泽东坚信，抗战的真正胜利必须基于两个条件，其一是中国共产党将来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其二是未来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主国家如英法美等同苏联一道对法西斯的德意日进行战争①。在他看来，这一切是迟早要发生的，它自然也是共产党人必须努力争取的胜利前途。可以想见，这样一种认识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来说却未必是那么合乎逻辑的。这意味着，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将不可避免地要同苏联和共产国际渐渐拉开距离了。

---

① 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提出的九个问题。

（二）来而不往非礼也

对于中国的抗战，甚至对于自30年代以来日、德、意法西斯国家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行径，苏联和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政策，始终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种区别的突出表现，就是苏联极力鼓吹集体安全政策，而英、法、美，特别是英、法两国却严格奉行"不干涉政策"，甚或采取"绥靖主义"的作法。面对1931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意大利公然侵占埃塞俄比亚，及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上台执政后单方面悍然宣布废除凡尔塞和约中有关条款，重新武装德国，苏联三番五次地呼吁有关各国缔结一项集体安全条约，以便威慑和制裁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确保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为此，它不仅抛弃了政治上的孤立政策，加入了它曾经长时间抱以反感的国际联盟，而且明确地在认识上把整个世界的和平看成是一个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划分的整体，确信："和平不能在地球的各地区或欧洲各地区被分开，不能被敲成碎块，把单个的和平碎块拼凑起来是不够的，通向和平的道路不应当对一些人是敞开的，而对另一些人是关闭的崎岖小路或专用道路。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远近邻邦的和平没有保障，那么就是本身的和平与安宁也不保险的。"① 然而，这样一种认识最初却是难于让英法等国的政治家们所接受的。不仅英法，而且受到英法影响的国际联盟，在这一系列国际冲突和法西斯侵略面前，几乎都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妥协的立场。他们似乎宁愿看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国际形象受到破坏，也不愿冒险卷入战争的漩涡，更不愿与苏联一起承担集体安全的义务。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两国公开介入，用武

① 李维诺夫1935年1月7日在国联行政院的讲话，转引自《国际关系与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卷，第359—360页。

力支持叛乱的佛郎哥军人政权反对合法的共和政府。作为抑制法西斯主义泛滥和鼓励集体安全的一种尝试，苏联一开始就站在共和政府一边，向其提供了军事援助和顾问人员。但是，对于在自己家门口所发生的这一切，英、法两国政府却坚持采取不干涉政策，甚至通过封锁沿海的方法来阻止苏联提供帮助。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共和政府在叛军及其德意军队的优势压力下逐渐瓦解①。

1937年7—8月，由于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华北和华东地区，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为了支持落后的中国把反对日本入侵的战争坚持下去，苏联又开始向中国提供了价值1亿美元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并且派出了数以千计的军事志愿人员协助中国军队作战②。然而，在远东有切身利益的英美两国，不仅以"中立"和"不干涉"等种种理由拒绝为中国提供任何帮助，而且仍旧无限制地大量满足日本对于军用物资的需求，甚至极力促成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相互妥协。

1938年5月，当德国一举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又公开准备割裂捷克斯洛伐克，夺取其苏台德地区。面对这一更加严重的局面，苏联不得不进一步积极呼吁国际干预，并在其西部边界陈兵38个步兵师，准备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可是，尽管捷克是英法的盟国之一，负有援助义务的英国特别是法国，却步步退让，拒不接受苏联的忠告，直至于同年9月29日与德意两国在慕尼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承认了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

英法美等国采取姑息乃至纵容德意日侵略扩张行径的"绥靖政策"的原因，无疑是它们对于战争的恐惧所致。但不容否认，拒绝苏联的建议和反对采取集体制裁手段，这也是意识形态的考

---

① 参见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1页。

②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0—473页。

虑在作怪。西方各国的政治家们，同苏联的领导人一样，多半都习惯于把对方的思想和制度看成是一种洪水猛兽，担心其侵略性。而由于苏联的制度还只是在一国的范围以内，世界的其它地区都还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控制之下，因此，当战争危机还只是在苏联以外的地区发生时，苏联可以很轻松地提出参预西方国家干预行动的计划，而西方各列强却不能不担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会乘机迈出苏联的国界，对整个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因此，只要还有一线微小的可能性，它们就宁愿把灾难局限在自己的范围内，不让苏联染指其间。正如这时捷克总统贝奈斯等人所说：即使捷克为了欧洲和平要做出重大牺牲，它也绝不会违反英法等国的意愿去寻求苏联的帮助，因为那将是“极端自杀的手段”①。他们一致认为：苏联的“任何成功都可能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欧洲的扩散”②，这与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相比或许更为致命。

设想共产党人可能利用战争的环境来推进其共产主义事业，这未必不在情理之中。战争，这历来是被共产党人视为爆发革命危机的一种客观条件。但问题在于，当三个最反动的反共军事强国结为一体，公然叫嚷要扑灭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孤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寻找同盟者，以便威慑这即将熊熊燃烧的战火不致扑向自己。尽管他们还无法判断这场战争最终将向何处伸延，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大战爆发，结果绝不会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有利。因此，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苏联这时不仅没有鼓励西方国家自相残杀，以便利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冲突和战争来推进世界革命的计划，而且根本上就主张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放在一边，和西方主张和平的所谓“民主国家”结成联盟，把战争消弥在萌芽之中。为此，斯大林明白宣布：资本主义

---

① 德波林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156页。

②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4，1493页。

国家"没有任何根据"担心"苏联人要亲自、甚至用暴力去改变周围国家的面貌"，乃至公开否认苏联有过任何"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图"①。而为了促进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联合，甚至连共产国际这一纯粹为了世界革命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世界共产党组织，也很快被用来进行有关世界和平的宣传了。这种情况自然要导致各国共产党人迅速改变过去关于资本主义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传统看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其它国家共产党人，把世界和平置于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之上，这时都还只是出于眼前利益的一种策略考虑。这既不会导致他们阶级斗争大目标的改变，也不会使他们放弃观察问题和认识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斯大林一方面努力寻求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则公开预言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原因而不可避免；一方面宣称"输出革命，这是胡说"，关于苏联共产党试图推进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图纯粹是"出于误会"，一方面却公开承认"苏联当然愿意周围国家的面貌能够改变"，确信革命不论苏联干预与否，"在其他国家也要产生"②。同样，作为被侵略国家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也保持着这种特有的阶级倾向性，他们固然注意"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并和共产国际一样把世界各国重新划分成"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呼吁民主国家同苏联一道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援助中国等被侵略国家，制裁德意日侵略者，但毛泽东明确强调："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在与未来的区别。"因为，"在资本主义各国方面，由于经济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

---

①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72—73页。

则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渐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因此，中国只能依靠社会主义苏联，依靠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支持，依靠未来历史的发展，而决不可对现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寄予过多的期望①。

英法美等列强对于德意日法西斯扩张主义的态度，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共产党人的上述认识。在欧洲慕尼黑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更加担心“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而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被“搬用到东方”，以致造成中国抗战的困难局面。因此，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加强了关于“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的宣传，同时更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苏联在支持中国抗战问题上的重要地位。但中共中央也了解，苏联外交的重心在欧洲，世界政治的重心也在欧洲，苏联不可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远东和中国来，中国抗战还必须要努力寻求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至少要利用它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断言：“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故不仅英国同日本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而且随着日本的不断扩张，美国同日本的矛盾也必然要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求得美英的支持和同情，从而巩固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是不可能的②。1938年12月，英美两国政府相继开始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汪精卫的逃跑，以及蒋介石公开拒绝日本首相关于中日重新调整关系的声明，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中共中央的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然而，对于英美列强本质的认识，使得这种情况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1938年12月10日，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放弃对军队、政权的控制和割据，完全统一于国民党

---

①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90—195页。

的中央政府。紧接着，对于共产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在组织上更进一步密切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蒋介石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明白表示：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不达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共产党作多少让步也不行。而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要解决两党磨擦问题也是不可能的①。据此，蒋不仅在军事上开始下令禁止八路军跨越战区，纵容河北国民党军政当局与八路军进行军事磨擦，逼迫其退出河北，归还阎锡山第二战区序列，对共产党施加军事压力，而且在1939年1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进而开始制定和颁布各种秘密的“防共”、“限共”文件，从而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进一步合法化。这样一来，国共两党间的冲突和磨擦自然日益白热化起来。

国内政治的这种新动向，自然要被共产党人同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联系起来。共产党人从来认为，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政策，它们多半都是依赖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来决定自己的政策的。目前，“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靠英美”，因此，“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政策有关”。这是因为英法等国的妥协政策打破了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使得建立世界性的统一的和平战线失去了可能性，影响到东方，日寇的进攻将可能更加猖狂，国民党内妥协的倾向将更加严重，这无疑是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抬头的政治背景。在国民党举行五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得到了蒋介石准备以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日到底”的标志，和国民党计划依靠英美压力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情报，这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的上述看法。他们甚至开始估计：“将来有可能蒋要造成东方慕尼黑会议”，依靠英法，“把日本追到芦沟桥

① 参见《中央日报》，1938年12月25日。

去”，并以割让东北内蒙为交换，来和平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国民党自然愈益失去信任。

1939年，中共内部对国共两党关系本质的认识已大致趋于统一，强调独立与斗争的倾向由于国民党“防共”、“限共”活动的加强而日渐突出。就连一度极力主张“和为贵”的王明也承认，在战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自始就存在着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两条不同路线的尖锐斗争，目前的国共磨擦便是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共产党人无论如何必须在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坚持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坚持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以保证自己的胜利。但是，这是不是说，共产党人由此开始根本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放弃了“和为贵”的主张呢？当然不是。事实明摆着，汪精卫逃跑了，投降了，而蒋介石却依旧坚持着，依旧没有放弃抗日的旗帜。蒋介石固然处心积虑地想取消共产党，将其合并于国民党，最终完成一党独裁，但他毕竟拒绝了“共同防共”的“近卫声明”；他固然同意采取“防共”、“限共”措施，但毕竟没有公开的下令反共。因此，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中央这时仍旧肯定国民党在总的发展方向上还“是在进步”，只是“在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故毛泽东这时还是主张，对国民党仍然“要亲爱，要团结”，“亲爱团结仍旧是统一战线的原则”。与前不同的是，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中还要加上“反磨擦这一条”，要加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条。他要求共产党人要敢于做到：“他占我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捉我二个，我们捉他四个，他关我们三天，我们就关他六天”，用加倍的惩罚打击那些反共顽固派，用发展进步势力的办法来造成“压服”退步逆流的实力条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叫作“来而不往非礼也”。

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总结出了这样一条经验，即在统一战线中，斗争和合作是两个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

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斗争是合作的条件。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抑制磨擦，制止分裂，而退让妥协不敢反抗，结果必然导致自己被国民党取消或溶化掉，结果也就失去了与国民党合作的任何资本。毛泽东说：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警惕性，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准备起来”，“人家来一个‘马日事变’初试一下，共产党不反抗，他们就大搞起来”。他对此形象地比喻说：“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所以，毛泽东的结论是，要想让国民党顽固派不敢实施其“限共”、“溶共”阴谋，唯有我行我素，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1939年春季之前，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看法，固然注意到了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但总体上还是比较乐观的。特别是共产国际和欧洲各国共产党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仍旧坚持“为联合而努力”的口号，主张“世界一切人民团结在法、英、美及苏联四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周围”①，这表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这时对建立全世界范围的统一的和平阵线和反法西斯的集体安全体系，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于整个局势的看法自然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们这时同样希望英美等民主国家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矛盾能够“一天天尖锐化起来”，最终导致一场打击法西斯势力的大规模战争。尽管他们宁愿这种战争“能够晚打”，以便“英美等民主国家能更多的直接帮助我们”，而苏联也能够得以“完成了三届五年计划，更强大了，成为一个使法西斯闻之裂胆的国家”②。但在西班牙佛郎哥政权在德意法西斯扶持下上台，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

---

① 参见《解放》第66期，1939年3月20日。

② 毛泽东：对十八集团军延安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之演说，1939年1月28日。

亚先后被德意吞并和侵占，英、法两国政府不得不开始放弃不干涉政策，整军备战，并主动与苏联进行有关集体安全问题的谈判，欧洲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显然一度受到鼓舞，确信反侵略阵线“现在有其前途了”，断言“这是慕尼黑协定以来国际形势由逆流到好转”的重要标志①。然而，这种情况毕竟只是转瞬间的事情。当人们了解到斯大林在联共（布）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以其深刻无比的科学天才，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锐利武器，描写了目前错综万端的世界时局”②，对形势作出了与前不同的评论之后，情况不能不迅速开始发生变化。

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新的结论，是在3月10日的联共（布）党代会上作出的。和前此不同。斯大林这时不再着重谈论世界和平、集体安全和对英法美等民主国家的希望。他第一次公开断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了”。既然断定战争已经开始，并且相信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那么，斯大林不可避免地只能回复到列宁当年所采取的立场上去。集体安全的努力在理论上自然开始失去存在的价值了。这是因为，所谓“帝国主义战争”，就是非正义的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战争，战争的双方将不存在什么“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区别，这种判断自然使得斯大林无论如何不能再对那些“民主国家”抱以任何幻想。他开始重新按照几年前的论断来认识问题。他声称：“非侵略的民主国家”之所以竭力采取“不干涉政策”，纵容侵略，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内心深处都包藏着一种祸心，即企图使祸水东流，促使德意发动对苏战争，从而将这些侵略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敌人苏联统统“都深陷到战争的漩涡中去”，“让它们相

① 《英法苏协定问题》，《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

② 《关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全会上的报告》，《解放》第70期。

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它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迫使那些精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在这种认识之下，斯大林当然不可能再对集体安全体系问题感兴趣了。它明确宣布：苏联的外交将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即同所有一切“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的国家保持联系，同时，“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到冲突中去”[①]。由此可以看出，苏联事实上已经开始放弃那种以争取和英法美等主张世界和平的民主国家结成同盟，以威慑和制裁法西斯侵略国家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试图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努力置身于所谓帝国主义战争之外，并且把防备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渔人政策的阴谋当作头等重要的外交目的了。

事情骤然间颠倒了过来。过去努力争取的联合对象，一下子又变成了最危险的必须加以防备的敌人。甚至英法谋求与苏联结盟的努力，也不再能引起苏联人的足够兴趣了。既然预料中的战争性质已经改变，社会主义苏联有什么必要为了某些帝国主义的安全而去冒与另外一些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危险呢？何况“需要他国予以援助的公约的国家，并不是苏联”[②]。进一步，随着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已矛头直指英法等国，苏联显然更加倾向于利用二者间的矛盾了。或者，最终当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两败俱伤之际，强大的苏联将“能够以它的决定的力量伸足于世界的天秤之中”，左右世界政治的未来走向，那岂不是更加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吗？[③]

斯大林报告的译文是在4月中下旬陆续摘要登载在中国的部分报刊上的。但如何具体了解和领会斯大林报告中的新精神，这

---

① 《斯大林文选》，第215--220页。

②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与国际工人阶级》，《共产国际》（社论），1939年第4期。

③ 同②。

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似乎也颇多了一些周折。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变动。直至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还在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报告全文。而5月中旬报告全文刊出之后，中共中央仍旧继续保持缄默，没有全面地修正自己的看法。但是，当5月30日共产国际发出转变策略的有关指示后，这种改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包含三点内容，即（一）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新的东方慕尼黑协定的一种必然反映，其中可能包含重大阴谋；（二）中共应当全力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要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反共阴谋，因为反共就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必要准备；（三）中共党的基本任务，仍是巩固与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在开展反对妥协投降，揭穿反共即投降准备的同时，应当注意不给统一战线的破裂造成任何借口①。

共产国际发出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和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斗争的指示，无疑是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自4月以来的"调停"活动及共国民党突然加紧"防共"、"限共"活动的一种反映。但由此得出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和国民党准备投降的结论，显然同斯大林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同样习惯于把国民党同英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国际，在相信了英美法等正在力图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而使自己处于"渔人"地位之后，自然也要对英国的远东的类似举动和国民党的一反常态，抱以同样的怀疑。

193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国际的指示。这导致它对当前形势和整个策略任务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动。人们前此对于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突出强调国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5月30日。

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人们过去对于英美等民主国家及其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其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阶级本性了[1]；六中全会确定的"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宣传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方针[2]改变了，开始明确肯定"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3]。

当然，共产党并非希望国民党立即投降。恰恰相反，他们并不相信国民党会轻而易举地全部倒向日本人，也清楚地知道目前单靠共产党的力量远不足以同时应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当6月初日军开始攻占陕甘宁边区河防对岸的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安全之后，共产党人仍旧明确了争取国民党大多数坚持抗战的主张。随后，中共中央一方面积极进行应付国民党大部分叛变投降的各种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仍旧继续打出"拥蒋"旗号，强调"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4]。只是，由于国共双方这时都采取了强硬立场，国民党"限共"、"防共"的磨擦活动日益加强，而共产党按既定方针全力壮大发展，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这不能不使得两党关系进一步对立起来。

1939年6月，国民党中央先后制定和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秘密文件，明令各地党政军部门及其首脑务必设法取缔共产党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等地区

---

① 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等。

②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

③④ 同①。

的政权机关及其下属军政组织，取缔共产党在各地之各种外围群众组织及其宣传活动，严禁第十八集团军自行跨越战区和扩充军队，并决定各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可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①。言外之意，至少在局部范围里，政治的甚至军事的反共行动已经被批准合法化。

由于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国民党丧城失地越来越多，共产党却利用敌后山区农村日军鞭长莫及，从陕北及山西逐渐发展到整个华北，并开始深入到华中地区。仅两年左右时间，共产党就已经从4万武装扩展到20万之众，还建立了大批敌后根据地和地方政权。这种“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使国民党惶惶不安，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②，如不加紧抑制，战争过后，共产党必将发展壮大以至不可收拾，甚至国民党之统治地位亦将由此而丧失。然而，在对日战争条件下，国民党毕竟不能同时对共产党也施以战争手段，因此，其抑制之策，不外政治、军事的局部压迫和经费、枪弹制肘而已。可是，共产党对国民党之关系，除经费及枪弹有所需要外，其余自两党合作开始即不受控制，对其压迫亦从不屈服。加上共产党八路军纪律严明，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廉洁奉公，远比那些被派到敌后去的国民党地方官吏和杂牌军更能赢得一般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稳固其正面防线和保存实力，又不敢把其中央军派到敌后去与中共军队争地盘，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等种种有利条件。国民党打击和抑制共产党的结果，反倒造成了自己在华北各省共产党占优势的地区全面陷于被动，原有的国民党武装反遭八路军的打击而无法立足。

随着政治军事磨擦全面展开，国共两党关系迅速发生逆转。基于“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的观点，中共中央一面全力进行

①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等。

②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39年。

反磨擦斗争，一面指示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磨擦的"合理与公正建议"，试图借机全面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迫使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对于华北的实际控制。这当然是蒋介石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其局部反共的部署丝毫没有放松。鉴于此，毛泽东开始明确提出了防备国民党乃蒋介石叛变的问题，主张立即准备保存精干，严密组织，"每省准备一个到几个根据地"，"准备打游击战争"，准备"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几年来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极大发展，使毛泽东明显地增强了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和决心。他进而三番五次地告诉各级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如果再在这些混帐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如果这些人再不改进，不进步，中国一定要亡。"但要改造"那些混帐王八蛋"，只能靠我们共产党。因为"从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共产党这样"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的干部和军队。国民党的干部和军队只会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打麻将，抽鸦片，娶小老婆。国民党的县长一个月180元还不干好事，共产党的县长一个月2元却能廉洁奉公，这样的党，这样的干部，哪有不受欢迎的道理？故毛泽东确信，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共产党必会成功。此即所谓："精神一到，何事不成！"①

1939年8月23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出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和祸水西引的目的，同它一向最担心的战争贩子——法西斯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一方面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帝国主义；一方面通过与德国达成的秘密条款，把自己的西部边界乘机推延到由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所统治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似乎此举能够使苏联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苏联的这一重大步骤，无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形势的认识更加复杂化。

① 毛泽东：为蒋灿题词，1939年7月，等。

德苏协定签订之后，中共中央很快即召开会议，肯定了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尽管人们此时对苏联此举是否最终摆脱了战争的威胁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日本亲英美还是亲德意还多少有些把握不定，但人们无疑已经更加一致地确信，英法和德意之间必然要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英法美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抗战的中国，都可能是远比德意更加危险的敌人。在9月初德国根据与苏联签订的秘密协定对波兰发动军事进攻之后，中共中央很快于10日收到了共产国际就德波战争和英法对德宣战问题的指示电。它使得中共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即"全部的完全的拥护"苏联！[①]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更加明确地提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去了，"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需要宣传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②]。

当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末日的再度预言和"推翻资产阶级"口号的再度提出，并不意味着中共这时又要重新开始回到过去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上去了，或象共产国际对西方国家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转而去对战争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要求，中共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被侵略国家的共产党人，仍旧应当坚持统一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共产国际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的指示致王明等电，1939年9月11日。

②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

战线的政策和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方式①。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把阶级革命的任务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不过，这一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仍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常识都告诉人们，在新的世界性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后，必然是新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诞生，难道中国能舍此而独异吗？尽管中国尚属落后国家，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但在国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的今天，难道中国还会步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后尘，在世界革命的大潮之外，独树一帜地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吗？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注意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把中国引上何种发展道路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国民党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绝无调和的余地。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只能取决于整个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双方实力的对比。毫无疑问，这时的国际局势所出现的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成倍增长，使得毛泽东开始相信，争取中国革命向着社会主义前途变化的条件已经出现了。

从1939年秋天开始，毛泽东公开地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进行抨击，断言它们不仅“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②，而且必然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

① 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9月10日。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这里所引者均为当时毛泽东所发表的文章，而后来选入《毛泽东选集》时，这些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修改过了，它们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

准备的”①。因此，他们固然一个时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在另一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②。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其实，毛泽东已经确信，不论资产阶级国民党实际上属于何种地位，“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③。在今天，“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时候”，“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而有能力领导与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一切革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倒资本主义的时候”，“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但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④。据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未来设想。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并受其启发而提出的。斯大林宣称：“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

---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共产党人》第1期，1939年10月4日。

②③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这里所引者均为当时毛泽东所发表的文章，而后来选入《毛泽东选集》时，这些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修改过了，它们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

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的一个整个问题”，并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它们吸收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共同轨道上来”，使得西方无产阶级得以经过俄国革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成“一条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样，在十月革命之后，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已经“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1]。根据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中国革命当然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不应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确信：在今天世界已经被截然划分成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而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充分显露其腐朽性而日渐崩溃之际，不仅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没有前途，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也绝对没有前途。这是因为，“处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一边，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都必居其一。”而事实上，在资产阶级已经失去其前途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方向最终也只能是站在社会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边，结果，中国革命必然会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起新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它将既不同于已经过时了的旧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最新式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只能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走向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这里所引者均为当时毛泽东所发表的文章，而后来选人《毛泽东选集》时，这些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修改过了，它们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

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因此，决定今天整个国家命运和今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基本构成的，绝不可能是一心指望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而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①。换言之，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实际争夺领导权，排斥资产阶级影响和作用，全力引导中国向着社会主义前途迈进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是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早在1937年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就反复提出过争取民族革命的“政治领导责任”和争取群众运动领导权的问题②。但是，基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和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承认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居于领导的与基干的地位”③。直到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仍旧同意“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军队政权中的领导地位”④。然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提出，意味着这种情况将要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主张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中国，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领导革命和争取走向社会主义。它不仅排除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排除了任何以资产阶级国民党作为主体的和基干的领导力量，建立一种既不标明社会主义，也不纯粹是资本主义的中性政权的可能性。尽管这时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仍旧妨碍着毛泽东断然提出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地位，使他不能不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后面特意加上“或参加领导”的字样，但他显然相信，共产党已然领导中国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3页。

③ 毛泽东：《论新阶段》。

④ 见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39年8月1日。

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必然要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① 。资产阶级国民党如果不是逐渐退出历史政治舞台的话，它也必将从目前的“实力领导地位”上退下去，从而失去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

不过，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是否象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样，就此失去了革命作用，而开始成为共产党人的敌人了呢？显而易见，得出这样的结论必将导致国共两党合作局面和统一战线的根本破裂，而这是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利益的。为此，毛泽东特别解释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买办阶级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本来就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其既有“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有矛盾”而成为革命动力的一面，也有“依赖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反对革命的一面。作为“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一部分”，而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②。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不赞同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政权解释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主张肯定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乃至地主阶级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仍然具有某些革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开始把国民党政权解释成“大资产阶级与地主联合的政权”，强调敌后政权必须区别于国民党政权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主，同时“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9年4月25日。

步士绅加入”，争取中间阶层，孤立顽固势力，这既有利于争取多数，又有“利于我们去麻痹地主资产阶级”，而“这种麻痹是绝对必要的”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种认识，反映了共产党人这时在策略运用上的灵活态度。他们虽然开始相信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在完全使用枯竭之时，”必将“只剩下反动的可能性”，从而成为自己的敌人，同时也注意到目前麻痹和利用资产阶级国民党，以便利全民族全面抗战事业顺利发展的必要性，其策略的主旨，仍旧表现出对国民党及其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某种肯定，并以此为基础，继续谋求巩固两党合作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旧把国民党主要看作是具有两重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肯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中“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大资产阶级与“没有丝毫进步作用可言的”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强调资产阶级不论买办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其革命可能性终将消失而成为敌人，这却意味着共产党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之间“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毛泽东很快即公开表示出对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怀疑态度了。他明确说：除非国民党将来能够“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继续合作“就有困难”，而且“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在今天还谈不到”②。可事实上，至少经验已经告诉共产党人，要国民党接受自己的纲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至此，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又重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既是未来中国命运前途之争，也是能否制止投降与反共，争取时局好转，争取抗战胜利之争。因此，中共中央明令各部：“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

①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主政权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1940年2月1日。

② 毛泽东同马丁的谈话，1940年2月。

地而斗争”，“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在一切我占优势的地方采取攻势，“不能避免有理又有利的磨擦”。一年之内须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争取这样的军队、自卫军，与政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但他们确信："没有伟大武装与伟大的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靠国民党是不行的①。因为只有不断地加强共产党的力量，才能最终完成战胜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一切投降反共企图，引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历史使命。

1940年3月，毛泽东开始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手段，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积极设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以及把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的边区和敌后政权，改变成为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小资产阶级左派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等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这充分表明了共产党人对策略运用的高度重视。不过，孤立和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团结争取中等资产阶级策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事实上将很难再把这二者笼统地视为具有革命与反动的二重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了。

长期以来，由于大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明显地分裂为附属于北洋军阀和外国资本，与附属于广州国民党政权的两部分，共产党人自然也相应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且由此出发，相信前者反动而后者尚有革命性。而随着国民党的公然反共，人们不能不开始相信民族资产阶级也统统投降了帝国主义，丧失了其革命性。但鉴于国民党政权同资

① 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

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这一明显事实，共产党人不能不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进一步的划分，肯定其中还有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别，而国民党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直至抗战爆发，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中央仍旧坚持此种认识，故而相信包括大资产阶级当权派在内的民族资产阶级重又具有了革命性。然而，随着国共两党磨擦日益加剧，特别是欧洲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人们的这种认识不能不受到强烈冲击。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提出，和对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否定，标志着毛泽东等人已经对蒋介石及其他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失去一切幻想，而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阶级策略的提出，则更进一步说明人们正在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之间划出一条有本质性区别的界限。1940年7月，毛泽东首先肯定："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的分裂是不可能的"，故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①。但是，与大资产阶级不同，"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还必须争取和团结②。紧接着，9月6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观点，改变了前此所提出的将"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而将"大资产阶级"包括在"民族资产阶级"概念之中的观点。他第一次明确认为：在中国，"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治，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的部分，即我们过去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这也就是说，毛泽东等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划分和认识，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大资产阶级"与他们过去一向视为革命对象的"买办阶级"完全视为一体了。而此出发，他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当权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估

①②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1940年7月13日。

计和对策自然也就与前有所区别了。

共产党人从来都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问题的。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重新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其政策和策略的相应变动。在把蒋介石国民党当权派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把大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阶级之后，中共中央不但否定了其革命的可能性，而且不能不将蒋之政策动向与国际帝国主义和政治动向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1940年6月中旬法国战败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判断蒋介石国民党将要发动的“反共高潮”，是“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的结果，其目的在于试图“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①。法国战败之后，考虑到英美已失去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故又判断“发动反苏暗流与反共高潮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要被迫着重新考虑其政策”，它们中的一部分虽“决不能彻底好转”，但有可能“在不妨及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为利用这一可能的有利时机，鉴于中共军队已经发展到50万，党员达到60万，而“大资产阶级现在还不统一不强大”，国民党内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也竭力反抗，使得蒋介石等当权派不得不“被迫初步让步”，承认中共在黄河以北的实力地位和实施宪政的必要性②，中共中央立即决定：不仅要争取这个初步好转得以实现，而且“还要争取彻底好转，即大资产阶级下台代以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得一票”。因此，尽管国民党在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对华北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之后，已经强硬地提出《中央提示案》，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扫数开赴旧黄河以北，并限定其兵力不得超过八路军3军6师6个补充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1940年6月。

② 在国共这一时期的谈判中，国民党提出了“投昇以北”的方针，企图借此把中共武装全部集中到旧寂黄河以北去，以确保其对华中华南地区的控制，而在华北磨擦之后的这一作法表明，蒋已被迫承认中共在华北的军事优势了。

团和新四军2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团体①，决心不惜以武力限制中共继续扩张和发展，中共中央依旧决定采取强硬态度逼迫蒋承认中共对现有区域的实际控制和实际兵力②，并相信在这种时机完全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殊不料，蒋介石国民党却公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电令八路军新四军依照《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开赴指定地区③。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并没有因为英法对德意战争受挫而一蹶不振，相反，蒋介石甚至颇像另有靠山。

国民党人加紧限共部署，是不是又和国民党的投降准备联系在一起了呢？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形成，这使得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又有了新的忧虑。但在10月初，人们对于英美联合的力量显然还是看重些，因此判断以蒋为代表的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还不会离开英美去加入德意日集团。然而，这丝毫不能使中共中央感到欣慰。因为蒋这时尚未公开参加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任何一方，一旦蒋宣布加入英美集团，得到强大的美国的全力支持，问题似乎将变得更为严重。在中共中央看来，由于参加英美集团有利于迅速打败日本，这势必会使国内"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如此一来，日本必不是美国对手，而"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两党必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将占尽优势，故"最黑暗莫过如此"④。据此，毛泽东于10月25日接连发出指示，说明国民党"目前的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主张"稳健的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的立场"⑤。可是，几天之后，人们又进一步注意到日军大举南进的

① 见《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
② 见周恩来关于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之建议，1940年9月1日。
③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的皓代电，1940年10月19日。
④⑤ 毛泽东关于形势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25日。（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皖南事变—资料选集》一书）

情况，而美国似乎还没有作好全面战争准备，蒋这时加入英美集团不能很快取得对日本军队的军事优势，遂又不能不怀疑“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估”、“目前的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加入德意日同盟的准备”，因为“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英国于今冬明春反而会被打得落花流水，蒋加入德意日集团的“可能性最大”①。根据这种判断，毛骤然悟出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必然是包含重大阴谋，其目的多半在于“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②。于是，中共中央开始相信蒋“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时局将急转直下”③，因而再度改变策略，决定不惜“闹得天翻地覆”，也要争到华中或华西几个较大的省区在自己的控制之下④，准备“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⑤。随后，中共中央拟就“炸弹宣言”，并设想了与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的一切可能。

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接连开会讨论时局和对策问题，虽一致肯定“中国的大势是由国际形势规定的”，但不论对于国际形势还是中国大势，在判断上都已深感困难，特别担心“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估计一变再变，生怕“此时错一着将遗无穷之患”⑥。但至11月初，中共中央的基本估计显然已经得出，即相信“目前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

---

①④ 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恩来、德怀、胡服、项英电，1940年10月29日。

② 毛、朱、王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

③ 毛、朱、王关于从华北抽调五万人支援新四军事致德怀电，1940年10月31日。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加紧准备对付蒋之严重进攻给周、秦、何、叶的指示电，1940年11月1日。

⑥ 毛泽东关于准备应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致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

的准备，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介石的烟幕弹"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前此之公开的强硬态度，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复电何白表示缓和，一方面"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极力争取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②。与此同时，考虑到与蒋决无全面妥协可能，期限一到，蒋必大举进攻，"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边区周围的封锁线是五道），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③，为了不致被迫"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中共中央于反复讨论后，终于下决心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准备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首先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以期粉碎蒋之可能的进攻和封锁④。毛泽东确信："蒋介石最怕是内乱"，"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等，"恐怕中国的真正好转要在那时也说不定"⑤。不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这种行动的结果在军事上固然"可制机先"，政治上却"是不利的"，它势必要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从而势必对整个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中国革命，乃至国际政治关系，造成巨大的影响，有鉴于此，为避免"处置不当"，"遗将来无穷之祸"，毛泽东不得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请求指示⑥。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明显与中共中央不同。

中国不是欧洲，更不是波兰、芬兰之类与苏联接壤的所谓"帝国主义帮凶"。中国虽然与苏联有着共同的边界线，并且正在进行战争，但对于苏联来说，它毕竟太大了，而且那里也只有

---

①③ 毛、王关于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策略考虑致德怀电，1940年11月3日。
② 毛、朱、王关于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问题致叶、项电，1940年11月3日。
④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⑤⑥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电。

一个对苏联称得上是危险的敌人。况且，如果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经希望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两败俱伤，故而号召欧洲各国共产党起来反对本国政府的话，那么，在这时几乎整个欧洲都已落入德意之手，德意日又结为军事同盟，开始在东西两个方向对苏联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这样的时候无疑已经成为了过去。更何况它们并不认为蒋介石已经下决心要充当贝当，甚至从内心深处生怕蒋介石会走上与德意日相勾结的道路，以至使其背腹受敌，因此，它断定，中国共产党现在反对蒋介石的企图，结果都只能便利日本把中国变为其称霸东方和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斯大林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实力上"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现在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境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不论对于中国革命还是对于苏联，更是一种严重的"危险"①。

事实上，还在毛泽东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要求后者批准行动计划之前，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通过周恩来表示过这样的意见，即蒋还没有走贝当道路决心，他充其量还只是处在三叉路口而已②。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毛泽东的回电，更是明确提出了不同意见。来电并强调说明：蒋介石的目前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人圈套而由反共走到投降的严重危险，亲日派要达到这一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因此打击亲日派，并制止国共冲突才是正确的方法。而谁是具体的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应依据具体证据去决定。因此，目前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应使用一切方法直接间接地向国民党诚恳地说明，共产党人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的态度，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

①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

② 见崔可夫《赴华使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5—36页。

国四分五裂，必使蒋身败名裂，同时，集中一切力量痛骂亲日派及内战挑拨者。

11月6日，在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立即通知各方面的负责人，开始转变估计和策略。其根据共产国际的解释，说明目前仍是“日德与亲日亲德派包围蒋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投降日寇”，蒋尚未下决心去作贝当，因此，只要我们“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的态度，“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①。据此，中共中央于7日发出正式指示，要求全党把“过去对于反共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来，一方面“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一方面全党动员，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中共中央明确表示相信：“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②尽管这时毛对共产国际的估计和策略实际上还有所怀疑，认为“好转前途甚少”，为此仍旧致电国际说明局势之严重③，但他也不能不同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目前蒋介石向我大举进攻都是不可能的”④，蒋之“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故“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蒋决不敢“撕破脸皮乱打”⑤。特别是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南京政权，并签订相互关系的条约之后，毛更加相信蒋介石已无投降可能，进而并得出“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的结论来了⑥。

---

① 见毛泽东1940年11月6—7日致周恩来、项英及各方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时局问题的指示，1940年11月30日。
③ 参见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1941年1月4日。
④ 毛泽东关于广泛宣传我给何白皓电问题致董老电，1941年11月29日。
⑤ 毛泽东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之方针致周、叶电，1940年11月30日。
⑥ 毛泽东关于利用日汪合流的时机准备政治新攻势给周、叶电，1940年11月30日。

12月初，中共中央更进一步肯定了此次投降危险已被制止，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已不可能的判断。不仅如此，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开始指出自己对反共高潮的估计和对蒋投降危险的估计过高，而把反对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当作自己的切实政策也是不妥的。因此，毛重申了在坚持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敌人矛盾，执行灵活的外交策略，以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原则，重新强调了改变对英美态度，利用日蒋矛盾和反对左倾倾向的必要性。此后，中共中央不仅发布一系列相应指示，而且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估计明显地变得谨慎起来。特别是在得知苏联正在继续为蒋提供军事援助之后，它即使注意到国民党还处于"攻势防御"的战略中，其军事限共的种种布署仍在加紧进行，也还是相信："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①。它显然没有想到，蒋固然不准备投降，也不会向共产党发动全面的进攻，但其"攻势防御"中仍旧包含有军事进攻的严重内容，并且其进攻目标业已确定了。

还在1940年7月28日，蒋介石就公开表露过"如欲抗战胜利，须先消灭共党"的强烈愿望②。很显然，由于共产党出人意料地迅速发展壮大，对于蒋之统治地位来说，抗战胜利与否确已象他自己所强烈地感觉到的那样，已经"没有什么意义"③。蒋之目的在于真正实现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和个人的独裁统治，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不能不成为其心头大患。1939年其夺取华北敌后根据地控制权的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的努力失败之后，蒋就处心积虑地设法确保黄河以南不被共产党所侵蚀，并下决心利用自己在华中华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对不受约束的共产党军队予以打击。根据华北磨擦的教训，在华中磨擦一时不能得手的情况下，蒋显然选择了其在力量对比、中央军配置上最占优势的皖南地区，作为

①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军队中各派系的情况给周电，1939年12月25日。
② 见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620页。
③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自己惩戒和打击共产党人的理想之地。不仅如此，蒋大搞声东击西，有意散布汤恩伯、李品仙等部准备向华中新四军进攻的消息，加剧华中的紧张空气，实际上却秘密地制定了袭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各种方案。此着确使中共中央在判断上发生了一些偏差。自从决定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以来，中共中央虽一再提醒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作好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但却始终相信："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而其对皖南新四军北移，多半"是不会为难"和"阻碍"的[①]。然而，1941年1月，令人震惊的悲剧发生了。新四军近万人在向长江以北秘密转移的过程中，被布置周密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歼灭了。随后，蒋介石立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并扬言要将新四军军长叶挺"送交军法审判"[②]。

再没有比这种打击更沉重的了。1月13—14日，在皖南事变尚未结束之际，中共中央一面紧急抗议，谋求谈判，一面已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全面大举反攻"，计划立即在华中围歼韩德勤部，在山东围歼沈鸿烈部，以逼迫蒋撤围皖南部队。至15日，得到皖南失败，叶挺被俘的消息，继而又进一步得到蒋17日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之后，中共中央再也忍无可忍。因皖南失败，围歼韩沈计划虽暂时中止，但毛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却已根本改变。他断言："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不管是德意，还是英美，"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现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③]。"我们决不能再取犹移态

①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现在开始分批移动给叶、项电，1940年11月30日。
② 见《扫荡报》1941年1月18日。
③ 毛泽东关于考虑与蒋介石根本破裂问题致德怀电，1941年1月23日。

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①，仅仅是由于此时部队还没有做好全面内战准备，“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不能迅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和四川，以确保陕甘宁之安全，而共产国际的政策又与自己“相左”，几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军事上暂进还只能取守势”②。不过，毛泽东坚持要求周恩来告诉驻重庆的苏联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说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要他们停止接济，准备后事”，“公开援助我们”，“不然要上当的”③。

至此，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即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9日正式通告全党：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走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因此，“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的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际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④。

把推倒蒋介石及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当作自己的重

① 毛泽东关于我们不怕破裂问题致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
② 毛泽东关于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致周、彭等电，1941年1月20日。
③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致周、叶、董电，1941年1月23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

要斗争目标之一，自新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以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了。至于何时明确提出这一斗争目标，和以何种方式来提出，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即共产党对国民党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国际条件的成熟问题。这是因为，不论是在如何看待两党关系问题上，还是在如何进行抗日战争的问题上，直至在建立何种政权和国家的问题上，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已经不再存在多少调和的余地了。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目标，共产党也绝难允许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长久地保持自己的统治。当然，由于抗战仍在继续，两党间的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有利于共产党的真正变化，国际政治条件也还没有成熟，就连共产国际和苏联也还不赞成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击措施，中共中央很快就改变了准备半年后发动军事攻势，打入国民党后方去的计划。1941年2月日本军队在河南对国民党发动的猛烈进攻，更是促使中共中央迅速改变了前此对蒋介石已经决心全面破裂以便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估计，渐渐重新看到了国共两党"妥协的基础"，转而相信蒋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内战已可避免"，以致再度决定利用日蒋矛盾，争取蒋"亲苏和共改良"①。但是，国共两党关系在1940—1941年之后，毕竟发生了实质性的重要变化。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权力，今天是掌握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金融资本家的手里，主要的权力是在蒋、孔、宋的集团"手里，他们固然还要抗战，"但是国内民主是不要的，对于共产党是坚决反对、限制的，有机会就打"的，因此，出于抗战的需要，对国民党固然还要"一打一拉"，以拉为主，以打为辅，可是，幻想国民党放弃反共反民主的本质，按照共产党的愿望改造，从而与之"长期合作"，"共同建国"，是不正确的。对其反共本质必须时时保持高度警惕，毫不让步，坚决反对，直至根本取消其地位，把中国的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① 毛泽东关于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致周电，1941年2月7日。

（三）在策略变动的背后

1941年国际形势的走向，远比1940年要容易判断得多。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苏联正式批准军队动员计划，并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准备对付可能到来的德国侵略。为此，苏联在并没有宣布改变其对华政策的同时，竟于1941年4月13日与其在远东最危险的敌人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规定：苏日双方均有义务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如两国中任何一方成为一个或几个其他国家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国之另一方将严守中立。而为取得日本对于苏联远东安全及其外蒙古边界安全的保证，苏联甚至不得不以公开宣布“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交换条件①。《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苏联不惜恶化苏中关系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因为按照条约规定，苏联不仅将停止对于中国的援助，而且它还成为了世界上极少数几个公开承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那个伪满洲国的国家之一。它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反感。然而，苏联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此举意味着，苏联已经准备放弃它同中国的联盟关系，不惜通过绥靖的方法来谋求日苏之间的和平，以便全力以赴地应付来自西部边界的战争。

与苏联采取上述步骤的同时，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也开始了旨在针对德国的极其相似的行动。1941年3月11日，美国正式通过了租借法案，它授权美国总统可以以租借或贷款形式向那些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各种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随即美国政府开始把其主要的注意力移向大西洋，大力支持英国对德国的抵抗，并着手对美国方面来往于英美之间的援助船只进行护航。为了保证在可能发生的对德战争时避免两线作战，美国也同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样开始秘密地通过民间渠道与日本进行谈判，力求达成美日之间的妥协。尽管美国国务卿曾明确提出了一个“四项原则”作为双方协定的基础，强调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贸易平等、不以武力改变太平洋的现状①，但双方代表还是很快在4月16日达成了一个《日美谅解方案》，公然主张美国应说服中国政府与日本媾和，与汪精卫政权“合流”，承认伪满洲国，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以此为条件来换取日本同意在中国恢复“门户开放”原则，及其部分撤军②。5月12日，由日本政府修改后递交给美国政府的协定草案甚至连日本应该承诺的“门户开放”原则一条也被抹去了，可美国官方却依旧同意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双方政府间的正式谈判。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同样希望争取在某种条件下与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对德战争。只是，必须注意的是，美国并非因此而放弃了“四项原则”，它对与日本达成真正的妥协始终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作为一个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大国，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日本毫无顾忌地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范围。因此，它除了出于策略的考虑谋求对日妥协外，同时还开始下决心给予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援助，从大笔贷款、军用物资、美军顾问直至美国志愿空军人员。

不论美苏在远东采取何种步骤，事情的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在竭尽全力避免在东方与日本发生战争，而它们同德国之间战争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苏联之间必然会达成某种谅解乃至合作，共产国际此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笼统地反对英法美帝国主义集团的策略毫无疑问地要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苏联正在悄悄地从中国抗战主要支持者的位置上退下来，让位给在远东有着更多利益的美国。于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避免地要直接同“美国帝国主义”者打交道了。

---

①② 《美国对外关系，日本，1931—1941》，第2卷，第407，389—402页。

对于形势变化的这种趋向，中国共产党最初固然还不能看得十分清晰，但它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的某些蛛丝马迹，进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还在3月初，毛泽东就告诫党内负责外交工作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参加英美集团或与英属缅甸订立联防协定之事不必象过去那样进行反对了，因为今天“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把蒋介石集团看成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因而相信蒋将以英美政策为转移，这是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公开反对加入英美集团的作法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出发点。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此时对英美的估计与前此已有所区别，即相信英美政府在太平洋地区及远东的政策已经不再是绥靖主义的了，因此中国加入英美集团将不会导致“远东慕尼黑”，并且蒋介石国民党还将因为英美的反日立场而难以投降和反共。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此时固然还没有改变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其政策本身却已经发生了实际的变化。

当然，这种政策性的实际变化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策略估计的改变，它并不足以对党的固有观念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共中央看来，社会主义苏联与帝国主义英美之间的矛盾依旧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因此，当《苏日中立条约》公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回到原有的立场上，断言《苏日中立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这是因为：“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靠他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对英对美对蒋都将了一军”，“使他们哭笑不得”。

再度估计英美政府怀有“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的企

图，这显示出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放弃对英美制造所谓“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高度警惕。果然，随着苏联表示反对中国加入英美集团，日美之间秘密谈判的消息不径而走，中共中央对“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又再度担心起来。5月18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再次断言：英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文章，都想做到苏联身上去，在欧洲，他们的总方针是“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在远东，则利用三国同盟的内部矛盾，拆散东京柏林轴心，贿买日本，把日本拉到自己怀里来，再一次施行远东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与苏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以配合其迫德向东的西方政策。”社论估计，英美的目的在于集中对德，故“只要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他们是愿意给予日本很多东西的，橡皮呀，油呀，棉花呀，机器呀，应有尽有，还在其次，甚至牺牲中国与荷印，也是放在罗斯福邱吉尔之锦囊里面的。”因此，“远东慕尼黑的新危险，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经过敏之谈。”①

远东慕尼黑危险的加剧，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危险的进一步担心。5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专文揭露日美妥协，这更加引起中共重视。5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了目前的宣传中心，即：（1）揭破与反对正在日美华三国问题上酝酿着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2）揭破与反对日本对华诱降阴谋与谣言攻势；（3）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条战线积极配合作战之战绩。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社论文章，并公开质问国民党：对于正在进行的日美妥协，你们究抱何种态度呢？！他们声称：“美国是靠不住的”，“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因为“随着西方战争的紧张而加速地转动着，我们的伟大民族抗战有

① 《解放日报》1941年5月18日。

被人出卖之重大危险！”而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险恶局面，为了拆散三国同盟，美国帝国主义显然正在阴谋“复活‘绥靖’远东的‘妙计’”，“这是已经轰动了全世界的问题，何以你们还一声不响呢？”①

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策略，这时已由坚决对抗的政治攻势转到拉蒋抗日的以拉为主的手法上来了。中共中央已经公开宣称：“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②而国民党这时则利用日军进攻中条山，中共军队不予援助一事，向共产党人发难，这使中共中央更加怀疑蒋介石的真正动机。毛泽东明确认为：日本这次进攻，“其目的仅在吓蒋”，“迫蒋投降”，而蒋则“正在沈机观变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方针应该是“只用小部配合作战（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大部集中整训”，“只作样子，不应实施”，“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因为，“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③

同时要应付两个敌人，这已经是共产党人策略考虑的基本内容了。在皖南事变后，不论在理论上对国民党与对日本还应当有多少具体的区别，但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已经再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了，他们不能不时时处处把国民党看成是自己的第二号敌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确信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买办性大

① 《解放日报》1941年5月30日。

② 毛泽东、朱德致彭、左转洛阳袁处长面陈卫长官电，1941年5月26日。

③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

资产阶级随时有妥协投降的可能，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在战胜日本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必然是自己最强大的危险敌人。因此，他们不仅要防备目前来自国民党的任何可能的叛卖与袭击，而且他们还必须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同国民党进行的全面的对抗和战争。毫无疑问，在日、国、共三方力量对比中还处于绝对劣势的共产党人不能不考虑采取更加谨慎而且更加有利于未来的作战方法了。6月9日，中共中央开始发布指示，要求部队注意“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因为保护民众也就是保护自己。因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因为这“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为此，在一切游击区域面非巩固的根据地，都应“多采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的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以达到“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长久坚持的目的。而随着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今后一阶段总的军事方针，这就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①

然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毕竟要受到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制约。1941年6月21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大举进攻，这不能不对国共两党关系以及共产党人的整个策略方针发生重要影响。十分明显，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自顾不

---

①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

暇，通过加强中苏关系和接受苏联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无疑变得不大可能了。苏联从中国主要支持者的地位上退下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共产党人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对所谓帝国主义阵营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认为苏德战争爆发以前的欧洲战争“基本上还只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但他们无疑已经意识到再不能用这样一种观点来认识问题了，必须相信：“今天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呼吁国民党的政治家“也能以同样新的精神和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来迎接这个世界政治和中国抗战的新时期”①。

这个“新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在中共中央于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所发的公开社论中，看来并不十分明确。社论甚至完全没有提到那些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就已经与德国法西斯在进行生死搏斗的国家的地位，社论认为，战争的正义仅仅是由于如今“德国军队的全部主力已集中于对苏战场”，因此才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但党内文件中，或者在几天之后，情况则变得清晰多了。中共中央开始明确告诫全党同志：“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法西斯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对于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亦以此为标准，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望全党同

① 《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

志一体遵照”[1]。而与此相关联，中共中央开始明确地要求各地高级领导人立即修正从前一阶段中央对于蒋介石集团的激烈态度中所得出的那种尖锐对立的立场，指出：“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说他比内战时还要坏是不适当的”，对之采取尖锐对立的作法也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及苏联与英美两国联合一致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需要，但出于对苏联的信仰和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更清楚地懂得，苏联的任何失败都可能给国民党同自己的关系带来严重的危险，而只有当苏联得到英美的支持并成功地抵抗了德国的侵略的时候，它才会有助于遏制国民党顽固派借机打击共产党的野心无限制地膨胀起来。因此，他们显然不能不继续把苏联看成是决定世界战争及其政治格局和未来前途的关键。他们一再断言：“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而当英苏签订了对德作战联合行动协定，英美两国又于8月14日共同发表了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并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首脑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更加乐观。特别是对英美《大西洋宪章》宣布两国将不追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其被剥夺的权利和自治权；各国在贸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彻底摧毁纳粹暴政，解除侵略国家武装，建立普遍安全制度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他们立即得出结论：自英

---

① 中共中央关于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为我对一切国内外势力联合或反对的标准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

德战争及苏德战争以来，从没有这么好的宣言。这一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因而必然成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因此，这一宣言的发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①。

对前不久还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英美政府所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务实态度。同时，它也说明中共中央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苏德战争的形势并非像他们公开表示的那么乐观，肯定英美的态度将成为影响苏德战争的重要因素，和全世界人民及其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共中央对于苏联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决定性”程度，已经开始有了与前不同的估计。而事实上，自从苏德战争爆发之日起，中共中央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与苏联之间的那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了。双方在围绕中共军队应当如何协助苏联牵制日本可能的攻苏企图问题上所发生的分歧，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

6月22日德军大举突破苏联边界之后，苏联方面在疲于应付来自西线的严重局面的同时，最为担心的就是同时受到与德意结为军事同盟的日本军队来自东线的全面进攻。为此，他们不得不要求中共中央立即以最为有效的方法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牵制日军可能的进攻。在苏联人看来，这种要求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正如共产国际在其决议中所表明的那样：“保证苏联取得胜利，是各国人民争得自由的前提。”何况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保卫苏联”历来是各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来自苏联的各种指示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积极

①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

响应。毛泽东一再表示：如日本攻苏，“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不论日本攻苏与否，我军之配合都只是战略的而非战术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只以破路和情报两项与苏配合，因为“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那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对此，苏联方面一度试图劝说中共中央指挥八路军主力打通外蒙通道，然后由苏方负责轮番予以装备，毛仍因此举危险太大而予以婉拒。在毛看来，援苏固然必要，但如果因此要使八路军受到严重损失因而损害到中国革命和利益，那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在这里，毛泽东很明显地并不认为苏联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他更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生存的条件所在，甚至他也并不相信只有苏联才是共产党人的唯一祖国。

当然，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问题在于，他相信，不论苏联处于何种境地，都不应当使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苏联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不仅因为中共的力量还远不足以对苏联的安危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因为他坚信，苏联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它决不会因此而陷于灭顶之灾。理论上，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制度和力量的代表苏联是决不会失败的。他断定：即使日本攻苏，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不保，苏之困难加重，到头来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不过，如果苏联都要靠英美的帮助才能摆脱困境，那么它还能有多少精力来顾及中国呢？事情是再清楚没有了。

随着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

经过皖南事变，苏德战争，直至再度为援苏问题与苏联发生矛盾，这迫使毛泽东下决心调整自己同共产国际及其联共党之间的关系了。继而，毛泽东从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入手，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少数长期以来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某些领导人宠爱，并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领导人，通过对他们在历史上的一些严重错误的讨论和批判，使得这些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重要代表人物迅速失去了地位和影响。尽管王明曾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批评中共中央的电报大杀回马枪，宣称毛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反帝反封即反日与民主含混并举，不分轻重缓急是不妥的；强调联合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却未说联合大资产阶级，以至说到经济政策时表示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故而要求与蒋介石国民党努力搞好关系，冀图以此来反击毛的进攻。但在皖南事变之后，试图让人们相信与蒋介石有进一步搞好关系的可能性，无疑比登天还难。王明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以致不得不借养病为名宣布退出讨论，于是，毛泽东迅速掀起了全党性的整风运动，开始灌输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独立自主的思想，从而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思想，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权威。这样，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其苏联党的那种已经长达二十年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开始彻底改变了。

要完全独立自主的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毛泽东等人梦寐以求的。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了解的丰富的多”。因此，还在1941年8月间，中共中央就决定立即设立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以作为独立自主的判断形势和制定政策的依据，避免亦步亦趋地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后面而再度陷于被动。随着与共产国际及其苏联关系渐渐开始发生某种程度

的重要改变，中共中央很快就不能不完全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认识来决定自己的政策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等二十多个国家从此正式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于次日宣布对已经侵略中国四年之久的日本正式宣战。紧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美英苏中等二十六个国家也于当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相互合作，不战胜法西斯侵略不止。这标志着，全世界已经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美英苏中等国已经结为战时同盟，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和矛盾在这时已经无足轻重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无疑对中共中央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就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周恩来等："日英美战争爆发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同时，毛泽东判断："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且"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最初阶段不会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利，而且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的核心力量的美英两国是否会把自己的主力迅速投入解放欧洲的战争，也是一个问题，但他始终坚信的是，有美英苏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最后的胜利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不仅如此，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共和苏联都是有利的，"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进

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个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因为德国在东线对苏进攻一旦被迫处于守势，必将对南线和西线进攻，从而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迫使英美集中主力打德。这样一来，由于敌人将忙于太平洋战争，国共磨擦也将减少，中共军队正可按照前此部署，“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故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下达了“1942年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要求各部“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守势之际，”“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

但是，1942年的形势并不象中共中央上述估计那样值得乐观。一方面，日本军队对于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实行的大规模“扫荡”行动还在继续，对中共形成极大压力，以至毛泽东认为：华北华中“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另一方面，蒋介石从3月份起，对中共再度发动政治和军事磨擦，这种事件仅一个多月就达到100余件，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改变对问题的看法。周开始估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蒋在看到美英参战并不能很快扭转被动局面，战争有旷日持久的可能，而美英苏又因陷于困难局面唯恐中日单独妥协，日本也因不能以主力对中国取攻势，反以政治攻势拉蒋，蒋自然“认定他已成为世界骄子，在目前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机下，正好放手反共。”鉴于4月伊始，日本进攻苏联的消息不径而走，他明确认为：“目前形势，日苏战争如果爆发，第三次反共高潮必不可免，且必然走上高峰。”周之这一看法，自然也是毛的看法。

还在4月11日，毛即估计日苏战争将于五六月爆发，德国亦将与此同时发动春季攻势，苏联无疑将面临严重困难，国民党必然会乘此时机对共产党发动政治的和军事的进攻。为此，中共中央很快秘密发布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并开始在边区组织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各地的中共军队，以防不虞。直至5月下旬，德国没有发动攻势，日本也未攻苏，情况才又有所缓和。不过，为了“防制”蒋之反共，毛泽东决定对国民党采取公开的和缓策略。6月，毛接见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开始许诺战后实行三民主义，及拥蒋作大总统，并第一次表示战后可同意考虑国民党1940年“中央提示案”所提出之划界方案。7月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因此，它“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①。

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拥蒋口号和合作建国主张，同样是同当时的形势变化和它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密切联系着的。

5月26日，英苏签订了一个以二十年为期的战时同盟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不仅战时，而且战后，苏联与英国都将长时间进行合作与互助。6月11日，美苏也签订了一个战时互助协定。这两协定表明，美英同苏联之间不仅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而且将在战后继续这种合作关系。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相信，“不仅胜败谁属已定，而且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明确的方针。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战后帝国主义制度将会倒台，各殖

① 《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

民地国家将会独立，中国也只能走和平民主合作的道路，而不能进行战争。故一方面我们“战后要长期与国民党合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不得不妥协”。因此，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和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既不是少数人专政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①。

可以肯定，英美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合作，极大地影响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形势的认识。正是由于意识到《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自由、民主、和平的信条已经根本上改变了未来世界发展趋势，宣布了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中共中央才改变了准备在战后继续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计划，重新提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问题。事实上，美英民主各国的行动及斯大林对英美政府的言论与行动都显示出，现时的“英美不是帝国主义”，至少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援助社会主义，这不能说是帝国主义”，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于美英政府的看法，也促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实际意义，就是要与英美好好合作，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可合作，因为战胜资本主义也已经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因此改变对于英美政府以及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看法，他们也并没有因此束缚住自己的手足，更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未来目标。他们之所以接受“和平民主”这种一般性口号，只是因为他们注意到：天下大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很疲倦，无产阶级的觉悟还未达到世界革命的程度，而“争取与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至于英美将来是否帝国主义，战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和平民主，那只能看情势的发展才能真正决定。毛泽东断言：“如果反革命还有，仍然是武装反武

① 《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

装”，“并未束缚我手足”。

不论中共中央对于整个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还有多少疑虑，其公开宣布拥蒋合作的方针，这不能不再度引起一心想根本解决共产党的蒋介石对其动机作出种种不着边际的猜测，从而诱发乘机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幻想。8月中旬，蒋甚至为此专门约见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见毛商谈国共关系问题。对此，毛亦深感兴趣，一度准备亲去见蒋，以求“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只是因为党内同志多担心蒋包藏祸心，才决定先派林彪前去代表毛与蒋商谈。

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其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宣称：“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① 此一决议案由于肯定了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态度，尽管态度强硬，却不能不引起正极力试图缓和与国民党关系的共产党人的重视。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明确认为决议表面上“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其目的“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而其所设定之范围就是“六不主义”（即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这与中共1937年四项诺言“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处”，就是“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也“可以这样作”②。不言而喻，中共中央这时的态度的确是希望借此以缓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他们估计，“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只要共产党也表现出相当诚意，缓和是完全可能的。鉴于党内一些领导人对此总是抱以疑问，毛泽东特别解释说：“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当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寇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故“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的，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因为“在德意日打倒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而我们答应不再组织军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的，“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1942年12月2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林彪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四项条件，希望能够作为双方谈判基础。这四项条件是：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①

如果说，国民党真想求得国共关系的改善和国内政治的统一，那么，自1940年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解决两党关系以来，这无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页。

疑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无奈蒋介石等并不十分看重这次机会，象共产党人一样，他们也把对方的这种让步看成是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只是他们相信，共产党人显然已经感觉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而不得不实行“廉价大出卖”。因此，他们丝毫没有立即与共产党人达成妥协的愿望，其目的不过是借机压迫共产党，以争取实现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设想。当他们了解到共产党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其愿望行事时，他们马上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故而立即放弃了这种谈判的努力，试图进一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以迫其就范。

1943年初春，国共两党军事磨擦再度加剧起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大加鞭挞，斥之为“变相军阀”、“新式封建”、“诈欺虚伪，违法乱行”。紧接着，共产国际于5月间公开宣布解散，这更加诱发了国民党人根本取消共产党的幻想。于是，国民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一面在各种报刊上大肆刊登取消共产党的言论文章，一面调兵遣将作出要进攻共产党的架式，以为如此便可以加剧共产党内部的混乱与恐慌，从而达到瓦解或取消共产党的目的。不想，此举恰恰使共产党人深受刺激，它适足激起毛泽东的极度愤慨，一度出现过的准备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建国的设想自然因此而被一笔勾销了。中共中央再一次断言：“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了”，今后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

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刚刚经历了整风运动，开始强调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从而划清了与共产国际界限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情了。只有那些完全不了解这时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盲目以为中共只有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

才能生存的国民党人才会幻想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会对中共造成致命的打击。事实上，自1941年以来，共产国际的存在对于中共已经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它的解散甚至对中共具有更大的利益。毛泽东明确指出：由于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了，其变化亦更为迅速，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因此，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当然是一个“英明的措施”。他实际上已经相信：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的革命只能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指导之下，目前需要的恰恰是，使各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即必须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①。

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并不符合苏联共产党人的想法，当然也并不是他们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解散共产国际，仅仅是因为作为历史上的世界革命指挥中心的这个世界共产党，已经不再适合于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甚至开始成为妨碍苏联同英美等国进一步改善关系，并结成更加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某种障碍。当战争把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战线，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已经不能成为世界政治的分水岭之后，继续保持这种以反对英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政治工具，显然既不会给保卫苏联，也不会给保卫社会主义，带来任何好处。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共产党因此放弃了它理所当然所拥有的统一指挥的权力，更不意味着它认为可以由各国共产党自己而不是

①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

由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共产党来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在形式上，它就不能接受"民族化"的提法，因为基于"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观念，它从来认为，相对于阶级观念而言，民族观念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及其各国共产党如果说还有一个祖国的话，那就只有苏联才是他们的祖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苏联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早就充满了疑问。而到这时，他们已经渐渐相信，中国共产党多半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共产党。

不过，不论中共和苏共各自如何看待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对方，要改变它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实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而掀起的反共鼓噪，几乎立即就引起了苏联方面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1943年7月至8月间，苏联驻华外交人员接连通过美国方面表达了他们的极度不安。紧接着，苏联报刊竟然也开始以明确的语言指责在中国再度出现的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内战危险，并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对准国民党中的某种顽固分子①。而中共中央更是始终相信，国共关系的好坏以及中国战后前途的走向，都与苏联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如同在中国政治的天秤中，代表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共产党必定是决定的力量一样，在世界政治的天秤中，代表世界上最进步势力的苏联，永远是决定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强烈关心，他们更多地主张重视党与党之间的民族差别，强调个体差异与独立，反对依附与服从于某种特殊利益和需要，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也决不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不会忘记自己同苏联有着共同的信仰与主义，并且恰恰是苏联才是自己思想和力量的发源地。因此，他们一边发动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理论派"王明等人的影响，一边却以斯大林、

① 转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1日。

季米特洛夫的著作作为整风学习的经典文件；一边反对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意志和利益，一边却又高度重视来自苏联的意见并渴望与之建立理应更为密切的直接的援助关系。特别是在世界政治日益明显地走向大国政治的轨道，苏美英三强的合作使得革命的前景变得极为曲折的情况下，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他们同蒋介石的斗争来说，取得苏联的支持将是何等的重要。当然，中共中央同样清楚地知道，要让刚刚从德军巨大的压力喘过一口气来的苏联人立刻转过身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这时的中国多半已经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中了，即使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共产党，也还必须要顾及到美国的利益。除非可以设想苏美英三强的同盟关系一旦战争结束就将立即瓦解，否则就必须同时取得美国的同情，并准备接受美苏之间就中国问题所达成的一切妥协。好在美国人这时对中共似乎并无恶意，而且他们对于中共所从事的一切远比他们从国民党那里看到的更感兴趣，至少已经有许多现象表明，共产党人并不是没有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的。

（四）“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当苏联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从中国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人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只能指望来自美国的援助了。理论上，只有苏联的援助才会对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有利，但事实上，当共产党人开始同美国援华人员进行种种接触之后，他们才逐渐意识到，也许同美国人的交往能够使中共军队得到他们在苏联对华援助期间都从未得到过的实际好处。苏美英关系的密切发展，无疑为中共中央开展对美外交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而美国政府在1942年底1943年初主动与中国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放弃在华特权的行动，更进一步使中共中央对同美国在中国今后的抗日战争及其战后中国建设问题上取得积极合作，抱以

越来越大的期望。当然，面对日益陷入困境的国共两党关系，中共中央事实上早就清楚地意识到，加强与美国方面的联络。将会极大地有助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调整国共关系。因此，在1943年之后，努力加强与美方人员的联系并积极对其施加政治影响，自然成为共产党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要说服美国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可想象。但在1943年，特别是1944年，这几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用盟国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的话来说就是："蒋介石面对着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击败了他。他对共产党影响的扩大感到彷徨，他不能忍受中国老百姓在欢迎共产党，从压死人的捐税、虐待人的军队、戴笠特务（的恐怖）底下解放出来，把共产党当成中国人民唯一的明确的希望。""他憎恨所谓共产党，他企图要消灭他们，（因此他）保存了一切供给他的武器，当日军撤退时就占领他们的地区。"①

事实上，史迪威这时与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然而他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却是如此爱憎分明。甚至远比这位美国在华最高军事指挥官要更懂得政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对中共抱以某种好感，他竟为此含蓄地写信要求蒋介石本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只不过是诸如美国那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的社会改革家，因此完全没有必要采取那些严厉的手段去对付他们，而应当容纳他们的改革意见。从美国军政上层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心理表明了一个事实，即这时的美国舆论多半对中共是抱有好感的，因为史迪威和罗斯福的这种好感很显然是从各种间接的舆论和报告中得来的。

影响美国公众的观点及其舆论，这确是中共外交策略的方针之一。自从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在重庆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导致蒋介石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与共

① 《史迪威日记》，第122页。

产党谋求妥协之日起，中共中央就对外交舆论工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至1943年因共产国际解散而出现国民党进攻边区的迹象时，中共中央又再度广为宣传并派人在重庆广为游说，致使苏美英三国大使高度重视，相继采取行动，从而再次取得成功。鉴于此，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开始进行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的宣传，抨击国民党抗战不力，并明确要求重庆的中共代表将此类文件"秘密地交给外国人"，争取"使外国人能将此项文件传至美国"，以便影响美国舆论和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态度。这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已经开始把争取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同情当成了它的重要的外交目的之一，因此它自然要为此进行大量的工作。

但是，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共的好感，严格地说并不是中共这时进行广泛外交活动的结果。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美国舆论对于中共的同情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普通记者和外交官们对中国国共两党进行实际考察和对比之后自发形成的印象，而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解放问题上的那些带有改良色彩的政策主张，更是明显地与美国人的民主观念和平等思想形成了某种共鸣。早在1938年，当美国记者斯诺把它的《西行漫记》公开发表之后，美国人中间就开始形成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更坦率，更真诚，更质朴，更光明正大，更具有科学思想"①的印象。这种印象几乎烙进了每一个在斯诺之后到过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其他根据地，以及与中共进行过密切接触的美国人的大脑②。这当然也包括那些可以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或美国国务院机关提供报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等。国共之间的不断磨擦和冲突，以及国民党将其主力集中陕甘，封锁中共边区，对日无心作战，只求保存实力以便战后用来消灭共产党，致使共产

---

① 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② 参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

党也不能不全力对付国民党，这种情况无疑使美国军政当局深感不满。

要美国改变对华政策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这在国民党还统治着中国并拥有比共产党强大得多的实力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已经清楚地看到国共两党的内战危险，相信美国将因此而被迫卷入中国内战泥沼并与苏联对抗的美国外交官来说，他们不能不设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的眼中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事情的结果也许会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可是，他们对中共的印象恰恰不是那样。面对着贪污腐化、独裁专制、失尽人心的国民党，共产党的行政忠实，选举公开，经济自由和深得农民拥护，不能不使美国的大批外交人员莫衷一是。很明显，至少在现象上，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毋宁说他们是农业民主党[1]因为他们断定，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要远比国民党更能反映民主政治的观点，因而也更加能够代表中国的未来，更加符合美国人的愿望。

既不能指望国民党，又不能转而支持共产党，其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折衷办法，即设法在中国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既保持国民党的现有地位，又能够通过把共产党塞入政府而消弥战祸，并迫使国民党在政治上进行改革，此可谓一举多得。于是，1943年12月，在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表达了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够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愿望[2]。要国民党与共产党分享统治中国的政治权力，这对蒋介石实不啻晴天霹雳，但对共产党却颇似春雷灌耳。要知道，共产党人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恰恰正是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要打破蒋介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3，中国卷》，第258—266页。

② 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第154—155页。

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时机。

还在1943年秋开罗会议召开之前，为了设法造成国内缓和的政治局面，以便于与美英讨价还价，蒋即指示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分别采取缓和措施，并与共产党重开谈判。之后，鉴于1944年1月开罗会议发表宣言决定美英中三国在远东战后将共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毛泽东也开始相信“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故决定“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起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①。进而，中共中央再度公开表示了“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的态度，并于4月29日派林伯渠前去谈判。然而在实际上，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于此次谈判都并不抱任何希望。国民党强调的是注意对国际之宣传，要求“(一)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二)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三)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②而中共中央也确信：蒋之缓和不过是“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要根本改变国民党反共政策，还必须要改变国民党的统治政策和一党专制的现状才有可能。故中共中央在决定重开谈判之后不久，也立即展开了争取民主民权的宣传攻势，公开要求国民党首先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禁止非法搜查、逮捕、刑讯和秘密处死，反对强迫集训和严格限制人民自由，反对把各党派

---

① 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8日。

② 蒋总裁训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准备注意事项，1944年3月15日。

看作“奸党”、“异党”，禁止其活动，并时时企图消灭他们①。

但是，对于此次谈判，共产党最初毕竟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并且预定向着“协调”方向发展，不主张谈判破裂的。因此最初本着这一精神前去谈判的林伯渠，自然是向着和平方向努力的，这导致谈判双方代表都极力试探对方的底细，并很快形成了一纸书面的东西。然而随着4月中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数十万大军一夜之间丧城失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使得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舆论面前顿时威信扫地，共产党对国共两党的实际的力量对比和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也立即发生了变化。人们迅速估计：“在蒋的独裁政治下，现时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困难，第一，是河南战事失败，…第二，是英美舆论对共的同情与对国的抨击日益增加，…第三，是财政经济上的无办法，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负担太重，…第四，是对共党无办法，想打又不敢打；第五，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队各个人中间的倾压、离心离德。蒋在目前对这种情形相当恐慌”。因此，“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照原定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他们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决无所得。”基于此，中共中央放弃前此方针，决定利用国民党的失败，提出更高要求，争取使其根本改变政策，“即国党不答应也不要紧”。不仅如此，至1944年6月初，中共中央已经相信，靠国民党来取得抗战胜利已无可能，且中国今后命运也因国民党大削弱而发生根本性变化，除非蒋得到美国进一步援助，否则中国的未来将是共产党的。他们估计，目前情况下，中国有变为南斯拉夫的希望，在蒋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条件下，罗斯福总统

① 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1944年3月12日。

可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重新进行选择，我们要争取变为铁托。这是因为国民党这次垮下去就不容易起来了，蒋的军队不可靠，将来美国兵大批到中国来进行反攻又太困难，因此只有共产党可依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人要承认我们，而且战后中国必然要实行民主，蒋之独裁必然不能维持。这样，中共中央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决心更加坚定，其虽不主张立即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但已决定采取强硬立场，并决定一旦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发现国民党仍借机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就准备下大雨”。

1944年6月，国共谈判已经开始走入死胡同，国共两党的方案各执一端，决无调和余地。但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态度尚属温和。其借国民党开放封锁，允许少数中外记者进入中共区域进行采访之机，注意进行心平气和的说理斗争。毛亲自并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联合国日的社论，说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持敌后而国民党何以不能抵抗的原因。他声称：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即“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励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他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只知道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据此，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应当立即“与民更始”，“修改自己的政策”，“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他并公开表示希望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等能够“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

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①。

公开表示对于华莱士的希望，这是中共中央对欧美外交政策在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后不久在一份指示中所说明的，在今天这种“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的情况下，“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尽管“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革命性不大”，但英美资产阶级“如美国罗斯福、华莱士一派”，由于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则革命性却较大。在这里，一切都是以联苏与民主为基本标准，是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本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进行工作的②。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合乎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而由于美英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政府外交人员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注和对国民党军事以及政治状况的严重不满，中共中央已深感自己有可能象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那样，取得美英政府的承认和援助。面对这样一种可观的前景，他们当然要努力去争取。

美国国内这时对于中共的舆论，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严重失败和政治上的极度腐败，已经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华莱士访华期间，即公开表露出极欲干预国共关系，并与中共发生直接关系的态度。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华莱士就针对蒋为河南战役失败所作的辩解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境内之国军，枪械不良，训练不足者固多，但装备犀利，训练有素，控制未用者，亦复不少。如西北方面现有武器精良，战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延安受封锁威胁，亦以

①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4日。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1944年7月13日。

其武力不用于抗战，而以对付国军，同室操戈，相互牵制之兵力过数十万人，曷胜惋惜！”华莱士确信：中共之目的，不外改革政治，“设中央采纳其若干建议，并准其参加政府，共同致力于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则延安当会改变其反中央之态度，而与政府团结合作。”至于蒋所称，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必将便利苏俄“夺取政权，赤化中国”之阴谋一说，华莱士同样当场予以反对。他指出，蒋并无证据说明中共至今仍受苏联指使，主观“认定中共为苏俄在华之支部，中共之行动，系实现苏俄赤化中国之阴谋，中共之言论，系绝无信义之谎言，并基此以处理中共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自然无由解决。“设中国政府对中共问题，改变此种基本主观，而以中共一切与苏俄无关，视中共之行动在求政治刷新，国家进步，中共之言论，出于衷诚表现，平心静气，考虑其建议，……则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矣。”随即，他转达罗斯福的话称：“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①

华莱士的话当然不足以改变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甚至罗斯福企图介入国共谈判的提议也被蒋介石的软钉子挡了回去，但是，蒋介石到底还要依靠美国，他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已经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关于国民党政治独裁的宣传对蒋介石也发生不可抗拒的作用力，就象他开始同意允许少数记者进入中共区域采访一样，他不能不试图做出某种政治开明的姿态，以缓和舆论的压力，因此他停止了继续反对美国出于军事目的与中共建立某种直接联系的努力。于是，华莱士到底不虚此行，在1944年7月22日，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机构—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这意味着，中共争取美国承认和援

① 张九如：《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记录》，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助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对于美国来说，同中共的关系当然不会象中共中央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不仅如此，中共同苏联的关系也确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不论美国人多少次得出了中共与苏联没有那种想象中的秘密关系的结论，几乎每一个新到延安去的美国人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要去寻找这种关系的蛛丝马迹。说到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仍旧是美国人的一块心病。可以肯定，要切实争取美国政府的承认与援助，必须根本打消美国人的这种顾虑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共产党人很快就注意到了。事情很清楚，美国出于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决不会支持一个完全按照苏联教义行事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要想得到其支持，就必须突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现实政策的民主性。因为"外面问得最多的，是我党今天所实行的各种政策"，比如，"英美人士很注意我们对苏联的关系，我们政治上是否独立？物资上是否得到接济？""有些同情中共现实政策的英美人士也向他们本国抱有成见的人民说，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他的政纲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急进民主党"，并"劝告我们若能改变名称，必能够得到美国广大人民的赞助"，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于马列主义中国化及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更多的解释，并需要注意宣传上的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中国作风"①。

设法取得美国的正式承认与援助，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整个外交工作的中心。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到中共中央对于美军观察组的重视程度，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中，他甚至把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称作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很显然，毛泽东相信：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为美国正式承认中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由衷希望这将导致美国政府在承认中国的铁托问题上迈出

① 中共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

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这是关系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①，归根结蒂，这是关系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谁战胜谁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对于外交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8月18日发布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它明确认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及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如此，如同过去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发展一样，“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②。

一切为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而由于取得美国的承认和援助能够有效地强大自己并削弱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人当然会为此而努力。为了免除美国人对自己与苏联关系的担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说明自己“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既没有条件也不会深入到中国的事务中来，因为在国民党极力反对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这样“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距离，他们更是致力于说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毛泽东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因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是逐步实现减租减息，其工业政策是要“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实现工业化，他宣称：“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

① 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①。当然，这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期望来自苏联的帮助，苏联毕竟还是他们用来衡量一切国际关系的标准。这也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这毕竟是他们革命的最高目标。问题在于，他们知道，目前自己的孤立无援和最低纲领，恰恰是美国人所能够接受和最感兴趣的。

不论美国政府对于来自美国较低一级的年轻外交官反映中共上述观点的报告是否感兴趣，深人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军官们和作为观察人员之一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如同其他来到延安的美国记者一样，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接二连三地通过重庆的美国大使向华盛顿强调中共的军事和政治价值，而且日益意识到改变美国的对蒋政策的重要意义。为此，谢伟思在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即向毛通报了美国政府给其驻华大使高斯关于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的训令的情况，这种情况无疑使毛泽东感到鼓舞。

这时，欧洲大陆接连出现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们成为了这些国家事实上的政权机关，从而预示着这些国家将要走上崭新的人民国家的道路。它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在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的谈话中，他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并直接了当地开始谴责蒋介石政府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确认其合法地位”的政府，“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必须立即召集由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临时性全国代表大会，并使之成为临时性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紧接着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人们更进一步围绕着组织联合政府与组织解放委员

① 转见《党史通讯》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人们甚至还谈到改党名的问题。他们显然对于美国与中共建立关系和提供帮助的前景充满了自信，并且相信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是有限度的，必要时有可能抛弃蒋，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下不变也得变，组织联合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会议最终决定，立即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争取蒋介石转变政策以避免内战爆发，如此不能解决，则明年即组织解放委员会。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电示正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等："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策，实行反攻。估计此种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伪宪。"①而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华军事物资问题，主张"根据我军历年抗敌的战绩，今后抗击敌伪的比例（六分之五），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连战皆败和衰弱无能，……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最近所传美国政府愿依租借法案武装中国军队成为近代化的六十个师，则我军则要求应被装备二十个到三十个师。"②与此同时，中共中

① 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给林董王的指示，1944年9月4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等指示电，1944年9月10日。

央通知各地："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如此不仅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争取美方赞助，制止国民党将来内战企图，而且可争取到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

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利用在参政会报告国共两党谈判情况的机会，代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了立即改组国民政府，代之以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①]。鉴于国民党竟然阻止重庆各报刊载中共代表报告中关于改组政府的文字，并单方面公布了国共谈判的来往文件，中共中央一方面相信有必要重新指名道姓的抨击蒋介石国民党，"非如此不足以杀彼流氓气焰"；一方面更进一步发表文章，针对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大谈军令政令统一问题，斥责蒋介石的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其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②]。不仅如此，依照目前国内两个战场的情况看，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如不"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就绝不能制止危机。中共甚至提出：盟国援助物资应该照国共两党抗击敌伪实际数目分配，即"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

①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48页。

② 《解放日报》1944年9月19日。

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城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①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态度之所以日趋强硬，除了为国民党的顽固立场所激怒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相信国共两党的实际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要在中国登陆作战，因此必须要承认和援助共产党。可是，由于美国这时在太平洋取得了可以直接进攻日本的战略基地，进而迅速取消了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这种条件显然已经改变了。就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之后不久，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以及利用中共军队的必要性问题上始终充满激烈矛盾的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中缅印战区也随之取消，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已经不予重视，其对华政策不能不渐渐以战后对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基本的出发点了。如此一来，美国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倾向性自然日趋明显。

中共此时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经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同国民党进行全面的抗衡。何况在缺少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一旦美国完全倒向国民党，全部兵力只占国民党不足四分之一且装备相当落后，力量分散的共产党军队，要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无疑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还在9月初，中共中央就不能不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内战而决定派遣部队南下江南，以加强自己在南方的力量，形成战略上的两翼，准备内战爆发时“筑长江之堤，抵蒋之水”，确保自己对华北主要地区的控制。同时，中共中央不能不设法取得美国的支持，以便遏制蒋发动内战的企图并通过美国的作用迫使蒋承认中共的地位

①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3日。

与实力。出于这种极为复杂的考虑，中共中央对于美国的态度自然十分重视。它不仅为美国方面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感到振奋，同样也因美国在自己正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毫无反应而感到不安。在10月初，中共领导人开始频频向美方人员询问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究竟如何，希望美国能够公开表明其态度。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对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将感到高兴，并一再提到南斯拉夫，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基本相同，蒋介石国民党与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没有什么两样。言外之意，他们还是对美国能够单独支持共产党抱以某种期望。当然，在内部，他们这时也不能不估计到，由于美英的态度，“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恐怕最终也要与国民党进行妥协才行。

10月12日，在国民党的要求下，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进行调处工作。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改造中国”的“十点建议”其中最主要之点就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以巩固国民政府之地位，同时在蒋领导下统一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的统一①。由于赫尔利在来华之前曾经访问过苏联，得到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保证，因此他对于严重困扰着蒋介石的所谓“国际共党之阴谋”深感释然。他一来到中国，就首先向蒋通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并且因此对于巩固蒋及国民政府的地位和解决共产党问题颇有信心。而国民党固然未必相信这种保证，但显然也对赫尔利维护蒋及其国民政府的这种立足点深感释然，故而立即抓住此一良机，要求赫尔利参预调处国共谈判，从而通过他向中共“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②。

由美国特使直接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这对于期望美国对蒋施

①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中国卷》，第650—651，259页。

加压力迫蒋接受联合政府主张的共产党，当然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10月17日，当赫尔利向中共代表表明了美国仍旧希望国共两党应当加强团结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当即批示："骂蒋可考虑略作间歇，以观其后"。18日，当赫尔利进一步说明蒋对共产党态度已经改变时，毛泽东则估计：蒋"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换言之，中共这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南斯拉夫化的事实，中共为此还必须和蒋介石合作。但由于美国害怕中共不要蒋，故中共可以这点来讨价还价。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一个由他亲自起草并经过国民党方面修改认可的国共两党关系协定草案飞到延安，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这个协定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实行各种政策，以期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之程序；

四、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其官兵的薪俸和给养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待遇，其各部队装备和军需品之分配亦将得到同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使之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之各政党，均将得到合法之地位。①

无论是赫尔利亲自起草的草案，还是这个经过国民党修改过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4，中国卷》，第666页。

的草案，都没有提到共产党人这时公开要求的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而国民党修改过的草案还特别加上了要求中共军队单方面服从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接受其整编的字句，这当然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关中共军队接受国民党政府整编的条款，称："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毛泽东再度重申了中共关于必须改组国民政府的理由。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地受到美国民主政治空气熏陶的美国将军，同其他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怀有不满的美国人一样，赫尔利也深知蒋介石的政府极不民主，并且相信使中国政治多元化，至少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不会对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造成损害，恰恰相反，继续保持这种政治分裂的局面，只能妨碍中国军队的统一。因此，尽管他对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严厉批评难以接受，但却相信同意中共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无不妥，这多半是促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办法，并适足促成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他进而狮子口大开，扬言"蒋委员长已同意改组军队，已同意改组他的政府，他并说他希望共产党帮助他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民主程序的发展成为可能。"

用不着怀疑，赫尔利并不是国民党人的成功说客。他既不了解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理，更不了解共产党人的情况。他甚至主观到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观念去自作主张地代表蒋介石许诺。于是，本来是代表着蒋介石的利益的赫尔利，却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一个反映了共产党人要求的新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

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愿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与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权利；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①

在中共中央看来，美国的政策既然是以保全蒋的地位为中心，那么，中共当然只能在不破坏解放区与不损害民主原则下与蒋妥协。毛告诉党内同志：我们应当看到，国民党还有着二百万军队，并且得到国际与国内各种力量的承认，我们还只有六十万军队，且地区分散，因此必须妥协。虽然我们极大的让步是同极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这一协定一旦成立，还是对蒋不利而对我有利的。因为协定首次肯定了国共两党具有平等地位，肯定了中共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从而否定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协定并且丝毫没有损害中共的解放区和军事力量，而且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我们将来组织解放区联合政府。难怪毛泽东在协定达成当天即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明确宣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②。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协定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将会是一种什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3页。

② 毛泽东致罗斯福总统函，1944年11月10日。

么样的感受。蒋介石明白告诉赫尔利：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①。情况同赫尔利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国民党还是不想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能接受共产党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且必欲全力保持自己对于政权和军权的全面垄断。那个在赫尔利看来“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延安协定草案”只好束之高阁了，因为赫尔利的“我们”里并没有能够包含国民党。蒋介石依旧自行其事地按照既定的原则重新提出谈判条件，只是他到底同意了赫尔利提出的让中共派人到军事委员会里做官的主张，条件是中共必须同时交出自己的军队②。于是，事情又转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中共中央还是老办法：你可联即联，否则再“发动一个尖锐批评，又吓得他不亦乐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正式考虑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了。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的一切布置是搞垮共产党，因此，我们的一切布置则是打倒蒋介石。毛泽东明确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进行革命以来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但是，在以前的历史中，他们从未有过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现实条件，如今，这样的条件终于开始出现了，以至于人们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此时看起来还是近乎幻想的斗争任务。事实上，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形势还远未到提出这一任务的时候，这不仅因为国民党还过于强大，而且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已经很明显地公开倒向了蒋介石国民党人一边。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人不仅不能打倒蒋介石，而且还必须继续与蒋介石进行周旋。然而，共产党人还是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内定的斗争任务，它仍旧具有现实意义，即它表明了一

---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4，中国卷》，第180—181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种决心，这就是：共产党人已经下决心向着夺取全中国的目标行进了。这意味着，与蒋介石进行的任何谈判都不再是有实际意义了。

对于美国方面一方面表示民主意愿，一方面又渐渐表现出必欲扶助蒋介石政府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明显地感到疑惑。毛泽东对美国外交人员公开表示："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但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因此，现在还不能采取公开的反对立场来与仍然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对立。甚至毛泽东还指望使美国人相信，共产党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准备实行美国人所害怕的"社会主义"，相反，它将代表农民的利益实行最起码的土地改革，并且争取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企业①。当然，毛泽东这样表示，更多的只是为了争取美国放弃对蒋介石的幻想，转而同情共产党。

1945年1月25日，为了表示仁至义尽和进行宣传攻势的需要，周恩来再度受命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然而，他一到重庆就明白声明："目前全国人民所期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等"，"至于其它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无补于事"②。紧接着，随着苏联红军逼近德国首都柏林，欧洲战争胜利指日可待，"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中共中央进一步估计"美蒋均急于

① 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② 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8页。

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其策略方针更加坚定。毛泽东明确认为，我们有可能也必须设法改掉美国政府的扶蒋政策，为此除一面加强正面影响外，还应在对待蒋介石国民党问题上采取坚定立场，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因为美国这时的政策偏于扶蒋，更易助长蒋之独裁气焰和内战危机，这与苏美英三国此时所确定的战后方针是不相符合的。中共中央认为，苏美英三国的方针在2月份的雅尔塔会议中已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肯定，这就是："1.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2.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三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

注意到苏美英三国间的矛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要的。随着欧洲战争不断胜利而在苏联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政权组织，这使得中共中央更加注意到在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间的区别，为此，人们重又开始日益加强其斗争策略中的这种观念。至3月下旬，毛泽东向党内明白说明了其在外交政策上的这种分别，即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美英及其他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不放松警戒。并且他开始明确主张现在有必要公开强调一下共产主义无限美妙，以此来说明共产党这个名字很好，共产党决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名字。同时，中共中央更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要把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人口发展到一亿五千万以上，"以我们为中心"，联合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

不难看出，进一步限定自己的斗争目标，这仍然是同国际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毕竟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势力的制肘，不论中共如何决心，不设法克服美国的干预是难以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的。但中共中央有信心，蒋介石无论如何是指望不

了的，其政权已经难以继续长期支持下去了，最终不过是在美国的坚持下给它在联合政府中保留某些席位，将来的政权事实上不能不是依靠共产党的。随着4月初赫尔利在美国公开发表扶蒋反共的演说，美国政府政策已经更加明朗化，中国共产党也更加公开自己的亲苏立场。毛泽东开始估计，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大局是定了的，但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拒苏反共，力图独霸东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反共也是必然的。希腊出现英国支持斯科比政权镇压共产党游击队的事件，就是战后意识形态对立的信号，也是中国必然出现斯科比危险的重要证明。在此情况下，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将要完结了，大骂的阶段恐怕快到了，美国不到山穷水尽，决不会和我们合作。它目前只是害怕苏联参战助我而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据此，中共中央开始改变对美政策，通知各地对美方人员加强防范，并决定立即开始准备应付内战。他们断言："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因此，他们决定：立即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进一步派兵到南方建立战略根据地，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立即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①]。

在1945年6月，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正在走向最后的胜利。但是，人们关心的政治焦点却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而其矛头所指是如此明确。在这时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美国反动派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重新开始依据斯大林的理论对世界政治的矛盾进行具体区分，并且开始提出警告："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但毛泽东坚定地相信：苏联、中国共产党

① 中共中央关于对付美蒋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6月17日。

和世界民主势力，终究要战胜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和一切反动的逆流。他甚至重又宣布：俄国党——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总司令依然存在①。同样，苏联之所以长期不援助我们，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换言之，中共中央确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而在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②。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要准备在战后依靠苏联并争取援助，为此应当在背靠苏联的东北建立中国革命最为巩固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出兵东北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断定，由于苏联参战有援助中共可能，因此美国对中共的政策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还会利用现有的关系极力侦察中共对苏关系的动向。但是，随着中共中央了解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苏联，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显示出某种令人关注的可疑动向，他们也迅速意识到苏联为了防止日本再起和便于插手中国事务，完全可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一个互助协定，这种情况必然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只是，由于苏联这时的报刊上接连开始出现批评国民党腐败政治和倒行逆施的文章，中共中央仍旧相信“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英美及蒋不能对苏无顾忌”。因此，苏联即使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互助协定，也决不会限制苏联对自己进行必要的援助。况且，苏联的参战必然会改变中国的形势，结果必然会使美国独占中国和蒋介石进行独裁变得格外困难，从而“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未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他们还是决定，以拒绝参加将要举行的国民参政会来给苏联以暗示，表明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周旋到底的决心。

但是，中苏之间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带有某种政治交易

①②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的性质。这是因为，由于雅尔塔会议规定了远东战后国际关系的政治格局，苏联既不能否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否认国民党中国政府在中国政治中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然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相对立的任何政策，也不会支持中共去与国民党打内战。他们唯一愿意做的就是促使中国产生一个由蒋介石领导，同时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将有可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而未必对苏联有利，但考虑到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利益，他们似乎没有多少选择的可能。因此，他们只是想极力争取实现他们在雅尔塔协定中所得到的那些利益，也就是说，把外蒙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此来造成在其远东地区以外的一条防波堤，并使其能够确保得到一个他们盼望已久的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可是，由美国同意的这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虽然规定了维持外蒙古现状，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并使大连商港国际化，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管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及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等①，但最后把它们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仍旧要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认可才行。面对这种情况，苏联方面自然只能以承认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来作为交换条件。

中苏谈判从7月初开始，到8月14日终止，历时一个半月。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一系列附属议定书。苏联因此实现了它控制外蒙和中国东北地区铁路及港口，并在东北占有优势地位的目的。国民党也因此得到了苏联支持它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中苏条约的第一条即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质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②。条约并明文规定，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中国东北地区，和在东北收复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5，马尔他与雅尔塔会议》，第353—354页。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第2卷（下），第264页。

区“设立行政机构”及“树立中国军队”①。

苏联终将出于其切身利益的考虑而被迫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可以说是早已胸有成竹。还在谈判期间，蒋介石还在就出让中国对于东北及外蒙的权利问题上向苏联讨价还价之际，他就已经在调集重兵向陕甘宁边区南线一带集结了。很快，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授命下，开始向中共关中分区发动进攻性军事行动。蒋甚至公然告诉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军事反攻之际，如遇中共军队阻挠我收复失地，情况有利只管打，不必担心国际干涉。这说明，蒋介石已经认定，苏联必将因为与美国所达成的妥协和顾虑其在中国即将获得的权益，而不敢支持中国共产党。这自然有利于蒋介石借收复失地之机重新确立他对中国的统治。

中共中央这时显然对于这种情况缺乏了解。8月初，中共中央仍旧估计：苏联决不会同国民党签订一个限制中国革命的条约，更不会允许远东出现一个在美国支持下的法西斯中国。当然，他们也注意到，由于苏联必须考虑到它同美国关系，因此条约也不会符合中共的愿望。但8月9日，当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之后，中共中央还是认为与苏军配合作战并得到苏联援助的时机来到了。他们开始估计，由于苏联出兵，蒋介石必然不敢对中共轻举妄动，结果大规模内战将不会立即发生，因此中共当前的任务将是“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即要准备在苏美协定与中苏协定的基础上，重新与国民党坐下来谈判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但考虑到在收复失地问题上自己必然要与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因此，他们同时也不能不作好应付内战的准备工作。随即，他们发出反攻命令，要求各部队对敌伪发动广泛进攻，并迅速壮大力量，准备在日军投降时能够立即夺取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他们并且命令各部队：“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

---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第2卷(下)，第274页。

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为了乘此有利时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毛泽东明确主张中共的行动不应受任何约束，相反，应当“无法无天”，只“向人民负责”。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如此突然地结束是中共中央所没有预料到的。而进一步让中共深感不安的，则是战争结束当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尽管中共中央这时还不知道条约的具体内容，但从蒋介石当天即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情况可以看出，条约的内容无疑是对国民党有利。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5日发布了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命令竟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它的有在中国的日军都“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①。毫无疑问，国际形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化。

日本突然投降的情况，在中共中央看来显然加大了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而蒋介石国民党的趾高气昂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估计。为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国民政府紧接着发出的不准中共军队参加投降的命令，朱德公开通电国民党，反而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②。朱德同时致函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决不能代表中国“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共军队不仅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而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处理日本的国际和平会议与联合国会议”③。中共中央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上“完全是欺骗”，它只能是为了便利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反共战争而作的舆论准备。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予以理睬。

---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5，中国卷》，第501页。

②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

③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8月22日，鉴于斯大林来电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和平的办法，使中国能够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共中央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对于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在22日当天发出的指示中明确告诉全党："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由于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因此中共只能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以争取有利于人民的条件①。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即（一）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自己；（二）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军队完全投降于他，自己没有合法地位，结果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只能使用武力强攻。但中共军队的武器只是步枪，没有外援不能攻坚克敌。由此不难看出，这时苏联的外援对于中共利用日本战败取得对于国民党的有利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仔细考虑了苏联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苏联的作法还表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毛泽东说，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大战之后，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而苏联在中国如果助我，美国必然助蒋，结果大战必然要爆发，世界和平就不能取得。因此，苏美英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确定了的，正如苏联在欧洲可以援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援助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希腊一样，中国是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帮助我们可能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

---

① 《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

民更有利。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但因为苏美英都要求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发动大规模内战，这种情况也未必就对我们不利。我们正可以借此逼迫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解放军和建立联合政府。当然，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以后多半还是打打停停，除非国民党认识到中共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决不能用武力来对付，否则它是不可能让步的。

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对于谈判的根本目的很清楚，即准备以江南八个零散的根据地来换取国民党公开承认共产党在整个陇海路以北即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它决不准备承认国民党对于军令政令的所谓统一。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派毛泽东等前往重庆谈判，一方面则加紧利用军事上的便利条件开始全力以赴地从华北地区抽调大批干部和军队向东北地区运动，以便造成既成事实。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则以迫使中共承认军令政令的统一为此次谈判的中心目的，因而对于中共的上述要求一概加以拒绝，指责这种要求不仅“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而且不啻“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这样一来，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和平谈判实际上并没有导致和平的结果。10月10日，双方虽然签订了一个《双十会谈纪要》，规定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方针，并决定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战争的烽烟就四处燃烧起来了。蒋介石必欲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以至不惜用武力的方法来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必欲保存革命的一枪一弹和他们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结果，双方仍旧只能是靠枪杆子来进行一番较量了。

第五章　走向新中国

（一）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随着1945年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开始走向最后的胜利，美英苏三大强国之间围绕战后欧洲的势力范围，乃至世界其他有关地区的政治走向，明显地开始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和斗争。可以肯定，这种情况正在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问题在于，美英苏之间的这种斗争在形式上似乎还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尖锐，相反，美英苏三强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就战后世界政治基本格局所达成的默契却给人印象深刻。因此，战后中共中央对远东国际关系的考虑，最初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而把苏美继续合作作为自己的基本估计。1945年8月斯大林那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更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苏联准备在远东和中国所采取的立场。

在即将出现的足以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接到这样一封要求自己放弃争取支配中国未来权力的斗争的电报，它所引起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①。何况，毛泽东已经充分相信，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是，毛泽东其实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已经不仅仅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甚至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

① 毛泽东对于斯大林这封电报的强烈反感在50年代表现得十分明显，毛泽东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三番五次地严厉批评斯大林1945年这封“不许革命”的电报。

题了。还在中共七大等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指出：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大局战后固然一时还不会改变，但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拒苏反共，力图独霸远东，以致变中国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后意识形态的对立，美英苏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加入反共反苏阵营，而中国共产党站到反美反帝的苏联一边，也是必然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共中央自然责无旁贷地要照顾到苏联方面的立场。但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共中央不能不同时采取两手策略，即一方面参加谈判，在政治上军事上适当让步，表示和平愿望；另一方面夺取一切自己已经占有优势的地区，特别是准备利用东北蒋介石鞭长莫及之际，配合苏军夺取东北，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4—5月间就已经一再主张："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一来"配合苏军收复东北"，二来"得到技术条件"。他明确认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这是因为，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因此"东北是特别重要的"。以致于他断言：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①]。

1945年8月9日，根据苏、美、英三盟国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苏联军队开始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并很快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苏联出兵东北对于这时急欲乘机夺取东北，背靠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是千载难逢之机。需要注意的是，随着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① 见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在七次大会上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1945年6月10日。

在原为日伪所占的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已经形成大片权力真空地带。“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事实使然。只不过，由于华南地区共产党的势力较弱，华中国共两党势均力敌并为国民党所必争，只有华北与东北有可能争取。而华北共产党的力量虽然占有绝对优势，但若无东北地区的保障，仍将四面受敌并成为国共较量的战场。因此，占领东北地区对于共产党人的未来毫无疑问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然而，在1945年8月，要决定夺取东北的战略却是异常困难的。一方面，苏联政府刚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文规定了只有国民党政府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这时完全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中共中央通过间接的联络渠道无法了解到苏联方面的真实意图。与此同时，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分别以远东盟军总司令和中国政府的命义发布命令，阻止中共军队接收日伪装备和地盘。这种情况意味着，任何一种策略上的不慎都有可能引起对自己不利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并且使苏联卷入一场国际性的对抗之中。

共产党当然不怕战争。事实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当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刚一下令禁止共产党参加受降之际，毛泽东就公开告诫党内各级领导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必须去争，至少在那些我们占优势的地区，绝不能让蒋介石白白得了去①。但问题是，在同有美国公开武装和支持的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中，如果没有苏联方面的支持，能否取得预期的胜利，这对于共产党人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②。而苏联会不会援助自己同国民党的斗争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原则上无疑是确信不移的③。然而在

①②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任务》，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1127页。

③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实际上，自抗战以来，这种“援助”始终只是一个“将来时”，在战后美苏抗争的情况下，它是否真的会来，会采取什么样形式，是多是少，是大是小，人们显然还深感困惑。但无论如何，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必须寻求这种支持，如同他们必须夺取东北一样。而事实上，共产党人确信，一旦夺取了东北，哪怕只是进入了东北，就没有理由再怀疑苏联的援助问题了。

还在8月10—11日，朱德总司令就已经公开发布了进军东北的命令。其二号命令特别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各部以及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立即向热河、辽宁及吉林进发①。尽管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强调这一命令主要只是“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但军委仍旧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应立即向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以及辽宁的朝阳和锦州一线推进，以迎接苏联红军，寻求配合，并探虚实②。到8月17日，晋察冀根据地冀察军区下辖之平北军分区詹大南、段苏权部即率先在张北与苏蒙红军会师，而苏军也明确表示同意接触③。于是，中共中央立即提出了“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问题。在接到冀察军区的电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下令由山东、冀鲁豫、冀中火速抽调4个团，每团不得少于1500人，另由陕甘宁、晋绥配备4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迅速“开至热河边境待命”④。随后，由于苏蒙红军拒绝配合八路军攻取张家口，和斯大林来电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平统一，中共中央注意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注意到“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因此对于苏联是否同意八路军进入东北

---

①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2日。

② 转见《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页。

③ 《程、耿关于我与红军在张北会师致军总电》，1945年8月17日。

④ 《中央军委致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电》，1945年8月20日。

"还不能断定"，但它仍然相信"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因而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已调之部队"仍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河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①。

但是，仅仅派干部去东北工作毕竟是困难的。很快，中共中央就再度决定在承认国民党政权接收及派驻行政大员的情况下，由共产党对东北进行实力控制的方针。这时，通过与苏联大使的接触，它已经了解到："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这两点，一般地决定了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故"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②。因此，在8月29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具体指示，要求"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③。自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8月30日，晋察冀根据地冀热辽军区下辖之曾克林部第12团在山海关外绥中县与苏军会师。之后，该部两团与苏军首次配合作战，于31日下午攻占了山海关④。苏联红军并允许八路军接防绥中、山海关等地，同意八路军接收当地伪政权及建立卫戍司令部。与此同时，山东八路军侦察部队在渡海与大连苏军接触后，也得到了苏军将不干涉中共在乡村中的军事活动和在城市中的群众工作的保证。甚至，当9月7日冀察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开进山海关时，苏联红军还专门派车迎接，并于11日与八路军召开

①②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任务和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③ 《中央关于去东北工作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④ 《聂、肖、刘转李运昌关于苏军及山海关情况的报告》，1945年9月10日。

了盛大的联欢会，“表示援助我们”①。而曾克林部更得到苏联红军方面的邀请，由苏军用火车运抵沈阳，担任卫戍部队。苏军指挥官甚至表示，中共军队完全可以利用大量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面对这种情况，尽管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还缺少直接的联系，但它显然已经深受鼓舞，并确信它已经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支持了。于是，中共中央再下决心：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外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赶往东北，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②。而为了“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中共中央还开始在华北各省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之蒋军，并令李运昌部率5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及沈阳一线，确保对进入东北陆路之控制，力图以此来压迫蒋介石承认自己在华北及东北的优势地位，从而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③。

对中共军事实力，苏共中央这时尚无太多了解，但它显然相信中共并没有可能推翻蒋介石政权。且美国正虎视眈眈企图借机卷入中国事务，一旦中国内战爆发，势必为美国武装干涉提供重要口实。考虑到战后欧洲局势颇为复杂，又是苏联战略重心所在，它在远东只能保持守势，力争和平和妥协，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然而，鉴于美国自对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就反复明确表示美国有权利要求苏联公开声明对中国东北遵守门户开放

① 《聂、肖、程转李运昌关于苏军表示援助电》，1945年9月11日。

② 《中央关于抽调四个师去东北给山东分局的电报》，1945年9月11日。

③ 《军委关于目前军事行动的部署》，1945年9月11日；《中央关于东北情况给重庆代表团的通报》1945年9月11日。

的原则[1]。表露出可能进入东北的意向，苏联又不能设法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和影响，尽力阻止美国人进入到东北来。为此，在占领东北后，斯大林一方面公开表示苏军在东北既未与中共接触，亦决无与中共联合的企图，希望国民党政府早日派人接收接防，国共两党早日成立协定[2]，另一方面则秘密指示在东北苏军暗中支持中共势力在东北迅速发展、与中共协调行动。

9月14日，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由已担任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陪同，乘苏机由沈阳飞抵延安，向朱德总司令转达苏军统帅部正式口头通知，即要求八路军在红军撤出东北之前，不要公开进入，个别进入东北大城市者，请即下令退出，至红军撤退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至于以地方武装名义在东北活动问题，苏方代表在非正式谈话中表示支持，并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3]。16日，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代表又通过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电台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还可进到外蒙去，"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4]。而苏联大使也私下告诫中共领导人，务必"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以力争东北。

不难看出，苏联此时虽为应付外交，在形式上对中共武装进

---

① 1945年8月9日，12日，27日，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曾三次向苏联政府转达美国政府希望苏联公开承诺在东北问题上遵守门户开放原则的意见。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182页。

② 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26页。

③ 参见伍修权回忆录之二：《到东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

④ 《中央关于张杨与苏军代表交谈情况给重庆代表团的通报》，1945年9月17日。

入东北限制极严，但暗中是对中共夺取东北持鼓励态度的。这自然促使中共中央开始下大决心去夺取东北。

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东北局，立即随苏机赶赴东北指挥一切。同时，明令"华中、华北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东北，"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①。中共中央已意识到："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现在是"千载一时之机"②。因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③。"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故此为"决定的一环。"为此"其他区域暂时稍受损失，亦应在所不惜④。"于是，中共中央于9月19日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决定江南武装撤返江北，华东新四军调8万兵力分赴山东和冀东，山东主力及大部干部则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全力夺取东北及热察和冀东于我手中⑤。

随着9月下旬美军开始大规模运送国民党军队赶往华北及东北，并且公开在天津登陆，助蒋占据平津等地，苏联方面对于中共夺取东北的计划，愈益变得积极起来。尽管9月中旬以来，苏军一再要求已公开中共军队身份的李运昌各部撤出沈阳等大城市，但10月初即劝告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应抽调25万至30万人分别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及沈阳附近，把住东北大门，并决定立即向中共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苏军领导

①② 《中央关于配备一百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1945年9月15日。

③ 见《刘少奇等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45年9月17日；《东北局关于东北情况及其建议致中央电》，1945年9月23日；《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19日。

④⑤ 见《刘少奇等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45年9月17日；《东北局关于东北情况及其建议致中央电》；1945年9月23日；《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19日。

人甚至转述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给予鼓励①。至10月上旬苏联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苏军准备开始撤退②之后，苏军更主动表示愿将东北全部交予共产党人，并且不顾外交条约限制，催促共产党人迅速接收各省市政权。

然而，在9月底10日初，中共中央“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还远”③，受命前往冀热辽之黄永胜、倪志亮、曹里怀、邱创成及太行军区等部，尚在途中，山东决定派往东北、冀东之5个师刚刚开始出动，承德至山海关一线总共只有万余人。而全东北中共军队人数虽已有近8万人之多，但因部队扩充过快，干部奇缺，训练不足，故“除少数部队外全无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对蒋介石在美国第七舰队协助下海运东北，颇感担心，因而一面批评各部队行动过于迟缓，一面力求谨慎，主张“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外蒙、朝鲜、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④。而随着苏方态度日益积极，力主中共全力夺取东北，中共中央遂不能不再下决心，表示彼方既如此，“我方自有办法”，立即抽调三十万办不到，但“一个月可有十万到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同时开始在平绥、平汉、同蒲、津浦各路“与蒋军大冲突”，迟滞其陆路北进。当然，中共中央这时仍旧感到困难极大，故要求东北局立即与苏军商量，或拖延撤退时间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或“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我以必要的援助，使我在这些大冲突中获得大胜

① 《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8日。
② 见《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苏交涉》，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编印，第127、129页。
③ 《彭、陈关于东北部队分布情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1945年10月8日。
④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等。

利”，从而对东北及全国局势发生“大影响”[①]。

要苏方从张家口方面提供必要的军火援助，这对苏军来说并非难事，但要其延缓撤军，在苏联方面已经正式宣布之后，就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了。特别是10月12日国民党之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到达长春与苏方正式接洽接防事宜之后，事情又再度变得复杂化。一方面苏军坚持中共应接收热河和辽宁省政权，以便于控制东北门户[②]，另一方面又担心全面接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阻止中共接收地方政权[③]，一方面苏军极力反对国民党由美舰运送从海路进入东北，逼其改走山海关，以便于中共军队阻截其通路，乘苏军撤走之际夺取南满，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美蒋抗议，不能不同意国民党军队从营口、葫芦岛登陆，直接进入东北[④]。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苏联大使，国民党军将于29日起自营口、葫芦岛登陆[⑤]。此举对中共中央夺取东北之计划无疑有致命的威胁。至10月底，中共军队除原有的李运昌等部外，只能到达3.5万人，干部6000人。拖延到11月，即可到正规军6万人，干部2万人。故中共中央一面“决心动员全力”，组成几十万野战军，作大规模作战，“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⑥]，另一方面再三要求苏军：“第一推迟撤退时间，第二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拒绝蒋军进入东北，第三允许我方立即接收政权及民选自治政府。”它明确认为：“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

---

① 《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等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

② 苏驻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这时甚至明确告诉熊式辉：辽宁、热河二省行政首长，已由苏军委派任用。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24页。

③ 原苏军让接收抚顺、安东等，10月中旬末忽又不让接收，甚至已进入东丰、西丰、海龙、西安之中共军队亦被赶出。见《彭程关于东北情况致毛主席电》，1945年10月21日。

④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四），第121、125页。

⑥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

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①。

实际上，进入10月下旬之后，当苏联方面了解到美国在华北的登陆部队开始公开帮助国民党强行抢修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并武装执行护路任务之后，苏军态度又骤然变得强硬起来。10月24日苏军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中断交涉②。25日，苏方代表通知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同时全面开始交接政权工作，并声称：11月15日前“如顽固进攻，苏将协同我打击”③。随后，苏军即应东北局之请求，先后将营口、葫芦岛等地转交中共军队驻防。

10月27日，美舰先头运输梯队抵达葫芦岛海面，遭到李运昌部31团驻防部队的抵抗，被迫折回。此后，国民党方面虽极力交涉，苏方却以“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为由，拒绝为其登陆提供任何安全保证④。不仅如此，苏军为防止国民党突然空运长春，还特别允许共产党人在长春机场附近设防，同时公开指责东北国民党部秘密组织10万武装破坏交通，袭击苏军⑤。至此，中共军队开始大批进入东北各大中城市，接收政权并布防。加上此时平绥、平汉、同蒲及津浦各路均被中共军队切断，仅上党、邯郸战役国民党军即有两个师起义，近20个师被歼，蒋之通往东北的海、陆、空通道全部被堵死。于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竭尽全力、霸占东北”的方针，主张“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

①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四），第126—127页。

③ 《东北局关于苏方态度积极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38页。

⑤ 同④第143—144页。

官吏，已派者须取消”，即华北国民党军亦应退出[1]。

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第13、52两个军开始在秦皇岛登陆。继而在美军帮助下向周围扩展，并于11月3日开始攻打山海关。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就此打响了。

此时，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只有13、52、94三个军约8万人，而共产党在锦州至山海关和承德一带的兵力达到10万人以上，尽管部队有些昼夜兼程，十分疲劳，许多新扩充之部队既缺枪弹，又无训练，难从作战，但中共中央仍坚决主张“坚持半个月”，拒敌北进[2]，它相信“本月内我可集中十万兵力于东北”，即可“靠此兵力及当地新力量作战”，两个月后更有“九万生力军可陆续增加上去”，敌纵使派出5个军十五万人也不足为惧[3]。然而，事情却由此而开始发生变化。

在苏联方面看来，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及热河的兵力，远不足以阻挡有美国帮助和装备的源源而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一直主张共产党人应不顾华中乃至华北，把全部主力至少50万人调到东北来，因为“满洲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故而他们相信“先机已失”。但是，在美军大力助蒋向东北推进的刺激下，苏军不能不设法加强在东北的共产党人的作战能力，因此，借撤退在即，他们先后开始向中共军队提供了少量坦克、汽车、运输机，并开始移交部分日军武器弹药仓库和兵工厂。甚至，为了有效地打击国民党军，苏军一方面虽被迫表示同意国民党可于苏军撤退之际分别向沈阳、长春、哈尔滨运送空降部队，一方面又同意中共军队向其发动袭击。但是，苏联人采取这一系列步骤的最终界限很清楚，这

①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目的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45年11月3日。

② 《中央关于把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作东北当前紧急战略任务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0日。

③ 《中央关于向东北增调兵力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中央关于李富春等速去沈阳致高洛电》，1945年11月14日。

就是无论如何不要把美国人引入到这场冲突中来。

从这一阶段苏联方面的态度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既不想看到中国成为美国人的势力范围，生怕美国染指中国东北，又极度担心卷入中国内战，而与美国发生冲突。他们鼓励中国共产党人抵抗国民党，但一再告诫要避免在有美机、美舰及美军之处作战。当毛泽东提出"霸占东北"之方针后，苏方代表更明白劝告："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在这种复杂心态下，国民党11月15日所采取的中止接收东北的重大行动，立即使苏联政府陷于窘境。

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照会苏联大使，由于接收工作"遭遇诸种阻碍"，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①。随后，蒋介石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苏联政府"故意蔑视""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蓄意"阻挠"其正常接收，"支援"中共军队抢占东北，"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故请美国给予"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②。国民党的这一举动，不仅使苏军已经开始的撤退工作无法继续，而且使东北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国际问题而引起美国的干预，这不能不导致苏联改变对策。

11月17日，熊式辉及国民党东北行营人员乘机南撤，苏军撤出长春之部队又奉命开回，并命令共产党人的军队全部退出城外。同日，苏联大使照会国民党政府，称"苏军司令部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今"中国政府军队能无阻碍的在长春及沈阳降落"，且将受到苏军"协助"。而为有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8—149、153、168—171页。

利接收，苏军之撤退可“延缓一个月至两个月”①。之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商定，苏军撤离东北日期可推延至1946年2月1日②。

11月20日，苏军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与顽作战，不准有共产党军队存在，共产党人的军队应一律撤至50公里以外驻扎。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东北“现在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但希望能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以便于我延缓蒋军之推进③。

其实，苏军赶走中共军队并非出自本意。蒋之撤退行营使其深感意外，手忙脚乱。美机美舰又接连出现于旅顺大连附近海面，更使其高度紧张。为此，苏联不能不一方面力图以让蒋接收东北为缓和之计，另一方面则大批向沈阳、旅大之线增兵，并重新在营口地区布防，加强防备④。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一方面“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要求其服从规定，但另一方面又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所应支持和在中国及远东唯一可依靠的力量，因此又绝不能使其削弱。于是，他们很快就同意中共军队可仅退至长春路沿线20公里以外，中共东北局及其各种政治宣传机关等不必撤退，支持由共产党人召集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于11月22日在长春举行，提供专门电台以保持双方间的密切联络，并开始从旅顺及朝鲜苏军处提供

---

①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8—149、153、168—171页。

③ 《中央关于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问题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9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线开展东北诸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

④ 1945年11月中旬以后，苏联接连向旅顺空运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50000人以上，包括4个坦克旅及一个炮兵师。

军火帮助，甚至同意中共军队不让北宁路以拦截蒋军北上。对此，苏联官方照会则称："至于营口、葫芦岛以及沈阳以南区域"，因苏军已经撤退，故不能予以协助①。

不过，由于11月16日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军队攻破，且发现国民党出关军队中有大批美国军事顾问②。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独占东北，无此可能"，只能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计划，"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主要力求"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③。随着11月25日锦州失守，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美国势力随着蒋军进入东北，并使苏联能够合法地在东北确立优势地位，苏联政府开始提出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的提议，极力压迫蒋介石承认苏联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利。

由于东北工矿企业长期为日本所经营，几乎所有重工业均为日本股份。因此，依照雅尔塔及波茨坦协定对德国之规定及先例，存在赔偿问题④。早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蒋介石就试图使苏承认"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应"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份"⑤，但斯大林仅承认"凡属于日人私人之财产，可同意赔偿中国战时损失，凡属于公司组织者，应视作战利品"⑥。因属于公司组织者占东北工矿企业绝大多数，故苏军占领东北后，很快就将其作为战利品或接管，或拆迁搬运至苏联。至11月底已搬运之机器，即已占总量之1/5多。但由于东北重工业仍具有极大潜力，苏联方面最初甚愿共产党人能全部占有，不让蒋美染指。鉴于此举不成，苏联遂又多方设法劝诱国民党同意"其财产应由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55—156页。

② 中共中央11月23日电称已证实国民党出关军队中每团有20名美军军官。

③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开展东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央关于准备撤出大城市铁路线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

④ 参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512—514页。

⑤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241、371页。

双方平均分配。并“组织——中苏合办之公司”，共同经营东北工矿企业①。

但是，随着美国的不断介人，苏联“合法”控制中国东北的努力实际上很难成功。11月以来，美苏不断在原子弹、德国、朝鲜等众多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美军已明显地将苏军作为主要假想敌。11月底，为便于尽快帮助蒋介石控制东北、统一中国和取消中共军队，美国决定在扩大对国民党援助的同时，派马歇尔将军直接来华参预调处中国内战②。尽管出于各种考虑，中共中央力主把东北问题提到谈判桌上并力劝苏联同样参预调处，但苏联显然对此十分谨慎。斯大林关心的只是如何避免来自美国的威胁，他再三告诫美国政府和国民党人：“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③。

实际上，苏联并非相信自己的警告和迫蒋“合作”真会有作用。自苏联11月下旬被迫对国民党让步之后，苏联已日渐深刻地感觉到国民党是自己在远东危险的敌人。鉴于苏联军官及士兵不断遭到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集团的袭击和暗杀，苏军已开始向官兵进行警惕和仇恨国民党的教育。而对于中共中央准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肯定中共在东北地位的计划，也“表示不乐观”④。据此，在1946年初，苏联一方面提议中共中央在马歇尔参加的国共谈判上，应力主“满洲问题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一方面陆续开始将辽阳、鞍山、本溪等东北重要工业区移交给共产党人，并通知中共东北局准备在其撤退时大量接收。

---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374—402页。

②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45—746、748、767—769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42页。

③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848—850页；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15页。

④ 《东北局关于苏军撤退日期致中央电》，1946年1月2日。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随着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国共两党正式在美国调处下开始谈判停战问题，但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冲突不仅丝毫没有和缓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二）和与战的抉择

1945年底，中国的局势异常复杂。一方面，自“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并企图迅速运兵以控制华北，接收东北，而共产党则利用在华北的优势地位，切断了华北各主要交通线，并迅速开进东北，控制了部分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甚至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由海路进入东北的企图，使蒋介石陷于被动之中。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苏联须顾及外交信用，共产党军队的落后装备又一时难以改善，要阻止有着大批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显然有极大的困难。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由于无力迅速调派大批军队赶赴华北与东北，要想在华北与东北对共产党展开全面攻击，也明显地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将军受命前来调处国共冲突，无疑成为这种复杂局面的一种转机。

对于马歇尔使华，国共两党的态度最初截然不同。蒋介石多次函电以示欢迎，并积极准备材料和方案，力图影响马歇尔和美国政策，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同时利用美国的压力得到战场上一时得不到的东西。但共产党却出于对其前任赫尔利扶蒋反共政策的厌恶，对马歇尔的调停不抱任何幻想。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对美国总统此时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①，一方面出于策略考虑，在公共场合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欢迎②，另一方面在党内则明确指出，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8—629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93—794页。

杜鲁门声明的实质仍旧是“扶蒋防苏压共”。

杜鲁门声明和其它一系列文件，构成了马歇尔赴华使命的主要点。它确实包含着扶蒋，防苏、压共的重要内容。杜鲁门等认为，支持蒋介石政府以防止苏联控制满洲以至中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必须设法制止中国的内战和混乱，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完整统一①。但是，作为一种妥协和美国民主政治观念的产物，马歇尔使命也包含着某些共产党人最初所不了解的内容。这就是必须设法取消国民党的所谓一党“训政”制度，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举行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使他们得以参加政府，从而建立起广泛代议制政府。美国清楚地知道，作出这种妥协和进行必要改革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并深信有足够的办法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②。在这一点上，美国甚至成功地取得了苏联的谅解，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中，双方不仅相互承认了对方在中国目前所负有的责任，而且同意共同促进中国停止内战和实施民主政治③。这种情况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马歇尔的地位，而且也不能不迅速影响了共产党人的看法。

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与各方接谈。30日，国民党方面提议由马歇尔参加，会同国共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调处停战等问题。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就此达成有关协议④。

这时，对于根本解决国共冲突的办法，国共双方的公开立场非常明确：蒋介石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双方主张南辕北辙⑤。但马歇尔似乎胸有成竹。调处工作一开始，他就一面提出实施停战和恢复交通的建议

---

①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45—746、747—749、768、770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4辑，第628—629页。

② 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42页。

③④ 1945年12月30日、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⑤ 同①，第794—804页。

和办法，一面催开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停战、政治民主化和统编军队三个步骤来完成他的使命。

关于停战的建议和办法，马歇尔提出一份停战令草案和一项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具体计划。停战令的中心内容是全国停战及军队停止调动和恢复交通，但草案提出两点例外，一是国民党军队可以“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二是应允许“为必须之给养、行政及警卫而作之纯粹地方性军队调动”①。对共产党来说，这种例外显然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意味着战争仍将不可避免，而共产党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考虑到军事上无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外交上又必须顾及苏联的信用和愿望，中共中央决定同意马歇尔的建议②。随后，在1月7日开始的三人军事小组正式会议上，国共双方经过一系列具体磋商，逐项修改通过了马歇尔提出的这一草案，并于1月10日达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停战协定③。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正式召开，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齐集一堂，讨论和商定国家大政方针。至此，美苏的干预和马歇尔的调处产生了明显的成果。毛泽东也公开认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将从此开始”④。

共产党人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会议召开的这种积极态度，并不是一种宣传手段。由于此时苏联方面一再表示“东北决不能打”，故中共中央开始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考虑到自己已经在东北及华北地区取得了立足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6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谈判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20—25页。

③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④ 1946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点和部分军事优势，中共中央显然同意在现有基础上争取和平与妥协。因此，共产党人在美国单方面调处国共冲突和停战协定问题上所作的种种让步，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在目前条件下实现和平。中共中央还为此明令各部队严格遵守停战协定，“违者将受到处分”①。当然，中共中央也特别告诫各地领导人，独裁还没有完全打破，蒋介石也不会真的变成民主派，“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②。

果然，国民党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的企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月14日，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议上就改组政府问题明确主张：（1）必须在现有之国民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2）增加人选应由蒋介石指定并“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3）国府委员会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以及蒋介石交议和1/3委员建议事项，蒋并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4）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③。这一态度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感。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扩大和改组现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④。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⑤。

---

①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1946年1月12日。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给各战略区的指示》，1946年1月13日。
③ 1946年1月15日《中央日报》。
④ 1946年1月17日《新华日报》。
⑤ 《中共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也引起了马歇尔的不安。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马歇尔认为，必须促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重要让步，放弃“一党政府”的形式，尽量实现政治民主，如此才可能说服共产党交出军队，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鉴于国民党的态度，马歇尔不得不放弃不干预中国发展道路具体形式的许诺①，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他于1月22日悄悄拜会蒋介石，说明自己的立场，并提交一份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②。马歇尔明白告诉蒋介石，成立这样一种委员会，将使蒋确实取得全中国的总统地位，而非如现在的一党领袖，并将保证中国的非共产党化③。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影响。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甚至视其“为共党所不敢提者”④，但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的大权，不得不虚与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⑤之后，国民党代表逐渐在政协会上作出让步：承认应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国务机关；委员选任无须经过国民党中执会通过，国民党不得超过半数；蒋没有紧急处置权，且蒋否决之决议如复议时有3/5以上委员坚持，则否决无效；凡重要决议均须有2/3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始可通过。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表示同意充分肯定人民权利和自由，愿意在协议上写上共产党所提出的“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的字样。鉴于国民党作出重要让步，共产党方面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比例、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整编军队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让步。由此，政协会议终于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队国家化及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了正

---

① 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曾明确表示：“关于中国的团结的详细的必要步骤，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拟定出来；任何外国对这些事情的干涉，都是不适当的”，马歇尔来华后也多次表示，中国民主的形式应由中国人自己选择。

②③⑤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39—141、142—143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71页。

式的决议案。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决议案规定：成立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以国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讨论并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及财政计划等，国府主席对于国府委员会的决议，只有复议权，没有否决权，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主张维持原案时，该案应予执行。同时，建立立法院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省长等实行民选，目前，总统得由县级省级及中央议会各级选举机关选举或罢免，而省可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并与中央均权。在军事国家化方面，决议案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军队内禁止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党派活动，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军队不得干涉政治，国共两党军队尽速完成整编，最终实现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50—60个师的计划①。

政协决议的达成，对冲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具有很大意义。中共中央确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很大胜利"，"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②。苏联方面更明确表示乐观。苏联大使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这是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应当准备学习法国的经验，逐步把主要工作转移到争取群众方面来。

让中国共产党学习法国的经验，其实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准备象法国共产党那样来处理自己与军队的关系，也就是说，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准备放弃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参加到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当中去，放弃非法的武装斗争，去走合法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这样的道路是否走得通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显然早就有所考虑。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战后法

① 见1946年2月1日《新华日报》。

② 毛泽东2月9日对美联社记者谈话，见1946年2月13日《新华日报》；《中央关于打一大仗决定东北大局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7日。

国模式的出现，其实仅仅是因为法国处在美英两大强国的势力范围内，而共产党还没有足够力量实现自己的统治。考虑到法国共产党的妥协不可避免的是美英两国迫使苏联让步的一种结果，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设想它再度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实际上，在斯大林来电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之后，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但是，相信必须与蒋介石妥协乃至参加由蒋介石领导的政府，还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也准备轻易地交出自己的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①，这早就是毛泽东的革命逻辑。在与国民党有过将近二十年斗争的经验之后，他自然更加坚信这种逻辑。因此，他早就下定决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②。但是，战后中国内部的国共两党之争，毕竟不再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了。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中国之所以可能走上法国道路，也是由于美国在起作用，由于共产党后面也站着一个苏联，因此，"国共反映美苏"。既然"国共反映美苏"，那么，随着美苏日益卷入中国内部事务，共产党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适应对美外交和美苏关系的需要。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以及苏联赞同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的事实，显然使得中共中央更进一步相信中国有走上法国道路的可能性。停战协定签字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通过，更使得中共中央不能不开始考虑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现实可能性，以致于人们开始相信："民主革命的胜利可能不需要再经过内战"。

政协决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中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这种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35、529、1159页。

震动的结果突出地反映在中共中央1月底和2月初的会议上。显然，在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了许多年之后，共产党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的妥协，第一次看到“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可能达到比军事斗争更大的结果”。联系到战后整个国际大势和法国等国的经验，他们终于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国“已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据此，中共中央于2月1日发出指示，指出：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它断言：“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①。

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赞同政协决议。政协决议通过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作好了参加政府的准备。提出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的具体人选，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部部长及不管部部长的人选②，并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协商国府委员中各党派具体比例数字及否决权问题，准备参加政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宣传战③，进而更具体地提出了关于军队整编问题谈判的各项原则④，准备开始正式谈判军队整编问题。

①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② 《中央关于国府委员人选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2月6日。

③ 《中央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向转变暂停宣传攻势的指示》，1946年2月7日。

④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

政协会议的成功，标志着关键的整军问题将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马歇尔看来，这是他全部使命中最困难的问题。但是，通过政协会议的结果，他看到自己在蒋介石国民党那里说话的分量；而通过与周恩来的谈话① 和毛泽东的来信②，他确信自己也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因此，马歇尔踌躇满志，认为成功有望。然而，他显然过于乐观了。

自停战谈判开始以来，马歇尔试图暂时把东北问题撇在一边。可是，到1945年底，东北地区已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20余万人，并控制了许多城市和乡村；而国民党虽顽固反对共产党在东北存在，但直到1946年1月，它进入东北的军队不过几万人，刚刚接收了几座城市。尽管马歇尔与蒋介石都寄希望于中苏条约的约束，但东北毕竟是共产党决心保持的战略要地，而且已经建立了如此之多的军队和地方政权，不论中苏条约如何规定，也不论国民党采取何种不承认主义，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何况，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使苏联对美国控制中国的企图极度不安③，苏联也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步骤，通过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广大根据地的作法，确保东北地区日后不会成为美国反苏的跳板。于是，东北问题不仅成为国共两党的内争问题，而且成为美苏远东战略争夺的重心。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问题十分严重，在停战谈判期间，共产党最终还是作了妥协，承认国民党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寄希望于和平解决东北争端。但是，由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此时在热河连战连捷，以致蒋介石完全不把东北的中共军队放在眼里，拒不承认东北有国共冲突问题，扬言只有接收主权和剿灭"土匪"问题，迫使共产党下决心在东北和蒋军作战，"以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④。这

---

①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48—152页。

③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15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打一大仗决定东北大局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7日。

样一来，停战协定签字和政协会议成功后，关内一片和平气氛，关外却充满了火药味，大有一触即然之势。

正在这时，蒋介石突然旧态复萌，在政治上重新制造紧张空气。他首先在国府委员党派比例问题上制造矛盾，以拖延政府改组；继而又以自己“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为借口，根本否定政协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煽动国民党人发难① 。同时还公然唆使暴徒捣毁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圆满成功的大会会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校场口惨案”。

东北形势的紧张和政治环境的骤然恶化，使共产党再度强烈地意识到：蒋介石是不可能轻易放弃武力的。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军队整编谈判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对着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显然，由于政协决议已经明确规定了军队国家化的方向和步骤，拒绝谈判是极不适当的。但没有国家民主化，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无疑是假的，其目的只是要“化”掉共产党的军队。马歇尔的目的最终也是要取消共产党手中的兵权。而严酷的现实却正在告诉共产党人，用军队国家化来换取国家民主化是有极大危险的。

2 月中旬，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对于马歇尔整军方案的具体策略问题。十分明显的是，在达成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前后那些日子里出现的那种和平憧憬消失了，人们开始对国家民主化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从而开始从根本上怀疑军队国家化的必要性。很显然，人们已经注意到，马歇尔提出的军党分离，军政分离，补给与训练分离的整军原则，不可避免地要使我们的军队离开民政，离开财政，失去征兵权，而训练权又掌握在美国军官手里，“照此计划美国即可完全控制全中国之军队，以后再经过交通货币的统一与经济的压力控制全中国之政治”。与此同时，由于我们交出了军权，恐怕“蒋对我们的军队是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那时，

①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第37卷，第333—335页。

蒋介石“要怎样便怎样，因此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鉴于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不是法国，我们国内国际的条件与法国不同，那种以军队国家化来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要彻底扫除干净，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用一切可能逃脱被消灭。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固然决定原则上继续进行整军谈判，并不反对政协所规定的军队国家化的方向，但实际态度已根本改变了。

整军谈判正是在这样的气氛和条件下开始的。谈判从2月11日开始，2月14日起正式讨论马歇尔提出的整军方案草案，国共双方除在第一期军队缩编比例、开始统编日期、宪兵性质和文件标题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之外，没有发生重大争论①。三人小组很快于2月22日达成一致意见②。25日，经蒋介石和毛泽东认可，整军方案正式签字。该方案包括部队复员、统编及配置等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歇尔极力强调的所谓“西方军事传统”③。

马歇尔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只是一纸形式上的东西。其实质是要共产党的军队统一到所谓“国军”中去。而这个“国军”，在政府没有真正改组，或蒋介石国民党仍旧支配着政府大权的情况下，充其量不过是国民党“党军”。显而易见，要共产党现在就准备缩编和交出军队，完全是一种幻想。然而，马歇尔这时却充满了幻想。在谈判中，他坚持要写上：自协定公布三个星期后，双方应拟具并提交各自所有部队的全部表册，以及所保留的部队表册和头两个月复员的次序。他以为，只要逼得紧，事情就一定会象以前一样顺利进展。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马歇尔甚至自信地指出，“现在可以准备开

---

①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211—258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64页。

② 同①，第265—289页。

③ 1946年2月26日《新华日报》；《马歇尔使华》，第60页。

始复员和整编工作了”，唯一的困难只是作为中间人的美国军官太少了①。紧接着，他兴冲冲地飞了将近半个中国，甚至跑到延安，去对在他看来“毫无怨恨样子”②的毛泽东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把政治分歧放在一边”的时刻了③。

马歇尔的愿望确实产生了一些反响。3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示除东北、山东以外各区、局领导人：部队立即开始复员1/3，“于三个月内外完成”，并准备第二期再复员1/3。随后，各地雷厉风行，拟定计划，并先后开始实施④。不过，坦率地说，这种作法一是为了“精兵简政”，二也是为了争取舆论，与马歇尔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相反，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反对在目前情况下交出部队战斗序列和表册，另一方面，也丝毫不打算把政治分歧放在一边。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在政治方面的宣传和斗争，并且把东北问题同政治攻势联系起来，决心以争取东北停战和争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之地位为目的⑤。不过，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苏美关系的急剧变化，迅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1946年是世界经历历史性转折的年代。刚刚经历了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美苏两大强国，在莫斯科会议刚一结束，立刻就从战时的盟友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敌人。随着1946年初苏联与美国在伊朗和土耳其等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苏美关系骤然间恶化起来。由于苏联力图取得对伊朗和土耳其的控制权而不可得，反而使得美国迅速把它的势力范围伸展到东地中海地区，苏联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落入美国的战略包围圈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自然更加渴望能够把中国东北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尽管苏联这时所设想的还只是一种和平的“经济合作”的方法，但

①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510—511页。

③ 同①，第501—502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1946年3月6日。

⑤ 1946年2月16日《新华日报》。

是，这种努力同样遭到了美国的有力干预。2月9日，美国务院正式向中苏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声明中苏两国政府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的原则，损害了美国方面的商业利益①。2月11日，美英两国政府还进一步单方面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否认美英苏三国曾经就东北经济问题达成任何秘密的协议。美国的这种作法，再度使苏联在外交上和舆论上深陷困境。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东北经济合作自然化为泡影。时至于此，苏联已别无选择。要想保证自己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发言权，它或者必须设法使中国东北置于共产党人的实力控制之下，或者只能使东北陷于一种长期的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以利于自己必要时的干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苏联人开始破釜沉舟，准备给美蒋制造麻烦了。

2月22日，苏联在东北驻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等公开开始指责美国"挑拨离间"，公开宣布苏联关于在东北"经济合作"的要求"不是为金钱，而是为国防"②。与此同时，苏军代表一反过去害怕美国军队进入东北的态度，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共东北局领导人：美国现在派军队到中国来东北很困难，因此"假门户开放之名，深入东北"，对此苏联将采取强硬态度以对之。他要求中共中央立即调派更多的主力部队到东北来，以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当然，苏联方面这时并不是不想看到东北出现和平局面，但问题在于，他们不相信美国和蒋介石会允许共产党在东北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表示，除非在东北成立联合政府，他们才会对美、蒋让步，但不应对此寄予希望。

3月8日，苏军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陆续开始从抚顺、吉林、沈阳等地撤退，沈阳以南一切地区概不向国民党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17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39、186页。

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这意味着，苏联方面开始确实采取强硬态度，支持共产党人在东北大打了。而这样一来，中共中央自1月停战令以来所决定的争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自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撤退，中共东北部队先后接收和控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致使南满大部分工业区都已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蒋介石顿时慌了手脚。他急忙找到马歇尔，一改过去根本否认东北存在共产党的态度，承认东北也有国共冲突，要求迅速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阻止共产党进一步进入苏撤区。3月9日，蒋介石就派遣停战小组去东北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经马歇尔修改之后，于第二天转交给周恩来。蒋介石的条件无异于要求共产党从东北完全退出，而经过马歇尔修改过的建议表面上似乎缓和得多，但实质上也并无多大区别。特别是他突出强调停战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显然是想回避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地位问题。这无疑是行不通的。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告诉马歇尔：把政治和军事分开的解决办法，是不能接受的。停战以来，中共在东北军事上一让再让，就是为了争取东北政治上的民主和共产党的地位①。

其实，这时国共双方的矛盾冲突，已经远不止是一个东北问题了。这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中央全会，准备公开推翻政协决议所确定的各项基本政治原则，并大肆攻击共产党②。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国民党代表坚决主张修改政协确定的宪草原则。这进一步激起了共产党的强烈愤懑。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国民党二中全会企图“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535—538页。

② 见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2—1037、1047—1048页。

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在坚持政协决议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我们“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①。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自然停滞不前。而蒋介石干脆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大打。

在东北停战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联方面已明显地感到不耐烦。苏军代表一再询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5个军来东北？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据此，中共方面谈判态度日益强硬，毛泽东并明确指示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②。显然，中共中央这时已深感停战谈判时允许国民党进兵东北却又未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给自己造成了被动，故明确提出：“绝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事实上，如彼方不停战，沈阳以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彼方停战”，“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不屈服”③。

3月20日左右，共产党人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最后以长春为限，国共两党分别在南满及北满驻兵的战略设想，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于是，中共在东北各部队迅速开始与苏军配合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接防吉林市以东

---

① 《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关于与张治中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1946年3月17日。

② 同上。

③ 《中央关于不能承认国民党所提条件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6日。

等地区，并部署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及其沿线地区，准备在铁岭、昌图以及四平等地分别抗击国民党军队。同时，苏军也以瘟疫、交通等种种借口阻止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向北推进①。

这时，国民党正以沈阳为中心向北、东、南三面进攻，而中共中央也确定了"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之战略方针②。这样，东北战争迅速全面展开。

东北战争蔓延，使美国的调处可能前功尽弃，故马歇尔极力压迫蒋介石和中共代表，于3月27日达成了一项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执行调停任务的文件。由于此项文件只规定了调处军事冲突的任务，而国民党军队已攻占辽阳、抚顺、铁岭，正向四平街、本溪、鞍山等地进攻，因此中共中央对于派遣小组去制止正在发生的战争表示赞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允许国民党军队可以在东北接收"主权"。特别是考虑到国民党进入东北之部队已达5个军以上，美国还在陆续帮助国民党运送更多的军到东北来，这势必要改变国共在东北现有的力量对比，故中共中央已提出严重交涉，警告说："如美方不停止再运，我方将认为美方政策已有变更"，"不得不严重考虑对策"③。可美国方面对此却另有打算，其不仅拒绝中共交涉④，而且密令派赴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协助"政府军"：（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运、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和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3）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⑤。

---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230—234页。

②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1946年3月24日。

③④ 《中央关于决不能让国民党5个军以外的任何部队进入满洲致周电》，1946年3月29日；《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719—720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94页。

美之全力援助，使蒋在东北问题更加有恃无恐。4月1日，蒋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公开扬言，对于共产党所谓“民主联军”和所谓“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①，从而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道路。而依据密令前往东北的执行小组美方及国方代表，也迅速就小组使命问题与中共代表发生争执，致使东北调处文件形同一纸空文。

4月初，苏方代表接连通知中共方面：苏军定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夺取三市②。他们表示：美国利用蒋接管东北来反苏，蒋利用美反苏反共，苏联目前不想直接涉足东北，故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全力坚持东北，使之悬而不决，造成美蒋之被动。

4月上旬，中共军队在四平和本溪接连挫败蒋军进攻。14日长春苏军全部撤离，17日共产党人攻入长春，并于19日完全占领。取得长春，对于共产党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故中共中央一开始就力主“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③。

长春取得之后，4月下旬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亦相继占领。这样，北满、东满及南满之一部均为共产党人所有，国民党军队只占有锦州至沈阳一段铁路线和周围一些重要城市。且国民党已运抵东北之部队仅7个军24万人④，而中共军队已达到40万左右，因此形势看上去颇有利于共产党人。但事实上，由于共产党人所占点线过多过长，且新兵较多，训练和装备较差，而国民党

---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74—78页。

② 《彭关于苏军撤退日期致李、黄并告中央电》，1946年4月3日。

③ 《中央关于东北局应迁长春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4月19日。

④ 《周恩来关于同马歇尔谈话内容致中央并转东北局等电》，1946年4月24日。

军队装备优良，兵力集中，全力突击本溪、四平，致使中共军队疲于招架，十分被动。尽管中共中央下决心“死守”四平、长春①，但它实际上也已经认识到，目前第一位的任务已经是“力求迅速停战”了②。故周恩来很快即提出：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只要和平与民主，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比例，并非想独霸东北，要求国民党正视现实，开始谈判③。然而，仍旧握有重兵的蒋介石，是绝不肯在这种条件下来同共产党谈判的。

4月29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了蒋的决心，声称他无能为力，决定暂时退出调处。此举实际上是马歇尔的一种策略，但他却美其名曰向双方施加压力。对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警告说：马歇尔暂时退出可以理解，但若美国借机运兵借款以援蒋，东北战争就可能“变成全国性的内战”④。

周恩来的警告马歇尔当然清楚。他确也担心东北大打祸及全国，且深知国民党军事上有严重弱点，继续战争会使中国在军事、财政及经济上都陷于严重混乱⑤。但是，东北事关美国对苏战略利益，中共控制东北的势头必须遏止，因此在国共之争无计可施，而国民党又占优势的情况下，他只能继续支持蒋介石运兵东北，以便使国民党有效地控制东北局势。当然，他仍旧指望停战，故一方面继续向蒋进言，一方面则力劝中共主动撤出长春，让执行部派员进驻，然后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从4月上旬到5月中旬，共产党约6个旅在四平一线阻击蒋军达一个多月，顶住了近10个师的轮番进攻，伤亡近两万人，且

---

① 《中央关于死守四平挫敌锐气致林彪电》，1946年4月21日；《毛泽东关于长春应布置守城致彭、林电》，1946年4月20日。

② 《中央关于同意马歇尔停战方案意见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4月26日。

③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811—812页。

④ 同③，第802—805页；1946年5月1日《新华日报》。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1—124页。

兵力全部投入战斗，极为疲惫。不得已，中共中央决定必要时"应主动的放弃四平"，同时要求中共代表团根据马歇尔的提议，经民盟提出"长春双方不驻兵"，组织"三三制民主政府"，市长由中间人士担任的建议①。但因5月19日中共军队被迫撤出四平，长春门户洞开，蒋介石气焰大盛，此议遂不了了之。不仅如此，蒋一面通知马歇尔：除非美方成员在执行部及执行小组拥有最后决定权，否则他将不愿受任何进一步协议的约束②，以此来拉美压共；一面挥师北进，迅速拿下长春、吉林，攻占辽源、伊通、西丰、西安，并分兵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水吉、安东等城市推进，并扬言："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③。然而，事与愿违。中共四平之战并未损伤主力，相反，被迫撤出各大城市，退据东北广大山地和乡村，恰恰有利于发挥共产党的优势，国民党则变得战线过长，捉襟露肘了。南满中共军队乘敌北上，迅速展开攻势，歼灭国民党军第184师（一部起义），重创207师，再下鞍山，直逼海城、大石桥、营口附近，迫使其北上部队不得不停止在松花江以南，不敢继续向北推进，其余各部则只能龟缩在几条铁路干线沿途的城镇里，根本无法展开。

对此，马歇尔早有预见。他反复告诫蒋："东北幅员辽阔，交通线绵长，中央军数量不足，无法处处设防"，应乘此"最好时机"，"与共方商谈解决一切问题"④。为迫使蒋让步，马歇尔甚至决心以宣布退出调处相威胁。终于，蒋亦意识到军事上的弱点。因此，为进一步调集兵力巩固南满，并在舆论上向中共施加压力，蒋宣布在东北休战15天，以便谈判解决停止东北冲突、

---

①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问题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5月15日。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880—881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30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34页。

恢复国内交通及实施整军方案的具体办法①。但蒋特别声明：“政府对收复主权保持自由行动一点，应始终予以维持”②。

对蒋之休战，中共当然不能相信。但考虑到“长期战争与我不利”，故同意与之和平谈判，准备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③。只是，中共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仅以和平的方法是不能保持其基本利益及获得真正的和平的。

果然，休战伊始，蒋军即向南满解放区进攻，并公开声明要继续其在东北的“接收”行动，要共产党人退出他们指定的所有城市④。毛泽东对此早有准备，遂命令山东解放区进攻被围各点，并由周恩来公开宣布“收复”由伪军占据的这些据点⑤，以示其强硬态度。同时，中共军队对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的进攻和在山西的战争挑衅，或坚决应战，或实施报复性措施。国共双方都很明白，目前的谈判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虽然双方都一再表示同意延长休战⑥，但相互之间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停止。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在国民党目前统治之下，得到一种真正的和平民主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感到，它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抗来自国民党的任何进攻”⑦。共产党确信：“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关键取决于战争。“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⑧。

---

①④ 1946年6月7日、8日《中央日报》。

②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第37卷，第348—349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我党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条件下实现和平的指示》1946年6月7日。

⑤ 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

⑥ 参见1946年6月22日《新华日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63—664页。

⑦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008—1020页。

⑧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的指示》，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

6月30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整军方案谈判的情况，称已让到“不增加师的数目，哈埠让政府象征接收，淮安、张家口、承德三地驻正规师，三地以南不驻正规军，驻保安队”，“仍未得蒋同意”，“坚持我让出”，“非要苏北、安东、承德不可”①。鉴于此，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蒋得寸进尺”，“目前一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②，下决心与蒋斗争到底。

时至于此，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全面展开了。

（三）“中间地带”的革命？

自抗战结束以来，始终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和”与“战”的问题。毫无疑问，没有人希望战争，特别是在人们显然还看不到胜利前景，而国际国内又充斥着要求和平的空气的情况下，准备和平的思想自然在党内占着主导地位。尽管还在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就要求全党作好战争的准备，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实际上也始终处于一种半战争的状态，但就连毛泽东也承认，由于美苏两国的介入，事情一度“似乎变了”③，好像中国确实要走上和平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了。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一件新奇的想法。无论在20年代中期，30年代中期，还是40年代初期，凡是在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发展和稳定的时期，都可以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看到类似的设想。但是，在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反复之后，要想让毛泽东再相信共产党与国民党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建

① 《周恩来关于整军方案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6年6月30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一个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6月30日。

③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如此强大的足以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政治势力之后，必欲坚持一党独裁的蒋介石能够让共产党来与他平分秋色吗？不错，考虑到“国共反映美苏”，“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毛泽东也一度设想过卧榻国民党之旁的可能性，相信“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因而准备在保持自己一定武装、政权和地盘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实现和平共处。但蒋介石却连共产党“在保存一块地方的条件下订城下之盟”的机会也不给，正如毛泽东所说：“蒋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①，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怎么能避免呢？

共产党人是不怕战争的，他们就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在中国全面内战，不论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如何，它是否符合世界大势，是否符合苏美英三强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呢？十分明显，和过去相比，中国革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息息相关了，以至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几乎不再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程度，甚至也不能取决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强弱，而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苏联和美国的态度了。因此，尽管人们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注意到战争难以避免，但“打不打”的问题始终不能决定，对和平幻想始终难以彻底扫除。

中共中央这时对战争的担心主要有二，一是战争是不是会给苏联造成困难，二是战争是不是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抗战胜利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的电报，到苏联赞成马歇尔调处中国内战和苏军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态度的反反复复，他们不难看出苏联力求妥协的复杂心态。无须否认，中共中央之所以一再相信“和平是能取得的”，并且一度准备走法国式的道路，正是受苏联态度影响的结果。但是，从1946年3月以后，这种情况

①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显然开始改变了。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积极支持中共在东北搅混水的情况，说明苏联不仅不再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战争，而且相信这种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苏联有利了。于是，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国共战争是否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不仅苏联人这样想，毛泽东也这样想。但是，未必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仔细观察以后，毛泽东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一旦国共战争全面爆发，会使美苏之间在远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但这未必会造成新的世界战争。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自 2 月份以来苏联和美英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特别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的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反苏演说①，和斯大林措辞严厉的针对丘吉尔演说的谈话②，表明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论中国事态如何发展，其实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造成的严重损害和各大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签订的各种条约，注意到美苏在欧洲与亚洲几个月来又斗争又妥协的情况，注意到斯大林一方面坚持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方面注重和平的态度③和欧洲各国左派势力处于上升趋势的现象，他又断然相信，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反动势力，因此，美国不大可能为了局部范围的争执而向苏联公然诉诸武力。

既然相信国共之间的战争不仅不会对苏联不利，而且一般也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再顾虑"打不打"的问题似乎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统一思想和解除中央内部存在的不必要的担心，毛泽东于 4 月间拟就了一个内部文件开始在中央领导人之

---

① 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历史文献》（英文版），第二卷，第211—217页。

②③ 《斯大林文选》，第462—468、469—470页。

间传阅。文件明确认为：由于世界民主力量超过反动力量，目前实际上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美、英等国同苏联之间在各种重大问题上，“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但是，美英等国反动力量之所以能够向苏联作出妥协，“只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因此，“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①。毛泽东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即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什么世界大战，大战不可能发生，美苏必然妥协，而美苏妥协更没有必要去顾虑，因为这种妥协纯粹是建立在世界民主力量的增长和斗争上面的。各国的反动势力越小，民主力量越大，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少。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各国的民主力量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对于反动势力，“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②。显而易见，毛泽东重又相信必须立即开始在全党树立夺取全国政权的大目标了，他甚至已经首先树立起了准备消灭国民党的坚定信心。

在1946年5月以后，大概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了。国民党不顾一切打下长春，显然为共产党开始实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全国范围的战争提供了一个下决心的重要机会。毛泽东很快就断言：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即。进而，他毫不迟疑地把战争引向关内，明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与晋察冀各军区乘蒋军全力向北之际，猛扑其后背，通过运动战大举歼灭敌人③。随后，毛泽东接连不断的写文章发文件打电报，为全党和全军鼓气。他明确宣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从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181—1182页。

③ 《中央关于准备全局破裂后作战方针的指示》，1946年6月22日；《中央关于准备举行平汉战役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

来没有这样广大”，而“国民党则从来没有这样丧失人心”①。“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顺，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②。

不过，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要在1946年里树立起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问题很明白，这时美国的调处仍在继续，和平的大门尚未关死，而军事形势总体上却很不乐观，共产党人在东北、热河、察哈尔、山东、湖北等许多地方都还明显地处于守势，甚至丧城失地，受到美国大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看上去则要相当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毛泽东不断地为党内同志鼓气，党内的和平空气仍旧很浓，“打不打”的问题仍未解决。因此，即使是毛泽东，这时也还是不能不作着和平和妥协的思想准备。

一切还是老样子，共产党不能不准备妥协，“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说过的这句话，如今依旧适用。但是，毛泽东内心十分清楚，时至今日，或者共产党交出武装，或者蒋介石让出政权，双方已再没有妥协的可能。如今的共产党当然不怕国民党，问题仅仅在于在那国民党的背后还有一个美国在那里指手划脚。共产党可以不管蒋介石做些什么，但却不能不管美国政府说些什么，这是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同美国的对立和冲突不仅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军事卷人，而且几个月来美国激烈的反苏宣传表明，美苏之间未必一定会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在欧洲的冲突和对抗必然日趋紧张，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卷入会不会造成苏联的被

① 《中央关于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问题给郑李王的电报》，1946年6月21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问题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183页。

动呢？

投鼠忌器，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不解决这个矛盾，中国革命就无法前进一步。鉴于美国方面反苏宣传越来越露骨，在国共冲突问题上越来越公开偏袒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开始下决心打破对美国的一切幻想。1946年8月，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他公开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并且直截了当地断言：“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的逻辑很清楚，即“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①。在这里，毛泽东再度表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的宏伟气魄。而他之所以敢于藐视正在全世界称王称霸的超级强国美国，一方面是他坚信“斗争哲学”，相信“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共产党的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到：“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②。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相信，当今世界斗争的中心实际上还不是美苏之争，而是美国的侵略和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为敌，只是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的一部分，它归根结蒂只会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有利，而不会把苏联拖入困境。

如前所述，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就已经在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性了。但是，抗战结束以来，毛泽东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几乎总是不能不随着美苏关系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191—1193页。

的变动而变动，并以美苏之争作为整个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以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作为自己战略策略的基本出发点，以至往往把自己与国民党的斗争也看成是苏美斗争的一部分，从而无法确立独立自主的战略策略。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过分看重美苏妥协，以至于过分看重美国力量的情绪。这无疑不符合毛泽东的愿望。因此，在1946年2月中旬以后，当毛泽东看出战争不可避免之后，他就始终把确定正确的对美战略看成是当务之急，并积极致力于扫除党内的恐美情绪与和平幻想。如今，这种努力终于导致毛泽东首次开始在思想上突破战后大国体系的束缚，确立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并依此来处理对苏关系了。中共中央甚至明确告诉党内："对苏战争危机目前已不存在"，"故实质上苏美矛盾在世界制度上虽是基本的，但不是实际政治的主要矛盾"①。言外之意，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今后再不应当成为左右我们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了。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应当成为我们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国民党公然进攻共产党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最困难的"打不打"的问题终于在蒋介石的"帮助"下彻底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胜不胜"了。既然全党都已经明白了非打不可，那么，其他的问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毛泽东相信，只用简单的算术就可以使全党明白胜利的必然性。他明确告诉全党：蒋介石能够参战的只有180多个旅，其中半数必须守备，能野战的不足100个旅在过去三个月中已经被消灭了25个，今后一时期再消灭25个，就足以停止其进攻，再歼灭其25个，"国共军力对比，必

① 《周恩来、陆定一关于国际形势的宣传等问题给方方、林平的指示》，1947年1月20日。

起重大变化”①。至此，中共中央不打算管美国人说什么甚或做什么了，他们下决心用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并且大胆地提出："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把他（注指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在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然后"超过"他②。当然，毛泽东这时还是不能不对美国的态度完全不闻不问，他承认，和美国的"麻烦仍是长期的"③。如果美国放弃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那末，三年或者五年就可能解决问题，否则，"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或者可能要打十年到十五年，以至"打得一个县城都没有"，或者打到一定程度，美国又会出来要求国共谈判，"我们亦不能拒绝"④。

不过，对美国的顾虑也就到此为止了。尽管在1947年2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还一度考虑过不得不停战的可能性。几个月之后，这种可能性已经根本不存在了。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冷战宣言》和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复兴欧洲方案》，使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共势力空前增长。与此同时，为对抗美国的冷战计划，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宣布成立欧洲工人党和共产党情报局，并召开共同会议，公开宣告：世界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的革命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动阵营，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高举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帜，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⑤。这种情况的出现立即使国际政治格局和战后美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大阵营的形成和苏美在欧洲尖锐对抗的局面，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同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完全放手地反对美国和提出"打倒蒋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90—1193页。

②③④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⑤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石”的战略目标。过去，对于是否提出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中共中央始终有所犹豫，担心会便利美国的军事卷入。现在，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毛泽东明确认为："美国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少"，因为“美国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他们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在他们是不在乎的”。

1947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日公开发表，首次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①。随后，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树立“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并尖锐批判资产阶级中间派试图在国民党的统治和共产党的统治之外寻求建立一种欧美式民主政治的政治方案。中共中央明确断言："在中国现状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凡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并受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鉴于国内一部分中间派人士表现出试图抛弃蒋介石国民党，同时也脱离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倾向，中共中央开始告诫全党注意对“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的“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的本质提高警惕，并且“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②。而对于来自外国的任何试探国共和谈的企图，他们更是要求外交人员“以反对外国干涉的态度严正拒绝之”③，坚决反对给蒋介石国民党任何喘息之机。甚至，他们也不准备接受来自苏联的任何这方面的劝告。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相信："苏联不干涉各国内政，况且大西洋宪章也承认人民有权”，有谁能够迫使各国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35—1239页。

②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的领导权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

③ 《中央关于与英国大使商谈方针给方方、乔木、之光的指示》，1948年9月25日，等。

放弃斗争的权利呢？因此，即使苏美英需要妥协，也不发生国共两党是否随之妥协的问题。

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当方向已经确定，步伐已经迈开，他不允许任何人阻挡他通向成功的道路。即使他们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毛泽东还是共产党人。当九国情报局宣告成立，苏联共产党通过日丹诺夫在华沙九国共产党会议上公开宣布世界已经划分成两大阵营之后，毛泽东即明确通知苏联方面："我们对于欧洲九国共产党成立情报局，认为必要的，对于日丹诺夫的报告，认为是正确的"①。当苏联展开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批判，他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苏联的一边。而为了准备建立新中国，他同样首先想到的就是亲自前往苏联去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如何建国的各种问题。

在1948年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已经得出了结果，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甚至两党军事力量对比的逆转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还要迅速得多。国民党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走入穷途末路，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日思梦想的新中国正在向他们走来。他们能不能允许别人让他们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呢？即使他们可能因此会与美国军队发生直接的冲突，甚至出现美国出兵干涉的情况，他们也决心在所不惜了。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作此准备，他指出：我们准备愈充分，打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便美军干涉，也无非占领一些大城市，使全国解放的时间延长些，最后的胜利也还是我们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斯大林未必不理解。当毛泽东打电报表示愿意来莫斯科探讨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意识到不应当让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离开正在尽速发展的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显然，他同样关注中国革命成功的巨大意义。十分明显，在苏美对抗和世界正在分成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下，再没有比这个占

---

① 见《毛泽东致东北局电》，1947年11月21日。

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亚洲大国转入到社会主义民主阵营更为让人振奋的了。这无疑是对美国在亚洲霸权的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为此，他很快决定派出他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潜入中国河北的农村，与中共最高领导人商讨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斯大林也并非没有顾虑。当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函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以与共产党谈判时，他仍旧不能不担心这是否是美国准备借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一个借口，以至不能不委婉地要求中共中央直接与国民党谈判，以便制止美国的卷入①。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到长江以北，准备渡江之际，他也不能不再度想起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是如何坚持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因而多少担心人民解放军过江是否会引起美国出兵。甚至，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人们也还不能忘记苏德战争前后中共中央所表现出来的类似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种“民族主义”的态度②。

毫无疑问，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也不喜欢来自苏联的这种无端的猜疑，他们同样对历史上苏联人的种种粗暴干预记忆犹新。然而，他们也同样清楚地知道，来自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对中国革命有着怎样的意义，而在当今的世界上，他们又必须作怎样的选择。合乎中国革命逻辑的情况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提议，与国民党举行了和平谈判，但谈判的目的只是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进而，谈判破裂，毛泽东下令挥师过江，解放全中国。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③，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者

① 《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月10日。

② 参见《蒋南翔给中央的报告》，1948年9月。

③ 《毛泽东选集》，第1480页。

联合苏联，或是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世界上不论哪一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①。

在这里，“中间地带”消失了，世界又重新变成了两个对立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不论在这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在过多少偶然性，也不论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多么强烈的独立精神，对于必欲踏上而且也是刚刚踏上通往胜利之路的他们来说，多半也只能有这一种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间地带”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已经消失。区别于苏联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已经并且还将告诉他们，世界并不是一元的，也不是两元的，它必定是多元的，并将永远是多元的。

①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日。

后　记

这本书的内容最初来自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中国革命与远东国际关系专题课时的讲稿，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央党校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帮助，这里我深表谢意，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牛军在本书最初成稿期间所给予我的支持。

由于原稿篇幅过大，本书在第一章和第五章作了较大删节。这多少使得这两章看起来显得有些简略，特别是第五章似乎结束得过于匆忙，许多问题没有能够说明或展开。对此，还望读者见谅。

作　者

